

目 录

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摘录)	1
八 我们的农民政策	1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1
谈谈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短评)	63
作为一种思想家类型的列宁	67
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	
(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新经济学》一书的批评性意见)	78
一 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彻底性问题谈过渡时期 规律的特征	79
二 关于经济生活调节者的问题, 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基本错误	87
三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或为什么不应当以普列 奥布拉任斯基代替列宁	100
科学和苏联	120
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可能性	133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二十次会议 上的发言	175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时期	198
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的教训与党的任务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的总结)	209
一 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	210

二 沙赫特事件	231
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	
(在列宁忌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240
论农民政策(摘录)	267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	270
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	
(在第四次工农通讯员会议上的报告)	300
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	324
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338
一 从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观点对我国革命的总的估计	340
二 我国发展的总方向 and 政策的总方针	342
三 国际形势和对它的估计	343
四 从国际形势着眼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345
五 经济政策的基础	347
六 基本阶级关系问题	351
七 文化建设问题	353
八 国家机关以及国家的和党的领导问题	355
十月的纲领(纪念我们党的纲领发表十周年)	361
技术经济革命, 工人阶级和工程师	375

关于联共(布)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的总结(摘录)

(1926年1月5日)

八 我们的农民政策

从这里我就更详细地来谈谈农民问题，因而在这里我要更多地作些重复，我要说说许多同志从其他的发言中已经听到过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能在两个方面犯错误；或者是看不到日益增长的富农，或者是不了解中农的需求，对中农估计不足。人们指责我们，好象我们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性。我们指责反对派的同志不了解关于中农问题的全部重要性。但是我们大家都同意，有过个别情况，人们的确缩小了富农的危险性。当我们讨论我们政策的原则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看到基本的、最大的、最有决定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次要问题上犯了错误，这还不那么可怕。但是我们如果忽略了某个庞然大物，那就糟糕了，那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同志们，如果我们提出关于我们的农民政策的问题并且问道，谁是最主要的庞然大物，那我们就回答说：中农。例如，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我们的全部经济必须适合于中农经济。为什么中农会升到了首要地位，为什么正好是它呢？这正是因为它“是庞然大物”。有些同志钻进了旧书里，很好的旧书里，发现我们有这么多雇农，这么多贫农，这么多富农等等。但是

这种统计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中农之所以在我们这里起着这么大的作用，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国伟大土地革命的遗产。难道能够忘记，几乎全部地主的土地——82%——实际上平分给农民了。这对不对呢？对的。我们有过一段剥夺富农的过程，我们把富农分得一千二净，分了它的财物，分了它的家畜和土地。这是过去的事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两个过程——“剥夺地主”和“剥夺富农”——导致了农村的中农化。分化过程现在是不是受到什么障碍了呢？是受到障碍了。什么障碍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土地停止进入商品流转。如果不停止的话，它就通过买卖很快转到比较富裕的农民手里去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土地买卖。这就是农村分化的巨大障碍。

我们的法律支持的不是上层阶层，而是力量单薄的阶层和中农阶层。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于上述过程和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农村现在基本上还是中农的农村。基本上中农构成农村居民的大多数，中农经济在我国整个农业经济中成了最大的经济因素。因此，当我们展望农村，当我们在这里给自己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最主要的任务的时候，那就十分显然，不经常解决我们就无法生存的最中心任务是，懂得同中农建立巩固联盟的必要性。如果反对派中的某些同志，特别是象瓦尔丁那样好尖叫的同志，论述“中农布尔什维主义”，提及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等等，那么这是极端不了解我们的政策。

人们常常回忆，以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有过什么情况。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对于全部贸易一概禁止，并反对任何破坏这项禁令的人，把他们当作投机分子、渔利商人、坏蛋等等。我们是这样做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这是国内战争时期。

但是请你们回忆一下，当我们开始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

宁写了些什么呢？他写道，现在已经不能把任何贸易都当作是投机买卖了，现在我们自己许可做买卖，而且自己在做买卖。所以，现在当人们说：中农，这就是投机商，因为它卖粮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们自己都鼓励这种贸易，因为我们的政策已经不是骂中农做买卖，而是抓住它的贸易活动和利益，把它引入合作社，然后通过合作社使它与我们的工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把它引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比叫嚷投机多少要困难一些、麻烦一些。但是不这么做，我们就绝对没有别的办法。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从两面“受冲刷”，越来越单薄。一部分上升为富农，一部分则下降为雇农。我们这里有这种过程吗？有。但是它是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强烈呢？不，不那么强烈。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也是相当稳定的，而在我们的政权下它就更加稳定好几倍。为什么？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同富农作斗争，支持穷人，跟中农搞好巩固的联盟，把土地从商品流转中剔除出去。所有这一切就使中农群众变得更为稳定。因此我们的中农问题仍然要在很长的时间内作为中心的和基本的问题。这里我应当说一说下列情况。许多人这样认为：如果你们净叫嚷中农、中农，而关于富农的危险性叫嚷得少一些，那你就把全部政策搞偏，而打不中要害。而对于这一点我们说：我们并不否认富农的危险性。但是如果你们对于中农注意得不够，那么你们就会因此给富农帮了最大的忙，因为除了使中农脱离无产阶级影响之外，事实上再没有帮助富农的更好办法了。我认为，在关于中农、富农和贫农相互关系的全部争论中，这一点如果说不是中心的，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每一个嚷嚷“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也不是每一个叫嚷“富农、富农”而忘记中农的人，都对富农进行了很好的斗争。他打的往往不是马，而是辕。

富农为什么有力量呢？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对贫农的剥削，而且还在于它使中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如果富农是孤立的话，难道它对于我们能有巨大的危险性吗？任何巨大的危险性都不能有。它的基本危险性就在于，他能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地控制中农，并且在此基础上也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富农是一个不大的集团。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也钻进了苏维埃。为什么？因为有中农把他们引进来。为什么要引进他们来呢？因为富农在经济上有时更接近中农，因为它比我们的合作社更会做买卖。如果有人反对我们说：你们关于中农说得太多了，关于富农的危险性叫喊得太少了，那就可以把这样的反对者叫做怪物，因为，实际上如果不把中农从富农那里夺过来，那又怎样去对富农进行斗争呢？这是主要的。再没有别的更主要的同富农作斗争的手段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农当作投机分子而稍微刺激它一下，那我们就会因此给富农帮了忙。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报告和讲话里多多提及中农，那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在实际上，在我们的经济措施上不够认真地对待中农，那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不把中农合作社整顿好，而是让中农看到，合作社买卖做得不好，富农做得好，那我们也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果我们在苏维埃中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就会把它推到富农一边去。如此等等。它，富农，将会利用中农的选票进入合作社和苏维埃，那时它就真正是危险的了。

这样，能不能离开中农问题来提富农问题呢？这将是错误的、荒谬的问题提法。对富农斗争的主要办法，就是使中农脱离富农。

但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中争取中农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在农村整个雇农和贫农中间拥有坚强支柱和对自己政策的坚强支持时才能最有成效地进行。给贫农以经济的、生产业务上的、“工会的”（保护雇农利益）、政治的帮助，不言而喻，是我党最责无旁贷的

义务。

现在来谈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你们知道，党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是从哪里来的：加米涅夫同志，再早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实行“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让步的路线的决议。这就是说，我们党早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就作了根本转变，在反对派看来，代表会议正是对富农作了让步。人们那么害怕富农，到处都只看到富农。我们不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评价党的决议。这些决议真的是“对资本主义分子”让步吗？不是的。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面临的是什么呢？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面临的是，在农村的某些地方发生一切阶层对我们和我们的良好的法律表示不满。我给你们列举几个关于租佃和雇佣劳动力的实例。我们对于租佃和雇佣劳动力有过极其严格的法律。许多从来没有到过农村而很少研究农村的人都听到过关于租佃的事情。从前租佃是这样的：农民向地主租用土地，付给他哄抬得很高的租金，所谓“充饥租佃”。而关于这种租佃的概念还一直存在于某些人的脑海里，他们认为，就是现在的农村也还是那样。

然而，谁现在租用土地呢？我们这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比较富裕的向比较不富裕的、向贫农租地。一个人有一定数量按照定额规定给他的土地，但是他没有农具，没有马，他不能耕种。富农分子想要租用贫农的土地，但是租赁是被禁止的。因而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想赚几个钱的贫农冒着破坏我们法律的危险终于把土地租了出去，而富农则利用这一点就付给比较便宜的租金，比公开准许和公开租用的情况下付得少。一俄亩地付几十戈比就算了。

这对于我们有利吗？我们土地国有化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叫贫农再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交给富农使用吗？使这种租佃合法化并进行监视，以防止产生奴役性的合同，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呢？问

题就是这么摆着的。

雇用劳动力禁止得更加严格。而这个问题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有了不同的提法。在代表会议以前，按照法律规定的结果是这样：我们雷厉风行地禁止了雇佣劳动，可是我们忘记了，农村中绝大部分的过剩人口不能把劳动力用于土地。我们说过而且写出了一道很好的法令：禁止雇佣劳动，我们使你不再受到剥削。

可是贫农呢？他这样想：如果你们一块面包也不能给我，那我就宁愿跑到最坏的恶棍富农那里挣块面包吃。但是因为这个最坏的恶棍富农知道，他被禁止雇佣劳动力，而贫农也知道这个，但还是来要求受雇，因此富农就利用这一点说：我要少给钱。同时，因为这种雇用合同不是公开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雇农的利益得不到任何工会的保护。这就是结果。这就是说，我们这里不仅富农不满意，连贫农也不满意，因为我们禁止他受雇于人和出租土地，并且我们这里中农也不满意。为什么中农不满意呢？因为中农一方面倾向于富裕农民，而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无产者。但是，问题当然不仅在这里。整个农业经济的增长和中农经济的增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是经济的基本部分）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引起中农经济商品率的增长。中农开始对于扩大商品流转范围表示关心。它自己做的买卖增加了，卖得更多了，同时也想多买点。以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残余、对贸易的各种恐惧、过分热衷于行政手段已经使它厌恶了。凡是限制商品流转的一切措施，都给日益发展的中农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它坚决反对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

所有这一切还有其另外的一面。那就是：经济的整顿和提高——首先是中农经济的提高——要求有更精确的核算。为了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有政府措施的正确性、革命法制。或者说还有另一个问题——中农经济的提高引起对合作社的向往。但是，如果

不消灭以前的制度，如果不实现自愿的原则、选举制、被选人报告工作情况的制度等等，合作社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由此产生许许多多关于活跃合作社和苏维埃、关于革命法制等等方面的措施。所有这些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措施首先都是为了迎合中农的。

所以，我们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文件、不是一纸命令，对我们重要的是行动。我们看到，我们的禁令措施不仅对于富农翻开了不利的一面——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而且对于贫农、对于力量单薄的中农也翻开了不利的一面。我们想要保护雇农，我们愿意保护贫农，可是实际结果却是我们妨碍了他们。我们说：来吧，让我们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换一个方式干吧。我们准许租赁的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将要坚决反对愚弄贫农。我们许可更广泛地利用雇佣劳动，但同时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通过工会，通过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在剥削者面前保护雇佣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紧密地联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

不言而喻，由于取消某些障碍使富农也占到了便宜，这是真的。难道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从新经济政策占到便宜吗？占到了。难道我们对于这一点事先没有估计到吗？而难道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这个资产阶级而实行的吗？这么说来，整个新经济政策都“正是对资本家”的让步吗？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村，对农民的让步。它同时也是我所说的战略手段：退却、改组队伍和以旨在保持同中农联盟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崭新方法实行进攻。要知道，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除了我们恶毒的敌人之外，谁也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家的让步。只有我们最恶毒的敌人才说：“共产主义破产了，共产主义什么也不剩了，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向资

本家卑躬屈节，对资本家作了让步，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这样说的吗？但是，难道我们对于这种想在我们队伍里散布恐慌情绪的胡说八道屈服了吗？没有。我们从新经济政策退却了吗？没有。我们沿着这些轨道走去，我们打了我们的敌人不是十个耳光，而是二十、三十、四十个耳光，而且还在打，将来还要继续打。现在在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命脉的条件下，我们正在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我们现在已经不用空文、废话来安慰自己了。对于我们重要的首先是这些东西的真实的内容。我们说：我们发展商品流转，这个商品流转可以带来更加大得多的利益，将加速整个流转，也将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周转，它将更快地增长；在我们的国库中我们将有更多的钱；我们将能够收到更多的税。我们将能够实际上帮助贫农和中农。我们现在不说把每个富农的裤子脱下来，把每一座铁屋顶拆下来；但是我们对贫农说：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吧，把中农组织在自己的周围，要学习不用靠社会救济养活的办法去反对富农，要学会自立，要学会用组织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经济，而我们，国家、党将帮助你们。要学会不是按照贫农委员会那样，而是根据新的条件把自己改组为阶级力量。到合作社来吧，要在经济轨道上打击富农，要用合作社，用政治和经济战线排挤富农，向富农进攻吧。

新反对派的拥护者说，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是对富农的让步。你们看见，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里在对农民的基本群众即中农和贫农的队伍进行改组，在最初时期富农也利用了贫农。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并不是为了偏爱富农我们才想出这个名堂来的，正如不是为偏爱资本家我们才想出整套新经济政策来的一样。

现在我要问一问你们：把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看作是对富农让步的观点，同反对派对我已经在这里说过的其他问题的提法有无联系？当然有联系。因为，如果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

那么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中的发展也就是这种退却的继续，而退却就意味着对阶级敌人让步。而阶级敌人就是富农、资本家。反对派的所有论调都照着一条路线来的：无论对在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无论对新经济政策的观点，无论对我们国营工业类型的怀疑，无论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照着一条路线来的。不言而喻，如果对富农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和农民的中农部分建立牢固的联盟，那么这根本不排除组织贫农，而是以组织贫农为先决条件。没有我们这个在农村中的最主要的支柱，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贫农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一直帮助贫农而且将来还要帮助贫农，因此把我们的十月全会的决议看作是对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修正是十分愚蠢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说过不止一次了。这不过是对于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补充。

我们认为对富农的主要斗争首先是在使中农脱离富农的战线上，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是贫农。我们常常有大量的富农和贫农签订的奴役性合同。有时这些合同甚至不是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有这样的情形，富农虽然不使用雇佣劳动，但在间接形式下却是一个不小的剥削者。让我们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假设富农有一部打谷机，他把它用高价租赁出去，因而在它上面发大财，或者他用高利出借种子。这种剥削形式太多了。贫农、中农都受它们之害。但是，同志们，为了对富农进行斗争，需要善于首先使中农离开它，同时以贫农为支柱。富农同中农联盟会给富农以力量。

我们现在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农村政策方针了。我们的支柱是贫农，包括雇农在内。这是我们影响的最忠实的传播者。我们可以在贫农帮助下争取过来的同盟者是中农。我们的敌人是富

农。这就是许多人喜欢“徘徊”的那三棵松树，这就是许多人从里面怎么也爬不出来的那三棵松树。不能使一个任务脱离另一个任务。不能把关于贫农的任务和关于中农的任务两下分开。贫农不能单独地对付富农，而中农没有贫农也不能单独地对付富农。不能使同富农斗争的任务脱离把中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问题。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农村阶级政策的同一问题的不同形式。关于农民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关于倾向问题也是由这一点来决定的。代表大会谴责了两种倾向：既谴责了看不见富农危险性的倾向，也谴责了看不见同中农结合的全部重要性的倾向。党有义务对富农剥削者的侵犯给予反击，党应当特别警惕注意，使与中农的“牢固联盟”不致遭到破坏。只有通过这个联盟并以贫农为支柱，我们才能够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富农。

译自《真理报》1926年1月12日。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 第二十三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926年2月)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党中央向你们的代表会议表示祝贺(掌声)。你们的代表会议结束了列宁格勒党组织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期。它是列宁格勒组织历史上同时也是我们全党历史上一个极其艰苦的阶段的终结。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格勒党组织应该——并且毫无疑问会做到这一点——使整个党的战线排列得整整齐齐，使自己的所有组成部分——上层组织、广大中间阶层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重新占据理应属于它的地位，即要作为我们全党的和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掌声)

同志们！我们的争论是在我们国内的情况极其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我们经历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蓬勃增长的时期：我国工业的增长，农业的增长，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贸易周转的增长等等。同时，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我国总的经济发展的范围内，我们相对地加强了我们的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我们的一切命脉，我们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主要命脉——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我们加强了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我们的银行和我们的信贷机构；在国家垄断的原则下我们发展了对外贸易，巩固了国营商业，特别是在其主导部门，也就是在批发商业和批发零售商业中；我们巩固了——尽管还远远不够而且还远远没有按照

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当前情况的主要特点，就是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在一些矛盾的形式中进行的。我们发展起来了，但与此同时，私人的——小的和部分中等的——工业家也发展起来了，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家、采购商和富农也发展起来了，——总之，在总的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在我们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上，在我们实行进攻的同时，在我们的经济命脉在整个经济中实行进攻的同时，一些反对这些命脉的形形色色的和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成分，也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我认为必需简单地谈谈关于另一类矛盾，另一方面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转中，在那里作为粮食购买者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作为粮食出卖者的农民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对抗的。

同样不应忘记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我国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当然，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同工人阶级和大资本之间的矛盾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是矛盾。其次，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不同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我们的无产阶级内部毕竟存在着这些矛盾，它们反映和表现为工人阶级某些阶层内部的某种动摇，它们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唯一的党内也有反映和表现。我在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这样一些矛盾，如我国工人阶级的“管理”干部与“被管理的”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有经济才能的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即做粗活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老的基干工人阶级和新参加工作和刚刚进工厂的工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年龄上的矛盾，即年长的工人干部和年青的工人干部之间的矛盾，由于生活经验不同所形成的矛盾。

这后一种矛盾不是阶级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工人阶级和

资本之间的矛盾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些矛盾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相比甚至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些矛盾是我们本阶级内部的某些摩擦，但是，尽管如此，它们毕竟存在着，尽管如此，它们毕竟产生一定的实际困难，这些困难我们应该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加以克服。

由于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不纯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矛盾，因为存在着诸如经济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乖戾行为等一系列消极现象而必然尖锐起来，今后我们党必须同这些现象作长期的斗争。所有这些矛盾的总和，——工人阶级及其各种经济形式同资本家及其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所有这一切，在我们这里出现某些经济困难时，就更加尖锐起来。

必须强调指出，由于粮食收购运动中遭受了某些失败，由于缩小了我们的进口计划，由于必须削减我们的生产计划，由于必须削减我们的预算拨款等等，我们增加了一些困难，正因为如此，同我国的反无产阶级的斗争就更加艰巨。

我们面前存在这类现象，即：由于某些失误和在经济方面出现的某些困难，在经济战线的某些地段上已经取得的阵地，在有些地方被收购粮食的私商占去了，由于严重的商品荒，在新的经济困难的基础上，私人资本家、商人、买卖人就能为自己捞到额外的利益，把出厂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的腰包，而且还用这种商品荒进行投机等等。总之，同志们，我想在这里强调的一个意思是，正因为有经济困难，我国本来就存在的这些矛盾往往尖锐起来了，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复杂化了，并且为党的队伍中的某些动摇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为了了解在当前这个时期被重重困难吓破了胆的新反对派的全部错误，我认为必须提出关于一些共同的思想渊源的问题，在那

里新反对派与以前的许多反对派流派汇合在一起。我认为，这种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根源是存在的，它们在现在的反对派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必须揭露这些根源，以便了解它们，而了解它们的目的在于正确地加以克服。同志们，我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对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过，你们会看出，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地提出在我们最近这次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政策中的一切根本的和主要的基本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如下的问题：列宁学说中最新的、独创性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知道，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

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回答。最新的，在根本上崭新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在恩格斯那里也没有的东西，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不可能有的东西，这就是提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有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已经得到巩固，重心正在由进行破坏性的工作转移到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如果你们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来看，那么你们就会确信，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发展这一学说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不过在根本上仍然是马克思所指出过的东西。如果你们问一问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之后，工人阶级在新的建设时期面临的任务是什么，那么你们就很容易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或者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可是列宁写了，列宁在这方面提出了最早的一些轮廓（我指的是新经济政策、合作制的理论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提出这些理论的任何前提。

列宁同志自己就非常明确地讲清了这个意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文章《论黄金的作用》中，在评价无产阶级专政带

来的根本性的变化时，关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曾写了下列一段话：“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①这一小段引文很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因为列宁自己非常清楚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基本问题，他说，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就是说，仅仅在工人阶级巩固自己的工人专政以前，看到改良同革命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的基本策略和战略方法之间的关系，他不可能看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情况。

同志们，在这里我再给你们念两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著作中的引文，说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侧面的基本思想，这个侧面是只有在列宁主义中才能找到的。列宁同志在他的《论合作制》一文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②

可见，列宁在这里又谈到了关于我们当前的任务根本不同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正在夺取政权之时的任务；他断定，现在重心正在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来，只有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来说，我们才认为重心仍然是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变革，促进国内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请允许我再读一段也是关于这方面的引证。列宁同志在给米雅斯尼柯夫——他当时已开始离开我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7页。——编者注

们党，后来终于彻底离开了我们党——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用‘国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国内战争’的口号的人是可笑的，甚至是很糟的。”^①

这就是列宁的三个基本论点。第一，在我们的视野中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在马克思的时代所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的。第二个论点是从第一个论点象译电码那样译出来的，这就是：在我国内部，重心正在转移到和平组织工作上来。第三个论点是第二个论点的所谓政治上的体现，这就是：现在在我国我们不是国内战争的党，而是国内和平的党。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所提出来的三个论点。

在这些论点中你们看到了一个表述得非常尖锐的说明，这就是：把我们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所写的一切，搬到已经在我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时期和条件下来，是荒谬的、愚蠢的、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合乎列宁主义的。同志们，你们会同意，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我们在我们国家中取得政权以前是国内战争的党，我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已成为国内和平的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我们的重心是要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要进行和平的组织活动。这在实质上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当然正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本任务，是扩大、加剧、点燃阶级斗争，使之白热化，以便随着和由于点燃、扩大、加剧阶级斗争，最后破坏、摧毁和打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总的基本“路线”。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社会；不是要瓦解这个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1页。——编者注

而是要组织这个社会；不是要在我们的社会中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而是要压制任何企图在我们的社会中号召进行国内战争的人，因为我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现在我们的立场就是要克服我国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各样的、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以自己的经常的干预保证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得到增长，力求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得到增长的基础上，在我们的经济命脉得到增长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得到巩固的基础上，保证排挤并克服其他阶级所代表的其它各种经济形式。

同志们，我给你们引了列宁同志著作中三段最重要的话，三个最重要的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这三段语录都没有引用，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发现当前时期最突出的特点以及列宁主义中这些最突出的东西，新反对派的所有的思想家都片面地提出问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都犯了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围绕着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后等等的一些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政治错误。

同志们，列宁还有一段话与上面引用的几段话有关，他说，我们现今的社会建筑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它（即这种合作）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这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也是由我们所处的时期的特点所决定的。比如说，当我们光靠自己不能够搞好烤面包这件事情时，我们就允许私人资本家开面包房，而这就反映了我们进行合作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工人阶级不仅和农民合作，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与资产阶级合作。然而与此同时，这里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合作，但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就仅限于此呢？不，并非仅限于此，因为除了这种合作之外，还有斗争的成分。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仅限于合作，即我

们允许它做买卖呢？不是，我们和它有合作，然而我们和它的斗争要比合作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一方面，我们容许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同它们进行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容许它们是为了最终彻底排挤、克服、并且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消灭它们。这是一种合作的类型，这种类型要求对它们进行激烈的，尽管是不流血的斗争。

我们在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程度上同农民进行合作，但同时我们对农民的任务是：第一，不断克服来自农民方面的敌对的倾向，以便保证我们对农民的领导，第二，改造农民，也就是消灭作为小私有者阶级的农民，把他们变成大农业生产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不是通过把他们变成雇农的方法，而是用完全不同的路线。因此，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极其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情况所产生的问题是：可能很容易不考虑适当的比例和适当的调子，离开正确立场而滑到右的或左的方面去。

怎么能够滑到右的方面去呢？这很容易。比如，可以自认为：是啊，我们是国内和平的党——列宁自己就说过，现在的重心是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再者，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我们这里阶级斗争将渐渐减少，减少，直到在没有任何第三次革命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为止。这也是很清楚的，但由此可以作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凡是讲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人都在做出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结论。如果持这种看法，那就是极大的错误。这样说就意味着滑到了右的方面，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完全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总的说来，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会趋于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它不会尖锐起来。只有耳也聪目也明的人才会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什么什么原因，阶级斗争不仅不会熄灭，而相反地，会趋于尖锐化，因而在这个一定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种尖锐的

阶级斗争中以相应的方式行事。

如果说，归根结底，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矛盾会趋于缓和，那么，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在每一个确定的时刻矛盾都趋于缓和。可能有这样的时刻：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矛盾会尖锐化。我觉得，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现在，我们这里的阶级矛盾，尤其是在农村中，正在尖锐化。阶级矛盾将一直尖锐到那个时候为止——直到我们的国家拥有这么多的物质福利（用普通话说就是钱），我们能用以把贫农的集体经济和中农的合作经济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能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发展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同这些在我们的帮助下已经增长起来的、走上了大型或小型公有化道路的经济相比，富农不再是经济上强大的力量了。那时候就开始另一个新时期，那时阶级斗争就会开始静息。而目前，当我们还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时候，阶级斗争还会尖锐化，并且在我们还不能真正地提高大多数农民经济的这一整个时期，阶级斗争会继续存在。因此，如果现在谁跑出来对我们说：根据我们刚才读过的列宁的论点，可以得出结论，即不能谈阶级斗争了，或者，无论如何必须马上收缩阶级斗争，——那么，他就搞错了，滑到右的方面去了。

从这些议论中决不能得出没有经过我们所处的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的条件所证实的极其简单粗糙的结论。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例如在某一个县或某一些县的什么地方富农对我们发动直接的进攻。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应当对他们架起机枪，而不必多加考虑和温情脉脉地去对他们进行“安抚”，就象我们在1918年所作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说：不行，这就是搞阶级斗争尖锐化呀等等，那么我们就回答说：对了，一点儿不错，不过应当记住条件和时间。列宁的策略的最基本的和宝贵的原则，就是要

了解条件和时间，才不致于——用个形象的说法——在举行葬礼时跳舞，在举行婚礼时唱哀歌。情况就是如此。

同志们，由此可见，在这里向右边滑倒是非常容易的。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了，怎么样就可以向右边滑倒，不过，不言而喻，也可以离开正确立场向左边滑倒（在外表上向左边滑倒）。如果人们不了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任务同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面临的~~任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去搞一个什么新的第三次革命，而是要进行和平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在各种经济形式中进行阶级斗争，为争取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而斗争，运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强有力的政治杠杆去推动我国的建设向前迈进，同时不脱离农民的基本群众，使他们在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的共同战线上步伐一致起来，共同进行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方针，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从另一面离开列宁的学说，谁就是拖着我们党后退，谁就是不了解列宁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的基本的和最独特的东西、列宁学说中的最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相联系的，是同巩固了工人专政以后的时代相联系的。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论断也就是我以上所说的主要的东西），现在我国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的斗争。例如，如果工人阶级在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斗争中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那么这就是它同私人资本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果工人阶级帮助贫农和中农组织合作社以反对富农的店铺，或者组织自己的信贷社以反对富农高利贷者的贷款业务，那么这就是无产阶级在通过一些特殊形式进行反对私人资本的阶级斗争。

不过，同志们，如果说，重心正在转移到阶级斗争的这些形式上来，首先是转移到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之间的斗争和“排挤”同

我们相对抗的经济形式上来，那么，决不能由此得出一个象尺子一样笔直和简单的、象做成尺子的树木一样粗糙的结论说：因此，我们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任何特殊的政治工作了。决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已经说过，情况可能造成一些非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形式，甚至表现为武装冲突的斗争形式。当然，这并不典型，但是，如果我们的阶级敌人迫使我们这样作的话，我们就要这样作。

而且即使在现今的条件下，我们也在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进行苏维埃选举当中的斗争，同富农的斗争，组织各种贫农团体，等等，等等。总之，现在我国的阶级斗争的中心，是我国的各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前的阶级斗争仅仅限于这些形式。我们采用各种互相配合的方法。怎么样合适，我们就怎么样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利用，我们一定要利用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组织性的一切杠杆，来发挥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中的一切力量。这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的总的提法，在我看来，这就是唯一正统的列宁主义的提法，在解决我国当前政策的各种具体问题和重要的原则问题时都必须从这个提法出发。

同志们，我已经讲过，反对派同志们不了解，或者说不完全了解在巩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以后的时期中所形成的情况的特点，他们往往喜欢机械地把列宁同志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所写的东西生搬硬套于我们现在的情况。顺便说一下，在解决关于农民问题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时候，在讨论关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现象。我现在就来谈谈跟我们在思想上的意见分歧有关系的这两个问题。我来谈一下关于我们的经济命脉及其同农民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首先必须指出，在我们进行争论的时候，对于能否吸引一般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反对派同志们往往表现出了某种怀疑主义。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提法是十分明确的。列宁曾十分肯定地讲过：我们必须实行一种保证使每一个小农能客观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地提出这个问题，即我们必须保证使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我们从列宁以前的关于旧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通常观念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来看这个任务的提出，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立即指出：这个任务本身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象列宁这样明确、这样着重提出过的任务。

我们大家都对小农非常熟悉，我们知道，小农就是小私有者，他没有社会主义的气味，尽管如此，列宁却提出了要吸引小农、小私有者参加建设——不是建设别的什么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志们，我们首先必须非常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随随便便、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问题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我们只能要么彻底解决它，要么根本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

同志们，从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可以说已经非常初步地提出过，但实质上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可是，当工人阶级已经进入自己的政策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当工人阶级已经真正达到了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的时候，它就时时刻刻都要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在解决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要直接碰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在这里，的确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只是简单地提出中立居民的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要么建立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巩固的联盟。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可以老是中立基本农民群众，只要使他们不即不离就行了，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使之安

安静静不闹事就行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非列宁主义的对问题的提法。列宁主义要求使各种社会主义成分不断增长，要求使大多数人民、最后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人民和工作者不断地得到改造。

我们不能这样来设想我们的主要建设任务：我们的城市工业——哪怕是四倍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城市工业在什么地方发展着，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却与城市毫不相干地在一边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对整个农业和全国的居民进行根本的改造。我们的任务在于：不仅要改造整个工人阶级，使之走上新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轨道，而且要使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在不断改变和改善自己的本性的工人阶级，加强和扩大对基本的人民群众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影响，使他们不断地和彻底地改变自己的阶级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乃是这样一个创造的和领导的力量——它应当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

如果说我们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并且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其中农民如汪洋大海，它面临着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许多困难，——那么，我们当然应当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例如同将要在英国、或德国、或美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相比，具有许多特点。这里决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决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决没有任何会招致我们的死亡的东西。

同志们，请看一看资本主义吧。资本主义是在几百年当中在各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在一个国家是一百年，在另一个国家是二百年，在第三个国家时间更长，如此等等。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老态龙钟的高龄了，但是，你们看到，尽管如此，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老态龙钟的高龄了，各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在法国，资本主义具有自己的特点。在美国，也

有自己的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同德国的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是一回事，但是，除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共同的标志之外，在组织形式和一般文化方面，它还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俄国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一个拥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它是一种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往往一下子就以高级形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我国的资本主义是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我们有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高加索或土耳其斯坦等的某些地方还有许多宗法生活的残余，还有几乎是封建社会以前的形式的残余。与此同时，却可以看到许多第一流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给它留下的遗产中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生长起来，这个基础与社会主义将要在美国生长起来的基础是不同的。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即俄国的——条件下，而不是在美国的、也不是在法国的条件下生长起来。因此，理所当然，正如同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样，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起初也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一直要到最后，即当整个世界经济都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时候，才会显示不出来而趋于消失。

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记住，我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它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繁荣昌盛以前，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在其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就是说，是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它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决定的。不过，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因为它的发展将沿着完全确定的道路进行；与将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相

比，它的特点就是非常落后，不过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中农。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那么就让我们都从中农是农民的基本群众这一主要情况出发吧。现在，中农用自己的粮食、自己的经济的产品做买卖，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他们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而实行的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做买卖。

新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的立论是：“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但是，众所周知，我们实行自由贸易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农民的基本群众能够“喘过气来”，是要保持同他们的联盟，并且在此基础上执行工人阶级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新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对我们说：“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并且援引伊里奇的一段话，那段话说：贸易自由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由此可见，一方面，他们引证了列宁的一个正确的论点，而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农民正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搞自己的经济，而这种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谁反对这个论点，谁就是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非列宁主义的道路，谁就是粉饰现实，谁就是在为某种实现不了的事情而斗争，谁就是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等等，等等。

同志们，我要首先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说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如果说给农民的基本群众的这种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怎样引导农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呢？由此可见，似乎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把农民引导到资本主义去，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也许，最好还是由这种自由贸易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去吧。不过他们也不这样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前景了。其结果是：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了。

同志们，实质上应当怎样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应当解释一下列宁同志所说的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论点。凡是读过这段话的人都不难看出，当列宁谈到贸易自由同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时，他仅仅是想说，在贸易自由的基础上经常产生资本主义。这决不是意味着他断言贸易自由等于资本主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现在我再重复一下：假使我们的某一国家机构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向另一个国家机构购买什么东西——这决不是资本主义，从这里面你挖掘不出任何资本主义，因为这里没有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资本家，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世界还没有人发现过这样的资本主义。不过，在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例如，假使一个中农进行贸易，假使他发了财，假使他开始雇工，他就会变成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即贸易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生长——，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不过，同志们，全部问题在于：是否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贸易自由都导致资本主义关系？从贸易自由导致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泛滥这个论点出发，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历史环境中，贸易自由都导致资本主义关系，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些断言这种说法正确的人，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的整个性质，他们把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所写的、所说的、所深信不疑的观点、言论和原理不加批判地搬到新的情况中来。

中农既买东西又卖东西，但是他不采用雇佣劳动。是不是凡既买东西又卖东西的人就是资本家呢？不是，只有使用雇佣劳动的人才是资本家。农民按其经济的形式来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呢？不是，因为他是私有者。中农是不是资本家呢？也不是，因为他不使用雇佣劳动。他是不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呢？不是，因为他

是私有者。但是，由此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他是资本家。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也是不正确的、荒谬的、不聪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加米涅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攻击扎伊策夫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中说，中农不是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资产者；但是，那篇文章中说了，中农是小资产者。

不了解小资产阶级是一回事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是另一回事，——这种不了解当中可大有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同志们，比如我就决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说你们应当保证使每一个资本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上来。例如，我们不去向洛克菲勒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提议这样做。可是我们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我们想把中农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想要保证同他们的巩固的联盟。由此可见，不懂得不剥削雇佣劳动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小私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差别，那是十分荒谬的，怪诞的。

如果说抹煞小私有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是荒谬的和犯罪的，那么抹煞小私有者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劳动的农民阶层和资本家剥削者之间的差别也是荒谬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无论如何必须看到这一点！同志们，如果说我们把要保证使每一个小农有可能参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当前最主要的而且是要实行一个时代的任务的话，那么，理所当然，假使我们把中农说成是资本家的话，那我们就把任何道路、任何前景都堵死了。不过中农具有双重特性，因为，一方面，他们想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发财致富，往上爬成为富农，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把他们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第二个灵魂，即劳动的灵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利用这种情况。由于他们具有劳动的灵魂，要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道路上来，——不过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具有私有者的灵魂，富农也会要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去。

现在正在为争取这些农民、为争取中农而进行斗争。一般说来，能不能把他们拉到我们方面来呢？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应当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从经济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那就应当这样提出这个问题：不剥削雇佣劳动的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商品经济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和为什么能够避免资本主义而转到社会主义呢？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有些同志读惯了旧书本，而且又不会读，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关系和我们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别，他们非常简单地考虑问题。他们说，不管怎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反对这样一些幻想，向来反对这样一些错误的、虚伪的、掩饰现实真相的观点，即认为中农群众、中小业主群众可以改善自己的状况。那些同志强调说：我们一贯反对这些观点，我们一贯指出，中农一定会不断发生分化，其中的比较小的一部分必然投入富农的怀抱，而绝大多数必然陷入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境地。他们记得布尔什维克曾经把那些抹煞农村中的分化、抹煞中农向两极分化的人斥之为骗子和自由派，并且曾经指出这不是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是民粹主义的提法。过去我们是这样说的。

过去我们是否正确呢？是的，完全正确，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中农除了向两极分化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下，如果他们开始富裕起来，他们必然总是变成富农。如果他们穷下去，他们就成为雇农或跑到城市里去等等。但是，实际上，中农要上升，要越来越高，而又不采用雇佣劳动，而又不变成资本家，——这样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曾经从这一观点出发批评过合作社，说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到处都是资本家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最富裕的农民的上层把持合作社。这是对的。所以，过去我们一直集中分析批判这一点，一直揭露说：民粹派、自由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等等都掩盖这一点；都抹煞农村

中的分化；他们掩饰中农分解为两部分；他们胡说八道，说那里的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与他们相反，我们曾经断言：那里的合作社是剥削性质的；它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它向来是在大银行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等等，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过，同志们，列宁曾非常正确地屡次说过：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把对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说是正确的东西搬到另一个时期去，这样一来，正确的东西就变成错误的东西了；这样做是荒谬的，错误的；绝不能这样做；这是违背马克思的学说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那本小书中说，现在也还有那么一些谈论什么非资本主义演进的可能性的怪人。但是，这个论点所反对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列宁，是列宁关于使农民实现合作化的计划。同志们，在这里我必须消去一切括弧。在我们的条件下，简单商品生产者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中农就处在这样一个接合点上：他们既可以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也可以沿着那一条道路走；他们处在通往不同方向的两条道路的接合点上：一个是资本主义方向，另一个是非资本主义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懂得：现在在我们这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国家银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工业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是掌握在我们手中；鲁祖塔克不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而是我们的同志鲁祖塔克。

如果我们对这一切都加以相应的考虑的话，如果我们从命脉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这一点出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难道不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农村都必然会而且只会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吗？如果我们的农村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如果我们的城市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那么中农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没有无产

阶级的城市，而单单只有农村（假使有人用化学气体突然把全部城市居民都毒死了），那么农村就会单独爬行，它先是后退，然后又前进，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有无产阶级的城市，有无产阶级的命脉。这是什么——是一件对农村的发展毫无关系的非常小的事情吗？显然，这种看法是荒谬的。我断定，这些命脉对农村、对于作为简单商品生产者而且现在正站在两条道路分叉点上的中农是起作用的，它们推动中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用什么方式呢？通过合作社。在这里回顾一下列宁同志所制定的合作社建设计划是适当的。我们不想用铁扫帚把中农驱赶到共产主义去，不想用战时共产主义的驳船来拖他们。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行不通的。我们要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合作社来吸引他们。但是，这种合作社不是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它不是同资本家的信贷银行，而是同无产阶级的信贷银行相结合，不是同资本主义的工业，而是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工业相结合，不是同摩根和洛克菲勒的托拉斯，而是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托拉斯相结合，不是同资本主义的铁路，而是同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的铁路相结合。合作社将逐渐地发展起来，我们将在其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将越来越在根本上抓好合作社政策，我们将越来越在经济上对合作社施加影响，支持贫农和中农去反对富农，把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来看应当发动起来的各个农民阶层发动起来。我们掌握着种种杠杆，它们将一年比一年更加能决定国家的总的发展，我们掌握着把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的桥梁。组织方面的桥梁就叫做合作社。因此，我们在支持贫农和中农去反对富农，对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帮助，促进共同使用机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而且归根结底在促进向电气化的过渡的同时，就会不断地使中农脱离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其《论合作制》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他说，在旧日合作社提倡者那里有许多毫无用处的、改良主义的、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甚至是庸俗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但是，在我们夺取了政权以后，这种幻想的甚至庸俗的东西就会成为现实。列宁同志本人的这个论点就驳斥了反对派中一些同志所说的反对我们的话。不言而喻，假使我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假使我们没有经济的、政治的和党的命脉，那么这一整个计划就不可能实现。假使有这些命脉，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里进行明确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抹煞阶级斗争等等。但是，同志们；有人对中农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估计不足，这就恰恰表现出是放弃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阶级任务。现在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有哪些社会力量呢？——有工人阶级，有农民的基本群众，即首先是中农，还有第三种力量，即资本主义成分、农村中的富农、私营企业主、商人。现在主要的斗争正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着。为了什么呢？为了争夺中农。这就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的阶级战略和策略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富农、资本家、私营企业主正在把中农从我们这里拉过去，力图使他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他们的这一着如果得逞了的话，他们就会获得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合作社把中农拉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从我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再没有更困难的阶级任务、更尖锐的阶级斗争、更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任务是工人阶级在目前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把中农争取过来，夺取过来，竭力使他们越来越脱离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从而把这部分基本农民群众从吸引他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富农那里夺取过来。可以在其他一

系列问题上犯一些次要的错误。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完蛋。如果看不见这个任务，那就意味着看不见当前阶级斗争的基本任务。如果抹煞这个任务，那就意味着抹煞我们现在遇到的、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遇到的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关于我们的命脉的问题的提法。

同志们，下面我要联系关于农民的分化问题，讲一下关于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不言而喻，在这里我也要首先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同志们，这恐怕也不是一个使人很爱听的任务——时时刻刻、在每一个场合下都讲问题的复杂性，不过我宁愿讲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愿给你们提供一些从外表来看很简单、但实质上并没有政治意义和严肃分析的答案。

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末尾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关于使农民中的中农群众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靠拢、向合作社事业靠拢的可能性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这个本身就很复杂的任务由于下述原因而更加复杂化了：在农村中我们决非只有中农，至少有三个基本集团，即富农、中农、贫农，除此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纯粹的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由此可见，除了上面所讲的一切之外，首先还必须加上对农村居民本身的阶级成分的复杂性有明确的认识。因为现在我们在农村中除了中农群众之外，在一个极有富农，在另一个极有贫农和雇农，所以，不言而喻，问题的提法和我们的任务由于这种情况而复杂化了。

假使我们现在非常强大，就是说，假使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最近几年内能够立即充分实现我们的电气化计划；假使我们手中拥有如此充实的经济资源，以致在最近几年内能把贫农和农民的经济提高到非常高的物质福利水平；假使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最近几年内能够在合作社

机构的非常良好的工作的基础上，使大多数农民实现合作化；假使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的国营工业能够充分满足对工业品的需求，充分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最近几年内引导绝大多数中农甚至也许是全体中农离开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点必须一次两次、再三再四地强调——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此，近期内我们的农村形势的特点是：第一，一方面，资本主义成分将会增长，另一方面，贫农和无产阶级成分也会增长；然后，第二，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可能——这里不应有任何幻想——一下子使全体中农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在近期内，中农的不同部分将同时各自走两条道路，就是说，毫无疑问，除了会发生农民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之外，除了这个过程之外和与这个过程相反，还会发生另一个过程，即中农的资本主义分化，它分化为两个极端的社会侧翼——一方面是富农，另一方面是贫农、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发展的自发势力本身是反对我们的，因为商品经济的条件产生从农民群众中分化出小资本家和富农的倾向。只有由我们的无产阶级城市进行干涉，只有让无产阶级专政，我国工业的各种经济组织、我们的全部命脉这些多少比较强有力的杠杆发挥作用，——只有反对正在发展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我们才能吸引基本农民群众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初期，甚至在中农当中分化会尖锐起来，而且现在在我国的农村中已经存在的矛盾（现在在我国的农村中已经存在着富农阶层）将加强起来和尖锐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们方面所发表的一切讲话中，在所有的一般同志、代表大会和党的决议的多数派拥护者所发表的讲话中，其中包括我个人的一切讲话中，——我们大家过去和现在都强调说，现在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无疑地会尖锐起来。这就是说：现在，在我国，一方面，正如存在着广大的贫农阶层一样，已经存在着富农；另一方面，中农本身会走两条道路：既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本身发生分化，分出两个社会的极的道路；又走我们的道路，即在我们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我们将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将在我国经济 and 农村政治斗争的各条战线上，看到这两条道路的分野。这表现在一部分上升的中农经济将日益采用雇佣劳动，即变成小资本家和富农。这还将表现在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变为富农经济的种种隐蔽的形式将会增长，例如这样一些隐蔽形式，即有了一点积蓄、搞到了某种机器的比较富裕的中农，会把它出租给贫困一点的中农和贫农等等，从而以隐蔽的形式剥削其他农民阶层。这还将表现在那些正在变为富农的分子，一部分会以公开的形式，一部分会以隐蔽的形式钻进合作社，而在有些地方恐怕一定会占据领导岗位，——尽管富农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等等是被禁止的。

因此，在各种经济形式的斗争中，在公开的形式和隐蔽的形式中，在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的斗争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合作社本身内部的斗争中，将表现出资本主义方式和我们的方式的斗争，现在所不可避免的两条道路将互相交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将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奇奇怪怪的形式。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但是，同志们，决不能由于这种五颜六色、纷繁复杂的关系就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裹足不前，甩手不干。不，我们应当以两倍、三倍的努力把我们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投到社会主义和合作社发展的天平盘子里面去，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只要加强国营工业，加强我们的命脉，加强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资源，我们就能日益把我们的天平的一个盘子压下去，把越来越多的

重砝码投到我们的这个盘子里去，这样一来，今后，在我们的正确政策下，在我们党团结一致的条件下，在农民问题上执行正确的政策的条件下，我们就会逐渐减少资本主义的机会，日益增加社会主义道路胜利的机会。

同志们，现在，我想根据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中已经说明的东西，更加具体地提出在经济中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问题。新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认为，——这一点，争论时瓦尔丁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讲得特别明白，——当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富农的时候，我们太热衷于中农问题了。同志们，我在各区的党代表会议上已经讲过，我认为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请求你们不要埋怨我，说我在这里重复某些我在各区党代表会议上已经讲过的东西。有些同志把要吸引中农到我们方面来的任务同与富农作斗争的任务对立起来，这就是把实际情况简单化，这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这种把实际情况简单化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问题究竟何在呢？在他们看来，富农是农村中的一种独立自主的、由自身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但是，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打破这种观念才能同富农进行正确的斗争。任何在农村中生活过、同农村有联系、或者哪怕是读到过一点关于农村中的情况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富农对我们的危险并不在于他们本身，而在于他们对中农所起的作用。当人们以富农的增长来吓唬我们时，他们总是举出一大堆例子来，但他们并不懂得这些例子的意义。例如，他们对我们说：据说，南方的一些哥萨克村镇改选苏维埃时，在某些地方富农已经沿着苏维埃的职位等级高升了，占据了我们的苏维埃组织中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地位，窃取了基层苏维埃机构，正在沿着这个基层苏维埃组织继续上升。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有。这种情形对我们危险不危险呢？危险。应不应当同这种情形作斗争呢？应当。不过我要问你们，富农在农村中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那么他们

是怎样钻进这些苏维埃中去的呢？他们是怎样钻的？请你们老老实实地、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吧。尽管有我们的全部立法，尽管我们党、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千方百计地想要孤立富农，但是，富农还是爬到这些地位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请你们抛开幻想，不掩饰实际的关系和矛盾，谈谈这个问题吧。原来，他们之所以能爬上去，是因为中农，可能还有贫农投票赞成他们。

接着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农，有时甚至还有贫农，怎么和为什么投票赞成富农呢？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当我们提出并且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懂得应当怎样和富农作斗争。在这种现象后面往往隐藏着如下的情况：在农村中，在村镇中，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既有我们的合作社，也有富农私商，但是合作社的生意做得糟糕，而富农的生意做得很好。我们的合作社里没有胶皮套鞋，可是富农那里却有。我们的国家机关收购粮食的工作做得很糟，经营得很坏，而富农作为粮食采购者，经营得很好；我们的合作社，或者我们的信贷社，或者其他某种机关手中没有钱，而富农呢，尽管他们进行重利盘剥，却能提供某些贷款。这些现象决不是个别的，特别是在合作社搞铺张浪费的情况下，在合作社的领导人不负责任的情况下，在吸引群众参加合作社机关的工作做得很差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老话来说，中农就把富农看作大恩人，他们尽管剥中农的皮，但毕竟能给点什么东西，而我们呢，给中农绘以美好的法令、谈论张伯伦的精采的演说，几乎任何东西也不能给他们。毫无疑问，在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下，富农正在建立同中农的事实上的经济结合，而我们却缺乏同中农的经济结合；如果富农在经济上把中农争取到自己方面去了，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在政治上把中农争取过去了。

如果我们即无产阶级国家和从属于它的机关，不同中农好好做生意，那么我们就把他们推到富农那里去；如果我们不善于在

经济上进行斗争来争取中农，那么我们就把他们推到富农那里去；如果我们的合作社办得很糟糕，那么我们就把中农推到富农那里去；如果我们的合作社中的铺张浪费有加无已，那么我们就把中农推到富农那里去；如果我们不根除对待中农的行政方面的拖拉作风，那么我们就把他们推到富农那里去；如果我们不及时搞好同中农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结合，那么我们就把他们推到富农那里去。我断言——而且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富农的主要力量和他们的主要危险，就在于他们可能同中农结成联盟，就在于他们对中农的领导权，即他们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由此就极其明显地得出了我们党的基本方针：同富农作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把农民中的中农阶层从富农那里争取过来——我们反对富农的斗争的战略路线就是应该这样来规定。有些同志由于思想简单，把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这个任务同另一个任务——反对富农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根本不了解，不去影响中农，对于争取中农的这个问题不给予足够的注意，把这个经济任务置诸脑后，这就是对富农经济的最大的帮助，这就是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最大的帮助。

不言而喻，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阶级敌人的时候——富农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而且是一个危险的阶级敌人——，我们应当向他开枪，应当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一切手段。这些手段中的主要手段就是我们为争取中农而斗争，——这一点，凡是稍微考虑到农村中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人，凡是稍微了解实际生活、其中包括本质上很不简单的、极其复杂的经济生活的人，都不能否认。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谈农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另一极即贫农的经济，以及关于帮助贫农的问题。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在关于富农的问题以及关于帮助贫农的问题上，反对派中的同志，对于中央的多数派提出的、在中央十月全会上通过了的、后来又由我们的党

代表大会认可了的建议，提不出任何一个补充建议。总之，在实际建议方面，新反对派提不出什么建议，他们却针对中央和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立场尖声怪叫，吵吵嚷嚷，骂得很凶。可是，同志们，在我们的条件下，这种尖声怪叫、吵吵嚷嚷的办法，对于说明我们党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实质，没有丝毫帮助。而这里，在谈到关于帮助贫农的问题时，应当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帮助，用什么东西去帮助，从哪里弄到资金去进行帮助。一个对自己的诺言负责、对自己提出的口号负责、对在自己的决议中制定的政策负责的党，就是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同志们，在这里必须强调，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要弄到物资，而不在于别的什么。要解决问题，不能靠大谈特谈帮助贫农，或者大声疾呼贫农比富农好，不能靠宣传二乘二等于四、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之类的简单真理，——全部问题在于从何处弄到资金，以便实实在在地帮助贫农经济，以便使贫农的机器协作社能购买拖拉机，以便帮助贫农购买马匹，以便发放一定数量的播种贷款，以便帮助组织和发展某种合作社团体。

同志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谈谈我们的一般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放手实行商品流转的决议。我们之所以通过这个决议，是为了保证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速度。我们之所以放手实行商品流转，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库在此基础上收入一部分额外的货币。我们之所以放手实行商品流转，是为了通过税收政策从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分那里得到一部分额外的货币；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切措施，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货币的基本资金，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以便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以物资去帮助贫农经济，这种帮助，其规模将越来越大，其形式就是要过渡到集体主义的经营原则以代替旧的、私有的、个人主义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假使新反对派中一些新出世的预

言家们,对于从何处获得额外的资源这个问题,能给我们某些新的办法,能指出得到额外的资源的特殊泉眼,不是发现一个反对派的智慧之井,而是发现一个额外的物质资料之井,那么,我们就会不仅不投票赞成我们自己的观点,而且会双手把整个反对派举到天上去。但是,问题在于,他们除了有害的和毫无用处的“口头生产”这个巨大的泉眼之外,别无任何其他泉眼(笑声。掌声)。在提出同富农作斗争这个问题时,我们断言,主要斗争手段——只要正确运用它,就能使问题得到有利于我们的解决——就是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至于帮助贫农的问题,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决议刺激起来的普遍经济高涨的基础上加快流转的速度和得到额外的货币资金。至于斗争形式的问题,我们声明,在我们看来,现在,重心在于经济斗争;在于把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同私商相对抗,在于由我们的国家给予物质帮助,在于一定的信贷政策,在于工会要保护我们的雇农而反对富农。但是,这种斗争还通过其他的途径进行,如:关于保护劳动的立法,税收立法(我们通过税收剥夺资本主义集团的一部分收入),改选苏维埃时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党组织贫农的工作,在我们的合作社领域中掌握各种命脉,等等,等等。

在对这个报告的这一部分加以总结时,我必须指出,在农村中放手实行商品流转以后,在农村中放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很多额外的资源,还没有感觉到发展商品流转的显著的成果。过去,我们在采取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策略之后,在这一过渡的基础上,并非在新经济政策的头几个月之内就增加了物质资源,同样地,现在,我们也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得到收获。因此,我们考虑到这样的前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明确的决议。而当由于执行这些决议所拟定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增加起来了的时候,当我们

掌握了大量物质资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能逐渐增加对农村中的软弱的贫农经济的帮助，我们就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有力地阻止农村中的分化过程，因为那时我们将使现在日益贫困的经济变成日益上升的经济。这决不是空想。这决不是无法实现的希望。不过，同志们，如果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向全国大喊大叫，我们并不向四面八方给千千万万的人许愿，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现在我们必须学格利波也多夫喜剧中的某一位主人公，他说：“兄弟，咱们吆喝吆喝”。别那么着，最好少吆喝多干事。（掌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得到好转之前，我们先等待着，忍耐着。在我们根据我们的正确政策积累起一定的资金以前，我们先不向四面八方许愿，到了有东西可给时我们再给。正如最近我们在农业税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减免办法一样——也许，有时没有对一切都计算得很正确——，当我们由于实行正确的、非歇斯底里的、考虑周详的政策，得到了必要的资金时，我们就要对贫农的经济采取相应的措施。

同志们，关于农民分化的问题就是这样。总的说来，在我国农民分化的过程本身不可能进行得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迅速。它之所以不可能迅速地进行，是因为我们有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及对中农和贫农的帮助；它之所以不可能迅速地进行，是因为在我国土地已经退出了商品流转领域，已国有化了。土地国有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重要的现象，它防止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那种富农经济的增长。假使在我们这里有买卖土地的自由，那么，自然富人就会接二连三购买一块块的土地，发财致富，这样一来，新的地主就会产生出来，发展起来，巩固起来。我们有杠杆——命脉，我们有正在变得日益强大的合作社，因此，分化的过程不可能进行得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迅速。由于我已经讲过的那些原因，最初，这个过程会很激烈，然后就缓慢下来。当

我们在各基本的经济枢纽中在经济上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坚决地、急剧地把多数农民经济扭转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尽管不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现在，农村中正在发生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因此，我们的当前农村政策的问题以及我们的一般政策的问题，就在于：既然认识到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分化，就要在无产阶级的命脉的领导下，在我们的阶级的领导下，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把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炮兵连动用起来。

刚才我讲了农民分化的过程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现在，我转到另一部分，即转到关于命脉以及关于工人阶级本身的部分。我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经济命脉，依靠自己的政治命脉，依靠自己的内部组织的力量。在经济命脉中，我们的国营工业所起的作用最大。政治命脉——这，首先就是我们的党。在工人阶级必须在我国进行的极其复杂的斗争中，在种种困难和敌视我们的力量都在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团结、联合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所以，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从这一方面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反对派所发挥的许多观点。

同志们，为了认真地执行政策，为了对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压力给予回击，就必须真正把我们的阶级本身捏成一个拳头，而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工人阶级和党就必须具有某种——哪怕是起码的信心，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建设正在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我们现在加强工业并且在合作社中做好生意，那么，请不要忘记，我们这样做，就是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可是，对这一点许多人却怎么也不能理解。

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是怎样的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这是一；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这是二；完全打倒资产阶级，这是三；剥夺它，这是四，按照新的方式建设社会，这是五；在这种斗争中哪怕是慢慢地、然而却是彻底地和坚决地推

行自己的路线，改变国内的生产关系，改造它们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建设时期是什么呢？这是紧接着巩固专政之后，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阶段。现在，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针对我们的建设工作发表种种言论，破坏对这一事业的信心，这客观上就是阻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有关的同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在我们党的队伍中传播着这样的思想，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中，我们在技术上不可能解决我国革命的任务，——那么，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和充满信心地进行这项工作，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责备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关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错误提法时，我们责备他们错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必须和什么作斗争呢？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得到胜利了的西欧无产阶级的经济援助，我们就会由于我国技术上的落后而灭亡。在这方面有人责备我们有民族狭隘性。假使我们说过，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完全可以单独支持下去，那么这种指责还有一点根据。要是那样说的话，那是错误的，那是民族狭隘性。但是，过去我们曾经——即使是在一个国家中，——带领群众走进十月的街垒，那是不是民族狭隘性呢？当然不是。现在正因为我们捍卫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观点，所以我们断言：尽管我国在技术上落后，尽管我国有许多农民，尽管技术和经济还极其落后，我们还是能够一步一步地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列强不用武装干涉来进行阻碍的话，我们就会把社会主义彻底建成。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如果设想一下我们周围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我们会不会垮台呢？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不会垮台，而会把建设进行到底。（掌声）但是，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虚无的空间中生

活，而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中。它们可不可能以武力战胜我们呢？我们回答说，“可能”。因此，我们能不能实际上放弃国际革命的方针呢？不，不能。国际革命是使我们不致被资本主义列强扼杀的唯一保障。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会置我们于死地呢？我们说，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谁这样说，谁就是散布对于我们的建设力量不信任的思想，谁就是散布对于我国工人阶级的内部力量、对于它领导农民的可能性不信任的思想，谁就是站在同列宁完全对立的地位。

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当时我们就根本用不着走进十月的街垒了；那么所有的孟什维克就是正确的了，因为他们说过，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内，别想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是正确的了，因为他说过，如果没有胜利了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我们一定会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一定会把我们推翻。

在1917年2月至10月间，我们的某些同志曾经同列宁进行争论，他们当时正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我国的内部力量足以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但不足以过渡到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要知道，当时党对这些思想上的动摇给予了回击。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是同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打交道，那么我们决不能以为我们一切都完成了而骄傲自大。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一直力求说明我们哪些地方还有问题，我并不掩饰这些问题。但是，硬说我们没有实际上有的力量，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意味着从另一方面挖自己的墙脚，砍断我们自己坐于其上的树枝。

现在，我很简单地谈一下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的问题。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反对派有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反对派不了解，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退却。你们都清楚地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自己的那本小书中把新经济政策说成仅仅是退却。我们则

认为：新经济政策曾经是一种退却，但是现在我们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回到战时共产主义去的道路上向我国的资本家实行进攻，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别的，而是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的进攻。还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我就联系到我下面将要讲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一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曾宣称——这一点现在完全被证实了——：如果我们不正确地解释新经济政策，如果我们不正确地谈论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教育工人阶级的新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新的青年，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破坏我们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思想力量。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一个青年工人大胆写的（而且署了名等等）一封信中的某些片断，来说明我们的反对派往什么样的磨盘里注水。这封信的标题是：“怎么办？值得去当强盗吗？”……（笑声）请不要笑，你们会看到，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可笑。先是名字，姓，生年——1909（一个年青的小伙子，才17岁）。接着，他就描述：他怎样在学校里学习，他过得多么困难，他的物质状况多么艰苦。他描述了由于我们的官僚主义的机关他吃过的苦头，接着他写道：“我应不应去当强盗呢？这会不会损害我的基本目的即在全世界实行并且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当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最终目的。”接着他说明了他“走到这样的生活”所经历过的思想道路。他说：“简单说来，这就是我怎样得到这个结论的。”他这样写道：

“布尔什维克放弃实行自己的阶级路线。‘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可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无产阶级专政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取代了。这种取代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彻底完成了，现在，问题仅仅在于名称了。布尔什维克还在把目前的状况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况且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建议不要这样明确地讲‘无产阶级的领导’了，据说，这样

讲，农民会不太高兴的。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靠实行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新经济政策，而要靠向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当然，我们可能遭到失败，但是，没有冒险，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在解决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时，关于革命战争曾谈得很多，列宁在主张签订和约时曾说过：‘我们必须扼杀资产阶级，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我们的双手解脱出来。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当我们把双手都解脱出来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而在1921年，资产阶级已被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却忘掉了革命战争，把重点放在和平建设上，而且幼稚地认为，这种和平建设——以每天都向耐普曼、富农、私人主动性让步的办法——会导致社会主义。

打倒和平建设——革命战争万岁！

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以下是签名和地址。）

的确，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不过，老实说，他考虑问题比反对派中的某些同志更加彻底。（笑声）我现在就跟你们说一说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请你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吧。一个人按照季诺维也夫的书学习“列宁主义”，在我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准确地一一列举了的那些页上，他谈到：新经济政策是退却，退却，退却。如果说从1921年以来我们所干的事情仅仅是退却，如果说这种退却就是作日甚一日的让步，——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在这个时期内，除了黑暗的退却阶段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当然，显而易见，如果把这种退却同我国技术上的落后联系起来，那么其结论就是：现在我们勉勉强强地支撑着，我们时时刻刻在唉声叹气中退却，我们时时刻刻在向资本主义让步。那么

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国营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要知道，如果说我们的工业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所谓经常的普遍退却这个空中楼阁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这里是经常的退却，那就很容易使这个论点适合如下的说法了：即我们的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而这样一来，那就会得出结论说：我们过去剥夺了资产阶级，接着就不断地向它让步；我们提高了工业，但不是用社会主义方法，而是用资本主义方法；农村中富农正在增长；由于我国技术落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达到我们必将垮台的时刻。如果说，新经济政策作为我们政策的总的形式（列宁说它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政策），象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多数派处心积虑实行的全面的退却，那么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会由于技术落后而灭亡。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我们年年都只是在实行退却；国营工业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国营工业是先头部队，如果连它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那么其余的一切就不用说了。再往下会这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在我们这里一切事情都很糟糕。无产阶级专政坐在什么东西上面呢？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屁股下面在经济上最坚硬的地方是国营工业，而国营工业又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其余的一切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因此理所当然，既然我们坐在这个玩艺上面，我们就没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因为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政权除了它坐于其上的那个实质之外再也不能体现别的什么实质。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只是在蒙骗工人。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权，用扎鲁茨基同志的话来说，是我们的蜕化变质了的负责经济工作的人员和热月政变分子的同盟。于是，那些与我们党没有关系的人，就把这个思想推导到它的逻辑

终点。新反对派的这样一些言行在具有这种情绪的、对问题不能考虑周到的青年工人当中得到支持，这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因为有人撇着嘴向他们冷笑说：社会主义，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国营工业吗？社会主义好呀，可就是工人收入少；我们对这种贸易自由和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嗤之以鼻；你们叫喊说，前进呀，可是你们自己却在广泛地实行退却；还有，你们说，贸易自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服务个屁，这是资本主义……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真正无言以对了。那么连我也要对这样的政权、对这样的经济嗤之以鼻了，而且要对这个尽搞邪门歪道的党嗤之以鼻了。要知道，这就是从这一切中得出的直接结论。要是说，我们的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的，不过还很可怜，——这倒是正确的；要是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不过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这倒是正确的；要是说，在我们这里，总的说来，合作社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过这里还困难重重，——这倒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中央委员会是热月政变分子的（热月政变分子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举行了反革命政变），那么，这就是胡说八道了。如果中央委员会是热月政变分子的，即反革命的，如果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党的干部都蜕化变质了，那么，我们的党就一文不值了，那么，它就在走极其卑鄙的热月政变道路。我认为，某些同志读白卫分子的报纸读得太多了，很害怕他们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的敌人骂我们的话怕得要死，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自己也开始相信他们所写的东西。这种事是不能容许的。

同志们，十分明显，我们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事情很糟糕；我们知道，在负责经济工作的人员当中以及党的官僚当中，存在着一种蜕化变质的倾向。但是，不应把这一切加以夸大，而应适当地同所有这些现象作斗争。我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认为，当新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摧毁对社会主义建

设的信心、散布对于我们的政策的总的的基础的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破坏对于我们的经济命脉的信任，他们就是在破坏对于我们的总政策的信任；而当他们谈论我们党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的基础。

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①在党代表大会上讲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是在破坏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以及整个党组织的威信。当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搞一个各派别和各团体的联盟，即破坏布尔什维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的时候，他就是在瓦解我们党的力量。当有些同志把共青团同我们党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他们就是在打击——尽管是不自觉地——工人阶级的事业，而且，他们客观上就是在帮助一切富农、耐普曼等等，他们就是在破坏对我们的经济命脉以及对我们的政策的总的原则的信心。他们瓦解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办法是，打击我们的党组织，提出许多问题，如议论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谈论关于建立各派别和各团体的联盟的问题，攻击和不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挑动共青团组织反对我们的党组织等等，把一切都翻转过来，使之是非颠倒。对此我们将斗争到底。如果对于在组织问题和总的政策问题上的这种冒牌列宁主义加以纵容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毁灭我们的党。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地谈一下我们面临的任务，特别是谈一下列宁格勒党组织。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必须强调它拥护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认为，它必须向所有的列宁格勒公社社员表明，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历史上必须进行一个肯定的转变——转变到实行非虚假的、而是真正的党内民主。（掌声）

我认为——请列宁格勒组织的原来的领导人中的某些同志原

^① 克鲁普斯卡娅。——编者注

谅——，这里原来的制度可以说是蛊惑宣传同极其粗暴的管理党的方法的结合。（掌声）应当记住，现在我们党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困难。如果出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和意见分歧，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在本质上对它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可是，你们看看这里是怎么做的吧。请你们去问一问任何一个持反对派观点的共青团员，或者请你们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试着稍微考考他们，看他们谈了些什么，知道什么，了解什么，——情况一定是使人很不放心的。某一位亲爱的领导人作了一个报告，然后人们就到处机械地重复这个报告，根本不去动动脑筋、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根本不去培养责任感，根本不去听取自己的对手的每一个论据，钻研问题和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等等。但愿少讲一点排场，少搞一点大轰大嗡，少来一点官样文章，少要一点外表的好看，少追求一点表面效果。但愿多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而且是通过比较民主的方法所做的工作。要知道，任何人都容易了解，列宁格勒的旧式的领导机构之所以如此迅速地丧失了威信，不仅是因为许多中央委员都涌到这里来（当然，这也起了作用），而且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在这里依靠党的基层的民主的不满情绪，反对列宁格勒组织者们的官僚主义机构。（掌声）

不言而喻，我们知道一切东西的界限，我们知道一切东西的分寸；我们不能跳越宽阔的沟壑，那不是一下子能跳得过去的。对待列宁格勒组织的基本方针应当大致是这样：我们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路特·费舍书记的信中所说的、德国党中央必须实行的党内生活的新方针，必须由我们的代表会议贯彻到列宁格勒的整个组织中去。同志们，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取得尽管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却是扎扎实实的成绩。

对待青年一定要有最大限度的耐心。当然，对他们，该剋的时候，要剋。但是，应当懂得，他们的确是我们的接班人，这里需要的

毕竟是小心谨慎的态度，必须为争取每一个人以便把他教育过来而斗争。中央委员会所持观点是：我们不能随便抛弃人，对于有些人，只要有某种可能争取保全他们来进行共同的事业（我们正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工作、而生活，甚至必要时而死去），我们就必须保全他们。这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它要求我们给予额外的注意，它要求我们作额外的努力。不过这些努力要得到补偿，不能用机械地而要用在坚信党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正确性的基础上有机地把我们的党组织的队伍团结起来的办法。如果说现在我们不得不经历某些——而且是相当严重的——经济困难，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在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内出现种种动摇的有利条件，那么在我们党的队伍中便必须加强团结和对于我们的道路的正确性的信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党的队伍好好团结起来了，而且我们一定会把它们团结起来，那么，我们就能摆脱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对此我丝毫不怀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基础上大大加强我们的国际影响——对西欧无产阶级的影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对殖民地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影响。

必须牢记和确信，通过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分，我们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牢记，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巩固我们的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力，加强我们党的影响；这是最重大的因素之一，而在当前，这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杠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因为只有在实现这种团结的条件下，只有在进行这种齐心协力的列宁主义的领导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带领工人阶级前进。

你们的组织万岁！

我们的整个党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结 论

同志们，你们自己也看到，实际上我可以不必来作什么结论了，因为在发过言的人当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同志反对我们的路线。不过，我觉得，对这位同志用得上一句很好的俄罗斯谚语：人家既然已经倒下，就不应再打他了。（笑声，掌声）后来，我竟然同我的朋友基洛夫同志发生了一点分歧。他说，我们同你们过去有过争论，尽管是暂时的争论。可是我说，众所周知的争论我们原来是有的，不过不是同你们，而是同那样一些人——那些人用诗的语言来说是：“有的不在人世，有的在遥远的地方”。（笑声，掌声）

同志们，尽管我收到了一大堆条子，我自己决定——但愿能得到你们大多数人的同意——只讲几个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和需要解答的问题。我的结论的第一部分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把结论的主要部分用来分析我在报告中几乎没有谈到的关于组织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第一张条子，真是写得学富五车，不过作者的文化还没有高到能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的程度（笑声），这就说明他知识有余而勇气不足，因为，干吗不敢在条子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呢？这既不触犯刑律，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体面的地方呀！显然，这位同志的美德就是小心为上。（笑声，掌声）

为了更加明确起见，我自己把写条子的人所反映的思想和问题归纳一下。

这位同志说，在列宁的那本小册子和我的那本小册子中，关于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不能期望整个世界经济

会联合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由此他作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下世界经济是四分五裂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下世界经济是四分五裂的，如果说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可能的，那么，它将首先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然后在第二个国家，然后在第三个国家，而这样一来，就会形成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这位同志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如此。

我认为，这种说法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的：首先，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有组织的体系的世界经济，就是说，没有这么一个机构、这么一个中心来调节世界经济，就象我国的大工业受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调节一样，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经济也受到调节。这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下没有，也不可能。不过，同志们，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各国之间就没有经济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是有的，而这种联系就是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所以，决不能从现在不存在有组织的世界经济这一点出发，而得出结论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世界经济。接着，这位同志说：既然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然后在另一个国家获得胜利，那么，看来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将永远是互不联系的、单独的一块一块的东西。这样的结论是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呢？我们肯定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但是，难道我们是提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天才的思想，说什么既然我们会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不可能也不会在另一个国家获得胜利吗？毋庸置疑，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整个逻辑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的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合。

接着，这位同志提出一个包含着两个小问题的问題。首先他问道：你们是否承认，如果没有国际革命，我国的建设事业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完全正确。如果我们将单独地建设社会主义，即既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干涉，也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的

国家援助，那么我们至少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援助，我们就走得快些；没有援助，我们就走得慢些。因此，条子的这一部分决无任何侮辱我们的无产阶级的荣誉之处。要谈一下的是条子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这位同志问道：难道在你们——一国胜利论的拥护者——的头脑中没有产生过一个问题，即在普遍的国际革命之前无产阶级可能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胜利吗？

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产生过。因此，这位同志怀疑我们是否产生过这种想法，那完全是多余的。但是，产生过这样的想法，由此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实际上，在我们自己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之前，当然会发生五次、也许十次革命。问题不在这里。难道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先慢慢地爬到终点，只有在这之后其他国家中才会爆发革命吗？谁下过这样的断语呢？难道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迟迟不发生国际革命的话，我们能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的落后会不会必将置我们于死地呢？问题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显而易见，在我们慢慢地爬到终点之前，国际革命就会在其他一些国家中爆发——这是一个神圣的真理。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由于我们在技术方面的落后，象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断定的那样，我们一定会垮台。我们说，如果很快就爆发国际革命，如果很快就能得到援助，那么我们会更加迅速地前进；如果得不到这种援助，我们就只能缓慢地前进，但是，我们将前进，将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现在我来讲一下一些条子中谈到的其他问题。同志们，首先我必须强调我在这个讲话中已经强调过两次、也许强调过多次的一点：我们面临的任务极其复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必须在剃刀的锋刃上走——走得往左边偏了半根头发，会犯错误；走得往

右边偏了半根头发，也会犯错误。任务是如此艰巨和如此复杂，以致必须时时刻刻考虑恰当的比例，才能确定正确的路线。我们说，反对派被富农的增长吓破了胆。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象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同志在这里发言时那样，稍稍往一边偏了一根头发，说富农对我们根本没有危险，——这就不对了。这位同志说过了头。所以我应当说明：不能这样讲。说反对派夸大了富农危险，这是一回事。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说富农对我们没有危险，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由此可以立即得出一个实际结论：不必同他们作斗争。这是不对的。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都必须有分寸。

有人给我递了一张条子，其中说，现在某些县里在谈论关于成立一个特殊的农民党的问题，而这位同志是支持我们的，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反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农民党，因为一个特殊的农民党的组织必然会发展成为一个反对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它会使我们工人阶级政党同全体农民的关系紧张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说明——不管这多么困难和多么复杂——，农民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成果，要保持土地，要保持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如果取消了我们党现在所占有的这种地位，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在我国，任何其他党都一定会反对我们党，因而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个题目我不可能详细地谈，只能扼要地提一下。

既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关于农民党的问题，既然我们不了解或者缩小富农的危险，象有一个同志在这里流露出来的那样，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讲过的一点，这就是：现在在农村中的富农有时不能一眼就看得见，剥削的形式往往是隐蔽的，在这些经济中的雇佣劳动形式往往是隐蔽的。我们知道，富农是剥削者，是农村资本家，而农村资本家正如任何

资本家一样，其基础就是他剥削雇佣劳动。但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富农在自己的经济中并不直接雇佣工人，但是他，例如把自己的收割机、扬场机、拖拉机出租，因此而得到大笔收入。这本质上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一个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或者正在变为雇佣工人的贫农，用主人的收割机或脱粒机工作，可是他却以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这是一种隐蔽的雇佣劳动形式，是一种初级阶段，是一种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形式，以便真正识别资本主义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收到的几张条子中说：一些由外国进口的机器在分配时往往落到了富农阶层的手中，因此必须注意要更正确地分配机器。这个意见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有一张条子提出了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农民的政策和帮助贫农的问题。写这张条子的同志是这样说的：您想要用扩大商品流转的办法来帮助贫农；可您刚才说——他这些话是对我说的——，现在还不能提供充分的援助，而要到发展了商品流转之后，当您得到了额外的物资之时，您才能给贫农以援助。于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这是干什么呀？要知道，在扩大商品流转的基础上您将从谁那里获得资金呢？还是从贫农那里嘛。由此可见，您是要从贫农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帮助贫农，这件事可是很不好呀。您应当从别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帮助贫农才对。

同志们，我必须在这里说一下，问题的这个提法太简单化了。在这里，我们是从我们的大口袋，即我们国家的大口袋里拿出钱来进行帮助。由于加速总的商品流转而得到的一切额外收入都流入这个大口袋，当然这些收入归根结底都是劳动创造的——其中有工人的劳动，有农民的劳动，有中农的劳动或贫农的劳动，总而言之是劳动，否则一切价值便无从产生。但是，说这些价值都是从贫农那里得来的，那是不对的，因为其中的税收部分是我们从资本主

义阶层的收入中拿来的，一部分是从中农经济中拿来的，一部分是从工人那里、一部分是从贫农那里拿来的。我们从各个不同阶层那里获得这笔进款。如果说我们通过剥夺——以税收的形式——资本主义阶层的收入而得到一部分进款，那么，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剥夺和重新分配资本家的收入；从富人那里拿来给予穷人。

如果说我们从中农那里拿，或者甚至部分地还从贫农那里拿，那么，同志们，要知道，我们政策的实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得到收入，攥在自己手中，其目的是要最适当地、有计划地进行分配。这样做决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比如，假使我们从城市工业中取得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拿出10%用于修建工人住宅，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不过我们应当最适当地分配这些款项。

其次，说我们是用贫农的钱来帮助贫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我们是从各个阶层那里得到收获，从富裕阶层那里拿一部分，从中等阶层那里拿一部分，然后从大锅里盛出来一起进行分配。

有人问我：现在在农村中哪一条道路占优势，是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我老老实实在地告诉大家：现在，关于农村中的问题，我还没有充分的把握说到底是哪一股潮流占优势，因为我们的统计工作做得不太好，我们只是在一些个别的乡作过详细的调查，现有的表报还没有提供根据来断定全苏联的情况究竟怎样。要拿到了今年即1926年的调查统计资料之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农村中的这些基本的对比关系。

同志们，现在，针对某些带有反对派性质的条子，我再讲一点意见。诚然，这样的条子不多，就那么一两张。总的说来条子是重复在这里发过言的一位同志的意见。条子中说：你们撤换了某某同志，你们采取了某些措施。同志们，对此我不打算加以反驳，我

只举出唯一的一条理由。有些人曾公然反对党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难道同志们不明白，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开除出党吗？（掌声）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要知道，我们没有比党代表大会更高的机构了，如果有人不服从党代表大会，如果有人不同意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反对这些决议，那么，反对党的罪行就莫此为甚了。（掌声）还要有什么东西才能开除出党呢？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采取这种惩办措施，如果说它认为在这里首先必须进行说服教育，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遵循的原则是，它不仅按照关于自己的权力的形式上的理由办事，而且特别关心要把尽可能多的人说服和争取过来。中央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确是完全按照它过去所坚持的党内政策的精神办事的。由此可见，仅此一条理由——由于不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就可以实行开除——就把反对派的论据驳得体无完肤了。有些同志企图加以利用的是什么呢，他们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有些人认为，如果人们服从反对党代表大会的省委，那么他们还是守纪律的党员，如果某个同志维护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反对不守纪律的省委，那么他就是瓦解组织。要知道，这是酒友之间的道理，而不是党员之间的道理。（掌声）

同志们，现在请容许我转而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组织任务。我要请你们原谅，可能我会讲得很尖锐，在一些正人君子看来，这种尖锐性不能认为是很合乎国会演说的习惯的、是很有礼貌的。（掌声。喊声：请讲吧）我必须讲一下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前的领导的一个祸害，这个祸害我在第一次讲话时忽略了，没有谈到，因此，我现在应当强调一下，以便纠正自己的疏忽，因为任何疏忽也是一种错误。我在这里曾经讲过，以前管理列宁格勒组织的方法，可以说是粗暴与蛊惑宣传的混合物。不过还应当把另一点作为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因素加进去——这就是人为地培植地方

主义、本位主义，自行其是，把自己同整个党组织对立。（掌声）不应当把两个事物混为一谈。一个是为自己是这样一个组织而感到骄傲，这个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对党有重大贡献。这样的骄傲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组织的成员在回顾以往的岁月以及这个组织所经历过的道路时，充满了某种无产阶级的齐心协力的精神、感到骄傲、认为自己内部团结一致，为自己的组织是整个党组织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而感到骄傲，这里面除了好的东西之外，决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不过，同志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这样安排的，往往可以把好的东西弄糟，使之变成不好的东西；可以由一个好的东西出发，用好的东西捏合成这样一个坏东西，它长在好东西的躯体上，结果使这个躯体也变坏了。可以利用这个组织的成员中的好的琴弦，要用灵巧的富有经验的手去这样拨动它们，以便让由此而产生的好效果往不大好的磨盘里注水。

为此只要不去注意某些非常“细小的”事情就够了。你们认为列宁格勒组织是光荣的，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但是如果你们忽视了决定一个组织是否光荣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忽视了仅仅一个特点：即永远忠实于全党的任务，那么你们的光荣的组织就会变成不光荣的。如果你们说，你们列宁格勒向来是非常团结的——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是一件伟大的、可以在全党面前夸耀的事情，不过只有当这种团结是为全党的紧密团结服务时才是这样。假使你们的这种团结的矛头是针对党的，那么好事就变成坏事了。假使你们只忠实于旧省委，一味重复那些老调子等等，那么，从全党的观点来看，这种团结就由美德变成劣迹了。你们自己的组织的骄傲只有当被置于全党的范围之内时，它才是正确的。党内一个组织的骄傲、“爱国主义”只有当被置于全党的范围之内，服从全党的“爱国主义”时，才是正确的和合法的。有些人因为站在党的前

列，而不是站在旁边，感到骄傲，这是好的。但是，当他们因自己抱成一团反对党而感到骄傲时，这就不好了。忽视这一点是不行的。这种变化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就是称兄道弟、拜把结伙的思想，而不是对党组织的正确领导。这是地方主义，而不是对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是地方性的本位主义，而不是正确理解自己的组织对整个党树立的功勋。所以，同志们，我认为，在管理一个大的党组织中的这种“称兄道弟”的思想，这种阿斯特^①原则，必须消灭，必须根除，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同中央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同全党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管理整个党组织的健康的原则将代替所有这些争吵不休、搞小集团、互相指责等等。

柯托夫同志、基洛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都谈到了过去列宁格勒组织中的上层人物疏远中央。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说过，你们必须结束——用有些人的粗暴的说法——这个古露西时代的市民会议时期，消灭我们党内的封建公国。（掌声）非这样做不可。而且这不应当靠别人由上而去做，而应当由你们自己去做。（掌声）你们必须保证这种现象不再重复。同志们，你们必须坚决走上党内民主的道路；你们必须使这种讲私人关系的原则的存在成为不可能；只要你们大胆地、坚决地采取现在必须采取的措施，真正保证在你们的组织内实行党内民主的话；你们就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同志们，在这里我应该说一下，据我个人的意见，你们至少应当削弱——我看就是要消灭——已深入到你们的组织中而且迄今已构成某种传统的一些组织方面的东西。我指的是代替书记的党的组织者的原则。你们可以把他们不叫做书记，而继续称之为组

^① 阿斯特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富豪家族。——编者注

织者，好吧，就让他们叫做组织者吧，或者叫做天文学家也行，随你们的便（笑声），不过很显然，你们这里过去实行的总的原则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原则——就是用由上面委派长官代替职务的选举；理所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行党内民主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种方法必然造成机构的严重“硬化”，这种“硬化”一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就可能变成机构的石化^①；可是我们不是在从事石头雕刻，我们的组织形式应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解决复杂的任务。

必须恢复选举书记的旧方法，关于书记嘛，我个人准备让步，就继续称为组织者也行。关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重复库兹马·普鲁特科夫的话：“如果你看见大象笼子上的牌子是‘水牛’，你可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时，任何人一听到“组织者”这个词，就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理解到这是真正的、选举出来的书记。同志们，如果我们进行了这项尽管是小小的改革，或者，如果我们哪怕是朝着向这种正确制度过渡迈出比较坚定的几步，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使党的机构不致过份僵化，我们就会造成一定的保障，使党的机构中不致产生小集团，这种小集团即使在并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时也互相剑拔弩张。这将是一种——如果不说是充分的，即100%的保障，那么也是一定程度的保障，它会使我们的组织内不致产生各种各样的小集团。同志们，我应当在此说明，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于错误政治路线的重大胜利之后，如果在我们的队伍中尽管没有足够的根据可是又出现意见分歧，——从全党的观点来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让我们做到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使那些旧的、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腐化堕落、爱好争吵、毫无原则等等弊病的残

^① 即僵化。——编者注

余，不仅在胜利后的第二天，而且在第三天，第四天，第二个月以及第二年，都不致在你们这里再次出现。必须使我们的列宁格勒组织同全党步伐一致，永远不要同全党及其中央相对立。必须做到使我们有尽可能多的保障：保证同中央直接联系以及中央对列宁格勒组织的工作的直接影响。我们不要把别人看作外人、瓦兰人^①、客人。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对我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全党的团结；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应以与全党对抗为骄傲，而应在党内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以绝对不向党闹一丝一毫的对立为骄傲。我们要保证做到这一点，把这一点写进决议，我们要给即将产生的省委下这道命令，把这道命令作为达摩克利斯剑，挂在任何敢于为了集团斗争的利益而牺牲党的团结的利益的人的头上。

让我们大胆地、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吧。我们一定要做到使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事实上能拥有巨大的影响。要把我们的党组织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一方面要在思想上理解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另一方面要有可能按照新的轨道、按照新方针的轨道系统地进行自我教育；我们希望做到，把我们在争论时造成的一切创伤、一切怨恨、一切缺点、一切过失、一切重大损失都一笔勾销，而代之以在内部说服教育基础上的最坚强的团结，代之以全党的完全一致。那时，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组织的骄傲就是：它在迅速地纠正了错误之后，重新站到了前列。列宁曾经说过：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不犯太大的错误并能迅速改正错误的人。我认为，这些话也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党组织。好的组织不是不犯任何错误的组织，而是能够迅速改正错误的组织。你们的组织，其上层领导人犯了错误，而群众又屈从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它毕竟迅速地

^① 俄罗斯古代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编者注

改正了这些错误。我们要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今后少犯和尽可能不犯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牢记：一人不及七人智。一个组织好，但是，所有的组织即一切组织的总和——我们党更好。

让我们走在我们党的前列吧，同志们，我们党，在你们的帮助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统一的、团结的、钢铁般的我们的那个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党。（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选集）》，
纽约1967年俄文版第317—353页。

谈谈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

（短评）

现在已无需证明列宁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巨大的遗产。这已经成为一个定理，即“不需要加以证明的真理”。现在我们不是应当同有人不“承认”列宁的现象进行斗争，而是应当同经常地拿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名字来凭空发誓和说大话的现象进行斗争。德国人把它叫作胡闹。常常可以看到，对列宁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做出这种胡闹的事，他的著作有时被剪刀和浆糊的拥有者们粗暴地弄得乱七八糟。当然，不应忽视党在研究列宁主义方面所做的真正巨大的工作。但是，现在必须着手来准备对列宁主义进行比较扎实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研究工作，把它提到必要的科学高度。

首先，我想提请同志们注意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例如，我要举出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已为人们所共知。然而，在这方而——即在理论方面——有许多问题根本还没有弄清。

我以为，即使从最基本的入手，即从弄清列宁同志在理论领域中究竟有何新的贡献入手，也是大有益处的。

在这里，人们通常会指出象帝国主义、专政等这样一些问题。这是对的。不过此外也不应该忘记，列宁在其他方面还提出了许许多多新东西。

我这里举出一系列大的理论范围。

（1）哲学。关于辩证法的学说。辩证法的运用。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辩证法和诡辩术。一个方面的问题

清单就大致如此。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自在之物和外部世界现实性的问题。自在之物和认识。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物质、能量等等和客观世界。

所有这些问题，列宁都是按自己的方式提出来并进行分析的，都对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难道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吗？

让我们再拿另外一个领域来说吧！

(2) 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理论）。我只粗略地举出一些极重要的理论问题。

例如，市场和实现的理论。在此以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也是有争议的。只需回忆一下这样的争论就够了，如对罗莎·卢森堡同志《资本积累》问题上的争论。列宁关于市场问题的文章（九十年代的文章），即三十五年前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实质上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这里还包括关于生产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学说，关于“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按比例发展的因素之一”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见我的小册子《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第60页）。按实质说，这里也包括关于危机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有了唯一正确解决的基础。最后，这里还包括对“第三者”问题的分析，这个问题列宁解决得非常出色。关于对外贸易、帝国主义等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同这个问题联系着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对西斯蒙第的批判而进行的对国民收入学说的精辟分析。国外的资产阶级（甚至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科学界根本不能设想这些著作的全部价值，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也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就司徒卢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的卓越批判。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吗？这难道不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轨道上对马克思主义

的进一步发展吗？

让我们接着说第三个大的理论部门吧！

(3)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地经济。

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的是绝对地租的理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象列宁那样如此深刻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绝对地租学说。反对承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熟悉经济文献的人都知道，这一规律的拥护者的观点流行得多么广泛。他们也知道，最时髦的理论（英美学派）十分重视这一“规律”，并把它推广到工业中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规律”只有一处，即在谈到李比希时作了批判。在列宁著作中，对承认这个规律的反击是相当出色的，而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文献中也是无与伦比的。难道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而且完完全全是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精神的。其次，正如大家知道的，马克思本人未能论证自己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化、关于大生产同小生产在这方面的斗争的学说。直到最近，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顺便说一句，不久前该书作者已经放弃了书中的正统的基本论点）。而列宁则作出了最杰出的范例：既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又进行了极其详细的统计学上的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想国》^①、关于“美国”农业的书，以及其他等等）。遗憾的是，在国外连对这样的著作也不甚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来说，列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专家。列宁在这方面提供了许许多多东西：他的分析、他的辩证法、他的卓越的有时甚至是出人意料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加以应有的注意。不然，列宁主义就不成其为现时意义上和充分意义上的列宁主义了。

与上述诸问题相联系的，还有关于自然经济的解体 and 国内市

^① 见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场的形成等等问题。对农民的不同集团、对依附于资本的各种形式、对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最抽象的理论思维（如对再生产图式的分析）同最具体的统计调查相结合，这使列宁的著作在这个领域中成为经典性的著作。

上面我谈到了人们很少写到和谈到的东西。现在我还想谈一下这样一个想法。列宁还是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他对俄国专制制度本质的分析，他对我国阶级构成的分析（常常都是有血有肉的分析），他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核心、“本质”的深刻洞察，他对这些历史时期更替的卓越描绘——这一切都是进行社会—阶级分析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主要的是，列宁是结合“当前的”要求来写作的。但由于他采取的是科学的政策，所以，他的文章集中起来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战略的方法论，而且也是一部最优秀的俄国历史。

关于帝国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战争，关于社会革命，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革命过程的多样性的学说；关于工人阶级的构成（工人贵族的影响和基础）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学说；关于农民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党的作用的学说；最后还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关的一系列理论原理（这里有许多材料还没有被党所周密分析）——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支柱”。关于“幼稚病”的全部著作是讲战略和策略的，但是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提供了在这方面作出判断的材料。

首先应该收集并归纳一起，特别是标出列宁在理论领域中所作的全部新东西。应该来尝试把这些新东西加以系统化的工作。那时列宁的形象在我们这里就会变得更加突出。那时将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伊里奇给我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宝库。那时，全党将更加容易地来研究这位思想和意志的巨人的著作。

写于1926年。译自《真理报》1926年1月21日。

作为一种思想家类型的列宁

在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人们已经不能否认列宁是当代最大的一个人物了。但是，迄今为止，在这些人士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列宁是一个天才的野蛮人，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直觉才能；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有点象无产阶级的俾斯麦——如此而已。而对于列宁是最巨大的智慧力量、而且是历史上刚刚出现的新型的 智慧力量的独特的思想家——这个意义却一无所知。资产阶级人士和当代资产阶级政论界的“电影摄影师”，对于这个意义一无所知，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工人阶级的相当广大的阶层，对这个意义也不了解。

列宁不仅是一个铁腕人物，熟悉历史的脾气；驾驭着历史，指导着历史飞速奔驰的方向。列宁还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

思想家这个词通常总是同关于流行的干瘪的和毫无生气的抽象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那种抽象装出一副无论如何想要跳得高过自己的耳朵的理论理性的姿态。这种观念是有其历史的存在理由的。席卷资本主义哲学界的洪水，恰恰培养出了这样一种类型的思想家，他们在实际的现实中越是卑躬屈膝，就越是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他们双脚（或者甚至四只脚）站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现实越肮脏卑鄙，他们就越狂妄地为“真”、“善”、“美”而斗争。当然，同实践世界的联系这里也是有的。不过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表现在“理论的”、“纯粹的”理性同它的“实践的”孪生兄弟之间的不和，这种不和乃是康德主义把持着现代哲学的整个时期中非常突出的

现象。这种萎黄病决不是一般哲学思想、甚至也不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所患的典型病症。只要回顾一下十八世纪的启蒙派唯物主义者就行了。在这些唯物者那里，哲学的实践的自我意识——如果说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话——是用头站立的（意见统治着世界）。另一方面，例如最近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企图建立同实践的联系，但他们的企图带有显然是歪曲的性质。马赫的“思维的经济原则”实质上是把康德的“理性”的“调节”作用翻译成生物学的语言。康德的“理性”把混沌世界变成宇宙的法律秩序，其办法归根结底是求助于风俗警察即至高无上的命令，这种至高无上的命令保证资产阶级个人的端正的行为，让他遵守神的规范。在实用主义的拥护者（詹姆斯之流）那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被歪曲得一塌糊涂。真理的实践标准，在他们那里被变成了对于那些寻求宗教慰藉的女乞丐“有用”、或者对于那些一心只想“在熄灭了的烛光的阴影里拚命寻欢作乐”的酒鬼“有用”，或者对于那些搞证券投机的头脑清醒的银行家“有用”的标准，——反正这个方便的“有用”的标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同样“有用”。如果说在经验批判主义者那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弄成这样，即现实性的世界受到了损害，那么在实用主义者那里，多亏那些口袋里装着叮当作响的硬币、“灵魂”里装着宗教的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实践家”，现实性的世界遭到了彻底的践踏。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提出并且正确地解决了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实践推动理论。而理论的认识是对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认识。只有认识这种客观的东西、这种现实性，才能正确地辨明方向，然后才能正确地行动。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客观主义。关于简单的客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列宁在自己的最早的

一篇著作中就曾这样写过：

“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

还很年青的列宁就在这里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做了一个出色的评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评述中还谈到了当时连提也没有人提过的、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例如主要由亨利赫·库诺夫所代表的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库诺夫提出一个论点说，“历史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这就完全是持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观点了。这种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历史已根据事实向这个原来的历史学派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但是，根据事实来看，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也适用于象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吗？当普列汉诺夫“赞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他就“歪到”“事实的辩护士的观点”上去了。当他开始诉诸“法律和道德的简单规则”时，实质上他就是向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道德投降，这种实践理性的道德用一些空洞公式的破布很方便地把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小小的过错和大大的罪行掩盖起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编者注

来了。丝毫用不着怀疑，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完全跑到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轨道上去了。现在，希法亭先生们急急忙忙拜倒在国际联盟这位花容月貌的达辛尼亚^①的石榴裙下，尖声尖气地歌颂革命中国的扼杀者、无产阶级联盟的凶恶敌人的“和平主义”，——这帮先生们所创造出来的思想体系，乃是帝国主义投掷在工人贵族或准工人贵族这些被收买去了的队伍上的影子。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根本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在上世纪中期就确定了的。不难指出：工人运动的实践怎样向它的有思维能力的参加者揭示日新月异的前景，从而使得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工作；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发现，又怎样使得工人运动更加富有成效。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时革命变革的理论是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为依据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个时代的框框的限制。马克思这位人类思想的巨人，在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时，并且由这种运动而推论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时，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瓦解时期的最后的一些具体阶段，以及新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分析。狭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还不可能生产出自己的理论的凝聚物来，因为这种实践本身还仅仅在理论上被预见到。但是，直接变革的实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最根本的实践。实行革命变革的时间，从历史过程的观点来看，是被革命的强大力量压缩了的时间。“正常的”阶级冲突的小涟漪变成汹涌澎湃的巨浪，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旧社会的全部基础都土崩瓦解。对社会风暴的有计划的领导，就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阶级斗争实践的最高形式。列宁曾经领导了这一斗争。因此，我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高形

^① 达辛尼亚是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幻想中的情人。——编者注

式。这就决定了一种新的最完善的思维类型，在那里，专业化的狭隘性被克服了，在那里，出现了一种“理性”，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造”世界。

资产阶级的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生于4月22日。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生于4月23日。在这两个日期和两个名字的对比当中，存在着某种真正是象征性的东西。今天——资产阶级；明天——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把封建时期的神学置于批判的放大镜下面之后，立即又向这位面孔微微发红的害人的老太婆伸出另一只手。无产阶级用带刺的扫帚把陈旧的垃圾扫除掉。

资产阶级哲学家是消极无为的，他们对“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忧伤地睁大戴着眼镜的眼睛。

无产阶级是积极的，无畏的，它敏锐地向前看，不承认认识的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康德象隐士一样地生活着，他正襟危坐在被一道万里长城同实践隔绝开来的雪白的理论宝座之上。列宁领导着千百万人，他把千百万人的经验变成一套一套完整的理论的总结。两个阶级、两个时代、两个世界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差别啊！

实践的观点是列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这个观点决不意味着忽视理论。恰巧相反，它要求十分重视理论。列宁认为，理论的原则性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美德之一。他的理论范围的确是广泛的：从“自在之物”起，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止。但是，每一次列宁的思想都是贪婪地、猛烈地向着当时工人运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扑去。列宁同志善于找到“当时必须抓住的”理论“环节”，而且他的强有力的头脑很快地装满了为了——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进行理论上的消费”所需要的最大限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象智力“生产力”的勤勉的“当家人”一样，极力主张“节约

制度”。他善于工作。在“有教养的人士”当中(而且很遗憾,还不仅仅是在他们当中),往往可以遇到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是在文艺界的一些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当中发展起来的,似乎真正的天才即“神的宠儿”同“工作者”——这些是互不相容的对立面。没有任何东西比那些在咖啡馆里追逐异性的男女所喜欢的这种偏见更加有害、更加错误的了。人类的任何活动领域中的最伟大的代表,那些体现人类生活的整整一个时代、其名字世代代发出光辉的人,——他们都是最伟大的工作者。亚里士多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哥德、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等这些最光辉的思想家,他们全都善于孜孜不倦地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最出色的工作者。天赋才能由于不间断的劳动而成倍地增长。人们通常忘记了:一个成熟的人的直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天获得的东西,是一种没有中间环节的简单的反射作用。丰富的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进行经常的仔细的加工整理,就导致一种几乎是本能的确定方向的本领。一个有经验的音乐家,在弹钢琴的时候,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识谱和寻找所需要的琴键。那些习惯于大量阅读和长时间阅读的人,往往并没有把每一行都浏览一遍,就一眼“看出了”一整页的意思。这是“不自觉地”,几乎“本能地”、“非理性地”这样做的。不过,一下子就读好些整页整页的书,但连字母顺序也不知道,也不会“按照通常的方式”读书,——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天才”。

在其他领域中,包括在政治中,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现象。列宁的天才的政治直觉,他的真正惊人的“嗅觉”、他的那种近乎未卜先知的历史远见、能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十分迅速地确定方向的本领,——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经过思想家的最丰富的头脑加工整理过的经验的结果。在列宁那里,这种加工总是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认识

各种现象之间的纯粹客观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建立理论原理与实践结论之间的联系。“自在之物”这个抽象的哲学问题以及关于人类认识的界限问题，在列宁那里，同对在其社会职能意义上的宗教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实际态度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请看看列宁论述经验批判主义的那部著作吧。它的副标题本身（《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就明确地指出了批判的锋芒将指向哪里。的确，这本书不仅证明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等等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抓住了他们的衣领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到了由已经接受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主义的”、“僧侣主义的”）结论的肮脏泥潭。在这里，“彻底的客观主义”同宣称“直接地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的“党性”结合起来了。

对于理论理性的“地上的”认识，对于它的实际生活根源的认识，必然导致最大的理论上的慎重。这不是一切国家、时代和民族的庸人所特有的那种“慎重的”狭隘性，而是一种真正的革命的慎重，它向任何幻想、虚妄、幽灵、一切“超感觉的东西”、一切鬼怪、形而上学的梦呓、任何种类和级别的偶像崇拜等等宣战。把宗教当作“奸尸勾当”对待（见列宁致高尔基的信^①），把哲学唯心主义当作僧侣主义对待，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直至它的微粒——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作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同列宁非常讨厌词藻的花哨、讨厌对不包含有必要概念的词藻的偶像崇拜，有着共同的根源。由此就产生了列宁的辩证法的那种极端的明白易懂和天才的朴实无华，这种朴实无华与列甫·托尔斯泰的艺术书简的——也是天才的——朴实无华惊人地相似。

列宁的思维的“实践观点”，表现在这种思维的极端的 具体性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5页。——编者注

上面。还在自己的早期著作（我们故意举列宁的最早的一些著作为例，因为它们再好不过地表明了他的智慧发展的道路）中，列宁就曾极其尖锐地反对凭空捏造出来的“抽象公式”（例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理论符合于……现实和历史为根据，而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①

“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②

这样的地方可以引出上百处。这是不是意味着列宁不了解抽象思维的重要性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对一切抽象理论持否定态度呢？当然不是。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说过，在社会科学中“抽象的力量”起着显微镜的作用。列宁了解这种力量的全部价值。例如，只要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一看他关于市场和销售理论的一些文章就够了，他在那些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向自己的论敌指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的原理的抽象的性质。列宁极力反对两个东西：第一是反对空洞的抽象，因为在空洞的抽象中，抽象的力量由于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变得毫无用处，由具体特征中逐步抽象出来的东西成了完全脱离生活的东西，同实际生活的任何联系都被破坏了，抽象的概念或公式成了所谓的虚数；第二，列宁激烈地反对笨拙地运用抽象公式，因为那是不考虑中间环节，不考虑具体方案、色彩、过渡、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因素、类型、力量、规律等等，而把这些公式直接“运用”于实际生活。因此，列宁最喜欢的格言之一就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7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73页。——编者注

常青的”。列宁是纯熟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的第一流的理论家，他懂得抽象真理的全部辩证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既然对他来说，用他自己的话讲，“头等重要的是实践的目的”，那么把抽象的东西正确地译成具体的东西的语言，就是列宁的思维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必须把这种思维的具体性同庸俗经验主义者以及——如恩格斯所说的——“归纳法的蠢材”的“具体性”严格区别开来。庸俗经验主义者只看见具体的事物，而不了解它们的联系。他们的思维必然是狭隘的。在这个意义上，婴儿和野蛮人也是非常“具体的”。离开了局部的东西的抽象思维，对于这种具体思维来说，是高级形式。但是，列宁从来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的思维的具体性是一种高级的具体性，是在出色地运用抽象方法的基础上的具体性。在列宁那里，抽象的东西同具体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同渺小的东西，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同局部的和狭隘的东西、广阔的前景同当前形势和平淡无奇的日常事务，就这样联系起来。至于列宁在这方面显示了多么无与伦比的技巧，显示了多么深刻的洞察“事物本质”的才能，那就不用着了，因为关于这一点过去已经不止说过一次两次了。只要回想一下以下的东西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或者关于革命过程极其纷繁复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等等，等等）的预言，或者众所周知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最后，对具体情况所作的一系列十分精采的分析（1917年2月，7月的那些日子，文章《危机成熟了》等等）。列宁的著作的这样一些分析，象极其贵重的宝石一样闪耀着光辉。各种社会联系的乱麻团，总是被他用统一的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就给解开了。

这个方法就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它是英勇无畏的，因为它没有偏见的。“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纯熟地掌握

了辩证法，没有任何一个偏见成为他的包袱。因此，列宁没有滑到去为战争辩护，而是在它的喧嚣后面预见到了国内战争。因此，他的四月提纲（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是“梦话”、“幻想的滑稽剧”）成了发展着的现实的指导线索。因此，他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欧洲必然完蛋，而战后的资产阶级的一些忧郁的哲学家，就象在哥伦布以后几百年又发现了美洲似的，认为那就是整个欧洲的末日。这在列宁那里如果不是科学预测的结果，则可以称之为“时代的感¹觉”。现代资本主义的那些歇斯底里的思想家们，企图要么就在各种神秘的妖法和魔术当中寻求安慰，要么就手忙脚乱地抓住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其实它下面的干树枝已经被历史点燃，正在烧得劈啪作响。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吹鼓手们正在拚命地探求一种“和平主义的”资本主义，并且正在得到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现，证明资本主义关系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甚至……是工人阶级所喜爱的。实际上，战争时期的历史正在重复……唯物辩证法使列宁能够判明局势，因为它，这种辩证法，看到运动和矛盾，看到对立及其发展，看到冲突和对抗，——甚至在它们还被“国内和平”或普遍的和平主义废话的隐身帽暂时掩盖起来了的时候。狭隘的经验主义者，非辩证论者，任何时候也没有看到，在赤裸裸的“直接给定的”战争现实后面潜藏着革命爆发。革命的辩证论者，在极其纷繁复杂、五彩缤纷的场而下，不仅看到具体的东西，而且看到具体的矛盾，不仅看到具体的“状态”，而且看到它们的具体的运动，不仅看到“存在”，而且看到“生成”，不仅看到事物，而且看到过程。

列宁主义毫不费力地揭穿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乐观主义者”的虚伪，况且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列宁具有非凡的“思想体力”，善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摧毁一切幻想，哪怕是很美好的幻想，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不是那种对革命的幼稚的乐观主义

者，那样的人能够以自己的乐观主义葬送最好的革命。革命的这些潘格洛斯们^①在本质上是敌视坚强的领袖的，因为后者在政治上同一切玫瑰色的东西、幻想的东西、甜蜜的东西和温情脉脉的东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列宁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这就是说，他明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对于这种认识的坚定信心，这种象雄鹰翱翔般的天才思想，使得列宁成了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给人类历史的广阔的阶段，而且是一个最光荣的阶段，打上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烙印。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列宁是一个进行破坏的魔鬼。要知道，当马克思和和乎平地住在伦敦的时候，一些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称他为“红色恐怖博士”。列宁实际地实行了反对人类奴役者的“红色恐怖”，对于他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在今后一切时代的意识中，列宁将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的体现者，将是新世界的最伟大的创造者，将是把思想和事业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人。列宁用不着说：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道路上……”^②

因为他自己就走在这条道路上，他生活在群众的意识中，而群众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在艰难的、痛苦的、然而却是光荣的道路上——为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伟大胜利的道路上，由人类的“历史前期”通往它的真正历史的道路上。

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译自《真理报》
1926年4月23日。

① 潘格洛斯是伏尔泰的中篇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乐观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② 普希金：《纪念碑》。——编者注

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

(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新经济学》一书^①的批评性意见)

我在很早以前曾经撰文批评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②

不久，“规律”的作者就写了一篇火气很大的反批评文章来答复我，他声言要“在犯罪的现场”把我“照下来”，当然他还责备我进行了各种歪曲，指责我使“崇高的理论”服从于“卑贱的政治”，祝贺我“廉价的胜利”，他好象一只天鹅，在雪白的抽象高空中翱翔，答应要在正在准备付印的书中，作出更有份量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答复。现在，这本书出版了，我必须进行回答，何况“卑贱的政治”在新的形式下提出了我国建设中的同一些具体问题，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却对它们表现了自己学究式的“非常冷淡的鄙视”，事实上，他恰恰论证了一定的——但是决不是完全正确的——政治，他用精心挑选出来的、“非政治性的”帽子滔滔不绝地抨击自己的论敌，诸如：“共产主义民粹派”，“孟什维克”，“庸俗的经济学家”等等。我的任务不是保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所有论敌。但是应当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决没有保持住“风

① 该书 1926 年由共产主义科学院在莫斯科出版。

②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 8 册；尼·布哈林：《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等等。见《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论文集，莫斯科 1925 年版。

格”，抱歉得很，他也象我们当中任何人一样，很少离开政治，不同的——不知为什么——只是他掩盖这一点。我认为，正是从政治观点指出这一点是我很小的（甚至是极其微小的）义务，但终究是一种义务。

应当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书中充满了“高调”和教授式的自大，这就使人产生了某些可笑印象：这可实在是“俄国式”的“老生常谈”。是什么样的老生常谈啊！从前当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地炫耀这种“博学”时，列宁就是这样嘲笑我们的。而现在在实行专政的第九个年头，在四十岁的时候还这么做，这该怎么说呢？象公火鸡那样自命不凡地高傲起来岂不可笑？

看起来是有点好笑。

现在，读者们，我们一起来漫游“新经济学”的理论花园吧。

一 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彻底 性问题谈过渡时期规律的特征

任何一个研究《新经济学》^①的人都会碰到的第一个最一般性的方法论问题是，这个经济学的规律具有怎样的性质。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的规律是自发发展的规律；它们是“盲目的”；它们反映出社会过程的不合理性；所以，它们“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一样”（马克思），是外部规律。另一方面，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不用说，在这里，一切发生着的事情也有因果制约性。但是这种因果性是为人们所认识，并通过他们有组织的集体意志表现出来的。“自由的王国”，是“被认识了

^① 书名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对社会一阶级因素完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所有“新的东西”都可以认为是“新的”，战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曾经是“新的”，现在的战后经济是“新的”，在这个名词下，苏维埃经济中的社会新事物被掩盖了。

的必然性”的王国，但终究是必然性。当然，有些人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把著名的“跳跃”，想象为是向因果性已经消失，规律性概念本身已经成为多余和变得“过时”的领域的跳跃，事实上，只有这些勇敢的“创新者”才会作出向真正廉价的唯心主义王国的“跳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向他们身上倾倒入上述马克思的“房屋”那样的力量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幸运的是，能够在无因果性王国中作因果制约性飞翔的各种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同他们辩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总不能用许许多多的篇幅，“辛辛苦苦地”去叙说众所周知的道理，这种唐·吉珂德式的作风显然是同节约制度相矛盾的。

我们提出过渡时期，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时期的规律性的类型问题。不难明白，这个时期是自发的规律转变为已经被认识了的和自觉运用规律的时期。当年彼得·司徒卢威^①先生曾提出经济过程不可避免的二重性的命题，并认为这种二重性是经济过程本身所固有的。这是资产阶级观点，资产阶级不可能跳出自己的圈子，它进行着“科学”的论战，反对一般说可以有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个论点，同时过渡时期的现实——毫无疑问，这种二重性在这里还存在着——乃是从自发性到自觉性、从盲目到计划、从不合理的东西到合理东西的经常变换重心的图景。这一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限界是“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后者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承者。所有这一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似乎也懂得。但是再进一步，他开始碰到了困难，尽管这时他还作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政治”“矛盾”就是这样……

事实上，我们提出来的的是这样的问题：合理因素比不合理因素

^① 彼·司徒卢威：《经济 and 价格》。

的增长表现在什么地方？答案是十分明确的：表现在计划性的增长上。但是这一计划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答案同样是清楚的：是国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是它的影响和比重的增长。最后，从过渡时期规律性的特性的观点来看，这一过程在何处得到了反映？反映在自发的调节者被自觉的调节者，也就是说被无产阶级国家（从某一时期起，失去自己的阶级性，也就是自我否定即不再成为国家的国家）的经济政策所代替的过程中。

抽象掉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在规律的历史特征之外，在“自发的东西”转变为“自觉的东西”之外，来把握过渡时期的规律。这恰恰是做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抗议过的事情。

然而“抗议者同志”本人是怎样议论的呢？

请读读下面这段话！

在《新经济学》的第6页中写道：“在方法论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意见。——尼·布·）可以归结为：第一、在研究苏维埃经济时，不能抽象掉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政策，即使是在一定研究阶段上的抽象。这第一个不同意见（如果坚持这一不同意见）以确定不移的逻辑必然性有把反对者推到施塔姆勒和他的学派立场上去，以及推到米哈伊洛夫斯基、卡烈也夫等主观社会学派的观点上去的危险性，同时，在经济理论方面，这种立场也不可能从庸俗经济学的——即使它是苏维埃版的——泥坑中摆脱出来，从而在科学地研究苏维埃经济方面，不能迈出真正前进的一步”。

往后我们会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迈出了怎样“巨大的步伐”。现在我们只指出（暂时是赊欠、但不会是长久的）在谴责论敌方面的巨大的……自信。我们深信，在目前场合下，这种自信对科学本身来说是多余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象刚才引证过的那样，重复着自己愤怒的指责，多次地援引施塔姆勒，援引——完全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接着又补充列举许多极不受欢迎的名字（同引用拉丁谚语不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以要提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极不受欢迎）^①，然后骄傲地宣称，他本人不用说是“纯洁的”，他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第34页）。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这很好，但是，说空话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至少，这两个量不总是“一致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马克思抽象了国家及其职能。这是正确的意见（虽然并不是十分新颖的意见）。但是，就我们记忆所及，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它的自发规律性。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却用很难听的话——罪有应得——来称呼那些不理解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之间“微小”差别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引证马克思呢？

这就是泄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秘密的东西：在第33页用最“小号铅字体”刊印的脚注中我们可以读到：

“指出在我们这里国家领导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同这种经济成分是不可分的，这只不过是证明，对于抽象来说，在这里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更大的困难，但这决不是说反对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有必要把经济同政治分开（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读者大概已经猜到了这是怎么回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自己论敌的决定性的论据藏在脚注里，从而也就隐藏了整个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问题从这一文化地窖中拯救出来，并且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使它能引起真正的研究兴趣。

^① 见《新经济学》第32、33等页。

但是，首先要弄清一个情况。取自《新经济学》第6页的引文，指的是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即正好首先同编制经济计划有关的那个领域。在小号铅字体印的脚注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显然不是为了“策略”，而是为了客观的“研究”本身——竟能把最重要的东西强塞进去，在神的帮助下，“经济政策”竟简单地变成了“政治”。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容易地完成他“困难的”抽象。但是，为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如此关心的科学的利益，并根据《新经济学》第6页，我们往后所说的，正是经济政策。

总之，我们从实质上来考察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引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主要“论据”。《新经济学》的作者对关于不允许抽象掉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意见写道：

“这种不同意见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是反对马克思的一般社会学方法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他（马克思。——尼·布·）以‘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说明从‘基础’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由，虽然，一定的上层建筑作为客观事实……始终是一个前提条件。为什么理论上分析苏维埃经济时，不能同样也从基础开始呢？我的论敌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马克思的方法转到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施塔姆勒和他的学派的阵营中去了，同时也是向所有批评马克思的人伸出了友谊之手……。”^①

这里不难看出什么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错误的根源。它的根源是，他完全没有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众所周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特殊的历史特点（类型的特点）来考察生产的类型以及它们的上层建筑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I。第32页。

的。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目前这一场合却根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论上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马克思在抽象形式分析中所提供的“古典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结构，那里经营主体（从他们的经济职能观点来看）不直接包括在国家的政权机关中。国家决不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研究生产关系是经济理论的事。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服务，它作为相应的政治外壳对后一过程起影响，仅此而已，而且经济规律性是在整个过程自发性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金融资本主义曾经意味着，并且正意味着合理因素（辛迪加、托拉斯、银行团等等）的一定增长（在一定的界限内和同时矛盾在新的、更高基础上扩大和尖锐化的情况下）。经济理论也不抽象掉这些因素。假如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抽象掉例如垄断价格、倾销、资本输出等政策，那它大概会是一种其妙无比的理论。当然，这里的任务是要为这一政策确立客观的界限，寻找它的经济制约性等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抽象掉这些因素，这一点完全是不难理解的。

有人对我们说，要知道，托拉斯和辛迪加在金融资本主义下是不包括在国家政权体系之内的，也就是说，不包括在上层建筑体系之内的；它们本身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组织形式。

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使下面的阐述清楚起见，我们需要谈谈托拉斯和辛迪加。因为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托拉斯和辛迪加是包括在国家机关总和之中的，而它们的政策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在国家政权的政策之内。我们的国家经济机构，是苏维埃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它完全包括在“基础”之中。正是我们制度中这一“小小的”特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只是感到事情不太妙，并且匆匆忙忙地用小号铅字把问题塞入脚注之中。

让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问题提得鲜明一些。什么是

与一切以前结构不同的苏维埃经济典型的东⻄呢？是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起着领导作用，是旧的生产等级制的阶梯被推翻了，是没有旧的“统治和奴役的关系”（马克思）。这首先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对工业的管理上，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的领导上。国家机关中的经济机构，是我们特殊基础的上层组织。撇开它们、抽象掉它们，意味着撇开“新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抽象，事实上正是意味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解这一点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事。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现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离开，简直是跑着离开这些立场的，可是他却“胜利地”揭发我们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非法的同居！真是“本想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间”。请试一试真的“抽象掉”国家的经济机构，然后再来确定一下“新经济”的生产关系类型。原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因为，基本的、决定性的生产关系，是生产中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关⻘，技术知识分子和（如果超出国营工业的范围）对农民的关系。抽象掉什么都可以，但是抽象掉主要的、决定历史上生产类型内容的东⻄，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允许的。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犯了这种错误，他十分幼稚地把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式搬到无产阶级专政中来。

国家这个上层建筑不是社会的永恒附属物，这是第一。第二，它在自己的初期和后期，都具有特点，因为无论是前一时期，或后一时期，它都不是原来的“古典”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因为它在产生的初期，是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它没入基础之中，并且在自己生命道路终结时，即当国家“消亡”时，溶合在基础之中。正是由于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这种直接的融合，国家职能在初期空前地加强了，这是过渡时期的特点。但是，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这种情况却是作为特殊上层建筑范畴的国家本身死亡的前提条件。“基础”生育“上层建筑”但又消灭上层建筑，就象赫洛诺斯生育和消灭自

己的孩子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对物的管理”（恩格斯）已经不是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的职能，这是总生产过程的一个小部分，那里经营的（有计划经营的）主体是社会本身，客观的发展规律是同这一发展的准则相符合的，不合理的经济生活为合理的经济生活所替代。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国家的计划机构、调节机构、管理机构，是共产主义“对物的管理”的萌芽。无产阶级国家在执行经济职能时（“经济政策”！），是合理的因素，是集体经营的主体。撇开它，把它“抽象掉”，从而你也就抽象掉计划，抽象掉自发规律向被认识了的规律的转化，抽象掉政治经济学向科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它叫作“社会工艺学”）的转化，等等，等等。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巧妙地变了这种戏法：他坚决主张“计划”和其它的好东西，同时却更坚决地主张抽象掉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的职能。他那里也有计划，但是没有计划的主体；也编制计划，但是没有编制计划的机构；也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没有这个因素存身的固定的地方。这种作法只能意味着是神秘主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把这种神秘主义奉献给读者的同时，却打出了“我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的红旗。

“这故事很新颖，可是难以令人相信”。

毫无疑问，在被认识的规律后面，是这些规律自身，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自觉的计划，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一定的方法所决定的；象通常所说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终究是一种必然性。但是，把这种“必然性”同它是“被认识了的”相割裂，这对有计划的经济来说，就是意味着从社会规律的身上剥下它的历史表皮，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是格格不入的，对规律来说也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在结束时，必须提出一条极为实质性的意见。用社会规律来替换它们的历史表皮，这比起更换脏衬衫来，当然是一个更为

长期得多的过程，分析过渡时期的全部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就在于外衣是形形色色的，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机体总和是由各种最不同的经济形式结合而成的，情况就更加如此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剥夺剥夺者”，是社会规律开始换毛过程的前提条件。这一过程是以国家经济及其影响的增长作为基础的。这一过程是在许多复杂的，并且常常是最矛盾的形式中进行的；计划因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起同样作用的各自自发因素的预见上的。因此，在每一个有关的时期，都必须避免对计划因素估计不足和估计过高，还要记住对立本身的历史相对性。当然，与此有关的还有在理论上对社会规律换毛程度的估价问题。分析所有这些最复杂的情况和找出发展的基本规律性，组成了过渡时期的理论。

另一个意见。

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抽象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政策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抽象掉计划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分析阶段上，抽象掉该时期纯粹政治局势波动所引起的特殊政治影响，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另一种问题，把这一问题同关于我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基本路线的总问题相混同，说得轻一点也是奇怪的和轻率的。

我们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方法论有着巨大的矛盾。往后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矛盾如何影响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以后的理论。而现在我们转到另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认为他的基本的和中心的错误。

二 关于经济生活调节者的问题，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错误

这样，我们解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来的第一个方

方法论上的问题，现在转到第二项“议程”上去。

“方法论上的第二个不同意见是针对本书所发挥的下述观点：苏维埃经济中的经济平衡是在两个对抗规律——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斗争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说不承认在整个体系中有统一的调节者。”（第6页）

《新经济学》的作者批评自然主义地理解价值规律（批评得完全正确），攻击那些不理解我国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并把这些同志叫作倾向于“对我国经济采取孟什维克观点”的人（十分正确。只是……嗯……嗯……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某些现在的朋友怎样说才显得更委婉一点？读者，您不能帮一下忙吗？……）《新经济学》的作者继续写道：

“对我所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所持的基本不同意见，其论据可归结如下：‘论敌们说，不错，我们这里有社会主义积累，但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或者，至少它的存在没有得到证明。’总之，社会主义计划因素同市场的斗争是有的，但是，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斗争却不存在。如果象一个读者在同我私人谈话中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不同意见的全部深刻性和不可反驳性不用多说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他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要讲什么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呢？苏维埃政府能积累多少，就积累多少。’”（第7页）

对于这个“基本的不同意见”和基本的“反不同意见”，可以简要地提出如下的看法。

关于“读者”。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手法，挑选一位头脑简单的“读者”，然后把他的反对意见看作是“基本的”。确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很容易了解”——甚至“不用多说”——这种“机灵读者”论据的不足，很容易把他们驳倒，并且也很容易感

到自己是胜利者。但是，来自“读者”的论据一点也没有说明问题本身。因为，如果确实是存在着社会主义积累过程（请看刚才的引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呢？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存在着计划因素同市场的斗争，那么为什么价值规律一定要让位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不是让位给某个其它的规律呢？要知道，正是后面这一点，需要加以证明，而不能先验地予以法定。这里，我们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但是，为了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更加清楚起见，我们只好按照相当自由主义的议事规则让他自己来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无论价值规律，无论其基本趋势是采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形式的计划因素，都在统一的经济机体内部起作用，由于十月革命的结果它们彼此是相互对立的。”（第 27 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如果在统一的经济机体中，存在着两种因素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切辩证发展过程所固有的，是整个体系前进运动的对抗形式），那么就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有二个调节者，或不能有（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二个调节者。”（第 36 页）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排斥价值规律对无组织经济有利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和有弊的解救性作用，我们就应当相应地用另一个规律，即计划经济在它发展的现阶段所固有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来代替（1）价值规律的调节活动。”（第 40 页）

我们的作者愈来愈激动，他转而直接进行激烈的进攻。

“……在形式上大家都承认有两种因素斗争这一事实。但是，大家知道，要斗争，至少要有二个（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斗争着的主体。二重性已经具备了。如果斗争真的在进行，它

不能不是为两种不同的劳动组织类型（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不同的生产力分配、两种调节的方法而斗争。怎么会没有同价值规律相对抗的另一个调节者呢？这无论从逻辑上，和从事实上说，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场合下，我很想劝告我们有关的经济学家，在头脑中装点‘计划因素’，并且表明，他们在理论方面，是怎样在我国‘彻底社会主义型’国营工业……和他们关于唯一的调节者的论断之间维持平衡的。”（第44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自己《新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建筑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基础之上。在这一基础上，他建立了似乎是他自己实践的正教教堂，同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他拥护列宁，而我们这一群罪人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民粹派”。为了特别强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给予他的产物——所谓的“规律”——的全部意义，我们引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自己为了引人感奋而加了着重号的一段总括性的话：“不了解存在着这样的规律，不了解它对国营经济所具有的强制性，不了解它对私营经济的影响，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错误，不仅是思想的固执，保守主义，而且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就是说，从我们集体经济整个体系为争取其生存而斗争的观点来看是危险的。”（第41页）

换句话说，谁不承认“规律”，谁就是出卖“集体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叛无产阶级，从而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泥坑，等等。

我们从末尾谈起，从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理论观点的正统性谈起。六年以前，即1920年，我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名词，并在脚注中说明“这是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的名词”，列宁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评注：“非常糟糕。抄袭成人使用的名词的儿戏。”不难明白，如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概念是“儿戏”，那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也是属于这一范畴的。关于列宁为什么是正

确的这一点，在下一章专门分析“规律”时再谈。在这里我们只想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引用列宁的话是白费心机的，他对否定“规律”的人的“严厉”攻击（“理论上的错误”、“思想上的固执”、“保守主义”、“危险的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象我们所看到的，首先都是针对列宁的。

当然，我们决不认为，这样一说问题就被“取消了”，我们只是从对问题的最一般性的提法开始，着手来实质性地探讨问题，并力求说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错误，以及他的论断同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整个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处在极端的矛盾之中。

从基本常识开始。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写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上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①

换句话说，在一切社会历史形态中，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或者简单地说，“劳动消耗规律”是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它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在商品社会（无论在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在任何一个商品社会），它给自己穿上了价值规律的拜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编者注

教外衣。价值规律是历史相对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它的“额上写着”,它“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①。不能把价值规律只看成是劳动消耗规律,因为这意味着忽视价值的特殊历史意义和性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能在社会历史形式之外来考察这一规律的物质劳动内容。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实质”在于它的拜物教性质。

但是,同样也不能忽视这一范畴“超历史的”(即在多少是“正常”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社会所固有的)物质-劳动“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脚注里,对这一点作了出色的说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②

马克思仔细地分析了劳动消耗规律:(1)在农民家庭“宗法生产”的条件下;(2)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按照计划进行劳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③;最后,(3)在商品经济中,劳动消耗规律给自己穿上了价值规律的拜物教外衣。由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第96页。——编者注

可见，劳动消耗规律——赤裸裸的或披上外衣的——是经济生活必需的和万能的调节者。

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关于现阶段的“过渡时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了一些什么。我们知道，他有下列一连串的议论：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原则同商品资本主义原则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计划同自发势力的斗争；同计划相适应的是一个特殊的调节者，同自发势力相适应的同样是一个特殊的调节者；第一个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调节者，在现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第二个是资产阶级的调节者，这就是价值规律；正象无产者是资产者的对抗者一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对抗者，因此，在过渡时期不能不是两个调节者，它们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原因，是整个机制的推动力，《新经济学》的作者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些推动力。

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随着计划因素的增长，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意见，价值规律转变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同样可以得出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的结论：价值规律不能转变为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转变为普通的劳动消耗规律，别的“转变”是纯粹的胡说。

确实如此。在从自发的调节者向自觉的调节者过渡时，一般可能指什么呢？也许指的是要跳出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所讲到的那个规律的范围？只要提出问题，否定的回答的毫无意义就一清二楚了。因为这个规律是经济平衡的普遍的和万能的规律。可见，问题只能是它（这一规律）的社会形式的变换。

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就很清楚，社会主义计划原则胜利的过程无非是劳动消耗规律脱去自己身上罪恶的价值外衣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是社会基本调节

者消除拜物教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只在两、三个地方顺便地提了一下劳动消耗规律，而没有看到这里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的观点却是真正令人惊异的。因为从他那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计划原则不是同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的价值外壳作斗争的原则，而是同这些规律的物质实体作斗争的原则。换句话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无产阶级计划是要使社会经常地失去平衡、经常地破坏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社会必要的比例，也就是说，经常同社会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作斗争。不用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杜撰了一个很好的“调节者”来拯救社会主义！诚然，这种“社会工艺学”既没有显示出“思想的胆怯”，也没有显示出“保守主义”；倒不如说它是特殊的——我想说——经济未来主义，在此之前，它是同传统，其中包括而且首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相对立的。但是，这种“勇敢”不仅对价值规律不会有好处，而且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如此关怀其利益的那个集体经济亦未必会有好处。

实际上这就解决了关于一个调节者，或两个对抗性的基本调节者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怎么也不能理解，在目前的场合，问题不可能是指（就其实质来说）规律的物质内容的对抗性，而只可能是指社会形式的对抗性。不能这样设想：存在着两个就物质实体而论是对抗性的调节者，我们知道，无论从现实观点来看，也无论从同马克思主义最起码原理相抵触的观点来看，这都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错误在于：他用价值规律转变为他自己所喜爱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过程来“替代”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

我们应当公正地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我们的观点有

某种反批评，有某种答复，这就是：“必须指出的第二点显然是，经济中的比例（这是每一个社会生产体系在客观上所必需的）同分工，同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达到这种比例的历史上暂时的方法相混同。正确的、按比例的分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我们现今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都是必需的。如果甚至证明——我指出过，这种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在斗争的基础上实际形成的生产力分配，由于某种奇迹，同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下，在价值规律作用基础上形成的那种分配相符合，也就是说，在国家工业化现阶段的集体经济内部的比例同资本主义的比例相符合，那么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证明一个调节者的论点。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所需要的比例，是由作为调节者的价值规律决定的，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找到这种比例，既然价值规律是历史地，也可以说是物质地，同商品生产不可分地，血肉相关地联系着的，商品生产不是生产工具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生产吗？……为什么不能用基本上是我们的方法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呢……？如果这一点是可能的，哪怕有一半的可能，那么关于我们这里基本上只有一个调节者的说法就意味着把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下的表现同对比例的客观经济必要性最粗暴地混同起来了，这种必要性不只存在于商品和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也不仅只有用资本主义方法才能确立起来。在商品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在同价值规律作斗争的基础上，这一比例才能确立。有时候在现实生活的个别场合，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的？——尼·布·）积累规律的作用方向即使是相同的，这一比例也将经常进行合力的斗争。”（第47—48页）

在这一段冗长的议论中，正确的东西和极不正确的东西都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了。正确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找到比例。不正确的东西是，我们的方法同价值规律的物质内容是相

矛盾的。正确的东西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社会特有的附属物。但不正确的论断是，似乎它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所替代，而后者在物质实体方面，必定会同价值规律发生矛盾。似乎“只有”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才能在我们这里确立起比例的那种结论，是极其错误的。说在资本主义下会有另一种比例这个一般性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是由此作出的那些结论却是不正确的，如此等等。

这里我们需要详细地探讨一下某些问题，因为这是一些新的、很少有人研究过的问题，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是明显地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里我们谈谈同刚才引证有关的两个问题：在不同社会关系形式下的比例问题和价值、劳动消耗以及积累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当然，我们在现阶段的分析上只限于对问题的最一般的提法，同时以关于“调节者”的争论为着眼点，本章就是探讨这个争论的。

我们这样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暂时把劳动消耗规律的社会形式问题撇开不谈，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只有一个已经为我们引用过的、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提出来的原理。但是请问，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即就物质实体而言，同一个调节者在经济关系方面会导致最不同的现象？难道在不同社会结构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我们真的会有同样的比例？难道这些比例和相互关系的动态是一样的？最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别是什么意思呢？看一看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吧，或者拿原始公社的发展速度同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对比一下吧，所有这一切怎么同就其实质来说是唯一的调节者即劳动消耗规律联系起来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大概会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感到不安。他希望我们的发展进行得比资本主义快一些。这完全是一种合理的“愿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由于我们需要比以前更快地实现工业化，需要更快的积累速度，所以很明显，我们应当有

另一个规律。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一般的形式上提出问题的，对这一点应该先给予回答。在每一个社会，生产是满足需要的方式，而需要——正象马克思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彼此之间联成一个自然的体系”。总劳动时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些生产部门总的来说，或好或坏地满足了这些需要。在有组织的社会里，这一点反映在经济计划上。在商品经济中，“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于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调节”的机制。假如我们面前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不可能大规模地使用劳动（生产是小规模的，分散的），需求范围狭窄；调节（自发的）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来进行的；供给与需求，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竞争，这一切决定了前进的运动。再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是大规模地采用集中的劳动，劳动在社会上的分配最后同样决定于价值。但是，价格不是直接围绕价值而波动，价格是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是这个机制特有的“中枢”。利润使竞争的机制运动；积累的能力得到了表现，并且以巨大的力量作用着。可见，价值规律在这里仍旧是调节者。但是，整个机制同简单商品经济中不一样。价值规律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些传动装置作用着。所以我们有另一种发展形式和另一种发展速度，因为，这个生产速度是同新的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编者注

求的增长相联系的，而这种新需求又同不同的人的集团（按阶级、按他们的收入等等形成的）相联系着，所以，“需求的自然体系”的内部组成经常改变着，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反映在生产上，其中也反映在生产内部的比例上。同时——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一系列基本范畴经常发生着质的变化：简单劳动转化为较复杂的劳动，而复杂的劳动转化为更为复杂的劳动；“平均的劳动强度”同样也在发生变化，等等。同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也在改变，所有与此有关的尺度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正在确立的平衡每次在新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但是，规律继续起着作用，因为尺度本身又不同了。经济平衡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恢复的过程发展得愈快，上述范畴的质变也就愈迅速。

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劳动消耗的客观规律是和自觉实行的劳动消耗定额相符合的。波动首先是按照统计计算进行的（但是，这点十分清楚，波动的特点不是类似价格围绕价值那样上下地波动）；第二，自觉的和预先确定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同时相应地改变劳动尺度）在这里是基础。劳动量是集中使用的。运动的刺激力不是利润，而是在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的条件下满足群众的需要。后一种情况使得中介劳动消耗规律的整个机制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应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两种收支体系”（没有阶级，没有社会各阶层不同质的消费收支），因此，“消费的自然体系”和它的动态也是不同的。我们看到，这个劳动消耗规律借以起作用的社会主义机制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机制。因此，发展的形式和速度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但是，劳动消耗规律仍然是整个过程的基本调节者，并且是在最“纯粹”的形态上。

总之，对我们总的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决定问题的是中介劳动消耗规律（或者是作为这个普遍规律的历史形式的价值规

律)的作用的机制。而规律则是各个发展阶段的唯一调节者。下面的说法是荒谬的: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两个规律,即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同样,关于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是矛盾的说法,也是荒谬的,因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生产价格规律这个机制才能表现自己的作用。

还应该提出过渡时期规律的问题。

这些规律的特征何在?其特征就在于,这里发生了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这是应该指出的第一种情况。其次,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可以抽象掉一切非资本主义的因素。马克思就曾经分析过“纯粹的资本主义”。然而,对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最抽象的提法也只可能是这样:它的前提是国营工业和农民的简单商品经济。抽象掉这些“第三者”是不行的,因为过渡时期的问题本身如果离开了这些相互关系就毫无意义了。最后,抽象分析的较具体阶段是以私人资本这个“复杂的因素”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就有劳动消耗规律作用的不同形式:如劳动消耗规律,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即变态的价值规律。不用说,这一切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形态的交错提供了特殊的结果和特殊的规律性。但是,不论这些形式怎样多种多样,它们都可以归结成某种统一体。

价值规律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的过程表现在,在计划的程序中半虚拟职能的“价格”(即已经不是从“市场晴雨表的波动”观点来决定的价格)是自觉形成的,而和自发形成的不同。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是某种和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相矛盾的东西。相反,这里是预先估计到(先想到)在自发的调节下事后才能确定的东西。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问题不仅在于劳动消耗的社会形式的对立(一方面是价值,另一方面是单纯的劳动消耗)。因为整个的中介的机制,生产的刺激,生产与消费间的相互关系等等都是不同的,因为,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满足群众的需要

越来越成为(虽然是逐渐地)生产的有计划活动的基本原则,所以生产的比例同私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的比例相比也将是不同的。最后,谈谈对社会主义积累和价值规律(或劳动消耗规律)的某些最一般看法。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经济是在市场关系(从一定的观点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含义”)的基础上获得发展时,我们也就驳斥了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甚至)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命题。形象地说,我们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价值规律“帮助”我们——不管这是多么奇怪——并准备着自己灭亡的条件。

我在这里只谈了最一般的看法。要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书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很有必要把这些公式翻译成比较具体的语言。

三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或为什么 不应当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代替列宁

现在我们转而来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全部议论的理论中心,分析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专门研究苏维埃存在的这个秘密之前,我们先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规律”的作用和意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写道:

“……我们不仅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且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那么我们对这个经济的实质就什么也不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既决定着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配,又决定着劳动力的分配和把国内剩余产品收归公有以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用的规模”(第58页,着重号是作者自己加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在吓唬读者。不

是闹着玩的！你不接受“规律”，这就意味着你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什么也不了解。喏，没有足够勇气承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发现的“划时代”意义的任何一个胆怯的人，怎么会不成为思想上渺小的人物呢？……可是我们认为，要是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点改成下面这个样子，大概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不弄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那么对他的观点的实质就什么也不了解。但是，苏维埃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意识却是另一回事。本来，整个争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他的理论观点有多少正确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

《新经济学》作者这个观点的“实质”在于，怎么说好呢，“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个“规律”以类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本身为前提。要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理论中抽掉这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新经济学》的整个大厦就会一下子塌下来。那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理论就什么或几乎什么也不会留下来。

我们在上而已经引证过列宁同志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意见，说这是“儿戏”。无产阶级领袖和当代最大理论家的这个严厉的意见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陷入了绝境。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导师说的”，我们还需要了解，为什么列宁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对的，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列宁则是错误的。

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在《资本论》第1卷著名的第24章中，马克思是怎样理解“所谓原始积累”的。

马克思如何着手研究这一问题的呢？在这章的开头，马克思写道：

“……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①

马克思是怎样确定原始积累的方法的呢？是这样的：

“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②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所谓“原始积累”的历史经济实质是什么呢？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③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哪一些主要的历史因素能表明“所谓原始积累”的时期呢？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782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783页。——编者注

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①

我们有意引出马克思的这些话，它们从不同角度即从提出问题的角度，从“方法”的角度，从过程的历史实质的角度，最后，从它的主要要素的角度，全面地说明了“所谓原始积累”。

这里，预先要作一个不大的说明。我们认为，把“资本主义的前史”算作它的历史是完全错误的，更不用说当作它的全部历史了。但是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却有这种倾向。这里，下述的理由曾成为而且还在成为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本来就充满着农民的破产、殖民地的掠夺、小生产的经常被剥夺和有关政策采用最“残暴的”方法。而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积累”的因素。

我们认为，这些理由是十分错误的。这里忽略了主要的东西，马克思认为“所谓原始积累”“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起点”。因此，例如由于现代帝国主义反对“第三者”，并且是“吞并”和“剥夺”第三者的工具，而把它列入“原始积累”名下，这是毫无意义的。不管怎么样，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把原始积累时期看作是“前史”，那么，它在时间上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它处在资本主义真正历史时期之前）；或者我们把它看作是排挤“第三者”的全部过程，那么这就需要取消概念本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反映任何独特的，即任何特殊的东西等等。

然而我们认为马克思是正确的。“所谓原始积累”，是某种特殊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是不同于它现实历史的“前史”。“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对象（这是社会学的和历史经济分析的对象）。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这同样只是历史前提。同时，继续排斥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的过程，正象排斥帝国主义问题等一样，为理论经济分析提供了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编者注

料。决不能阉割“原始积累”概念的内容，使其丧失特有的历史特征（“前史的”性质，暴力方法，“各种变革”，过程的“突然性和强制性”等等）。本来，马克思讲得十分清楚，“它（即原始积累。——尼·布·）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的前史”。把它同历史时期相混同，就意味着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提法，意味着用“理论的”清水来代替烈酒。

现在我们反过来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

他说，社会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结构，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得到完全的（就是说连同它生产上的上层建筑）成熟^①，他还指出，“这一事实不仅对理解社会主义的产生，而且对理解今后的整个建设也具有巨大的意义”（第53页），然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接着说：

“所以，要说社会主义也有它的前史，那么，这一时期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才能开始。大工业国有化，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积累的第一个行动”（第54页）。

但是，为了同资本主义进行类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这样说还不够。他在进行历史对比中，走得要远得多。

他是这样确定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之间的区别的（在这里我们提供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同我进行辩论之前，第二种说法是在辩论之后）：

1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作者加的）积累，就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固定资本中去，这一剩余产品不是用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中间进行额外分配的，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看我很久以前写的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它收在《进攻》这一论文集），可以把它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有关观点对照一下。

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相反地，我们把主要来源于国营经济之外的国家手中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应当起十分巨大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加速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科学改造时刻的到来，加速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取得最后的纯粹经济上的优势。不错，在这一时期也有建立在国营经济生产基础上的积累。但是，第一，这种积累同样带有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预先积累资金的性质，并且服从于这个目的。第二，用第一种方法即靠牺牲非国营经济利益的方法来积累，在这个时期占着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把这整个阶段叫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或预先积累阶段。”（《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4年第8册第54页）

2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作者加的）积累，就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中去，这种剩余产品是在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的，它不是用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国家代理人中间进行额外分配的，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相反地，我们把主要来源于或者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之外的国家手中的物质资源积累叫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新经济学》第58页）（以下没有改动；双着重号表示原文的改动。）

读者们可以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采纳了我们一系列的意见，放弃了资本是由产品形成的说法，放弃了把固定资本同职能资本一般相混同的作法等等。这都很好。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一些其它改动，使他的观点更糟糕了，这很不好。

事实上，我们已经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指出过（参看《论

托洛茨基主义问题》第96页),在他的说法中无法弄清,到底哪里是他的“原始积累”的界限。如果(参看第一种说法)指的是国营经济纯经济上的优势,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很快就具备了(大生产的规律),但这同显然预定要在更长时期内起作用的“规律”发生了矛盾。我们还指出过另一种情况,如果,在另一方面,指的是对西方和美洲国家的优势(其实,在抽象研究中,在这种研究的第一阶段,是不能这样设想的),那么相反,过程却要拖得很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答复中没有仔细地探讨这一点。可是他作了些什么呢?他现在(参看第二种说法)把社会主义积累说成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外连一个“戈比”也得不到的一种积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就是哪怕只有一个“戈比”(在第二种说法中是“或者同时”)也得来自社会主义范围之外的那种积累!

如果要进行认真的类比,并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样的定义转向“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定义,那么,整个资本主义,直到它的死亡,都将算作资本主义的“前史”;因为,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都从“第三者”那里获得额外利润;在资本主义生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阶段;它不在剥削“第三者”的基础上弄到利润。

现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情形怎样呢?不难理解,只要存在生产结构的差别,只要大经济,以及计划经济还具有技术上的优势,那么,即使在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来进行的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国营工厂在对手工业的残余等方面,始终是占优势的。把从手工业者,或农民那里得到哪怕是一个戈比来充作工业积累基金的整个时期,都看作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这就意味着把真正“历史时期”同“前史”相混淆了,而前史被拖得那么长,以致这一概念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那么,什么才——十分相对地——可以被叫作“社会主义原始

积累时期”呢？大概只可以把“剥夺剥夺者”和采取相应措施的那种行动叫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里却是它们的结合；使用暴力，过程的特点是“各种变革”，过程的“突然性和强制性”，最后，过程的特点在于它是发展的历史的前提和“起点”，而不是它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相同的因素。但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名词终究是“儿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儿戏”掩盖了我国发展的特点，牵强附会地解释了事实，为许多东西提出完全不正确的前景。我们的剥夺，是反对不久前还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经济革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是革命，并且也不是反对旧的统治者，而只是使农民破产；在那里，建立了必要的阶级优势；在我国，情况全然不同；在那里，继续采取措施，以便继续剥夺“第三者”；在我国，剥夺问题是针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指的主要的、进一步的问题，那是小生产者即另一个阶级的问题；在那里，进一步的演变，是在破产、排挤，或者也可以说，“吞没”的角度下进行的，在我国，这是在“和睦共处”、“改造”“使同化”等等角度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进行的那些对照和类比只能是玩弄名词的“儿戏”。已经不是孩子了。是停止幼稚地提出严肃问题的时候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原因。

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的基础的经验上的事实，这首先是内战和饥饿年代的事实，是余粮收集制和工业几乎停顿的时期。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在生产力遭到难以想象的破坏和极度低落的情况下，“经济”呈现出一幅独特的情景：“城市”吃光了自己的一切，“乡村”“喂养了”城市。余粮收集制是城市在某种程度上靠牺牲农村利益而生活的一种形式。这是列宁要求农村“借给

我们粮食”的时期。可见，城市部分地靠牺牲农村利益来养活的经验上的事实是有过的。但是，（1）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正常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2）“借给”这一口号的性质本身就说明，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你们试试借原始积累骑士之口来说明这一口号吧！

最后，谁也不否认，工业从小生产者那里得到和还将得到额外价值作为自己的积累基金。所以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答复中写到这一点时，那才真正引起笑话呢：

“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同私人经济非等价交换的事实和这一事实的不可避免性，无论如何，在物交换时，顺差是在国营经济方面的，他（布哈林。——尼·布·）承认我对问题的基本提法（！）从而使他自己丧失了对实质上是从这个论点中产生出来的一切结论进行原则性争论的可能性。”（《新经济学》第214页）

这个“反驳”使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件事。当我和瓦·瓦·奥波连斯基被关在监狱里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我们把他叫作索洛古博夫斯基的“文静的孩子”。在一次讨论中，我说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农民绝不会全部从舞台上消失，这时，“文静的孩子”庄重地站了起来，出乎意料地大声说，“第一次让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的作法，同“文静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却更令人发笑，因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同意我的看法；他的规律的“基础是老生常谈”（第248页）；“问题全在以后一连串的结论”（同上）。现在，我们就开始逐步地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同的、与他的“规律”相联的观点作出具体的说明，以便彻底地推翻他的“规律”和“一连串的结论”。

“布哈林同志基本的、完全不可容许的错误（如果这真是错误的话）——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写道，但他自然不能没有“怀疑”，——这种错误贯穿在他的整篇论文之中，并使他不可

能击中基本的争论问题——如下：我的论文是一种在理论上分析苏维埃经济的尝试，或者说得谦虚点，是一种着手进行这种分析的尝试。我国的苏维埃经济分为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国营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性，私营经济也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性。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包括在整个苏联统一的经济机体之中，为了进行理论分析，在方法论上必须单独地考察这一或那一规律性，然后再说明现实生活的合力是如何求得的。但是，考察国营经济的发展趋势，必须在这种趋势的纯粹形式中进行，也就是说，在作这种分析时假定把不遭到私营经济反抗的国营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最适点下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继承马克思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只有它才能使我们清楚地了解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现象和明白一切正在进行着的东西的内部意义。

可是布哈林同志作了些什么呢？

他把对国营经济发展规律性的分析（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必须暂时抽象掉私营经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和从这一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同无产阶级国家的现实经济政策混在一起，很清楚，不需要费特别的力气，就能‘揭露’这里的矛盾。我不知道应该把这种混同，这种错误叫作什么。布哈林同志清楚地知道，区别在什么地方。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经济著作中，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两者必居其一，或者他现在不能理解这种分析方法的实质，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他为了今天的争论牺牲了研究时的理论良心。所以应当在犯罪的现场把他照下来。”（第210—21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总之，看到没有，我“不费特别的力气”就“揭露”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矛盾，而我的罪名恰恰就在于此，原来因为我由于

对卑贱的政治的爱好，不诚实地故意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纯”理论分析范畴和现实的经验上的合力范畴相混淆了，我象庸俗经济学家一样行事，一切为了迎合卑贱的政治的需要。

没什么，我们会“承担责任”的。我们再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我第一篇反驳他的论文的答复中援引一个地方。众所周知，他的“规律”的内容是，发生着资源从“私营经济”成分到国营经济成分的转移，同时，这个规律既“废除了”价值规律，也“废除了”其它许多规律。

我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转移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但他“一连串的结论”却不对头，他的说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拼命地多拿一些吧”这一口号，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对的，它会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等等（“卑贱的政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发挥上段引文中的思想时写道：

“……既然国营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靠牺牲私营经济的利益来实行扩张，因此就必须说明，这源源不断的资金是经过哪些渠道流入国营经济的，在这方面国营经济在其纯粹形态下的发展趋势如何，就是说，抽象掉私营经济成分的反抗，从而抽象掉工人国家出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势必（这两个字的着重号是作者自己加的。——尼·布·）执行的现实政策。国营经济靠牺牲私人生产而获得发展的自发（！？——尼·布·）趋势是否走得比国家经济政策实际达到的还要远？当然，是这样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些趋势进行科学的分析（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对这些趋势的最适点的表述就是对国家和党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对政策的批评，不管是什么样的批评，总是（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同最适点不一致的吗？问题是够没有意思的了。但这种没有意思的问题是布哈林同志迫使我们提出来的，他连一句话也没有提醒读者说，我的论文不

是用来探讨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而是用来对我国经济的基本规律性进行理论分析的。”（第 212—213 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就是这样“在犯罪的现场”把我“照下”来的。我敢说，正是从理论观点来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上述议论，除了废话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们踏着“摄影师”同志的足印，逐点来研究。我们从结尾开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埋怨我说，我连“一句话”也没有“提醒读者”；他的论文是对“我国经济的基本规律性进行理论分析”的，而绝不是用来分析“国家经济政策的”。很抱歉，没有“提醒”。“没有提醒”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估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文方面，我同他曾经有，而现在还有很本的分歧：对上面提到的那种分析的要求他是有的，而分析本身，我认为根本没有。我现在又重新翻了翻论“规律”那一章：关于“殖民地掠夺”问题（第 62 页），“把一切社会主义以前的形式中的剩余产品……收归国有”（第 62 页），“对私人资本主义征收利润税”（第 64 页），关于国家公债问题（第 64—65 页），货币和债券的发行（第 65 页），铁路运价（第 70 页），银行体系的垄断和信贷政策（第 70—73 页），国内外贸易（第 73—84 页），“价格政策”（就是这样写的。第 84—89 页）等等，等等，接着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议论，诸如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为了取得胜利就得靠牺牲私人经济来获得积累，而且愈多愈好，这就是该章的全部内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鼓吹把政策抽象掉，然而他那里除了政策之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不过他的政策是一种坏政策，关于这一点，我在当时就“提醒过”。理论分析本来应当表明，我们的政策是由哪些客观规律决定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比关系是怎样改变的，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动态是往哪一方面增长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变为劳动消耗规律，在过渡时期表现出来的是劳动消耗规律的哪一种新的中介机制，我们政策的

界限在哪里等等。但是读者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里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在他那里恰恰缺乏对经济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缺乏对通过我们的头脑而转变为法令的客观规律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鼓吹为了光荣的理论而抽象掉政策，而在实际上，他为了光荣的政策而“抽象掉了”理论。

那么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要提出这些反对政策的抗议呢？是为了论证一种坏的政策。读者在下面会知道，这是怎么进行的。现在，我们转过方向盘来详细地探讨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并以最大的明确性来判明他错误的根源和确定这些错误中“最有趣的”即最“突出的”错误。

(1)在得出规律时的方法论上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一定没有好好地想过过渡时期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他的论断很简单：马克思在“纯粹形态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趋势。这就是他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从这里“得出”《新经济学》的方法：我们这里有国营经济和私人经济。我们先得出“纯粹形态上”的国营经济的规律，然后再规定“合力”。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建议的东西。

正确性的外表这里是存在的。但仅仅是外表而已。事实上，一切都建筑在不正确的类比上。马克思撇开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分析了“纯粹的资本主义”，从而使情况简化了。假如我们撇开“第三者”，剩下来的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从而过渡时期所有的范畴和问题都将消失。可以试试撇开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包围，那时，价值问题就将完全消失，同时，象工资等的形式也将消失。甚至在“国营经济”这一范围中，也没有留下什么“过渡的”东西。如果讲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象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一样），那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也许是对的，而抽象的国营经济——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也许是抽象的极

限。但是如果提出在历史的特点上来研究过渡经济的任务，那么必须以两个阶级的社会，即无产阶级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联合作为抽象的极限。抽象掉对外贸易（不管在经验上它是多么重要）是可以的，在分析的第一阶段，甚至是必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根本没有这样作过）；但是，在分析过渡时期时，抽象掉“第三者”是不容许的，这意味着抛掉一切特殊的理论问题。

在理论上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在经济政策方面得出错误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发展的规律想象成好象是两个阶级手中互相残酷地抽打着的棍子，他忽略了体系是一个统一体；虽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但它终究是一个统一体，一个具有相互制约部分的统一体。对这种相互的制约性估计不足，就会犯巨大的错误^①。

（2）“在纯粹形态上”的“原始积累”规律。这个总的不正确的观点也被用来论证所谓的“规律”。这个“规律”——假若它曾经有过，并得到正确的表述——是“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抽象掉“私营经济”，“规律”就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它变成没有任何内容的、毫无意义的词句的堆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思想。我们当中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报告的发言中认为这一报告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是“我国著作界中罕见的作品”（见《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1926年第15册第180、193页），他提出这样一种说法：

“还有一个意见。假如我们可以在我国国营经济方面划分出某种综合体，而后者假如又是自给自足的，那么，社会主

^① 彼·马斯洛夫（参看他的著作，《经济政策原理》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区分私营经济、国营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观点，但他终究没有足够地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果谈的只是长远的，有决定意义的“利益”，那么国营经济观点同国民经济观点是吻合的。

义积累（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尼·布·）规律就能显示出全部作用，而价值规律在这里就一无用处。根据这一抽象的原理，我们可以说，我国国营经济这个和那个综合体愈接近自给自足，愈接近某种独立的整体，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就愈小。反之亦然。”（《学报》第 182 页）

总之，如果我们“自给自足”，即如果国营经济同“第三者”是没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假定这些“第三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这正是从这些不存在的第三者身上汲取资源的规律显示出“全部作用”的时候！请问，是否还能说出比上述的“一个意见”更不合逻辑的话？可是这却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些具有“巨大价值”的论点中得出来的结论。

（3）“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最适点。但是，上面所探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思想，在《新经济学》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最适点”的论断中得到最后的完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些理由（它们特别尖锐地反对我的论据）多么令人吃惊，在“我们的著作界”中多么“罕见”，以致真的需要把它们广为传播，因为透过它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原罪”。

我们刚刚引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如下意见，必须在“纯粹形态中”来考察国营经济的趋势，或者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说法，“假定把不遭到私营经济反抗的国营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最适点下的规律性”（第 210 页）。在另一处我们引证过的地方，他说必须在“纯粹的形态上，即抽象掉私营经济成分的反抗，从而抽象掉工人国家出于经济上（！——尼·布·）和政治上的考虑势必执行的现实政策。”

好吧，象顺从的人一样，我们姑且照《新经济学》的方法行事。

起先我们只要弄清楚，我们必须抽象掉哪些反抗。然后，我们仍旧象顺从的人一样，准备“听从”“作为作者”的我们的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学报》中（第 80 页）是这样地规定这些障碍的，

“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不在于执行这一政策时它的经济力量之不足，而首先在于私营经济低下的购买力和这种能力相对缓慢的增长。”

但是，请读者原谅，我暂时离开一下本题，因为在“理论”方面存在着某种情况，而我认为这种情况是犯罪的。

在一篇“政治”论文中，我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指出（见《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论文集第 82 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根本没有说明农民市场容量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我的论敌在答复时（见《新经济学》第 243—244 页），对我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抨击：

“至于说到国内农民市场的容量和估价它对我国工业的作用，那么在这里我至少要听听布哈林同志的教导。这个问题我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等等。

好吧，我们不对谁在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微妙的题目进行争论。但有趣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新版中根本改写了关于农民市场购买力低下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他谁也没有“提醒过”。我们在这里读到（见第 87 页）：

“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不在于实行这一政策时它的经济力量不足，而首先（往下完全“改写了”。——尼·布·）在于必须把这一政策同降低价格的政策结合起来……”。

无疑，这是重大的改动，我认为这个改动也是不正确的。仿效我“论敌”的方法，我把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照了下来”。现在读者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特别

重要的。但是我们顺便先说一个意见：必须指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一方面鼓吹要抽象掉国家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第一个公式中却无论如何都企图把这一政策同客观事实（国内市场购买力低下）联系起来，而在第二个说法中，把政策同政策（积累政策同价格政策）“结合”起来时，却又放弃了客观事实这个理论因素，而他本人还大喊：“政策从分析中滚出去！”现在回过头来谈谈主要问题（这一分析将会说明，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改变了说法和为什么他“没有提醒读者”）。

这样，我们开始来探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最适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经济观点看来，国营经济的工业积累基金或国营经济成分积累基金可以取自农民经济中的剩余产品量的最优的（最适当的）数字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坚决要求抽象掉来自“私营经济”的“障碍”，我们同时也知道，这种主要的障碍是国内市场狭窄的容量。总之，要在“纯粹形态上”推论出原始积累的“最适点”，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意见，就必须抽象掉国内市场的容量问题。

喏，现在请试试推论出这个最适点！那我们就可效法这种“最适当的事业的大师”，他可以不考虑决定这个“最适点”的条件，而得出“最适点”！甚至连小孩都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说法中，“最适点”这个概念本身，干脆是毫无意义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不难看出，错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相互关系的规律以这一相互关系的双方互为条件。抽走一方（农民经济），从而也就取消一切。这就是你们看到的“理论”“分析”！

（4）“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生产力的分配。在这篇著作的第2章中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替代了价值规律，并且成了所谓支配国内生产力分配的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同

样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我们的基本错误是，我们认为不能抽象掉象农民市场容量这样的“障碍”。我们也从这些观点出发，来考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在纯粹的形态上”！）。

如果不是站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立场上，那么，在这里就不能抽象掉消费，即不能抽象掉需求，这是很清楚的。我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我国，生产领域的社会划分主要是同它们的基本的生产划分（无产阶级的大工业和农民的农业）相一致的。粮食是在田地里而不是在城市的作坊里生长的，这是旧时贵族学校学生也知道的事实。

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决定需求的国内市场容量，是直接决定轻工业规模，部分地决定冶金和其它工业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连锁联系”这又决定其它部门间的比例。因此不可能制订任何“自在的”工业化计划。可见，我国的工业“生产计划”总是同收成问题联系着的，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现在请试想一个不计算“农民市场容量”，即抽象掉这个问题的“计划”出来！难道这不是谬论吗？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却把这种谬论提到方法论的原则高度。这种谬论的基础是同一个错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到了国民经济中的矛盾，但没有看到它的统一，看到斗争，但没有看到合作，他从“一般的”、“逻辑的”矛盾，而不是从“辩证的”矛盾观点来研究问题的，因此得出了上述的结果。

看来现在该从“一连串结论”转向规律本身了。我们来回想一下，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中（《学报》1924年第8册第92页）关于这个规律是怎么说的，那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自己的“规律”是这样说的：

“这个或那个转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国家在经济上愈

落后,愈是小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国家,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得到能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那种遗产愈小,——社会主义积累不得不依靠剥削社会主义以前经济形式的程度就愈大,靠在它自己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也就是说,该国靠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作者的剩余产品来发展的机会就愈小。相反地,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这个或那个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的形式表现的物质遗产愈大,该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对该国无产者来说,缩小自己的产品同殖民地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的必要性愈大,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的必要性愈大,——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多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也就是说,愈要依靠自己的工业和农业的剩余产品。”

在我们批评的压力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上面这个说法中,不得不取消“殖民地”和“剥削”。关于这一点在以后还会谈到,所以现在可以先搁下不管。现在只指出下面这一点:“规律”所“直接提供”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不存在“第三者”的地方,从他们那里就什么也拿不到;什么地方他们多一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也就多一些。所以,这里就有“规律”,象六大于五,或四小于十二的“规律”一样,这恰恰是“老生常谈”,这一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同意的,对他来说,一切都在于“一连串的结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主要结论中的结论,是这样一个“结论”: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是国营经济为生存而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商品交换领域中要求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再现使这种不等价交换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哪种比例,而且也同一定的赢余联系着。”(《新经济学》第249页)

这个“结论”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而对它的分析要求有一系列新的中间的逻辑环节，往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些环节。

这里，我们对另一些，特别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最适点”相联系的“结论”做一个小结。我们对“这些结论”的“结论”如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几乎达到了混乱的“最适点”，即使有照像机的帮助，他也不能从这种混乱中爬出来。至于别的，以后再说。

译自《真理报》1926年7月1、3、7日。余大章译。

科学和苏联^①

伟大的历史变革只有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后经过一段时期才能得到充分评价和显示其全部意义。以往的革命——无论是埃及奴隶的起义、中国农民的起义，还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革命，都以或多或少带有幻想色彩的外衣掩盖着自己的客观内容。只是在事变发生之后，这些“圆脑袋者”的清教徒思想才被揭示出来，原来它无非就是“变相的”、“合乎理性的”等等“资本主义精神”。只是在事变发生之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才被戳穿，原来它就是资产阶级个性的自由，政治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即自由地买卖商品、自由地购买和剥削无产者劳动力的人的自由。

从这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革命的差别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本性和自己的历史地位。它之所以具有极其伟大的全人类意义，正是因为它明确地理解自己的阶级意义。它之所以具有极其巨大的作用，即作为打开从“人类史前史”通向“真正历史”的大门的巨人作用，正是因为它是认识到自己历史作用的那个阶级的革命。然而，只有经过数十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生活比起“灰色的理论”来如此丰富，无法精确计算的因素如此众多，以致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定会

^① 布哈林的这篇文章是为三卷本文集《十年来的科学和技术》而写的。该文集是由“教育工作者”出版社出版，阿·弗·越飞、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姆·雅·拉皮罗沃-斯科勃洛院士编辑的。

出现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意外事件。如果一般说来和整个说来我们是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和意义的，那也决不否认这样一个论点：事变的进程将在极大程度上丰富我们的经验，以生动的具体的内容充实抽象的公式，提供许许多多细节、特点和特征，使有可能构成一幅完整而具体的未来变革的图画。

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来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实际上只有一半时间是在从事建设工作，因为头五年是同由外国武装干涉者全力支持的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五年。五年，甚至十年，从世界历史观点看，只是无比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个时期难道没有加深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吗？不仅是革命所“创造”的和列宁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苏维埃国家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而且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也是这类“新发明”。难道可以认为，人民群众及其组织力量的创造精神就到此为止了吗？随着经济的高涨，随着经济社会化、社会主义形式的加强，我们还将看到无论在经济领域中或者所谓“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系列“新发明”，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同时，在西方和东方，革命过程的展开一定会提出许多特殊的任务，不断地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实践和概括性的革命思想前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扩展着精神境界。在这方面，它无情地破坏着往往表现为人民群众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一系列旧的偶像崇拜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十年和全世界深刻革命运动的十年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地扩展了知识兴趣的半径。还在不久前，科学思想主要在欧洲运行：它的 *Orbis terrarum*（地转）首先在欧洲。帝国主义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部分地打破了这种局限性，但是它们首先是通过野蛮的方式打破的：在讨伐义和团运动期间，“文明的列强”烧毁为数达两万多卷册的中国四库全书，

就是这项“工作”的杰出象征。激起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国际革命过程同时也摧毁着列强的傲气、种族隔离以及对待所谓“非历史民族”的野蛮的老爷态度，这些民族以十分清楚的语言提出了自己历史存在的权利，我们亲眼看到，它们从帝国主义暴力的客体变成为积极历史过程的主体。目前，已经不能不估计到“各大洲”，从另一方面说，也已经不能不估计到“千百万人”。

然而，革命也使人们看到了历史社会形态的变迁；它迫使人们把目光更加凝聚于未来。在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俄国没有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验的证据，现在这个证据却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了。我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巨大悲剧就在于：他们看不到发展的前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沉溺于同这种方式相适应的观念的领域之中，并把资本主义的相对范畴——经济范畴（“私有制”、“个人首倡精神”等等）、政治范畴（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文化范畴——变成这个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不可动摇的设施。而如果说当年他们鼓掌欢迎“暴君行径”，那么如今他们则惶恐地弃绝无产阶级起义，仿佛它是侵犯人类文化的永恒的和闪光的珍宝似的。只有通过建设工作的经验才能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假如说1918—1921年外国武装干涉清除了年轻的工人国家，那么全世界报刊，从庸俗的报刊到科学的报刊就会异口同声地证明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现在连资产阶级世界的经济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两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共处的事实。

然而，苏联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还仅仅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无产者的国家还未能为“精神”文化的增长以其成熟的形式提供必要数量的材料。目前，重心还放在另一方面，即放在迅速建立国家的物质生产力，首先是大工业企业单位上。但是，这种对立本身是暂时的，因为进一步发展将向我们提出（现在也已经提出）巨大的科

学文化任务，而苏联将成为（只要帝国主义不破坏我们的工作）世界科学生活的巨大发源地。

这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中得出来的，因此这里没有丝毫夸大。只需抛弃那些反映资产阶级世界所固有的相对狭隘眼界的陈规旧习就行。

这听起来似乎是奇谈怪论，但是，即使是在十月武装起义中得到最高体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是科学的政策，而且是唯一科学的政策。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司令部能够象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导者列宁那样对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和基本的发展倾向进行如此清醒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我国革命进程中那样如此惊人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的威力（如果不说马克思本人的总的极其英明的预见）。再过数十年之后，将会更加令人吃惊地清楚看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并因此成为巨大社会力量时，将把人类从流血的帝国主义死胡同引领出来，列宁的辩证法将变成革命行动的实践，为世界历史展现新的前景。如果说现在，这些原理对于许多人来说还只是一种使庸人为之惊讶的愿望，那么它们对于未来的几代人来说将是公理。

然而，革命的破坏时期几乎仅限于社会科学方面。它的建设时期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部科学、整个知识领域巨大繁荣的前提。这里必将发生科学上的革命，沿着各种方向进行的革命：方法方面的，组织科学劳动本身方面的，各种学科相互关系方面的，科学的实践意义方面的，最后还有可以说科学的自我意识方面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分工几乎象它的经济基础一样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从广义上说）取得了惊人

的成就，近年来，十分清楚地暴露出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思想的某种绝境，就象资本主义的艺术所陷入的那种绝境一样。在艺术领域中，当问题涉及到合成结构时，我们可以看到分崩离析和毫无成果的现象：它们彼此互相矛盾。在科学领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我们姑且不说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的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不进行理论概括几乎成为理论智慧的一种新发明。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事情比较顺利的也只是在彼此互相脱离的这个或那个专业范围之内。然而只要一提出关于理论概括的问题，那么立即就可以看到一种毋庸置疑地倾向于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等等的普遍失却信心的状态。从极端唯理主义和对“纯科学”的偶像崇拜摆向唯利是图的准则或者甚至完全否定任何“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就是科学自我意识领域中的情景。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为科学自我意识提供真正的和现实的基础。科学劳动，也和经济劳动一样，在这里具有社会有组织劳动的倾向，它的个别一些部门直接地互相繁衍，而不是被车间、托拉斯、私有制和竞争的铠甲所束缚。这种变化的巨大意义现在还看不出来，明天将会看得很清楚。从数量上说，我们还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已经接近于巨大的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将相应地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数量。优秀的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常常抱着所谓“纯科学”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最有成效的和最有价值的。然而，从有计划的科学的“经济”观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纯科学”的思想是对事物真正的相互关系的偶像化的歪曲，是从“发展的形式”变为“发展的桎梏”的思想。它把“纯”主观的科学激情（“为我的科学”）同科学的客观作用，即在人类实践需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集体的认识触觉的客观作用混淆起来。它把作为体力劳动的延续、完善和调节的科学劳动从劳动社会职能的总和中抽取出来。任何一个科学规律都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公式。作为事实，规

律是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的某种东西。作为公式，规律就是被译成人的语言的事实。因此，符合实际的标准同认识工具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实践方向的工具和机构这一点毫不矛盾。不了解这个真理就必然会带来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某个科学部门和另一个科学部门的脱节。资产阶级科学危机的基本原因正在于此。

有计划的科学劳动，即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劳动是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原则。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具有献身精神并发扬科学激情。同时，它也提出在科学劳动和人类社会的整个劳动体系之间的明确的相互关系，它重新使理论和实践、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纯科学”即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以及科学的各个部门之间（在社会范围内）联系起来，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彼此分离同时又组成为某个统一体的各个认识领域繁荣起来。

把智力劳动和科学劳动的社会主义原则，把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地有组织的重新结合设想成仅仅是由工厂到科学实验室的孤立的“订货”，那是十分荒谬的。没有再比仅限于解决一些技术任务的平庸的经验主义更违背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特别是违背社会主义科学的精神了。所谓“美国化”，这只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的，即在科学劳动实践方针的意义上说的，以便同脱离实践的学院派（“经院派”）方针相对抗。相反，美国式资本主义文化（“文明”）的固有的局限性，用奥·斯本格勒的说法，即同“文化”的对立，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劳动解放的不断过程（不仅是社会劳动的解放，而且是通过自然界自发力量的征服和对它的有目的的利用并从自发力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将为全部社会生产力从狭义上的物质劳动领域移到智力劳动的重新配置提供基础，并极大地扩展科学兴趣和科学论题的范围。

同时，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向整个科学提出统一的方法时，

必然会提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方法。这个过程已经在苏联明显地表现出来。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支持。对此感到如象对缺乏“思维自由”那样而愤懑的唯心主义的哭丧妇们，实际上就是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土上缺乏确实不可想象的那种“猿猴案件”^①的自由而感到愤懑。苏联作为国家组织从人类科学武库中得到最犀利、最完善的武器，并向各种科学—哲学迷信展开十字军讨伐。如果回想一下，资产阶级科学为了替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哲学的”和准科学的辩解花费了多大精力（而维护唯心主义的立场归根到底也是为此目的），那么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智力劳动付出了多么巨大的附加开支，付出了难以计量的耗费。科学理论的社会—实践本质，即在科学劳动或多或少有计划组织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的这个本质，正在消除与神学论著、“巫师手法”和神智学把戏为伍的唯心主义残余。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很难推进培根的发明术的，如同用逻辑的概念很难拔出铁钉一样。正因为这样，在我国，例如谢切诺夫—巴甫洛夫学派、越飞院士的著作，或物理学家列别捷夫的遗著，或（在另一个领域内）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才博得了如此美好的赞扬。

不言而喻，不是任何一种唯物主义都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样十分明显，科学界的“社会舆论”也不是立即就掌握这种为社会科学领域中带来如此丰硕成果的方法的。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自发的唯物主义”正在被辩证的唯物主义所取代，后者正在夺取一个又一个的科学部门，它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公认，它正在成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的统一正在极大地提高科学认识的战斗力的，而这正是因为它是唯物主义方法的统一，它是统一的

^① 指1925年美国唯心主义者反对达尔文学说而提起的诉讼案件。——编者注

唯物主义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资产阶级本身的优秀传统，因为资产阶级曾经有个时期是举过反对“偶像”的旗帜的，是无畏地揭示过事物的真实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辩证法丰富旧的唯物主义，把自己求知的目光投向各种樊篱之外，而现代资产阶级方法学却把自己著名的“我们不知道”^①写在这些樊篱之上。辩证唯物主义彻底地排除各种唯心主义精神，如生理学上的活力论空想、数学上的“纯逻辑”幻想、无数不可知论者的羞答答的怀疑主义等等，把最大胆的实验研究（对它来说简直是无限的）同理论思维的准确的概括性工作结合起来。

如果说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内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方面说，方法的统一这一事实将大大有助于各门学科的相互繁荣，而这也不可能不促使这一方法更加精益求精。因此，在科学领域内的“计划经济”将必然会带来科学劳动生产率的更加迅速的提高。

最后，应当指出科学影响的极大扩展和它的作用的极大提高。

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合理化的强大趋势，首先是它的经济基础合理化的强大趋势。这不可能不是以极其精确地科学地分析相应因素为前提的。科学在这方面正在推动这种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的趋势。

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合理化是与十八世纪的唯一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合理因素，即计划原则本身是依靠精确的科学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是被认识了必然性，而不是人类智慧的随意反映。经济计划不是数字的堆积，不是“一般的”数字的理想结合，而是精确地估

^① 语出埃米尔·杜·布瓦-雷蒙（法国人）《我们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一书。
——编者注

计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是在具备实行计划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科学地分析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增长得越迅速,那么计划、合理化、精确的科学预见的范围就越广阔。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过程是永远二元论的,在那里理性因素(计划)和非理性因素(经济自发性)之间的矛盾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固有的原则,提出这种理论的反社会主义的挑战,按其实质来说,它所依据的是亚·斯密的幼稚教条,根据这个教条,商品交换是永恒的范畴,而向往交换是人的“灵魂”的基本特性之一。对于依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上的蜗牛来说,这似乎是“公理”。但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粉碎了这个外壳,同时也粉碎了这一“公理”……

因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求大大地扩展科学工作。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直接的指令。经济政策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必然地贯穿着科学精神,而科学则变成为社会改造的巨大杠杆。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采,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如果说力量强大的美国实验室是在集中的然而又被私有制分为碎片的机器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毫无疑问,联合起来的和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规模将产生(而现在已经开始产生)更为巨大的包括一切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源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资产阶级世界“思维运行”的规模归根到底是受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利润的笼头所约束的。而苏联科学创造精神的规模将只受国家社会资源的限制。目前,苏联经济学家在同具有巨大意义的数字打交道时,已在进行一番估计。不过这只是未来经济计划的萌芽。目前,苏联工程师们已经在建设巨大的电站,这些电站是不受任何私有制、任何地租的限制的。

不过这也仅仅是我们未来的微小的预示。这些预示，这些未来的萌芽对我们来说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雄辩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设为科学开辟了多么宏伟的前景。

苏联科学家现在完全正确地把研究我们联盟的生产力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这项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不过在这方面，问题的范围本身也将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广泛得多。

这不仅仅是由于我在上面所述的一些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于节约人的机体是不感兴趣的。然而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越是发展，就越加集中地注意活的劳动力，即经济主体本身，生物机体本身。资本主义对人的研究（包括对所谓的心理技术学的研究）是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出发的。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在极大程度上关心节约劳动者的机体。因此在将来，研究人本身的科学会繁荣起来，无论从劳动生理学的角度看是这样，从一般生理学的角度看也是这样。这里还涉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地镇压所谓“异族人”。社会主义社会则解放一切民族。苏联现在早就为民族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由此，不仅民族志学，而且历史学、语言学以及研究民族特性的其他学科在将来也必然会繁荣。现在，甚至在象比较语言学和语言史这样的学科中也出现了直接反对“大国主义的”语言学理论的尝试。即使不对这些尝试作出评价，我们也可以确认，苏联领土上各民族之间的崭新的相互关系是促使在一系列理论领域中科学地提出新问题的巩固基础。

还有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在即使极简略地分析科学在苏联的特殊地位时所不能加以忽视的。这就是关于科学干部的问题。在内战和饥荒的年代里，科学干部大大减少了。但是，幸存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英勇地克服障碍，并坚持工作。不能不承认，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力量在我们这里是很不够的。然而，整个发

展进程说明,即使从这方面来说,苏联的情况也不比资本主义国家进展得慢,而是进展得快。

可以有一定把握地说,社会关系的这种秩序是历史地比较高的,比较进步的,它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挑选熟练智力劳动者,即所谓“天才”,各个科学工作领域中的首脑人物的范围。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民主是国家生活的一种完美形式。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破天荒第一次参与文化生活。对他们来说,受教育的道路上的障碍破天荒第一次被排除了。这种教育破天荒第一次开始丧失极少数社会集团的等级垄断和阶级垄断的性质。换句话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扩大了文化领导者和文化熟练工作者的育种场。

几乎每一个过程,其中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都有自己的特色。目前,我们正在大大普及基础文化水平。在提高这种文化水平的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取得(不过很快将取得)应有的成绩。我们已经开始在向这个发展阶段过渡,到那时关于科学干部的问题也会象“恢复”我国经济的问题一样得到解决:熟练的科学工作者将会“蓬勃发展”。

苏联是有很潜力的国家。无怪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理学家”预言她有灿烂的未来。但是,她之所以会迅速发展不仅是由于数量: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不仅是由于她在欧亚大陆上的特殊地位,也不仅是由于她拥有还在广漠无垠的无产阶级祖国各个角落里沉睡的无穷的自然资源。她之所以会迅速发展,而且会越来越迅速地发展,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急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为从前帝国主义俄国的各族人民开辟了资本主义国家闻所未闻的和根本不可能的前景。

但是,十月革命不是孤立的行动。而苏联对巨大的国际革命浪潮也不是袖手旁观的。恰恰相反,十月革命本身是由于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的巨大危机而产生的。苏联是第一颗晶体，革命的晶体，围绕着它将必然会产生其他的晶体。革命过程发展得越深入，改造世界的伟大工作开展得越广泛，在科学面前展现的前景就越宏伟。

人类所经受的空前未有的危机，只有通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苏联的道路才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新的毁灭性的战争准备来解决这个危机，而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千方百计地来为这一使命服务。和平主义客观上只会削弱劳动者的意志，它在科学上也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因为它依据的是在现实相互关系中没有任何根基的幻想。现时资产阶级世界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潮代表着腐朽和颓废的过程。这些思潮是与精确的科学知识和合理的思维直接对立的。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力量当中，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充当使人类摆脱严酷的和毁灭性的灾难的巨大力量的角色。

正因为这样，苏联的科学履行着极其崇高的使命：它有助于人类摆脱当代的耻辱、摆脱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事业。它有助于建设没有战争、没有投机、没有暴力的新的关系。它有助于建设一种由理性的人们管理的合理的经济。它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

而正因为这样，科学将自己的作用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科学曾经从神学的婢女变为金铤的婢女。现在，它正在变为劳动人类的朋友和同志。它正在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行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高度的计划性也就是高度的科学领导。因此，社会主义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物质生产力的繁荣，不仅意味着人对人压迫的消灭，它也意味着人类知识的巨大胜利。当电流的发明者（萨柯和樊塞蒂因此而丧命^①）和“猿猴案件”的导演者反对十九世纪的杰出自然科学理论

^① 萨柯和樊塞蒂是美国的工人革命家，原籍意大利。1927年8月23日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坐电椅处死。——编者注

而叫嚣“苏维埃的野蛮”时，当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挑衅者把自己的“预卜者”从镣铐上解脱下来而叫嚣“苏维埃同文明相对立”时，我国的工人阶级同科学家们一起可以平心静气地说，十月“伟大叛乱”的红旗将永远成为不仅是解放了的体力劳动的旗帜，而且是解放了的科学的旗帜。

第一次发表于1927年。译自《布尔什维克》
杂志1927年第17期第10—20页。

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 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

1. 问题的产生。2.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成熟性的问题。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各种批评：从资本主义总的成熟性的观点，从军事破坏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成熟性的观点。3. 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前提的问题：国际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维主义，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右翼在十月的立场。4. 关于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关于我们革命性质的问题。5. 防止外部危险的保障和我国发展的内部力量。6. 结论。

当前，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基本的问题被重新非常广泛地、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分析其原因，但是不能不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正处于从所谓恢复过程向改造过程过渡的时期。不过，我们觉得，这个术语并不完全确切，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前一阶段算作恢复过程，那么，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国的工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沿着革命以前时期的发展的同一轨道进行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谈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恢复过程。实际上，我国在十月革命后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国营经济的发展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不断的改造。我们的发展，同工人阶级取得十

月胜利以前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当我们谈到恢复过程时，必须记住，使用这个说法是有条件的。我们想以此说明，我们的产品总额达到了战前的水平，生产的物质基础恢复到了战前时期的规模。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谈到恢复过程。也只有按照这种理解才可以谈到从恢复时期向改造时期的过渡。

总之，现在我们面临着改组经济的整个任务，把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的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任务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寻找和使用基本资金，以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根据新的技术去扩大生产基础、建设或建立新的企业。不难想象，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而且它的困难并不限于实践的范围。不，甚至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任务正如德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颗硬核桃”^①。这一困难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一系列动摇和犹豫。它促使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

应该指出，关于基本资金的问题提出来已经比较久了（同列宁提出电气化的问题相比）：我们的一些反对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在这一方面可以提到彼·巴·马斯洛夫的一本著作，也就是他在1918年发表的《战争和革命的总结》^②。马斯洛夫当时完全站在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在上述著作中鼓吹孟什维主义观点。不言而喻，他否认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下列理由来论证这种否定态度的：在我国总的经济技术基础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新的技术问题。他当时这样写道：

“只要了解一下在农业以及占用了工业中最多人手的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的企业类型，就会得出结论，当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

^① 意即“一个棘手问题”。——编者注

^② 彼·巴·马斯洛夫：《战争和革命的总结》，莫斯科1918年俄文版。

替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物质条件的时候，革命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俄国大革命在最初几年只会使工业脱离农村中的农业，借助于资本主义来造成这种脱离，而社会主义只是‘在相当遥远的将来’才会重新把它们结合成和谐的整体。如果不脱离小农经济，工业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形成社会生产，因为手工业者的原始技术不可能保存下去，而技术的改变将使半农业经济发生分化。尽管革命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但甚至革命也无法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新的技术基础上的新企业。”^①

这一段引文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趣的是最后一句话，在这句话中，作者把关于在我国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同我们找不到力量和资金来为我国经济奠定新的技术基础这样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了。

用什么资金可以奠定这个新的技术基础——问题就在于此。用现代语言来说，这个“基本资金问题”正是被彼·马斯洛夫提到了首位。孟什维克马斯洛夫认为，既然谈不上任何新的技术，那么在他看来这就是根本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根据。

由此得出结论，关于把我国经济引上新的技术轨道的问题，基本资金的问题，直接引导到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总之，直接引导到当前成为我们党内的争论题目的一系列问题。因此，现在回顾一下过去，回想一下以前关于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说了些什么；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又说了些什么，这是有益的。这样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一系列论据，使我们能够仔细研究争论双方的观点在思想上的根源，从而了解目前的争论。

这里必须谈一谈——即使是很简略地——关于现代资本主

^① 彼·巴·马斯洛夫：《战争和革命的总结》，莫斯科1918年俄文版第15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义,首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成熟性”问题(按照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预断和策略总是建立在对事态的一定的、完全客观的分析基础上的。布尔什维克在解决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成熟性问题时,考虑到了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三种现象。它们是: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基础及其组织形式。第二,各阶级的对比关系,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第三,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成熟性。不言而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从下列观点出发提出关于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成熟性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培养出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行政干部等等之后,才能夺取政权。这样提出问题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按照他的理论,无产阶级不掌握“普遍组织科学”的原则,不领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包罗万象的学说的各种观点,就不能夺取政权。显而易见,按照波格丹诺夫这样的立场,关于资本主义成熟性的问题大概永远也得不到正确解决。但是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另一种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关系总的说来已经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关系过渡。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论点,关于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已经达到充分程度的论点,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组织形式(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垄断,银行团等等),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这一事实本身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成熟性的证据,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本身正是生产力发展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之间最严重的矛盾的表现,这个资本主义外壳对于今后生产力的或多或少正常的发展来说已经变得太狭窄了。

不言而喻,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作出估计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完全不是从承认资本主义的全面成熟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出发的,而且也完全不认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资本的集中和积聚的

程度，工人阶级集中的程度等等到处都是一样的，都足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了。与此相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关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规律”的论点。这个规律是以各国资本主义结构的不一致性作为基础的。这个规律还指出了下列情况：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中心和这个经济的殖民地外围地区有着严格的差别；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的成熟性完全不是以各个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完全同样的水平和同样的速度等等为条件的。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这个规律，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性，关于它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准备程度，关于世界革命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甚至可能在一个国家中开始的过程等这一些问题的立场的理论根据。

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对待问题的立场则不同。这里必须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关系不成熟性的论据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系列持批判态度的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想要驳倒布尔什维克关于在目前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成熟性的论点。一些人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还没有成熟；另一些人说，它在经济上已经成熟，但由于世界大战，由于大战期间开始的贫困，它不再是足以向社会主义革命轨道过渡的基础了。最后，还有一些人提出一系列特别“独出心裁的”理由，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不成熟，因此不能解决世界革命的任务。

第一种类型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从资本主义关系在经济上不成熟性的观点提出的批评，最明显地表现在亨利希·库诺的著作中。在一本为1914年8月4日在帝国议会中的投票辩护的小册子^①中，他大致发挥了这样的论点。他说，现在考虑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意味着从事毫无意义的臆断和空想。马克思曾说

^① 指库诺1915年写的小册子《党破产了吗？》。——编者注

过，无论哪一个经济形态，在它还没有完完全全地实现自己的一切可能性，耗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以前，是不会灭亡的。库诺说，看一看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的那些国家；看一看还没有完全装满资本主义商品成分的那些市场；看一看资本主义还处于发端阶段的某些国家，你们就会十分清楚，资本主义还将得到很长时间的发展。库诺断言，在大战以后，由于部分地消灭了生产力，资本主义关系将得到额外的发展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而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市场网对于遭到破坏的生产力来说将变得更大；所以，认为社会将在近期内过渡到社会主义轨道上去的想法是荒谬的、不能实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切说得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因此没有必要再引证抱有同样观点的其他批评者；只要提一下另一位——这一次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或半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亚·亚·波格丹诺夫就够了。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即在《社会主义问题》这本小册子中写道：“人们在证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尼·布·）时提到正是那些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得到巨大的发展。如果以整个工业的两种基本原料——生铁和煤炭的世界生产为例，根据它们的价格、劳动力报酬和对劳动力的大概的剥削率，计算人类所具有的整个劳动能量有多少份额体现在这些产品的巨大的年产量中，那么，其结果大约是2—2.5%，决不会超过3%。在这个结果中似乎没有什么占压倒的多数”。^①

亚·亚·波格丹诺夫援引了生铁和煤炭生产中的这些2—2.5%，从而就认为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和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过渡的任务。

很难把这种批评认真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因为这至

^① 亚·波格丹诺夫：《社会主义问题》，1918年莫斯科版第48页。

多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①。因为这些“批评家”所持的出发点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前提的极端简单化、完全不是辩证法的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排除（或者几乎完全排除）其他生产方式的时候，它才会灭亡。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将会早得多，因为它发展自己的内部矛盾要早得多，这些矛盾使得它的继续存在变得无法忍受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例如，世界大战，“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同样，“批评家们”抱着这样一个论点：资本主义在物质上的成熟性应该是这样的，在夺取政权后就会出现差不多现成的社会主义，它立即把整个社会全部包括进去。而实际上问题只在于运动的出发点，只在于继续建设的可能性。在“批评家们”那里几乎整个过渡时期都消失了，而这个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中间的发展时期。他们（“批评家们”）表面上的激进主义是他们最深刻的机会主义的反面。对于这一类批评家大概用不着再多费唇舌了，前而所举出的已经足够了，可以转过来谈一谈另一类反对意见了。

这后一类反对意见大致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已经成熟了，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内部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能够把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战争毁坏了一切，现在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态度，现在不能给自己提出社会主义变革的任务。顺便说一句，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他谈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谈到了在遭到战争破坏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可

^① 这里可以讲一件可笑的事：有一个名叫鲁道夫·施奈德尔的“德意志工业帝国联盟”的书记也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苏维埃制度，社会化和强制经济》中用马克思本人来不仅打击布尔什维克，而且打击全部的社会主义者。这位德国工业家的学识渊博的辩护士写道：“早在五十年前，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卡·马克思就已经用唯一的一句评语驳斥了世界上所有这些空想家和改革家”（第20页）。当人们谈到实际上实现社会主义时，就陷入空想：“社会主义从科学倒退到空想”……（第20页）。（鲁道夫·施奈德尔（“德意志工业帝国联盟”书记），《苏维埃制度，社会化和强制经济》，德累斯顿1919年版。）

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也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恰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例如，非常著名的俄国孟什维克李伯尔就是如此。1919年，他在哈尔科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社会革命还是社会崩溃》。他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并没有忘记说，他“很遗憾”，他过去的手稿在他不得不躲避“共产党的暗探”时遗失了。他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我在我国革命的‘蜜’月时期就早已论证过在本讲座中所发表的基本的‘悲观主义’论点。从俄国革命的最初几天开始，我就很清楚战争所引起的它的腐烂崩溃的特点，而我从来没有把闪烁不定的沼泽地上的微火看作是革命的灯塔。”^①这种可说是富有诗意的描述包含着这样的政治含义：你们布尔什维克不是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国际革命和其他东西吗？你们不是把这提上日程吗？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不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前进过程，而是战争引起的腐烂崩溃的过程。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三章“未来的展望和任务”中，作者详细描述了由于战争的结果所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他公开声明，他的观点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总的说来”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从我所说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不能实现社会主义。”^②

不难看出，这个论据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无痛苦的”过渡这一机会主义前提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将在必然同生产力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灾变中产生（“灾变论”）。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截然相反，“批评家们”是以真正田园诗般的事件进程的可能性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上述论据还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算术概念联系在一起：它认为，离开了发展生产的物质骨架的一定界限，就会立即使得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① 米·伊·李伯尔：《社会革命还是社会崩溃》，哈尔科夫1919年版序言。着重号是我加的。

^② 同上，第57页。

成为不可能。正在变化的阶级力量对比，无产阶级在自己战斗中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予以考虑。更不用说经验对这一论点的检验，也就是说，后来事件的全部进程完全驳倒了机会主义者的论断，他们简直是逃避解决任务，如同逃避整个革命一样。

第三类反对意见以最畅销的商品形式表现在一种理论中，这种理论应当证明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取得政权，因为它在居民中是算术上的少数。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批评家们认为，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都必须要以无产阶级占多数为前提。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恐怕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考茨基的那些论据是大家所熟知的。

“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以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①当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少数能够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时候，各社会力量的这种具体结合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当无产阶级革命极其困难的时候，在国内占多数的无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这种贵族式蜕化也是可能的^②。由此可见，只有对问题采取公式化的、庸俗的、不具体的和不辩证的态度，才会得出关于无产阶级占少数时不可能实行变革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0页。——编者注

^②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列宁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列宁文集》第3卷第493—494页）。

关于无产阶级本身不成熟性的理论的独特变种是亚·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大家知道，波格丹诺夫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起来的特殊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只有当工人阶级拥有已经准备好了的、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复杂任务的干部队伍的时候，它才能够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波格丹诺夫的论据是相当简单的。例如，他提出计划问题这样的问题，并说：制定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是非常复杂的任务。而如果提出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那么将更加困难得多。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和组织方面的前提，要克服这个困难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些前提还不存在，因此当然也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本身提上日程。

因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立场非常独特，我们将完整地引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地方。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社会主义问题》第38页上写道：

“有计划地组织人类，必须以总结组织经验并使之社会化，用科学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为前提。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解决任务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解决任务是不可能的，就象如果没有总结技术经验并使之社会化的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机器生产制度是不可能的一样。”

其次，在第68页上写道：

“目前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不能自立，这是一个基本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在最近的将来的纲领中应该把这个事实作为出发点。阶级的文化——这是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的全部总和。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有些计划该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和幼稚的无知啊！因为它们硬要无产阶级立即去进行最激进的、在整个历史上空前复杂和困难的、在组织上改造整个世界的事业。而在这时候，我们经

常亲眼看到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发生分裂和瓦解，而且往往并不是由于受到外部的打击。”

瓦·巴扎罗夫在那几年发表了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有趣的、非常接近亚·波格丹诺夫立场的观点。巴扎罗夫所依据的那些前提，大致是同波格丹诺夫一样的，只是他更具体和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结论。对于这些结论必须详细地谈谈，且不涉及它们的论据，这个论据的总的性质刚刚已经指出过。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表述这些结论的。瓦·巴扎罗夫对西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作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的结论：

“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我们觉得，工人政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新形式作为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自由的计划经济的工具，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在目前条件下，工人政党唯一能够实行的任务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所表述的任务：把建立在获得利润的基础上的经济变成‘旨在为消费服务的国家经济组织’，变成——就象最新发明的一个笨拙的术语所说的那样——‘满足消费的经济’。”^①

作者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组织必然具有国际性质这个意义上作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修改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

“……这里所说的是很广泛和复杂的组织。但是，由于这个组织丝毫没有同强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断绝关系，由于另一方面这个组织的总的轮廓在我们所经历的时代的自发过程中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因此现代民主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不能认为这个问题从原则上来说是它所无法解决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并把那些同顺利地解决上述任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民主主义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关系到最近几十年，甚

^① 瓦·巴扎罗夫(鲁德涅夫)，《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哈尔科夫1919年第1版第21—22页。

至几百年的期间内全世界历史的进程。”^①

总之，巴扎罗夫根据工人的不文明性所提出的论据是这样的，上帝保佑我们，按照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榜样，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中掌实权的人是资产阶级；哪里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势必在几十年中，甚至几百年中满足于从事很聪明的事情；支持以最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②。

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关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怀抱中在文化上和组织上成熟起来的“理论”是彻头彻尾不正确的，是违背工人阶级发展的基本事实的，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这个理论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成熟起来”，以致能够立即管理整个社会，并且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解决建设时期最复杂任务的力量。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成熟起来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成熟起来之间的全部原则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我在当时曾写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培养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③

① 瓦·巴扎罗夫(鲁德涅夫)：《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哈尔科夫 1919 年第 1 版第 22 页。

② 必须向读者说明，对巴扎罗夫的观点的这种评述只是指相应的一段时间。

③ 见尼·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进攻》文集第 1 版第 232 页（《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53 页）。——编者注

可见，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的理论之所以是不正确的，还因为它为夺取政权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还因为它不了解过渡时期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成熟起来的时期的意义。如果波格丹诺夫的理论根据是正确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会根本无法解决，就象方圓问题或永动机问题一样。

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成熟性和世界经济的成熟性问题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表现为这几种形式。至于说到布尔什维主义本身，那么它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个问题，关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性问题，从未有过任何分歧。我们党内的所有流派，所有思潮，所有派别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都没有采取怀疑态度，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对于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首先是在欧洲的一些所谓先进国家中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一论点表示异议。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另一个问题，即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的成熟性问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仅是当我们在辨别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妥协政党之间的不同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不一致；而且在我们自己党内，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解答也是五花八门。甚至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也各不相同。因为关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按照这样的提法，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

在这里让我们先听一听来自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反对者的意见，也同样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毫无益处的。

著名的社会民主党教皇卡尔·考茨基在围绕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充当了带头人，他起先很温和，然后按照叛徒的方式，最后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在自己的较早的著作中表现得比较温和。例如，甚至在那本曾遭到列宁驳斥的小册子中，考茨基还多少讲点体面，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在客

观上就已经扮演了资产阶级奴颜婢膝的思想上的应声虫角色^①。考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相当准确、清楚和明白地提出了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这本篇幅很大的书中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国革命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说实在的，它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个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的国家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就已经说过，——这位熟读过许多书的老人讲道，——在旧的社会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可能性发挥出来之前，任何新的社会都是不会产生的。因此，既然社会发展的上一阶段还没有结束，既然旧的社会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他以这些论据武装起来之后，就开始猛烈地直接攻击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非常醉心于助产婆的角色，但是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极端笨拙，因为他们催逼孕妇大大缩短根据自然规律所必需的怀孕期而提前分娩。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完全不是接生婆，而简直是招摇撞骗的江湖医生，他们只是标榜自己进过革命助产术学校——马克思学校的训练班。其实他们同马克思学校毫无关系。俄罗斯母亲所生产的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她不过是布尔什维克骗子手的试验对象。

总之，俄国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还没有成熟的，因此不应当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位社会妥协主义教皇在他的通告之

^① 在这一方面，有点儿名气的保尔·施曼博士在一本由“研究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同盟总书记处”出版的小册子中发表了很有趣的见解，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很特别：《欧洲的亚洲化》。这位保尔·施曼关于考茨基所发表的言论一字不差地写了如下这些话：“从社会政治观点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写得最好的（在德语中说得还要有力：“das weit aus Beste”）和最有说服力的是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第8页）。而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施曼提出了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来加以论证。他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写道：“精神上的死亡，许多世纪以来亚洲各民族所固有的人类的内部僵化，现在象幽灵一样，裹着用欧洲思想的碎片做成的外衣，站在欧洲的大门前。而这些碎片使变得盲目的文明世界受到欺骗。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带来欧洲的亚洲化。”（保尔·施曼，《欧洲的亚洲化》，1919年版，第8、9页。）

一的结尾中这样教训说。^①

除了教皇考茨基之外，必须分析一下奥托·鲍威尔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他真可以称为社会妥协主义的主教。必须指出，主教比教皇更善于玩弄手腕，更善于随机应变，奥·鲍威尔的观点比考茨基的立场更加狡猾，更加灵巧。

他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他一点也不否认，在俄国是工人阶级专政。他一点也不否认，我们的党作为城市工人阶级的政党取得了政权。他说，虽然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同西欧不同，但它是必要的，它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西欧它会采取民主制的形式，而在俄国它采取了完全特殊的形式，“无产阶级专制制度”的形式。在我国是专制制度，但终究还是“无产阶级的”。但它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它的历史使命在于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唤起我国大多数居民走向文明生活；而大多数居民——这就是庄稼汉。“无产阶级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唤起千百万农民走向文明生活，从而亲手培育出将把它推翻的政治力量。一旦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把这个农民培育得足够强大的时候，农民就会立即说：“滚开吧！”这样，“无产阶级专制制度”的历史使命就将完成，那时我国人民也就将成熟到可以实行真正的民主制。

下面两段引文充分说明鲍威尔的立场。他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小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②“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

^①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狄茨出版社第2版第78、90页。

^② 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6页。

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①

除了考茨基和鲍威尔以外，帕尔乌斯和施特勒贝尔的立场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帕尔乌斯的小册子《工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致德国工人的信》对我国革命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恐怕很难找到比这更加卑鄙的作品了。考茨基撒谎的妙文同老奸巨滑的帕尔乌斯的伎俩相比简直是算不了什么。后者甚至把自己在1905年的立场说成是：似乎他根本没有讲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讲过……奥地利民主制式样的工人民主制！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明白，正是出于祈求欧洲资产阶级社会舆论原谅他很早以前青年时代的罪过的愿望，帕尔乌斯先生才用得着奥地利外套。

在这位最卑鄙的叛徒看来，我国革命简直是一帮无知的逃兵对国家的占领。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工业发展的一定程度和工人阶级的成熟。”^②而在俄国这二者都还没有，因此，它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使命在于充当桥梁，结果某个凯撒、波拿巴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人将通过这座桥梁取得政权。这就是帕尔乌斯为我国革命所作的诽谤性的“总结”，这位很有胆量的商人曾多次试图碰运气在我国政治市场上销售他的破烂货色。

至于说到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后一位作家施特勒贝尔，他企图把他对我国革命的观点发展成一整套理论“体系”。

在一本标题很有特色的《不是暴力，而是组织》的小册子中，施特勒贝尔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实质”时声称，关于共产主义的无产

^① 同上。这里不难看出鲍威尔的立场同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非常相似。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② 帕尔乌斯，《工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致德国工人的信》，柏林1919年版第15页。

阶级革命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国革命的基本因素是巩固农民私有制，而巩固农民私有制也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决定这一革命的性质的东西。谁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共产民粹主义者”，——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达的话。结果，施特勒贝尔把布尔什维主义归结为巴枯宁主义。

施特勒贝尔写道：“如果布尔什维克还以为，可以通过宣传和强制手段把俄国农民争取到真正的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一边去，那么，他们只不过是重新证明，他们充当了典型的旧俄罗斯革命主义的观念的俘虏，这些观念是巴枯宁主义的特征。”^①

“农民……至少代表了苏维埃俄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七。他们的人数和经济意义的分量归根到底决定整个革命的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异想天开的人和狂热地相信奇迹的人，才会认为俄国革命按其内在的性质和最终结果来说是共产主义革命！”^②

俄国布尔什维克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为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壤施肥，——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对我国革命的分析结果。在俄国资本主义关系还不成熟。这是一个半亚洲式的国家，它的相应的阶级关系表现在农民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无产阶级就象一只苍蝇在农民的牛奶中漂浮，而这只无产阶级苍蝇面对着农民大象无法进行任何共产主义革命。农民的重锤拉得越来越紧，而这个重锤决定着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不管俄国革命的积极活动家穿上怎样的化装舞会的服装，不管他们提出怎样的口号，也不管他们想出怎样的办法，反正都一样，归根到底无论如何问题将由农民来决定。整个革命的唯一意义就是巩固农民私有制。农民革命的客观意义就是使农民从封建羁绊下解放出来。正是这

① 亨利希·施特勒贝尔：《不是暴力，而是组织》，柏林1921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第13页。

一点决定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评论”。

现在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同胞俄国孟什维克的意见。他们的看法大体上同他们在西欧的同伴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象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位俄国孟什维克的经典作家，他在理论上是最彻底的。他按照他特有的风格，带着“书呆子气”来评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他写道：“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一定的生产方式，当它不是阻碍而是促进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决不会退出这个国家的历史舞台的。那么试问，俄国资本主义的情况怎样？我们是否有理由断定，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好景已经过去，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能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相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俄国不仅苦于有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在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人士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①而在1917年10月28日写给彼得堡工人的公开信中，格·瓦·普列汉诺夫提出了其他的论据。他写道：“在我国的人口中，无产阶级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而只有当它占多数的情况下，它才能够胜利地实行专政。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②

让我们再看一下前而已经提到过的彼·巴·马斯洛夫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他在当时是正统的孟什维克：“俄国工人阶级不能够担负起组织生产，因为它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其他阶级甚至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③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正在进行的革命

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发表的全部文章和演说两卷集。巴黎波沃洛茨基出版社1921年版第1卷第26页。

② 同上，第2卷第246页。

③ 彼·马斯洛夫，《战争和革命的总结》，莫斯科1918年版第143页。

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全部基础的革命，同时也可能是而且必然是社会革命，它将引起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不是在生产组织的领域里，而是在各不同阶级之间分配国民收入的领域里。”（也就是说工人们将得到略多一些，而农民们将负担较少的赋税，等等。）^①

孟什维主义的中坚分子、最优秀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家们还在革命初期就是这样写的。他们认为这个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是资产阶级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事件愈来愈深入发展，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愈来愈巩固，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感到自己愈来愈坚强，归根到底总会发出而且的确愈来愈顽强地发出关于布尔什维克必然蜕化的音调。

如果说起初激烈地大声地发出关于布尔什维克必然失败和毁灭的音调，那么在第二阶段，由于布尔什维克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就愈来愈大声地发出另一种音调：布尔什维克坚持下来了，但他们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布尔什维克巩固下来了，但他们在农民自发势力的影响下正在蜕化。事情也只能是这样：谁承认我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在苏维埃得到巩固以前，他就必然会叫嚷无产阶级革命必定要失败，而在苏维埃得到巩固以后，就必然会谈论蜕化。

达林非常好地表达了这种音调，他一般说来是著名孟什维克之一，也是正在走向没落的孟什维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自己的《战争和革命以后》一书中写道，“必须了解事件的意义，必须撕掉化装舞会的服装。必须洗掉颜料和白粉；不是根据言语，而是根据行动；不是根据意愿，而是根据结果来作出判断。必须了解革命的

^① 彼·马斯洛夫：《战争和革命的总结》，莫斯科1918年版第142页。

客观意义。”^①而革命的这个“客观”意义就在于：“俄国已经在经历第五个年头（这些话写于1922年。——尼·布·）的那个革命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②。他提出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会是这样的？”他的回答是：“因为农民的利益决定了全部政策的命运。”^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援引过的李伯尔这位露骨的右翼孟什维克的立场是很有意思的。李伯尔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中，在总结自己关于在俄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时写道：“……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重新学习过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主义首先只有在那些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中才能得到实现，在那些国家中首先具有开展非常巨大的胜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这是在美国“首先具有开展非常巨大的胜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尼·布·）。然而，从某些时候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这个理论对于我们这些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俄国民粹派在反对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就发挥了这种理论。”^④这就是说，布尔什维主义就是民粹派理论，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这种理论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里怎么会不想到“共产民粹主义”这个“最新的”指责！）但是在我们的这位“思想家”看来这还不够。还需要给布尔什维主义的代表们贴上一个更加有损名誉的标签。在李伯尔先生看来，民粹派还不够。因此他“加深”问题的提法。他写道：“这种理论（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尼·布·）非

① 瓦·达林：《战争和革命以后》，柏林1922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同上，第13页。

④ 米·伊·李伯尔：《社会革命和社会崩溃》，哈尔科夫1919年版第16页。

常陈旧；它来源于斯拉夫主义。”^①

亚·波格丹诺夫独出心裁地、但以同样的基本方法解决了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资产阶级在战后遭到了破产，布尔什维克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弱点夺取了政权。在大兵们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而农民是多数。因此，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国家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是技术和组织者阶层即知识分子的国家，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形成为阶级。即使布尔什维克主观上并不想建立这样的政权，客观上他们的作用归结为建设一个独特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在革命的烈火中最终形成的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由于发生官僚习气和官僚主义的蜕化，自己也变成这个新阶级的组成部分。同革命过程的代表者本身的主观空想相反，社会主义在客观上的不可能性也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曾经不止一次作为波格丹诺夫在著作方面的孪生兄弟出现的巴扎罗夫不能同意承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按照他的说法，我国革命只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宣言中才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出现，实际上，在这些宣言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要填平这条鸿沟无产阶级将花费不止一百年的时间。^②

^① 同上，第17页。读者可以看到，李伯尔先生在歪曲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提法，他把谁最早“开始”的问题同革命类型的高度问题混为一谈。帝国主义阵线在我国被突破得最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早，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技术经济上的落后，我们进行建设则比较困难。这一切在布尔什维克的书报上不止一次进行过解释。还应当指出，关于“民族局限性”的“最新”论断是以施特勒贝尔、李伯尔之流的论断作为自己的光荣先辈的。布尔什维克的“斯拉夫主义”——这样说更厉害一些！如果说李伯尔先生把布尔什维克列入斯拉夫派，那么，切尔诺夫则指责我们剽窃所谓“最高纲领派”的思想。“俄国民粹派——最高纲领派有先见性地在自己的臆想中预先想到了几乎所有最大的布尔什维主义试验”（维·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布拉格版第1卷第162页）。

^② 参看巴扎罗夫：《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哈尔科夫1919年第1版。

大体上这就是俄国机会主义社会主义、首先是孟什维克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它归结为以下几点：我国的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成熟；国内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利于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于农民；依靠着我国居民中的农民多数的新的资本主义，正在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借助于布尔什维克党或者不经过这个党，根据它的主动精神或者违背它的意志，通过让它保持政权并发生蜕化或者推翻它，——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关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理论。

从非布尔什维克方面关于这一问题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这一些。现在谈一谈来自我们党内的一些集团和派别的批评。

要考察这后一类批评，最适当的是从托洛茨基同志开始，况且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如此喋喋不休，大叫大嚷，简直使大家都厌烦透了。这里只需要提一下在书刊中不止一次引用过的两个地方，以便把它同刚刚分析过的那些批评者作某些对比。下面就是托洛茨基著作中的这些地方：“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①

这是托洛茨基在1922年(1)所写的著作中的第一个地方。

^① 列·托洛茨基：《1905年》一书序言，1922年俄文版。

第二个地方是：“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①如果我们愿意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同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所说的作一对比，那么不由得会发现这些观点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完全吻合。如果说托洛茨基同志在1922年不否认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那么在狡猾的鲍威尔看来，这个专政也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教皇的这位狡猾的主教谨慎地提出一个小小的限制：专政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但是非常非常短促，它的巩固直接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那么，革命的雄辩家托洛茨基一点也不落后于鲍威尔，他也（显然是由于害怕陷入民族狭隘性的过错）不容许这样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保证自己的暂时统治转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不管怎样耍滑头，兜圈子，相似之处——说得温和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或者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这是一样的）的立场不多不少恰好是鲍威尔的社会民主党立场的俄国翻版。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同志在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才会同现在臭名远扬的叛徒科尔施及其朋友们沆瀣一气。要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大丈夫为了抵偿自己的共产主义堕落的罪过竟鼓吹对俄国革命发起十字军远征，他也认为，我国革命具有由于考茨基的恩赐而忽然出现的资产阶级农民性质，并且郑重其事地宣告，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在培植新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幼芽。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既然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那就毫不足怪，无产阶

^① 列·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转引自布哈林，《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114页。

级专政开始变为“远远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那就毫不足怪，它“正在脱离”阶级的轨道。要知道这是从鲍威尔—托洛茨基的前提中得出的最起码最普通的结论。

关于托洛茨基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应当分析一下一种相当独特的对列宁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观点的“友好”批评。我们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同志在十月革命期间对列宁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独特性就在于这些同志不仅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来同列宁相对抗，而且“友好地”提出了一个相对立的政治纲领。但是首先必须谈一谈加米涅夫在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对列宁的观点的批评。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加米涅夫的四月立场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他在全俄代表会议上所做的副报告中，这一立场是上述这些同志的整个十月逃兵路线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据。

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列宁的报告和加米涅夫的副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已经开始的革命的性质的问题，关于可能是革命动力和现在就是革命动力的那些阶级的问题。这次制定党在最近时期（而这个时期是革命的开展时期）的行动路线的代表会议，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正在开展的是什么样的革命，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正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报告人（列宁）和副报告人（加米涅夫）都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列宁认为将来的任务，最近的将来、最近几个月的任务在于“实行这种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轨道的过渡）。加米涅夫则认为，如果象列宁那样的看法：“这次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正在接近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意味着陷入“最大的谬误”。“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那么这个联盟（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尼·布·）就不可能存在，在它面前就不会有任何具体的任务，无产阶级就会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斗争。在这个时候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承认……苏维埃是

组织力量的中心，因而我们也承认，有的任务是可以由工农联盟来完成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过时，我想，你们大家应当承认，在这个革命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那时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联盟发生破裂的时刻就到来了。我想，必须在两种策略中作出抉择；或者是无产阶级面临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的任务，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无法帮助它，那我们就破坏联盟并着手实行那些应当由无产阶级来实现的思想；或者我们认为，根据当前的条件，这个联盟是生命攸关的，有前途的，那我们就参加这个联盟，并这样来制定我们的策略，使这个联盟不致遭到破坏。因此我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这个联盟中与众不同，并且清楚、准确地规定自己的纯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目的。我们同联盟一起前进，并且还能够在同联盟一起前进几步。我希望无产阶级政党确实会这样行动。”^①

这里还顺便解决另一个问题（更正确地说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关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关于农民是否还可以作为能够帮助革命的力量而加以利用的问题。加米涅夫的观点在这方面也是清楚的：任何能够同农民一起前进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根本谈不到的；任何无产阶级在那里能够领导农民、同它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专政都是根本谈不到的。与此相反，加米涅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能够开始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恰恰是同农民的联盟破裂的时候。不是同农民的联盟，而是只有斗争，不可调和的斗争，这就是加米涅夫所看到的在革命开始时的景象。

显而易见，这种对我国革命的理论分析，这种对革命的动力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的估计，这种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可

^① 《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全市和全俄代表会议》，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53页。

能实行工农联盟的论断，等等，完完全全地决定了加米涅夫同志及其战友们在十月的日子上的立场。加米涅夫在十月的日子里采取了同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立场相对立的立场以后，作为一个贯彻到底的人，从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发挥的同列宁理论相对立的理论中作出了实际的结论。其他同他一起的人，彻底地或不彻底地，也从第一次“友好地”对列宁主义进行理论修正的企图中得出了结论。因为实际上，既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意味着同农民必然发生冲突，那就不能参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不能号召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因为起义的失败是可以用天文学的精确性预见到的。由此写出了反对起义的信，由此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确实，请看一看为这些肆无忌惮的退出和离开、这种破坏党纪的行为、这种从战场上逃跑的行为“提出论据”和“进行解释”的各式各样的文件的主旨是什么。这就是由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所签署的一个文件：“我们的观点是——这个文件中写道——必须由所有的苏维埃政党组成为社会主义政府”（当时所谓苏维埃政党不是指那些拥护“苏维埃政纲”的政党，而是那些当时加入苏维埃的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尼·布·）。“我们认为，只有成立这样的政府才能巩固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在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里英勇斗争的成果。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只有一条道路：通过政治恐怖的手段来保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走上这样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会导致使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失去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建立不负责任的制度以及毁灭革命和国家。我们不能替这种政策承担责任，因此我们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①

^① 《1917年革命档案。十月变革》（事实和文件集），波波夫编，H. 罗日柯夫主编，彼得格勒“新时代”出版社1918年版第408页。

下面是摘自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一封长信中的一段很简短但意思很明白的话：“我们在胜利的时刻，在我们党统治的时刻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写道，——因为我们不能够平静地看着，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政策如何导致工人政党失去这一胜利的成果，导致无产阶级的毁灭。”^①

不言而喻，这些政治结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的，它们作为说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种特定观点的结果，是完全“正确地”得出的。的确，既然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我国的无产阶级很弱，在我国人口中占多数的农民不能被利用来作为哪怕协助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目前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任务，是做不到的危险的主张。当然，可以迫使党轻率地投入这一场冒险，但是这种冒险就象所有的冒险一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党将立即遭到毁灭，或者在经过它的短期统治以后遭到不可避免的灭亡。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即使它掌握了政权，它也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专政的刺刀来保障这种地位，而建立在刺刀上的地位是不巩固的，不合适的。处于这种地位的党不能防止自己脱离无产阶级，而由于这种脱离将使革命力量的圈子缩小到它自己的范围以内，当它弄清楚，同自己本来的愿望相反，自己的步骤不合理、毫无意义和没有效果以后，它就将听凭革命横遭摧残。

这里应当指出，在这些由于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理论、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低估农民的理论而得出的最初结论中，已经带有后来在反对派情绪每一次爆发时一再重复出现的那种音调。无产阶级很弱，无从得到帮助，从农村方面也得不到帮助！哪里谈得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建设的企图注定要

^① 《1917年革命档案》，第409页。

失败，——它们必然会蜕化为自己的反面；顽固地推行这些企图只会导致新制度蜕化为官僚主义的、机械的压制和政治恐怖的不负责任的制度；导致脱离群众以及最后导致党本身的蜕化。总之，布尔什维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企图不会有好的结果，而别的结果则应有尽有；事情看来可能会导致前面提到的德国资产者施曼曾说过的那种“亚洲式的僵化”！……

现在让我们作一些结论。

把前面叙述和分析过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俄国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所有各种观点作一比较，可以证明它们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在关于俄国革命各种内部力量的对比问题上，在关于从达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的观点看俄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性问题上，基本上完全一致。在这些问题的范围内，可以说所有这些立场基本上完全一致，这一点也没有夸大实际存在的相似之处。当然，我们指出共同的出发点，并不想从而指出上述所有派别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得出同样的结论。不是的，得出的结论是各不相同的：一些人成了革命的英雄，另一些人进行了反对革命的斗争，还有一些人可耻地摇摆不定。必须公正地指出，即使在同一派别的范围内，结论也并不一致。例如，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普列汉诺夫拒绝镇压无产阶级的，虽然是“为时过早的”，但终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企图，从而离开了自己的朋友们。在另一个派别的范围内，结论也是各不相同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日子里作出了一种结论，站在先进战士的行列中前进，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得出了另一种结论。托洛茨基考虑到，虽然由于内部的原因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靠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可能会得到拯救。因此：前进！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以为，正因为由于内部力量的配合毁灭是不可避免的，用不着这么快地前进，因此：往后退。

我再说一遍，结论是各不相同的，而理论根据（在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方面，对评价工农联盟的态度方面，在解决关于力量的配合和关于小小的工人阶级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过来的可能性问题方面；在解决关于这些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发生冲突的问题方面；在解决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即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可能性问题方面）——所有这一切的根据在他们那里都是同样的。这个“根据”同列宁对问题的提法相距甚远，如果说它使人想到列宁对问题的提法，那只不过是它们的互相对立，而决不是由于它们的相似。列宁对于俄国资本主义成熟性问题的提法并不象许多批评列宁的聪明人认为的那样肤浅和笨拙。列宁从来不否认关于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比在西欧和北美要少得多这样的论断。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就会立即毫无例外地从所有方面现成地产生。在每一个国家，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甚至在美国，情况将会是这样的：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到对经济的组织将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综合体都包括进去。但是列宁认为，在俄国的落后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小岛，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开端。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曾认为这种结合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最有利的条件。从帝国主义战争中产生革命的特殊条件，国内各种力量的特殊结合，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运动的起点，——所有这一切的总和提供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不断向前推进的基础。只是必须细心地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把它变为自己行动的基地，到那时，利用它作为制高点，有计划地、从容不迫地把整个经济领域都置于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

在讲了上述这一切之后不妨提出一个问题，在彻底运用这种不相信在我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这种既是欧

洲社会民主党人、又是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又是托洛茨基、又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所共有的观点的情况下，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我们已经顺便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必须更加尖锐地强调指出这一点。原来，彻底运用这种不相信观点就会导致以下两种可能的情况之一：如果没有胜利的国际工人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不是由于被推翻就是由于自己蜕化而将遭到毁灭。任何其他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长久地存在，那么它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形式，而改变自己的内容，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成为“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如果在我国社会阶级领域里农民占巨大的优势，如果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们国家的蜕化（如果我们“保存下来”的话），这个国家在农民的压力下对受到富裕阶层支配的农民作出愈来愈多的让步。这样一来将形成我们国家蜕化的具体形式——它的“富农化”。换句话说，在那些早在1917年夏季就已形成的机会主义前提中就完全包含有目前反对派的思想，这个反对派从我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正在谈论我们的蜕化的趋势。反对派的理论观点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诚然，社会民主党人比持反对派立场的共产党人更早地作出了这些结论。在这一方面可以把考茨基的著作称作全苏共产党反对派的指南，也就是持反对派立场的共产党人的指南。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强调指出我们的反对派在思想上背离列宁主义。如果反对派谈论“富农化”，那么鲍威尔很早就这样说过。他现在还说，在我国经济中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他现在还认为，我们不完全是非工人的政党；他“只是”以为，我们开始散发出农民的气味，看来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保尔·列维在给罗莎·卢森堡同志的一本反列宁的小册子（他违背已故的女革命家的意愿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也是这样写的。

达林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那本书中写道，“主观上”我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客观上它不外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必然是农民革命，如此等等。而另一种理论流派——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难道不就是现在的联合反对派所热衷的那种关于我们不可避免发生官僚主义蜕化的理论？如果说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强调农民方面，那么波格丹诺夫则非常坚决地强调我们的“蜕化”过程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我们的官僚主义（技术知识分子官僚，“组织者”等级）蜕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某些反对派的演讲中发出了关于“卡芬雅克之流”的调子。但这种胡说并不新奇，它早就被帕尔乌斯、考茨基以及其他绅士们“发明”出来了，因为这一伙人不相信我国能够进行胜利的革命。但是由于“可恶的布尔什维克”不退出舞台，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一种希望，一颗明亮的星：蜕化，波拿巴主义，凯撒主义以及其他的“热月”。蜕化的理论是完全建立在社会民主党的、波格丹诺夫的、托洛茨基的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十月的前提的基础上的……

在这个历史绪论之后可以着手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了——按照在书刊上同反对派的辩论中它所得到的那种特殊的提法。我们现在转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恰当的是援引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那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某种半官方说法。

季诺维也夫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说，必须分清两件事情，这就是：“（1）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2）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①

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引证了列宁的一

^① 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265页。

段引文。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先进国家里的革命的支持；第二个条件是要同农民大多数达成协议。

季诺维也夫同志接着引证列宁的一系列引文，列宁在这些引文中坚决地说，“社会主义在一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从列宁那里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引文，应该把这些引文概括为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也就是在我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论点；这种说法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同季诺维也夫的理解相对立的，对此下面还要谈到）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在对它进行解释以前，必须指出，可以用一系列其他的引文，其中包括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书中正好也引用过的引文，来同季诺维也夫所引用的引文相对立。我们引证以下三段引文，从形式逻辑上看，似乎这些引文是同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依据的那个论点相矛盾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本人在他的那本书的第269页上，在援引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规律的引文时，引用了以下的论断：

“这个（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尼·布·）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这段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不仅获得胜利，而且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可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把它从外文译成俄文，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引用《论合作制》一文中的另一段引文。列宁同志在这里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编者注

写道，我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①。他接着写道：“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可见，毫无疑问，列宁同志无条件地认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不仅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而且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能够把它建成，因为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现在我们试把这些引文中所说的一切作一比较。这样，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在我们一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我们能够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我们有达到完全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怎样调和这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论断呢？列宁本人在这里是否有矛盾？他是否在一种场合采取一种观点，在另一种场合又采取另一种观点呢？也许这里包含着某种恰恰是我们的反对派所不理解的东西？如果看一看反对派的同志们的全部言论，就到处可以看到想以第一类引文作为依据的意图，似乎这些引文证实了反对派的“理论”。但是，这些反对派分子对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提出来反对他们的另一类引文则避而不谈，不加分析。哪里可以找到对所有这一切的解答？这个解答必须到列宁本人那里去寻找，而且非常容易地就可以找到，只要仔细地弄清楚列宁的意见，特别是在列宁的最后一些著作中包含的意见。我们以为，可以从引自《论合作制》这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中找到对问题的解答。

列宁在这里写道：“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③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第687页。——编者注

正是这一段引文说明，应该怎样解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在我国。——尼·布·）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一系列原理。他的意思可以归结如下。如果我们从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的配合出发，那么，尽管我国落后，尽管由这种落后所决定的巨大困难，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足够的一切，我们能够建设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列宁的这种立场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截然对立的；这种立场完全不同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这种立场从根本上区别于各种“流派”、“派别”和“团体”的立场，这些“流派”、“派别”和“团体”认为，（由于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在各社会力量的这种配合的条件下，我们必然要失败或蜕化。这是对这种立场的全面的否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论点同时也是对关于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回答。这是对关于根据国内原因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的回答，而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回答。但这个回答还不是全部的回答；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要知道我们不是单独地生活在世界上；除了我国内部的力量配合之外，还有国际环境；这个环境孕育着各种危险；它受到以下一系列危险的威胁：战争、干涉、封锁等等；它同我们继续发展国际革命的国际义务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没有确实的保证；在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在实际上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说进行到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当列宁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一国是不可能的，他是想说：不要忘记，我们还受到国际包围，不要抱怨由于我国技术经济落后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但是不要忘记，你们不是单独地生活在世界上，不要忘记，你们处于国际包围之中，从这一方面布置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反对我们。在我们所引用的那段引文中正是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季诺维也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无数次地引用这

一思想。如果看一下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在一国的最终胜利”的所有引文（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所引用过的引文），那么，很容易看到，这里说的正是关于外部危险。而季诺维也夫同志把问题搞乱，把内部危险和外部危险混为一谈。在这一方面下面一段话是很有趣的。季诺维也夫在他的著作的第278页写道：

“我们希望，谁也不会指责象《共产主义ABC》这样的书有悲观主义。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国革命正处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旋过程中。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只是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济（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原有的）建设、组织经济是很困难的……如果对于共产主义的胜利来说必须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工人们彼此间的互相支援，那么这就是说，胜利的必要条件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不是‘悲观主义’，这不过是共产主义ABC（不带引号的）。”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同志由于过分天真，竟认为他可以用共产主义ABC来掩护自己。唉！实际上这个ABC（《ABC》也一样）是完全反对他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季诺维也夫同志加了删节号的地方。他用了两次删节号。让我们看一下，在《ABC》中这些地方写些什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在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一论点之后，紧接着有以下的被季诺维也夫同志删去的地方：

“如果结果是在某一个国家中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中工人阶级还在忠诚地为资本服务，那么，归根到底，各强盗大会扼杀这个国家。在1917、1918和1919年，所有的大国都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他们扼杀了苏维埃匈牙利。但是他们

没有能够扼杀苏维埃俄国，因为这些大国本身的国内情况是这样的，以致不得不考虑，在本国工人的压力下可能连自身都要保不住，这些工人要求从俄国撤军。所以，首先，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工人的援助，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国的存在本身就受到威胁。其次（接着是季诺维也夫所引用的谈到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不是不可能，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地方）。”

在这以后是季诺维也夫的第二个删节的地方。我们也恢复这个地方。它说明困难的原因。在《ABC》中写道：“这样的国家从国外得不到或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它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得不错！恰恰是在他需要的地方，对反对派有用的地方，他加了删节号！我们再补充《ABC》中的一段引文。在《ABC》第45节中谈到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谈到农民的私有者本能，谈到甚至在部分工人中间还有这些本能的残余。《ABC》作出怎样的结论呢？（1）俄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困难的事业”；（2）形形色色的内部性质的障碍“使实现我们的任务变得困难，但是绝对没有使这种实现成为不可能”。这完全不符合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这符合列宁的观点。

可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对列宁的观点作了错误的解释，并且完全徒然地引用《共产主义ABC》这本书。季诺维也夫同志徒劳无益地把问题搞乱。我国是否在任何可能出现的国际形势下，例如，在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保障，对此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显然，防止外来危险的唯一保障是国际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争论。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体系同反对派所持的观点体系之间的分界线不在于此。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抛开国际事务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我们

是否能够同列宁一起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国际义务等等，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或者是我们的落后性必定要把我们拉向毁灭？问题就是这样。同目前的反对派的分歧的历史证明，情况正是这样的。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最初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无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技术经济基础落后^①。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问题并不象骤然看来那样简单，我们必须区别对问题的正确提法和不正确的提法。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得这样细？为什么我们必须一方面提出关于同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干涉以及战争等等作斗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把这个问题同关于我们的力量的内部配合问题分开，而在实际生活中二者是共同前进并且事实上不可分割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一系列非常有份量、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确实，如果我们面临着一定的和平发展时期，比如说有几年的时间，那么，按照这样的问题提法，说什么由于我国技术经济的落后性，由于我国的农民太多，我们不可避免地在这整个的和平时期内必定在蜕化的中心线上运动。如果对于列宁在分析了我国发展的内部力量之后给予肯定的回答的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就必须毫无例外地对一切表示怀疑：我们的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们国家的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如果我们由于

^① 现在斯米尔加同志也随声附和加米涅夫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核心”是关于“在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斯米尔加同志恰恰是强调落后，并从这种落后得出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这里所说的不是困难，而恰恰是不可能。这的确是“列宁主义”！（参看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讨论的速记记录；另外参看斯列普科夫同志的文章《反对派经济纲领中的矛盾》，《真理报》第232号。）

我国国内阶级力量的配合而对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就必定同它这样的发展是一样的,这种发展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因素占优势。这将“保证”使发展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性质将肯定无疑地把重心转移到农民方面而反对工人阶级。这必然将伴随着我们国家机关系统中人员的这样的重新配置,在这种重新配置的情况下可以走上讲坛宣布,在上层我们正在变成脱离工人群众的官僚,而我们的国家机关的下层则处于被富农分子淹没的状态之中。这就是说,现在正在形成的整个“反对派的立场”,从证明我们蜕化的方面来向党进攻的立场,来源于这些同志对列宁直接谈到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的那些地方产生怀疑。

也就是根据这种把问题分为几个部分的做法得出真正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对问题的提法。

如果人们在每一个合适的或不合适的场合都谈论国际革命,那么,这并不总是表示最高的革命性。可能有这样的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问题提法,这种提法直接同革命的观点相矛盾。例如,就是那一位李伯尔有一段解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的很毒辣的话。李伯尔先生在列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时写道:“最后,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国际性质(只要想一想,“国际性质”!——尼·布·)。社会主义制度将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它造成世界经济……因此,设想在这个经济的某一部分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触动整个世界经济,那是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它要求不仅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国家中,在大多数工业发达的国家中一定的状态,因为不然的话就必然会发生那些还没有作好准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同那些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是否能够同列宁一起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国际义务等等，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或者是我们的落后性必定要把我们拉向毁灭？问题就是这样。同目前的反对派的分歧的历史证明，情况正是这样的。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最初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无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技术经济基础落后^①。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问题并不象骤然看来那样简单，我们必须区别对问题的正确提法和不正确的提法。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得这样细？为什么我们必须一方面提出关于同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干涉以及战争等等作斗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把这个问题同关于我们的力量的内部配合问题分开，而在实际生活中二者是共同前进并且事实上不可分割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一系列非常有份量、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确实，如果我们面临着一定的和平发展时期，比如说有几年的时间，那么，按照这样的问题提法，说什么由于我国技术经济的落后性，由于我国的农民太多，我们不可避免地在这整个的和平时期内必定在蜕化的中心线上运动。如果对于列宁在分析了我国发展的内部力量之后给予肯定的回答的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就必须毫无例外地对一切表示怀疑：我们的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的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我们国家的进程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如果我们由于

^① 现在斯米尔加同志也随声附和加米涅夫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核心”是关于“在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斯米尔加同志恰恰是强调落后，并从这种落后得出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这里所说的不是困难，而恰恰是不可能。这的确是“列宁主义”！（参看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讨论的速记记录；另外参看斯列普科夫同志的文章《反对派经济纲领中的矛盾》，《真理报》第232号。）

很明显，这是怎样的国际性，它是怎样得到论证的。请看：“不要进行革命，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会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国际革命在这里表现为某种一次性的行动；似乎各国无产阶级会一下子走上历史舞台并且喊道：“革命万岁！”而社会主义就会马上被放在盘子里端给他们。实际上，这种世界革命咒语的政治含义在于说教：“不要走在前面，不要在一国进行革命，因为你反正得不到胜利”，或者翻译成更现代化的语言：“你怎么敢一个人在愚人城里在一条街上建设社会主义！你为什么采取这种民族的狭隘观点？”“你在一国开始革命，你就不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李伯尔这样教训我们。

这样的“国际主义”是社会叛变行为的另一面。

我们再重复一遍。争论的是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同国外有关的危险问题。因此，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当我们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一国”就是指我国。我们不能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譬如说，如果我们面前是某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没有我国所具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里指的是我国，以及它的全部特点，它的技术、经济，它的社会阶级对比关系，它的无产阶级，它的农民，还有这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一定对比关系。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而按照这样的提法，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既然我国革命要求的对比关系，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比关系是一样的，既然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决没有这样的时刻，从那一时刻开始这种建设似乎会变得不可能。如果在我们国内有这样的力量配合，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年比一年取得优势，我们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比私人资本主义成

分发展得更快，那么我们的力量将一年比一年取得优势。如果撇开一系列互相抵销的各种可能的曲折和形形色色的偶然事情，而“按平均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发展将沿着上升的路线。完全不明白，从国内怎么会产生将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不可能的力量。但是由于实际上不是只有在苏联的领土上进行生活，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处在某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是占据世界的六分之一，处在资本主义的六分之五的包围之中，因此就产生一系列国际性质的危险。如果提出问题，是否有防止可能出现的干涉的绝对保障，那必须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保障。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一切都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所以，当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我们一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其他同志把这一思想“归结为”由于我国技术落后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错误的，必须用全部力量反对这种观点。必须同这种解释进行斗争，因为否则就不能捍卫列宁同志制定的路线。关于在“一条街上”、在“愚昧之乡”、在“愚人城”的社会主义等等的嘲笑应该使真正的革命者感到厌恶。人们以为，这些恶劣的玩笑十分机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简直可悲，因为他们只是重复考茨基关于“土耳其斯坦社会主义”、希法亭关于“布哈拉的毛拉社会主义”之类的俏皮话。似乎在这些社会民主党的笑谑下面包含着革命的国际主义，这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在困难的时刻擅离岗位的一般的逃兵行为。

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同我国的技术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们必须为我国的基本开支寻找资金联系在一起的，最后，是同发展速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速度较低于在欧洲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速度。当然，这个胜利的革命会使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我国工业化速度经过一定时

期之后会大大加快；我们会不得不按另一种方法改组我们的生产力；我们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式“划分区域”和“编制计划”；我们会得到另一种城乡之间的对比关系；我们会迅速得多地把我国落后的农业吸引到工业影响的范围里来。总之，速度就会大大加快。而我们现在前进的速度慢得多。但是，这种比较（同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欧洲经济的速度相比）慢的速度不是否认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速度只是表明我国建设工作的相对巨大的困难。

必须这样解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同某些更带普遍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可以提到一件事。早在1923年的争论中，我们就说过：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是正确的，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会同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就要使我们得出一些非常重大的结论。要知道，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就会得到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因为，当无产阶级将来在英国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要同印度以及其他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如果无产阶级将来在法国取得政权，它势必要同非洲打交道。如果无产阶级将来在全世界取得政权，它势必要同所有的其他的农民国家打交道。世界无产阶级势必要解决怎样同世界农民和睦共处的问题。如果这里的对比关系大致同在苏联一样，那么，在根据没有外部援助必然灭亡的理论作出相应结论之后，不管是否愿意，就会得出库诺的问题提法，说什么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农民，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们“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光是在中国就有四亿农民，所以革命“必然”注定要失败；要知道根本得不到来自外部的“国家援助”。这就是反对派的理论所得出的结果。如果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只是因为没

有把问题考虑彻底，而半途停顿下来，当谈到英国的时候，只看到伦敦、曼彻斯特，而忘记目前还追随英国的其他各洲，抱着半蔑视的态度置数量巨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于不顾，从而表现出自己的道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它的动力等等的问题有着极为重大的实际的世界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反对派的思想根源无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当然，不应生硬地简单地理解这一点。反对派的领袖们当然不是孟什维克；但是他们有朝着孟什维主义方向发展的倾向。他们在“帮助”孟什维克魔鬼，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从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出预言我们失败的某种不可改变的需要。大家知道，反对派联盟的组成部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施略普尼柯夫集团在十月期间预言过这种失败。因此他们的立场被列宁称为“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在1921年春也预言过这种失败（尤其是托洛茨基同志）。1923年秋又预言过这种失败（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党，预言这种失败。所有这些相继遭到破产的“预言”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根据的，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否认我国革命客观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

写于1926年。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6年第19—20期第28—59页。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全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我首先想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提几点粗浅的意见。我要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因为注意到托洛茨基同志说过，季诺维也夫同志“非常好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的荒谬性。

首先提一个形式性质的小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他并不打算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他仅仅是希望维护自己的“思想”。但是，在这些思想上，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有很大一部分已被我们党解决了。现在维护自己的思想就是意味着用把我们党的决议置之度外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思想。当然，托洛茨基同志形式上有权力这样做，但是，用德国话和用一切其他国家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上诉。

至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情况，第五次代表大会邀请过托洛茨基同志发言，而既然他没有讲，那这一沉默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谴责”。但是，这一次全会及其主席团没有邀请托洛茨基同志。这样一来，从形式上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既然托洛茨基同志一般地提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那他最好不要对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对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保持沉默。托洛茨基同志以第五次代表大会为借口，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第二个意见是涉及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声

称，在列宁同其他同志的一切重要分歧中，列宁始终都是原则正确的。这是对的。我们认为，不断革命论也是属于这样一些带有分歧的问题，列宁在这里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今天的发言里说他看到不断革命论仅仅有某种“缺陷”。他说他过去没有发现不断革命论中的这些不足之处。说客气一点，这相当不明确。如果您说的仅仅是实际正确的理论的某些“缺陷”和某些“不足”，那就是说似乎整个理论是不可更动的。托洛茨基同志说，诚然，正象经验已证明的那样，它有某些缺陷。但这仅仅是缺陷，不过如此。可以说，托洛茨基同志知道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种承认还远远不够。托洛茨基同志在评价这整个理论时，从未声明它是不正确的。这类声明我们过去未听说过，而且在托洛茨基同志今天的发言里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这是第二个意见。

我的第三个意见带有非常粗浅的性质。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说没有必要查考一些同志的履历。可是他刚说完这句话，就拚命地查考起曼努伊尔斯基和佩珀同志的履历来。至于说佩珀同志的履历，特别是从他鼓吹把门罗的理论应用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来看，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自然指的不光是佩珀同志，而且还包括其他同志。但是，如果我们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能象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条件下生活得一样好（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那也不算坏。不过那样我们就得为我们的扩张而操心了。

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履历、生平和事业，他顺便插了一句话，说他在美国坚持了一条同列宁一样的路线，甚至几乎胜于这一路线。这是不对的，可以说我是一个活的证据，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托洛茨基同志在美国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激烈反对者，我想他不会否认这一点。他曾多次以讽刺的口吻问我：你们是否在北极也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大家知道，尽管美国不在北极）。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立场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托洛茨基同志在美国反

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而如今又把这一点叫做“实行列宁的政策”。还是说客气一点，这是因为说了大话而“稍微偏离了真理”。

现在谈谈关于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我们这里也有世界经济的均衡化和发展的过程等等。二乘二等于四，这是最起码的真理。谁也不会去争论这个。托洛茨基同志接着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完全忽视了均衡的趋势。这是不对的。谁也不会这样认为。

托洛茨基同志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过于轻率，过于简单化，他在评价我们苏联的状况时，还是采取过分简单化的解释问题的态度。他在这里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我们越是发展，我们就越是要依赖世界经济。他讲到此为止。这仅仅是一半真理，因此是不正确的。为什么？由于世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发展的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这是一种不正确的问题提法。如果我们只抓住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苏联状况的论断的一半，那我们会得出怎样的前途呢？

这个前途就是变苏联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为它的附庸。

（喊声：“对！”）

如此而已。可是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同志的逻辑体系中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当然，绝对正确，过去的俄国依赖过国外资本，——二二得四！我们进口过各种机器，——二二得四！我们出口过粮食，——二二得四！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听起来使人非常开心，但是他讲的那些话的严肃性，则完全不可信。

然而，托洛茨基同志还援引了另一个论据。他说，不应该践踏

我们的全部经济史。一个革命者是否能够肯定这些东西呢？在十月，我们相当用力地“践踏了我们的经济史”。（笑声）这种说法有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在经济发展中不会有任何一定的“飞跃”，发展的方向不会有什么改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使历史“抽象化”。因为我们是以前我们的过去为起点前进的。但是如果把我们“引向”这样的论断，即说什么我们“不应该践踏我们的经济史”，那也未免有点“过份”，这是不对的，这是否定革命的转折，这是回到已经走过的历史阶段。这样提问题过份简单化，因而是错误的。

现在谈谈对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最后一个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对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用自身的力量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论点进行了驳斥。他在这里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战胜了我国资产阶级。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说法里，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他忽略了“经济上”这个词。斯大林同志讲的不是政治上战胜，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这我们已做到了，在十月就已不顾某些同志的某种反对这样做了，而且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帮助。要证明这种情况——同样没有什么新奇。二二得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用我们自身的力量在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在我们的批发和零售商业中，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挤掉。甚至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我们要制止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不断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不断发展。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任务，难道这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吗？否则这会意味着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的“小错误”，一个“小小错误”就是忽略了“经济上”这个词。而这个词恰恰是一个决定性的词。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者说，用自己本身

的力量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我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总之，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是完全正确的。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意见里还有另一个错误。他讲了关于国家的消亡，把国家已不再存在这种情况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其实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已经完全实现了的共产主义。但是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这样一些“色调”和“细节”，我不准备讲，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也该好好去“分析”它们。

例如，如果我们纯理论地设想我们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已处在消亡阶段；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会有这样的形势出现，并因而不得不拥有军队，那么，这支军队自然就会是一支非常独特的军队，是一支没有阶级基础的军队。这支军队的职能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义务，而不是国家的工具。这是“武装的人民”，而不是国家的军队。

这就是我认为有必要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提出的几点意见，因为他抓住了“自己的”题目，而没有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加以发挥。下面我要结合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对他的一些问题上的主要论据具体地予以答复，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争论的那些课题。

现在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其中要涉及到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我还是要提几个形式性质的意见。

很遗憾，我象其他同志一样，没能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速记记录通读一遍，尽管同志们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念完了自己的发言稿，因而稿子是现成的。但是手稿被留下来，看来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这个发言和准备回答这个发言。这可以说是一种

表现在小事情上的虚伪态度。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

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及托洛茨基同志说他们不“申诉”。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们在这里引证了俄共中央的决议。但是决议里白纸黑字分明是说，我们的中央认为这种发言是一种申诉，尽管这些同志自然在形式上有权发言。实际上是在申诉，可是“形式上”却在声明：“我们不是申诉”。这不是什么“端正的”态度。

现在谈谈发言的政治方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我不进行派别斗争”。但实际上情况怎样呢？在全会上的这次发言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意味着国际规模的派别斗争的继续。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开场白里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话，是因为许多年来他都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如果沉默不语，未免有点不得体。好吧，就算这是一个“论据”。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是以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很迫切”作为自己发言的理由的。加米涅夫同志也报名要发言，这是不是因为他是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呢？

准备发言的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派的同志。现在总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可以说这些同志已经写好了一个完整的反对派政纲。第一部分已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按照打印好了的稿子作了宣读。第二部分是由托洛茨基同志宣讲的。第三部分可能由加米涅夫同志宣读或者宣讲。而另外的人还将作一些各种各样的“补充”。这种发言所抱的目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并不是无的放矢。在共产国际里，最有力量的反对派除了我们党内的反对派，就数德国党内的反对派了。它明显地证明了自己对意识形态产品的完全无能，它需要国际上的支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联共(布)反对派方面的国家援助”(笑声)，没有这一帮助，德国党内的反对派就“注定要完蛋”，无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和非布尔什

维主义阶层的代表人物在那里就要灭亡。在这一点上不断革命的理论也胜利了。“为了装饰门面”，这些同志说他们不是进行派别斗争，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准备新的、尖锐的、更大规模的派别斗争。这一斗争能否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是作了这样的尝试的，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怀疑。

这又是虚伪，而且是政治上的虚伪。这是一种外交手腕，这不是公开的政治路线。

在其他方面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我说过：几乎在讨论每一个稍微大一些的问题时，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模棱两可，这种闪烁其词是一贯的。不妨以稳定问题为例：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向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他在自己的一次讲话中同时谈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承认”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它。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也不止一次地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这让我们怎样理解呢？这种游戏是什么用意呢？其用意在于：从真实情况出发，反对派不能不承认局部的稳定，但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左派”，又不能不否认它。最后随着情况的复杂化，季诺维也夫同志将会说：“我早就说过没有任何稳定”。或者说：“我早就说过存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或者说：“我们曾正确地预言过”。如此等等。这很巧妙，但是过分露骨。可见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也在搞一些政治虚伪举动。

我现在谈谈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有名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几乎象在一切其他问题上一样，极其努力地贯彻着某种既定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于改变问题本身的提法，在于他们提出争论的不是主要的和根本的分歧问题，而是争论以外的一些问题。做得巧妙得“可怕”。我认为我自己有责任揭露这种手法，并且指出，我们对待任

务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坚强的信念和一定的路线，而我们的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在玩弄模棱两可的游戏。我将从一段引文里指出这一点，我想我会受到全会成员的感激，因为全部报告只局限于一段引文，而且这段引文是来自季诺维也夫同志。

这种声东击西的做法表现在哪里呢？这正是我们所要谈的。

第一，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俄国革命的国际性，这一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在我们党内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同志，硬说我们持有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是他们要弄的一个花招。其实，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我们的革命是，而且一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个情况就象二二得四一样，是一个定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他们把我们完全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们。这是对我们全党的诽谤。

第二，我们还承认另一条定理，就是说，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的实际胜利没有其他国家和世界革命的援助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革命才能解决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说我们持相反的观点，——这又是对我们全党的诽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同反对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是为什么他们硬说我们持相反的观点呢？是为了把同志们的注意力从根本的争论问题上转移到其他的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论的问题上来。在这场游戏中，他们打出了引文这张王牌。引文——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当引得正确的时候。（笑声）这一点同样应该指出。引文——本身好得很，但是遗憾的是，引文被用来证明我们谁也不否认的东西。反对派说，列宁曾主张把我们的建设同国际革命联系起来，列宁认为没有世界革命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曾持国际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很漂亮，很了不起，——我们完全同意其中的每一个原理和来自列宁的全部引文。但是不幸的是这里讲的完全不是这些。为了弄明白这里讲的是什么，我试分

别加以分析，首先尽可能把问题提明确，提清楚。为了弄清问题，需要辨明三个主要问题：

- (1) 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干涉或战争。
- (2)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和苏联。
- (3) 苏联由于内部矛盾产生的内部困难。

我想把问题分成这三部分来分析，大家会相信我们是正确的。

现在谈武装斗争、战争、干涉问题。我已经说过，在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原则性的矛盾。虽然我们处在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依赖地位，但是我们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独立。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将一天比一天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同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则矛盾也将更加尖锐。我们的革命正在为世界革命打下基础。但是，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由于它是由我们管理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结晶点。世界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是整整一个时代。当然，我希望而且知道，这个时代会大大短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但是应当记住，英国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而一系列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还要晚，更不用说在各地中海意大利共和国和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还刚刚处在萌芽状态。我们的革命时代将短得多。然而，即使在革命过程加快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望革命会在许多国家立即和同时发生。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会在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先开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将会有斗争、战争等等。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在中非确立之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大资本主义盟国之间将发生长期的战争。过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将占整整一个大的历史时代。但是历史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是：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世界要么属于我们，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最起码的一点，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等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确立。只能

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这样。资产阶级将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每一个苏维埃国家，反对每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什么保证得了我们能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平静地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呢？不言而喻，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永久共处也同样是空想。这种共处是暂时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我们的前景上看，我们和资本家之间的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断然声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胜利，或者至少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实力的一切决定性的中心的胜利。我们要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明确：没有世界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决定性的中心的胜利，要谈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这是一个特殊问题，一个另一种形式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国营工业是不是处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依赖地位呢？当然是处在这样的地位。这种依赖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在进出口方面，即在商品交换方面。第二，在信贷关系方面，第三，在租让方面。这就是我们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依赖关系的三个最主要的渠道。这对我们国内状况是否有影响呢？当然有影响。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必须与在第一种情况下有所不同。试看，如果苏联经济完全孤立，即我们的经济被全面封锁，那时会怎样。在我看来，在实践中，这种全面封锁，如没有反对我们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假定有这样的在实践中不可想象的例子，即不带有战争的全面封锁的例子。我倒希望反对派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在存在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呢？我们是否站得住呢？我们是不是肯定要毁灭呢？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呢？在这种情况下困难是否不

可克服呢？

在存在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呢？对这个问题反对派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我看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毁灭。最好反对派能在这个讲坛上公开向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做就有助于弄清问题。但是这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运用了这样的说法，“我们永远都应小心谨慎”等等。我们是永远应该“小心谨慎”，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基本属性。但是这里绝不应该“过火”。季诺维也夫同志描绘的那种危险的、我国情况复杂化的和困难增加的前景，并不能作为我们认识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的钥匙。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毁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

当然，我们是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无疑地，我们的发展速度将会减慢。但是我远不相信，即使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不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托洛茨基同志涉及了这个问题，但他忽略了一些情况。在没有封锁和孤立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发展速度一般会更快；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作个比较。把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对比一下，那情况就不同了。所以说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快。无论如何绝不能排除这一点。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专政，因为我们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计划经济。我们这里形成了不同的城乡关系。

我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独立问题。但是我敢肯定而且每分钟都能证明，我们城乡间形成的崭新关系是同较快的发展速度联系着的。我们的工业化不是使我国农业破产的手段，而相反，它是使之繁荣的手段。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城

乡间的完全不同的互助关系。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们知道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是因为那里的封建制度不发达，那里的工资比较高，因为那里的城乡关系完全不同于旧的欧洲，所以说那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我国，由于有社会主义专政，有崭新的社会关系，工业化不是使农业破产，而是使之繁荣，它不是意味着农业市场的缩小，而相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因此，发展速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由于有崭新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农业——这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决定着更快发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生产机构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建立，我们将很难摆脱所谓的商品荒。这一切都完全正确。还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困难。我同意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企图引用我的《共产主义 ABC》，但是他引得不正确。《ABC》中发挥了三个至今我们仍然维护的思想：（1）国际革命是防止战争和干涉的保证；（2）国际革命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没有它，建设将非常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3）在国内具备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提出指责，说我忘记了《共产主义 ABC》，我将十分高兴地把这句恭维话奉还给季诺维也夫同志。

还有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到我们这儿来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把世界市场这样的重要事实也否定了！马克思早已说过，国内市场价格决定于世界市场，等等，等等。

季诺维也夫同志竟有勇气说，对马克思的这些话应该通过在现实中的运用原原本本地进行理解。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对外贸易垄断制。我应该提醒您，马

克思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存在着自由竞争；只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志同道合者即主张废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还没有打破这种竞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前提也就不存在。我要再一次地强调指出：即使在存在对外贸易垄断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如果在现实情况同既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旧的自由竞争时代之间划上等号，那就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死记硬背，仅此而已。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不清现实形式的特殊性，就象他在这里“阐明的”下面的政治问题上表现的情形一样。季诺维也夫同志援引了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在某个时候说过没有英国革命的欧洲革命是“杯水风浪”。于是，您断言我国革命以及例如德国革命都是杯水风浪？在这种场合，我们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记得马克思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849年。离那时很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固然不应改动马克思的话，但是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新的形势，那我们就会按照季诺维也夫的办法去援引马克思的话，说什么马克思说过大陆的革命是“杯水风浪”。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欧洲大陆的革命在那时还很不发达。他忘记了那时是英国垄断世界市场，而现在它已丧失这种垄断。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那时在俄国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那时资本主义是在上升，而现在它已处在衰落阶段。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来都是“鸡毛蒜皮”，所以他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即在以世界经济为一方和以我们苏联经济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在存在极其尖锐的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绝不是一定要毁灭的。我们将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造成巨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

可克服的。至于说资本家对我们发动全面战争，那我们还保证不了我们一定能站得住。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倾覆和炸毁将首先提供这样的保证。

第三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整个争论的重心。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概括：在这样的国内条件下，可能还是不可能在国内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由于我国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毁灭。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否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没有，提得非常清楚。按照我的提法，这是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或者按斯大林同志的提法，这是关于在经济上战胜我们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问题。能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吗？不能。在第十四次党的代表会议前夕，加米涅夫同志说过，由于我国技术落后，我们注定要毁灭。斯米尔加同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也说，由于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没有西欧国家的帮助，我们注定要灭亡。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里（托洛茨基同志至今仍在鼓吹这种理论），同样在说，由于我们经济落后，没有世界革命，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毁灭。于是就出现了“在一条街”、“在一栋房子里”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论调，臭味相投的论调。这是迎合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试问：我们实际上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这里出现了一些客观物质性质的问题（关于建设的经济基础，这种基础对这一建设够不够的问题），以及关于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各种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和各阶级的现存相互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声称：在存在象俄国那样的前提下，即在工业不发达和农民经济在经济中占优势的情况下，谁要认为在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个乌托邦分子。因此，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发生了革命，那客观发展规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资本主义

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际中出现并加强。难道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对派能十分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国是否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这就是争论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革命是“民族的”，或者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上面争论完全是多余的。只有假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反对把我国革命视为国际革命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问题有一个回答，而且是明确的回答，可是反对派不给我们明确的回答。

正是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清楚的，绝对清楚的。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用了列宁的两段引文：第一，说是在我国，我们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不被干涉和战争所扼杀，我们就一定会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列宁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反对派断言，这样割裂问题是不可以的，这是“烦琐哲学”。反对派的同志们，如果说这是烦琐哲学，那就请你们去找列宁，是他说的“如果”（如果我们不被扼杀），即公然割裂了问题。这如何解释呢？在反对派同志当中，谁都只字不提列宁这些决定性的引文。

我明白，引证导师（“导师说”）的言论还不是充足的论据。列宁有时也“犯过错误”，正象托洛茨基同志为了原谅自己的错误而发现的那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中间立场是没有的。由于我们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否面临着灭亡和蜕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那就请你们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由可能到变成不可能的界线和起点。如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有了前提、起点、足够的基础和甚至相当的成就，那又到了哪一点上一切都要开始“反过来”？这样的界线是没有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指出说，这个问题“未讨论过”，如此等等。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讨论过，而且相应的决议，即按照我们的精神起草的决议，由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内的全体同志所一致通过。

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厉害的还在后面。我要给大家援引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引了列宁的话之后所讲的一段原话是这样：

“非常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如果我们能保证不受国际上的干预，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甚至只靠合作化的帮助，也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 237 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论述。这里还提出了关于稳定的问题。任何一个好的领导也应成为一个好的预言家。所以他们能预言一切可能的事情，列出全部“赞成”和“反对”，全部“半赞成”和“半反对”，因为他事先相信，不管你怎样扭转，“可能性”之一总归是一定要实现的。等到过了多少年以后，人们会走过来说：我正确地预言了关于稳定问题，我“曾经”预料到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路线，等等。于是，人们就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是各种在意思上完全相反的说法，以便后来好引证。他们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绝对免不了再过多少年以后，总有一天季诺维也夫同志会走到我们面前说：“我总是这么说的。是不是愿意再看一看我的这段引文！”

（会议主席提醒布哈林同志注意他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我尽量快点把这个问题讲完。

如果我们的反对派在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所鼓吹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是正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关于我们蜕化的不

可避免性的理论也是正确的。如果要建成社会主义，我们的力量还太弱，而国际革命又不能及时发生，那我们就不能不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先是一个让步，然后是第二个让步，再往后又是第三个让步；我们将被迫节节后退；可是这总不能无止无休地继续下去。量变迟早会转为质变。最后终于出现了蜕化的时刻。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理论基础。

季诺维也夫同志援引了我在《进攻》文集中关于蜕化的文章。我现在仍然确认这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出自我手。但是这是同这个问题无关的。我在那里谈的是完全另外的问题，不仅谈了我们蜕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谈了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倾向，其中任何一个革命所包含的危险。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事情真妙！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都出来讲话了，明天也许加米涅夫同志也会出来补充，而他们所有的人都闭口不谈他们从前的立场是怎样的。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诚实的。对“热月”——默不作声；对“富农政策”——默不作声；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我们的政策间的分歧”——默不作声。而我们在这里需要的是明确的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我们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也试图对此避而不谈。其实我同他们那时就争论过。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许还没有忘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不作任何回答呢？显然我们的反对派又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我们现在继续讲。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中央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指的是1925年的秋季）？当时他们说：矛盾在异乎寻常地发展，而党中央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还说：手中集中了几乎全部余粮的富农对我们组织“粮食罢工”。所以粮食收购情况不佳。所有这一切，大家都听说过。有人写文章谈了“富农的粮食罢工”；加米涅夫同志讲了富农如何按照自己的利益“调节”我们的计划，并把这一点视为主要的危险。反对派认为一切其他现象

都仅仅是这一主要现象的政治表现。接着这些同志纷纷出来说，富农更强大了，危险更加深了。同志们，如果第一种和第二种论断是正确的，那在今年我们这里就会发生更强有力的反对无产阶级的“富农罢工”。可是在实际上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十月份的粮食收购数字比去年的数字高，十一月份的数字比去年同期超过了5 000万普特，收购总数已比去年增加了35%，这是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就。而按照反对派的说法，一切都应相反。反对派污蔑说我们帮助富农发展经济，我们连连让步，我们帮助富农组织粮食罢工，而实际结果却证明相反。也许他们会说这是奇迹。的确，“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难道不也是奇迹的时代吗？

可见错了的不是我们，而是反对派。他们对阶级力量、对经济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们在这里也失算了，就象他们在“飞机仪表厂”失算了一样。反对派主要经济理论的基础本身垮台了。反对派的假意识形态和主要风浪在这个领域里也完全被粉碎了。

现在谈一谈关于“热月”问题。在反对派对我国发展的这种看法中隐藏着反革命思想的萌芽。我说得很尖锐，但这是事实，并且我说得十分谨慎：“萌芽”。第二，坚持这种论调的同志自然完全避而不谈他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原理。而这仍然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关系的。关于“热月”稍说几句。马尔托夫早在1921年就在谈论这一问题，而我们忘记了世上的一切马尔托夫分子！但是反对派重新谈起这一点，可能是因为马尔托夫已经死掉，按照通常的说法，他需要“接班人”。我们来从实质上分析一下问题。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取得了胜利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之所以取得了胜利，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最大的经济王牌掌握在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它是大生产的代表者，而雅各宾党人专政维护的是小生产的利益。于是小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政治作用和它的小生产理想之间的这个矛盾不可避

免地必定导致大资产阶级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发达，还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和领导的革命力量出现。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怎样呢？那些高谈“热月”的同志，请给我说明说明这个问题。请给我解释解释，最进步的经济原则是支持哪一方？在我们这里谈论“热月”，那是绝对荒谬和在经济上的无知。只要对法国革命和我们的历史有最起码的知识，就足以看出，在我们这里谈论热月是十分荒谬的，并证明其肤浅、庸俗化和地道的无知。另外一个问题是富农危险问题，据说富农会把我们推翻，等等。不用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是，我想请求指责我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给我解释解释下述情况：大工业生产掌握在我们手中；中等生产的一些不大的孤岛掌握在私营者手中；在商业方面，批发商业掌握在我们手中，而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的是一部分零售商业。苏维埃经济，合作社的主要杠杆，经济命脉掌握在我们手中。想知道一下，谈论小生产者在我国战胜大生产的危险可能性（仿佛是必然性）的同志们根据的是什么立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些同志（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同我进行争论的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例如，我说过，如果富农把自己的钱存入我们的储蓄银行，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危险，因为我们将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使用他的钱。而这些同志说，这种“长入理论”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富农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我们，等等。但是，同志们，请回想一下所谓的“资本民主化”的理论吧。这个理论的创造者是伯恩斯坦，现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到处宣扬这个理论。伯恩斯坦说过，既然女厨娘将把自己的积蓄存入资本家的银行或者用这些积蓄购买股票，那么资本将民主化，换句话说，下层人民将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资本，并削弱大资本而和平地掌握经济。

大工业掌握在我们手中，我国的全部银行已经社会化。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大生产。请给我解释解释，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是不

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资本民主化”的理论呢？只有在他们那里，不是弱小的人反对资本家，而是民主富农和小商人“渗进”无产阶级的大生产。在我看来，就是在这里，胜利也将归于大生产一边。集中起来的力量必定要取得胜利。另外的看法完全是根据修正主义的前提得出的。在这个反对派的问题提法中没有一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成分。我们胜利的信心根源于马克思关于大生产的优越性的学说。此外，我们有资本主义世界所没有的而且也办不到的工业计划管理。这就是我们坚信我们的立场正确的根据。

可见，至于谈到所有这些论调的理论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活，而且渗进了伯恩斯坦主义的因素，所以，只要把镜子递给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他们就会看到真正的修正主义在哪里。

关于我们蜕化的危险性问题，我不想多谈。据我看来，我们蜕化的危险性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官僚化现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而提高价格的政策只是促进了这种官僚化罢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决不是这种提高价格政策的拥护者。但是，皮达可夫同志坚决主张提高价格，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支持他。要知道，他们是个联盟；如果他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不是一致的，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敢说出这一点，不愿让人知道联盟是在重重困难中建立的。

对于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玩弄列宁的引文问题，我不准备多谈。这里只讲几句。例如，战争初期，列宁曾写过我们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则硬说列宁主张民主共和国，他摆出一幅样子，似乎从那时起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在暗暗维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所犯的十月的错误，如此而已。

（听众席上的喊声：“完全正确。”）

如果你们这样想，那么由于国家落后而蜕化的理论不外是以新的形式重犯这些错误。

我快要讲完了，尽管我本应涉及其他各种问题，例如，对农民的态度问题，等等。

季诺维也夫同志涉及了若干专门性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他提醒说，“左派”遭受排挤，右派却受到“赏识”。我想就这一点讲两句。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否真的同意过致德国党的“公开信”呢？他有一次说过，“公开信”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文件之一。“公开信”（我也属于此信的作者之一）中难道没有说过所谓的“极左”分子在其对苏联的态度上反映了“面向西方”的资产阶级方针？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这一点完全正确，而且无比恰当。

现在我要问你们：德国资产阶级西方方针的这种露骨的倾向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无疑是加强了。而其表现呢？无疑地，它也加强了。不难理解由此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结论就是：所谓极左倾向从前在我们党的范围内是可以容许的，而现在则已经成为不能容许的了。我指的是柯尔什，我指的是施瓦尔茨和那些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从前那些相当“体面的”领袖人物。如果看不到这些变化，那是愚蠢的。情况就是这样，即只好去谈论反苏的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集团。我们相信，苏联是一切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结晶点。我们对这些极左倾向的严厉态度也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柯尔什分子，半柯尔什分子在无产阶级-共产党内是不可能容许的，因为在这里，“左的”倾向正在变成真正的反革命。（掌声）

至于说右的倾向，那么我要问你们，真能指责说我们对右的倾向抱容忍态度吗？我们最尖锐地批评了波兰党，比季诺维也夫同志要更尖锐些。我们批评了英国党的某些错误，而英国党也承认了这些错误。我们成功地摆脱了纠纷和说服了同志，这样好还是

不好呢？不言而喻，这样非常好。即使象路特·费舍这样的人，如果她真心诚意地及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我们本来是不会把她开除的。但是她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她不承认错误，同样，德国的所谓极左派领袖也不承认错误，所以我们也开除了他们。路特·费舍等人在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他们在向柯尔什方向发展。这是事实。我们批评了所有右的倾向，并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苏瓦林这个右倾叛徒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说道：我“只是”建议不要把苏瓦林派到英国，而要把他派到中国。孩子虽小，但不能否认他的存在。比方说，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何不建议我们把考茨基派到爪哇去呢？在爪哇正在举行起义。说不定考茨基先生能够纠正爪哇共产党人的错误呢？现在有人建议派苏瓦林去中国。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成了派出地点了呢？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中国面临着全部世界革命问题，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全会上都这样认为。应当把最革命、最能干、最忠于共产国际的同志派到中国去。（掌声）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建议过派苏瓦林同志不是去英国，而是去中国。敬谢建议！

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败坏和滥用自己的仁慈。

最后我想说几句。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我们党内的反对派同志本来是可以在这里讲话的。——自然，他们是想“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共产国际主席职务期间的工作”发表一个声明。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全部重心在于反对派同志要努力把经过周密研究的纲领推荐给包括被开除者在内的整个反对派。这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发言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回答，我想执行委员会定会作出这样的回答。这一回答将被写进决议。各国党现在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们不是信心不足，而是坚定地相信苏联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它们已经团结起来，决不容忍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袭击。同志们，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只

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使共产国际沿着国际革命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如此。这一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我们要坚持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方针,一直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全会速记记录)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106—121页。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 革命的建设时期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唯物主义革命辩证法，其基本要求之一是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和独有特征中去考察该历史时期。这些专有的、特殊的、只是具体历史时期才具有的特点就是所谓时代的“本质”，或者用流行的、庸俗唯心主义的话来说，叫做时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完美的科学理论，是因为它不是“教条”，也就是说，它不是把现成原理和现成药方僵硬地汇集起来，而说明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运动、发展、变革和激烈的、根本的、有时是灾难性变化的任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认识方法，它首先考察的正是这些变化，因此，它是最敏锐的认识工具。所以，分析具体事物，是进行任何马克思主义概括的首要前提，玩弄凭空臆造的“定义”、“原理”和死板的“分类”和“公式”等等，都是同这种概括格格不入和水火不相容的。而在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的大堆著作中却充满着这类东西。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要进行概括。相反，它是概括的科学思想的最高体现。但是，它的概括并不是死板的“空洞的”抽象，而是生活的结晶，历史过程的“精华”。

作为变化着的人类社会的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并从理论上“揭穿”了。现在，简直是所有的人，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其反对者，都在谈论“资本主义”。但是，不应当忘记，有过一个时候，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曾经嘲

笑“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和阶级等概念。只有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发展进程才“把辩证法印入了”甚至是许多资产者的“头颅”。

帝国主义，这个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内在矛盾尖锐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特殊形态，也同样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阐明。列宁主义就是已经丰富的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它从理论上“揭穿”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种种特殊的、独有的特点，也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到最紧张的程度，使历史过程导致新社会制度得以产生的灾变的种种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接近于把帝国主义看作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一些非列宁主义者，都在半路上停下来，接着就慌忙地向后跑。例如希法亭，他在结束《金融资本》一书时预言过“巨大的冲突”，而在这一冲突中“金融资本专政将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变成了国际联盟的鼓吹者和歌颂者，象逃避瘟疫那样地避开无产阶级专政。

昔日梦中闪现的幻想，
在烽火轰鸣中实现了……
为什么，你们要投出
林中惊蹙的那种疑惧眼光？
为什么，你们还不赶快投入事变的漩涡
去享受那大风暴的快乐？
又为什么，总是忧愁地把过去当作天国来留恋？

这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瓦列里·勃柳索夫对知识分子所写的诗句。唉！半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仅暴露了“林中惊蹙”的特性，而且变成了投入空前的历史搏斗的伟大阶级的公开叛徒。只有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帝国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问题。

然而，我们时代的历史已经划出了继续前进的犁沟。它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大国里诞生，使这个专政巩固起来，开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大概在历史上还没有过比以1917年的十月街垒为标志的历史分界线更大的分界线。如果说，这一具有特别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由于打破了世界经济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根本统一，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国际局势，那么，另一方面，它直接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未曾碰到过，而在理论上只是非常一般地表述过的任务。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个别的但毕竟是很大的战线上，这一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就其最基本的东西和最深刻的“本质”来说，根本不同于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整理这一时期的经验，是列宁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列宁主义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而作出的最新贡献。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是变革的理论。这是彻底破坏性的、“瓦解性的”理论。它的这一性质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本身、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明显的特点中产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立的统一体”。它象任何社会一样，也是一个“统一体”，是某种整体，这个整体的所有部分都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它们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发展，而不能存在于这种依存关系之外。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而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体”。它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是基本的对抗。这个社会发展的性质也是根特别的，它的发展实质上就是这些矛盾的扩大和加深。如果要谈“社会发展的总路线”，那么这是一条“资本主义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路线，首先是一条阶级斗争扩大和加深的路线。到什么限度为止？到什么界限为止？直到这些矛盾把社会分裂开来、破坏它的统一为止。而破坏这种统一，即破坏旧社会，

也就是革命。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辩护(辩解)，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学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抱住统一因素不放，也就是说，忽视对立因素——他们也不可能不这样。他们的实际利益在于用一切办法来抹煞和掩饰阶级斗争。他们的理论思想忠顺地服从于这一“实践理性”。正因为如此，一切关于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都毫无例外地是反革命的；例如，社会学中的“有机学派”是这样，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例如巴师夏的《经济的谐和》或奥地利学派，或英美的政治经济学家等等可作参考)。相反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正是把理论的重点放在矛盾上，放在“对立”上。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在于通过加深和加剧阶级斗争来战胜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是实际的客观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过程的客观趋势，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理论。

既然马克思主义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那么，不难了解，概括性的实践口号是沿着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方向发展并以国内战争的口号为终点的。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阶级合作”、“国内和平”、“缓和劳资斗争”、“工业和平”以及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用以欺骗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诸如此类胡说八道更可恶的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革命可以利用改良本身作为新斗争的据点。其目的在于加剧对立，打破社会的“统一”，分裂社会，发动将成为新的“统一”即新的社会历史制度的起点的革命。

这样就为在新道路上的发展创造和巩固了基本前提，现在必须认识这些道路和这一发展时期的特殊性。人们由于不懂得这个特殊性，犯过多少错误，采取过多少重大步骤，提出过多少荒谬的

理论“原理”啊！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社会或者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是“对立的统一体”，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所依靠的是彼此矛盾着的经济形态。然而，整个的社会进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如果就这一时期发展的最一般形式而论，那么这将不是矛盾的扩大和加深，而是矛盾的缓和；“最后”阶段将不是社会的炸毁，不是社会的解体，而是社会的统一——通过矛盾的消亡和克服而得到最大的巩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一”因素让位给“对立”因素，而且后者将在这个社会的崩溃中获得自己的最后胜利。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统一因素越来越压倒对立因素，而且正是这个统一因素，最后将在永远消灭过去时代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达到它的终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是这些矛盾的缩小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问题在于进行强力的革命摧毁。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社会向高级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进化的过程。新时期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这种区别是同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根本不同的阶级配置联系着的。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强调的是统一的因素。但这是一种辩护吗？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辩护。但是，这些老爱玩弄“辩护”这个词儿的人们却不懂得，如果他们由于这种“辩护”而责备我们，他们将会掉进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博学”深渊。因为，为资本主义辩护是一回事，而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本身会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辩护则会变成对共产主义的辩护。

这就是发展的总路线。但这一路线只是发展趋势的最一般的表达。如果看不到那些在更短时期中和在历史道路的具体曲折中

部分地改变这种趋势的特殊条件，那就是最大的轻率。

让我们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吧。难道那里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使阶级对立尖锐化的基本路线缓和或者甚至暂时失去作用的趋势吗？当然，这样的时期是有过的。在资本主义早期，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主人”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在资本主义末期，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是怎样在收买、殖民地超额利润和（思想上的）所谓“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在一个时期这些趋势是存在的，部分地甚至获得胜利。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逻辑归根到底要给它们以致命的打击，而使“和平生活”转变为革命风暴的基本规律，会猛烈地爆发出来。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但是，这决不排斥这些矛盾在一定发展时期内的尖锐化。生活是这样复杂，仅仅自我满足于问题的一般提法，即使这是绝对必要的提法，那也会是完全不科学的、荒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这样的提法是必要的，但是不够。在发展的初期，当重心还在于某种比较公开和尖锐的冲突的时候，一个时期的矛盾尖锐化可以说是一种规律。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排斥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这里需要对具体形势进行具体分析。

然而，发展的总路线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行动的总路线的基础。因为既然无产阶级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所以，许多问题的提法可以说就“倒过来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于推翻“社会整体”，即推翻它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相反地，工人阶级或其个别部分的“直接”利益，可以使它留恋这个社会。牺牲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推崇直接的、暂时的和一时的利益（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是机会主义的基础。

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就是巩固社会，加强它的统一，在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日益增大的基础上克服矛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在这里行会的、暂时的和集团的利益会同基本的、共同的和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例如，由于关闭“自由港口”和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在职人员的人数可能有所减少；实行社会主义合理化等等，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后果。在这种场合下，重视行会的和暂时的利益而忽略共同的和基本的利益，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等的基础。显然，资本主义时期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的提法是截然相反的：在一种情况下，革命观点是炸毁社会的路线，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巩固社会的路线；在一种情况下，是加剧矛盾的路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克服矛盾（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基础上克服）的路线。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整体”的领袖和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在过渡的社会里，则是无产阶级。在这里，无产阶级不单纯是一个每时每刻为自己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得到最大份额而斗争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这里是一个为社会命运负责的社会领导者。它对待经济、对待经济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对待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不同的态度。

非常清楚，无产阶级现在对待大工业的态度完全不同，它是这个大工业的共同“主人”。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它不能总是抱着使自己得到最高份额的收入的那种观点，因为它应当交出收入的一部分来作“积累基金”。

但是，问题还不仅在这里。无产阶级还必须关心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的结合，经济的（从而也是任何其他方面的）发展进程就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分配全部国民收入的时候，现在无产阶级不能持这种观点：从农民那里取得越多越好。这里主要的问题也完全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尽可能多取。这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没有承担关心社会发

展的责任。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保证适当的发展速度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最高速度的增长。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正确的路线，机械地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那就是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因为，归根到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恰恰不是取决于当前从全部国民收入中取得最多的份额，而是取决于在最快的城乡流通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同资产阶级“合作”。这一情况特别清楚地说明了现在问题提法的整个原则性差别。如果说要在这个时候按最高原则进行分配，那就必须立即没收新资产阶级的全部利润和资本。在技术上这是做得到的。然而，正因为考虑到发展的前途，我们才有意识地容许同这个新资产阶级“合作”，以保证加速国内的经济流通，并在这个基础上系统地排挤这个资产阶级（每一次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这个唯一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统治，这种发展的新类型，将导致在各方面采取崭新的方针。既然主要的目标是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改造的社会（通过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进行改造）的统一，那么显然，国内战争的口号就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见列宁给米雅斯尼柯夫的信^①）。既然发展的类型基本上是进化发展的类型，那末显然，我们在当前实践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就可以相对地称为“改良主义的”方法（见列宁《论黄金的作用》^②一文）。因为对我们的社会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进行慎重的改造、我们的各项“改良”、我们的“建设”都不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新形式下）的继续。相反地，在我国条件下，猛烈的破坏，消灭我们的国家，加剧矛盾和炸毁社会的路线，这是反革命的路线。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1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74—581页。——编者注

这些口号、方向和政治方针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这一辩证法雄辩地说明，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阶级敌人，过去制度的保卫者，为什么成了我国现存制度的疯狂的激烈的破坏者。它说明，为什么那样和平地“爬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改良主义者，而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却是那么一些“革命者”（应读作：反革命分子）。这个辩证法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为方针的各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政党都爱护、保护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说明，为什么列宁主义教导说，我们的重心（如果撇开国际事务不说）在于“和平组织工作”（列宁语）^①。

从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随着社会民主党的笛声跳舞的共产主义“极左派”叛徒就是这样的人）的观点来看，谈论国内和平，谈论无产阶级国营经济的利益同小农经济的利益相结合（这种结合有利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大型国营经济本身），是可怕的和丧失理智的；从这种应声虫的观点来看，容许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合作（不要同在政权上的合作混为一谈，这样的合作既不可能也不会有），这就更加可怕和更加丧失理智了，这简直就是背叛、“蜕化”，等等。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态度上，“极左派”应声虫重复着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他们不懂得，这些“思想”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而前卑躬屈膝的最卑鄙行为的最坏的一面。

既然列宁主义是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它就从“摧毁性的”（“破坏的”）学说变成为“建设性的”（“建设的”）学说。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相反，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建设性的”，而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破坏性的”。在这方面，它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原则上没有任何区别，现在，它向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比任何时候都厉害。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作出结论说,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掩饰和抹煞实际存在着的矛盾,掩饰和抹煞实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阶级分化等等呢?从“国内和平”的口号是否可以得出反对阶级斗争的结论呢?

谁要这样解决问题,谁就一定要滚到机会主义的另一端去,因为对当前各个时期的阶级矛盾估计过低,就会削弱抵抗各种资产阶级发展倾向的力量,这些倾向会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出来,只是由于无产阶级从其制高地上发动日益强大的进攻,并且把人数众多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农民的经济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它们才会后退。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列宁主义者来说,不仅需要正确地认清整个历史发展时期,而且需要正确地认清这个时期发展中的各个具体阶段,以至这些阶段中的各种具体情况。过渡时期的矛盾不会马上消失,它们将在阶级斗争中被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使矛盾尖锐起来,以至最后炸毁整个社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最后则会克服矛盾。但是,正是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行动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它排挤城乡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和改造农民。这种斗争还可能暂时尖锐起来(必须及时地看出,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从我们方面给敌人以特别的反击和特别的镇压)。但是,日益增长的、强大的国营经济力量及其对农民日益增长的影响,最后将取得甚至连瞎子都觉察得到的新经济制度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前景,它将由千百万工人的双手和智慧来实现。

我们只谈到了建设时期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所直接面临的任务的极端复杂性,要求大大地丰富正在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

想。列宁主义第一次在这里立下了基本的路标。在战争和革命的严峻时代所诞生的列宁主义，不仅提供了它所制订的推翻资本主义压迫的理论，而且还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牢固基础。革命破坏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综合，这就是列宁主义。

写于1927年1月。译自《真理报》1927年1月21日。

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的 教训与党的任务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的总结)

1928年4月13日在列宁格勒组织
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在粉碎了反对派以后，我们全党自然就要挽起袖子来着手进行务实的工作了。全会的工作是在务实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下进行的。这是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会议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全会讨论了两个问题：粮食收购及其教训和沙赫特事件。在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全会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我们某些重大的内部政策问题。其实，粮食收购和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的专业性问题。

同样，沙赫特事件也使我们涉及到一些重大的问题，这就是工人阶级对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党同工会、党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一事件又重新使我们触及到党内民主和党内纪律等等问题。

因此，我不能仅限于单纯地传达全会的情况，我还要尽力对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加以分析。

一 粮食收购运动的教训

经济和阶级

我先从一个差不多是理论的问题谈起，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关于我国经济中的生产和市场的比例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我们国家的社会阶级力量问题。这一点必须首先弄清楚，因为每一个党员都会自问：为什么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原因何在？这些困难是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些困难是不是意味着力量的很大优势在我们的敌人——富农、私商等等方面？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本身的错误的结果？或者说，这些困难是不是由我们的错误和我们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促成的？如果后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的错误和我们阶级敌人的力量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于我们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问题，我首先想指出两种可能的、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提法。

第一种不正确的、片面的、从一定角度来看是“极端的”提法认为，一切过错在于破坏了主要的市场比例，工业品生产少了，农村的需求扩大了，分析到此为止。这是一种看法，一种态度。

另一种态度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同样是错误的，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业品生产是不是能满足农村的需求，不在于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出现了比例失调，而在于在我们这里，富农富了，富农在农村中的阵地增强了，同中农或者同某一部分中农抱成了团。

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种不正确的、片面的态度在于只看到经济比例、经济形式、市场关系、市场的商品流动情况，但是看不

到阶级；

另一种同样不正确的和片面的态度在于只看到阶级，看到富农的力量，但是看不到阶级斗争据以展开的一般经济基础，看不到市场关系，看不到城市和农村相互间的商品流动情况，没有考虑到市场比例，没有提出比例失调问题，等等。

一种看法只看到经济形式和市场关系，但是看不到阶级；另一种看法只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看不到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各阶级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市场，通过商品量，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占有，通过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关系展开斗争。不能把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割裂开来，即不能把阶级和经济，把经济 and 阶级割裂开来。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关于机构即关于我们国家的计划领导的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如果我们的计划领导机关由于某些失算而破坏了必要的经济比例，那么，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造成一种可以被我们的敌人——富农、私商和一般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加以利用的局面；我们的坏事和损失成为阶级敌人的好事和益处。

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国民经济的诸因素正确地加以平衡，使它们保持一定的均势，我们的阶级敌人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就会被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他们反对我们的斗争当然没有消灭，没有停止，它继续着，然而是在对我们敌人远非有利的情势下进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管理和领导机关破坏了某一个重要的经济比例，由此出现市场的比例失调，那我们的阶级敌人就会更加神气起来。他们就能够利用局势。只要把水稍微搅混浊一些，我们的敌人就会更加起劲、更加巧妙和更加成功地利用这种已形成的局势，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反对我们。他们力量的比重开

始上升,因为计划和管理的领导方面的过错,使他们得以利用已形成的经济局势。

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的错误。一般说来,或者是政策的总路线上的错误,政治路线的错误,或者是日常领导上的错误,暂时的错误。如果我们犯的是第一类错误,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的敌人会长期利用这种状态,他们将长期打击我们。这样的错误,在我们这里,至少到目前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常常有相当严重的暂时的错误。暂时的错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是它们可以在一定的、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起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来谈一谈我们碰到过的、但还没有根除其后果的一些具体困难。

计划领导的错误,比例失调、阶级 和粮食收购期间的困难

首先应当指出,我们存在的并且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开的困难决不具有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些困难,不能说,它们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是无法防止的。它们是由于我们经济政策的许多措施实行过迟,由于计划领导的失算,由于我们党组织陷入党内争论和同反对派的反党和反苏维埃活动的斗争而脱离经济领导所造成的。

在我们这里,经济管理和党的生活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经济不能被看作是离开由党所领导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而独立存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鼓吹的那种使我们的经济脱离经济政策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家勾心斗角,而托拉斯巨头和国家机构照常做自己的事情。与资产阶级国家相比,在我们这里,党内斗争在国家的整个经济机体上发生强烈得多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与众不同的特点说明,为什么我们党的动荡也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

计划领导的错误很尖锐地在我们的经济中反映出来，还因为我们是在力量高度紧张，我们的经济计划高度紧张，我们的国家预算和我们的资金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向前迈进的，我们极力保持经济发展的最紧张的速度，以便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紧张迫使我们克服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向前迈进。

因此，计划和调节在某些方面的各种失算十分严重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央委员会关于粮食收购的决议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已遇到的困难不是不可避免的困难。这些困难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行动迟缓，计划领导上的错误，党的争论。当然，即便是最出色的计划也消除不了我们经济发展和我们工作的客观困难：国家的落后，积累的高速度，“百分之百”的计划工作的不可能（存在2400万农户）——这一切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经济战线的不同领域中出现这种或那种困难。在正确的计划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困难会减少；几乎在每一次发生比较大的对局势的失算的情况下，这些困难就尖锐起来。

首先我想谈一谈困难的经济方面，由于发生这些困难，我们差一点儿陷入全面的经济危机。

必须指出，在我国一般说来，在农业和工业的再生产周期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在我国，农产品的出售时间不是在工业充分开工的时候，相反地，而是在工业刚刚发生某种季节性下降的时候。这当然是可以纠正的，只要在收获季节前，我们能有充分的机动后备，我们能有相应数量的商品储备。在本年度，我们没有后备。当我们进入农业秋收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业没有足够数量的后备可以投放出去，以满足来自农村的需求。

可见，我们没有能够及时积累起我们工业的一定后备，——这

是市场的平衡遭到破坏的一个原因。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后备，问题还在于，我们在这一年度，生产季节性缩减的程度比上一年度厉害。

在夏季期间即在上一经济年度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生产急剧下降和生产不足（同 1927—1928 年度第一季度的计划相比），在我们工业品零售价格降低的情况下，相对地减少了工业品的供应。

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农村的需求增长了。农村的这种需求，是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上层分子即富农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里还应当指出两种现象，它们对了解我们所碰到的那些困难的全部内情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技术作物（获得大丰收）和畜产品的价格高。出售技术作物产品和畜产品，使农村特别是农村上层分子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额外货币收入（同去年相比），使我们可以对这笔收入课以必要的赋税等等。第二，由于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很多，由于有各种辅助性的和其他的工作，同去年相比有数额多得很多的货币流入农村。多多少呢？这里有一些非常粗略的计算数字。一些人认为多几个亿，另外一些人说数目还要大得多。至少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在最近一年，农民经济的这种副业收入大大超过了上一经济年度。需求（包括富农经济的需求）的这种增长没有以相应提高赋税来保持平衡。结果，所谓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就是说，城市投入农村的工业品的数量没有能够同体现农民需求的货币量相适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在秋季能够供应农村的工业品的数量比以前相对地减少了。

在城市中，工人数目和工资基金均有增加，因而城市的需求也增加了。

这样，需求和供应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曾经多次试图计算

出商品的缺额，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数字是极不稳定的，例如，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前一经济年度第四季度和本经济年度第一季度，商品短缺数额约为5亿卢布。后来又出来另一些数字，提出的数额小得多。但是，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向你们提起几件人人皆知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在秋季，我们为了满足城市而停止了农村市场的商品供应，——我们指的是工业品。我们把商品拨到城市去，为的是满足城市的需求。而到冬季，当感觉到粮食收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了填充农村市场而停止了城市的商品供应。我们不得不把工业品调拨到农村去。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停止城市的商品，而把商品调拨到农村去，这样做是不是对呢？

是做得对的。这样做是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既然把大批商品先是不顾农村而急忙调拨到城市，后来又急忙从城市调拨到农村，那就意味着商品缺少。在城市中，这一点即使从过去和现在买东西排队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不仅买农产品要排队，就是买工业品也要排队。对这件事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这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农村，应当补充说一句，农村的商品供应量绝对减少（与去年相比）的事实也是有的，——这样一来，在经济方面即在城乡交流方面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现象是：农村对商品的需求增长了，而商品供应却落后了。

为什么这一点首先正是反映在粮食收购上面呢？

这一点首先反映在粮食上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在最近期间，谷物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比价悬殊太大。这种悬殊对粮食很不利，以致农民宁愿把粮食留下来，用出卖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换来的钱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

农民有时宁愿用粮食饲养牲畜，然后再出卖牲畜。这主要是

因为谷物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比价继续保持悬殊，这种悬殊在近几年来急剧地扩大了。从1924—1925、1925—1926和1926—1927三个实际经济年度和1927—1928年度的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指数（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1925年度，谷物产品的指数为129，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产品的指数为135。差距是不大的。在1925—1926年度，谷物的指数下降，过去为129，现在为123，而技术作物和畜产品却上升了，过去为135，现在为140。谷物下降了，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上升了。1926年，谷物的价格指数从123降到106。畜产品和技术作物产品从140提高到145。在1927—1928年度的第一季度，谷物为109，——同1926—1927年度相比，差不多是同样的数字，增加不多；而技术作物却由145增加到151。你们看，在最近几年，谷物产品同畜产品和技术作物比价上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

但是，我应当指出，谷物的不利地位不仅表现在市场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课税上。在课税方面，谷物的地位也是最不利的。我手里没有足够的数字来专门说明谷物，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举出一些数目字，这些数字只能十分概略地说明我想强调指出的情况。我们拿农民经济的两大类相对纯收入来看看吧。这两大类是“大田作物”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农业收入。

大田作物在农民的全部相对纯收入的总额中占39.5%，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劳动收入）占27.8%。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别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拿对两类收入的课税来看看，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数字：大田作物在赋税中所占份额为66.59%，而非农业收入仅占5.2%。这里当然应当考虑到建筑工人的工资和其他不予课税的收入；但是，尽管这样，悬殊终究是太大了。

还有一种情况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的平衡。我在前面指出过，在我们这里，农业生产的周期和工业生产的进程是不同的。农民在秋季卖出自己的产品而得到一定数目的货币，而工业到这个时期（如果它没有专门的后备）却不能及时投放足够数量的商品。但是，究竟为什么农民不愿拿着这些货币等待，比如说等上几个月，而要立即把这些货币用掉呢？

这是由于我们的货币还没有稳固到可以作为积累手段的地步。农民把货币看做是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而还没有充分把它看做是积累手段。我们的农民宁肯用货币购买商品，而不愿把货币存入储蓄银行。我们的信贷系统还不稳固。如果它是比较稳固的，如果我们的储蓄银行是稳固的，如果这些信贷杠杆是强有力的，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只要农民手里有一定数目的货币，或者说只要扣除前一时期的经济周转费用后农民手里还剩下货币，农民就把它直接投入市场。这些货币不是流入储蓄银行和信贷的渠道，而是直接开始压到市场上去。

由于这些原因，粮食供应缩减了。上一年度7月到12月，我们收购了42800万普特，而本年度同期只收购了3亿普特，而且本年度的12月仅仅收购了上一经济年度12月收购量的59%。不言而喻，要是这种粮食收购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整个经济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城市的供应就会遭到破坏，实际工资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发生一系列其他更重大的经济灾祸。同志们，这就是从纯经济方面考察所得出的图景。

我有意地在我的报告中一开始先指出，问题的经济方面不可能离开社会阶级方面，而是相反，因为社会阶级方面不可能离开经济方面。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经济情况，基本的市场比例遭到了破坏，正是因为这样，使手里掌握一大批粮食（尽管决不是数量最多的粮食）的富农有可能更方便地进行投机来反对我们的价格

政策。

富农无疑利用了局势，同时我们的收购机关又没有做好工作。我们的收购机关在客观上，不依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因为它们没有组成统一的收购战线，因为它们不是联合成紧密的队伍，而是相互竞争，有时简直是激烈的竞争。

这样一来，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基本经济比例遭到破坏，并在这个基础上，富农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比以前大得多的经济积极性，他们企图在固定的价格政策的基础上，在相互竞争的收购机关的纵容下，在党组织进行争论的条件下以及在地方组织不大懂得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回击我们经济敌人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同中农联合起来。

这些就是引起了有造成严重国民经济后果的粮食收购危机的那些经济困难的原因。

反对派和对我们困难的分析

在转入谈论关于中央为解除粮食收购危机而采取的措施的问题之前，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央所做的分析是不是同我们反对派所讲过的话有些相似呢？它是不是实质上证实了加米涅夫曾经提出过的著名论点，也就是证实富农“调节了”我们的经济呢？

同志们，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我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同反对派的观点是有天壤之别的。反对派是怎样看待富农危险的呢？

是这样的：在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比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得更快；耐普曼和富农不断地而且胜利地向我们进攻；而我们则在他们面前节节后退；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落后。这同一个人人皆知的论点是异曲同工的，这个论点就是，如果没有组织成为国家的西欧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退却，这就是反对派“哲学”的含义和根源。

而我们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经济影响的一些最大杠杆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将来不犯大错误，占有这些杠杆就会使我们在国内关系方面是不可战胜的。富农首先是当它能利用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才是一支危险的力量。因此主要之点在于我们的政策要正确，首先是要确定正确的经济比例。只要我们保证在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之间保持正确的比例，富农反攻的领域就大大缩小，当然还不是完全不再存在。相反地，重大的失算，不管它们是由什么表现出来的，是由简单的算术错误，还是由我们统计的缺点，或是由党内生活的事件（争论）表现出来的，都会使富农成为危险的阶级敌人。

中央全会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决议说道：

“可见已经形成的经济情况，富农对这种情况的利用，在执行实际的工业品分配计划中的错误（工业品运送迟缓）。整个计划工作的错误（对农村上层分子课税太轻，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相差过大等等），工业品的增长的暂时落后，以及机关（包括党机关在内）的组织性和积极性不强（这点起极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引起了极大的经济困难，这种困难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成分巨大增长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如果及时地和正确地使主要的经济因素保持平衡和消除经济机关与党机关中的缺点，那么这种困难是不致于发生的。”

可见，中央在其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们及时地和不迟缓地计划好主要的经济因素，正确地和适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所遭到的困难是不致于发生的，富农就不能够破坏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

我们不透过于人，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机关”的过错，不是狭义的机关（某一个苏维埃机关犯了这样的错误），而是广义的机关，就是说，是计划经济的机关的过错。我们的

计划编制得不大好。我们被争论缠住，造成了许多错误，误了事，这也就使得我们的敌人（他们在其他条件下干不出任何反对我们的大事）有可能获得若干（暂时的）胜利，这些胜利已被党的坚决措施化为乌有。

反对派断言，没有西欧的援助，我们就会毁灭。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肯定说，我们有为胜利前进“所必需的和足够的一切”。反对派说，我们节节后退。实际上，我们日益壮大并步步进攻。反对派说，我们的阶级敌人日益壮大，我们需要外来的援助，以便想个办法摆脱困难局面。实际上，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错误和失算。在于我们还不善于很好地作计划，我们失策，我们行动迟缓一些，——部分原因是我们还不善于及时防止象争论这类事情，——从而把几张王牌交给我们的敌人。

是富农“调节了”我们吗？

应该说是我们自己调节了自己，计划作得不好，从而，我重说一次，把某些王牌交到自己敌人的手中，他们不放过我们的每一个过错，利用任何一个失算，在我们没有筑起足够高的壁垒的那段战线上转入反攻。

党中央的措施

在我们党处置了反对派、消除了内部疾病而把自己的精力转到实际工作方面以后，在粮食收购方面暴露出来危急现象，警告我们必须采取紧急的和非常的措施。

中央被置于这样的境地，即需要千方百计地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任务，因为粮食收购工作的破坏会使人人都感觉得到，并且最后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需要采取紧急的措施。十分自然地，从我谈过的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的分析中产生了中央为整顿粮食收购战线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既然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市场的比例失调，中央就必须追加一批工业品赶快地运往农村，哪怕工业中心暂时没有工业品。

此外，我们必须采取许多措施来缓和农村方面的过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我们加重对农村上层阶层的课税，这是对农村上层分子的直接的社会阶级压力。

我们发行加强农民经济的公债，在农村按生产能力配销；我们实施关于捐献的法律，其目的是满足农村需要。我们打击组织反对我们的斗争的敌对的阶级力量，即打击富农和投机商。这里可以运用第107条。然后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在另外一些地方有另外一种比例）发给贫农。其次的措施是建立粮食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然后实行非常措施来检查苏维埃机关，把那些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结合在一起或半结合在一起或和睦相处的分子清洗出去，等等。我们把党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整个党的机关行动起来，这归根到底对粮食收购进程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极端的和非常的措施在历史上证明是正确的；粮食收购的速度加快了，结果收购的粮食数量超过去年同一时期的收购量。

在1月以后，我们开始施加一定的压力，粮食收购量立即就迅速增加上去。在9月和10月，粮食收购工作正常，比去年同两个月略有超过。到11月开始下降，到12月就大大下降，大约减少一半。在这以后开始有所好转，到4月终于赶上了去年的数字。

应当注意到，我们必须在余下的几个月中也以比较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粮食收购运动，以便在全年的总平衡表中获得必要的经济效果。

所谓的“过火行为”和向富农的进一步进攻

不用说，在每一个党员面前，除了这个问题，还摆着关于这些

措施的政治后果以及关于下一收购年度的实际准备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准备下一次的粮食收购运动呢？我们的方针是不是应当是再一次重复这一次粮食收购运动的经验呢？这一次粮食收购运动和我们已采取的非常措施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党的路线对比一下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有莫大意义的。根据各地方同志的报告来看，我们可以指出：在粮食收购期间，农村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改进了；富农的阵地被削弱了，在许多地方被严重地粉碎了；农村贫农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贫农和中农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可以说，我们摆脱了困难而没有使同中农阶层基本群众的关系复杂化，但是同中农的上层部分的关系多少尖锐化了。在政治方面总括起来看，我们是赢多于亏。由此应当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出一定的政治结论。第一，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路线的意义；第二，我们必须了解为十分特殊的、极其紧张的经济形势所迫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的作用和地位；第三，我们必须了解同各种过火行为、对歪曲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我们的非常措施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对于这些歪曲行为，有时候对某些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要予以谴责，而且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这些过火行为有哪些呢？关于这些过火行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必须绝对制止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党应当同它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会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从政治实质方面来看，这种过火行为可以肯定为这样一些做法，它们不仅打击了富农，而且也打击了中农，它们常常滚到余粮收集制的轨道上去。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过火行为。虽然中央委员会一再发出有关指示，警告各级党组织防止过火行为，直到现在这种过火行为还没有根

除。属于这种过火行为的是这样一些做法：不按照司法手续没收余粮或者一概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取缔粮食自由市场，为查清余粮而进行各种搜查，在许多地点建立阻截队，强行摊派公债以及地方工作人员想出来的其他“狡计”；例如，在农村付汇款时，一部分付现款，而另一部分以公债券支付。

这些过火行为无论如何应当制止。在某些地方，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违法乱纪和强制措施，为此在某些地方不得不把某些人枪毙。

中央委员会指出，上述一类近似余粮收集制方法的政治过火行为必然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会破坏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本身。例如，有这样的事例，实行产品直接交换，也就是用钱不卖给工业品，只有用粮食才换给工业品。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清楚，这破坏我们的通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货币一半不是货币。

不错，如果我们强行摊派公债，国家从这里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如果从前景来看一看这件事情，那么当你强销这一种或另一种公债的时候，在这样的基础上能建立起什么样的信用呢？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把小额积蓄吸入储蓄银行或存入合作社，或者要求人们把积蓄存入银行，这是绝对荒谬的。我们总是说，我们应该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农民的小额积蓄会被吸入我们的信用机关。在这里回想一下我在前面提到的事实是十分适当的：在我们这里，货币作为积累手段，作为储蓄手段的作用是很不发展的。同时，破坏我们信用制度的各种做法更加缩小并破坏了货币的这种作用。而这又意味着，货币不断被抛入市场，并使市场比例失调现象更加尖锐起来。由此看来，我们破坏信用制度（用各种“大小过火行为”），目前的困难到明年就会扩大再现。

可见，信用制度和我们经济的商品率本身遭到过火行为的破

坏。如果采取余粮收集制的方法，那么中农群众就失掉扩大自己的生产和向市场抛售大量商品的动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额就会缩减，也就是说，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必定吃亏。

不过，我在这里也应当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与过去年代相比，有某种崭新的东西。我们应当认真地分析这个新东西，我想首先谈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我们“认真地和长期地”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以及后来当我们同反对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现在这个论点仍旧不变，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

但是，我们应当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根据现时提出问题。我们当然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想象成我们放弃对市场自发势力的影响。我们大家都记得列宁的论点：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但是我们对它加以调节，而调节的限度和深度由我们即由苏维埃国家确定。我们同样知道，新经济政策本身包含着自我克服的根源，即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源。因此，既然我们是这样认识我们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只是重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或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呢？不，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夜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实行加紧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坚决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成分的政策，因为我们巩固了同中农的联盟，我们巩固了经济命脉，等等。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既明确地指出了具体经济形式，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斗争的做法。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吗？是的，提出了。可以怎样表述这个新东西呢？不在于政策本身的基础，不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是一种政策，而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完全另外一种政策。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我们的经济政策提出的新东西，大致地、约略概括地（我强调这个附带条件）应当表述如下：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朝着加强直接调节的方法，加紧反富农斗争，加紧农业集体化方面迈出了一定的、相当大的一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了使农民经济在生产上合作化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了预购合同制对农业集体化的意义，特别强调指出了根据阶级原则分配机器的必要性，限制租佃及许多其他东西的必要性。在我国最近几年的进展中，在加强了社会主义阵地（顺便说说，我们的已寿终正寝的反对派正是不了解这一点）的进展中，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合理的。

但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然没有取消下述论点：城乡关系的基础，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现在还是农业的商品化。商品化问题当然还没有被取消。我们应当说，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的增长是一个积极因素，理应得到我们的支持。

或者说，象关于农业中的个体劳动积累的问题是不是被取消了呢？不，还没有被取消。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没有取消它，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结，这些决议没有说我们现在反对个体劳动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这完全是胡说。但是，现在，当我们掌握着一系列在我国日益增长的杠杆时，我们就应该比以前更坚实地，比以前更有力地，更大量地投放资金、人力、物力和一切其他东西，执行向农村的集体生产联合组织过渡的路线。

两 种 倾 向

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我们现在可以觉察到两种可能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机关的保守倾向，它看不到新东西，认为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完全一样，1928年同例如1925年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某种飞越倾向，忽视限度的倾向，某种跳越我们必须经过的那些必要阶段的倾向。我称之为保

守倾向即抵触新事物的倾向的东西，实质上是想还停留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事物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倾向的人看不到新经济政策本身发展的新阶段，看不到和不了解经济发展的新的可能的形式，看不到促进一下中农和贫农经济的生产合作化的必要性，看不到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必要性，不相信在这种进攻方面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粮食收购工作暴露出我们机关中有一部分人丧失了阶级嗅觉，不愿意同富农吵嘴。这是一种半庸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还看到飞越某些必经阶段的现象，这一点例如表现在不了解非常措施的过渡的、有条件的性质。有些人认为，这些措施差不多是正常的；有一种否认个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趋向，或者一般过高估计行政命令的方法，有时候忘记必须永远记住的各种好东西，例如忘记了中农。某些人对加强集体化的了解太简单，结果“集体组织”几乎是用征集的办法组织起来的。有材料说，人们得到一点钱以后，就把它们投入假集体组织，不加选择地把什么人都收入集体组织，连富农也混进去了。这种飞越是一件大坏事，应当彻底铲除。

我们应该前进，我们也必将前进，但是应当经常有一些好值班人，能发出危险信号，并及时地采取措施来消除危险，因为每一个混乱状态——党内性质的或者经济方面的——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都会造成不良的——经济的和一般政治的——后果。

不应当这样平衡

现在来谈谈关于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当前任务的问题。从我讲过的话来看，这些任务基本上已经应当说是清楚的。

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之点和基本之点是，在确定我们的最近实际经济年度的计划时，我们应该站在我们急于要办的事情的中心，这个问题是怎样平衡主要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究竟怎样来平衡这些主要的经济因素呢？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我们从四面八方加以批判的流派，这个流派是由民粹派类型的有学问的专家——康德拉提也夫、魏恩施坦及其他人组成的，他们掌握了财政人民委员部附属的市场情况研究所的杂志。

这个市场情况研究所的公报是这样估计情况的，他们说，我们国家的一切灾祸都是来自工业化方针，因为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过快，根据这些专家的看法，这种速度没有考虑到全国和农民经济的实际积累速度，这个方针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罪魁。他们从这一切做出的直接结论是必须把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抵挡回去，加以重新审查。

在最近一期《市场情况研究所公报》中刊载了康德拉提也夫和魏恩施坦以及许多其他人署名的几篇文章，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证了这种分析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结论。我从乌特茨的文章中摘录一段话：“它（指我们的工业。——尼·布·）从健全国民经济的主导因素日益成为新的麻烦和困难的主导因素。”可见，一切灾祸都来自工业化政策。这就是说，他们得出结论，应当坚决地缩减工业化的速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提议修改提高工资的方针。他说，应当减少首先来自城市工业人口的需求，因此不可以使工资基金膨胀，应当削减工资。

另一个作者魏恩施坦说，应当提高粮食价格并对自己提出发展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度的任务。用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度取代集体组织！

取消工业化方针，取消提高工资的方针，实行降低工资的方针和提高粮价（首先是为了独立农庄）的方针，——这就是他们的“路线”。如果把平衡各个经济因素的任务看成是数学任务，那么，可以按照不同方法平衡。但是康德拉提也夫、乌特茨和其他人所

提出的那种平衡方法只不过是取消国家工业化而坚决向国家富农化方面发展。这是一目了然的。而从社会阶级角度来看，这就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阵地，因为工人阶级既在自己的工业基础方面又在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直接的物资数量方面遭到削减；与此同时却增强我们农村中的上层的最富裕的阶层的经济实力。这是十分露骨的富农纲领，结果有关的科学机关就“完蛋了”。不用说，这种“平衡方法”决不能成为我们党的争论的题目；它完全被我们党的争论抛开。我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出现了无疑代表我们农村的上层，富农阶层利益的知识分子集团的思想立场。

可以提出关于反对派的为摆脱我说过的那些困难而提出的平衡我国经济的方法问题，我指的是提高工业品价格。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平衡方法，因为如果我们转而实行工业品高价政策，那么，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就会增加我们的收入，即增加积累，会缩减另一方面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反对派有非常大的分歧；在这里也有一道把我们同反对派分割开的最主要的分水岭。虽然我们有经济困难，我们也必须屏弃这种平衡方法，即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实现平衡的方法。我们必须屏弃它，因为不然我们就会走上我国工业独自腐烂的道路，我们就会促使实际工资下降而置工人阶级于困难境地。这种方法不仅不是前进，而且是在某一方而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时代。这样我们就会减少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毁掉促进我国工业降低成本等等的推动力，更不用说我们会加强农村富裕阶层的境况，恶化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境况。就是说，根据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期间充分谈过的这一切原因，我们也必须屏弃这种平衡方法。

正 确 的 道 路

我们的平衡计划首先在于提高对上层阶层的课税，抓到我们迄今很少抓到的非农业收入。在我们面前摆着增加工业品产量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困难多大，我们必须扩大工业品的供应，要注意到，我们农村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细平布，还要其他商品，其中包括并非列入第二部类即日用消费品生产部类，而是列入生产资料部类的商品。因此，必须扩大拨往农村的工业品的定额，并转到（如果谈的是广泛的商品市场）供应另一种品种的轨道上去，因为农村方面的需求的构成不同于从前。

必须做到提高我们基建投资的利用率并在短期内取得大效果。应当指出，根据工农检察院对基本建设的调查可以看出，在我们这里，有很大数额的基建投资远不是有效地加以使用。加强它们的使用效率，缩短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期限并从面使它们提前投入生产，合理地并及时地使用外国设备，是我们最重大的任务。

最后，我们还必须从使谷物同技术作物和畜产品之间在生产上和市场上保持比较正确的对比关系方面，来平衡我们经济的基本因素。这是一般性的任务，但其实是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们这里，统计工作极其薄弱，它在短暂的、比较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提出不同的数字。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水平，以便得到比较可靠的材料和比较可靠的数字，尤其是在工业品方面特别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设法做到，在夏季不减少工业产品的产量，在收割以前我们蓄积起一定的商品后备供粮食收购运动时期机动使用。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决定

下一经济年度的概算给予我们很大的希望，这种平衡是能够做到的。做到这一点的客观根据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

在准备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方面采取许多组织上的措施。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决定包含在决议中：那里指出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统一的国家收购机关。建立相应的组织，它把各种共和国组织和以前的粮食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大组织——“苏联粮食公司”。其他的次要的组织同这个全国性的粮食收购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这里问题的主要之点是：用组织统一的中心的办法，用统一收购工作的办法，消除在目前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那些消极方面（主要是收购机关战线的分散性和它们之间的竞争）。

粮食收购运动无疑地搅扰了农村。它改善了我们同贫农的关系，削弱了富农，整个说来使我们保持了同中农的巩固联盟，但是中农的上层分子现在无疑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不满。我们应当彻底调整我们同中农的关系。我们应当利用农村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已经发动起来的积极性，以便继续进行我们对富农的进攻。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巩固贫农的阵地并向前推进。必须继续巩固我们同中农的联盟。

正如中央委员会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懂得，随着本年粮食收购运动的困难的消除，“非常”措施应该废除。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又处在这种状态，那么我们是不会拒不采取非常措施的。可是，粮食收购工作重心在于，使我们在最好的一般经济情况下进入下一实际经济年度。如果真正取得这些最好的条件并做到使国民经济诸因素保持正确的平衡（我们有根据期待这种成功），那么我们就象目前的实际经济年度那样需要“非常”措施。

这样说来，政治结果和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我们使农村受到震动，是我们正在加紧组织贫农，是压制了富农，是目前在比这以前大得多的程度上开始建立农村的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是

我们现在必须竭尽全力继续进行播种运动，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农村的建设工作并百般设法加强它。同中农的联盟决没有失去它以前所具有的巨大意义，特别要注意到，我们不仅在这一方面必须重复过去的做法，而且必须逐渐向前迈出新的步骤，以便逐渐地，适当地，按照物力和人力，按照目前的集体经济的示范，也把中农引上生产合作的轨道，更不用说建设一般合作社（不论是消费合作社或农业合作社）的日益增长的必要性。

同志们，这就是从粮食收购工作的教训得出的和一般说来摆在中央面前并由中央解决了的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第二个问题。

二 沙赫特事件

当然，沙赫特事件不仅对顿巴斯有意义，而且这是一件具有全苏规模和全苏意义的事件。从粮食收购问题中的具体事实出发，中央不能不讨论我们国内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同样，从沙赫特事件出发，我们也必不可免地要涉及我们的工人政策、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党内政策和我们的工会政策等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顿巴斯发生了什么？

我着重谈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情况。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在普通工人的协助下在顿巴斯破获了一起破坏组织。这个组织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同外国资本、大的外国资本主义组织、国外侨民以及某些大国的参谋部建立了联系。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原先的矿产主，其中有一些人有过非常丑恶的反革命经历，以专家的身分

在我们的机关里工作，它的成员中有的是白卫军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少人都是原先的邓尼金分子，还有一些人是邓尼金原先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总部，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许多别的城市都有自己的人。它通过某些外国工程师同国外联系，这些工程师中有些人是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例如德国“钢盔”团的成员。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把顿涅茨交给原来的矿产主。他们近期的任务就是利用战争和利用新的外来干涉大肆进行活动。大家从某些在押的所谓专家和工程师的供词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批被捕的工程师中有人说他们的组织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关系到由某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来给苏联以压力。从这时起，推翻苏维埃政权已几乎成为这一组织的正式纲领。

这一组织的活动和手段最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怠工；按照行不通的计划订购完全不适用的设备；生产不需要的设备；重新布局设备，把机床从一个工厂搬到另一个工厂，结果使这些机床在那里根本用不上；关闭带来很大好处的赢利矿井和开设不赢利的矿井；胡乱支配资源、设备、劳动和技术等等。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最温和的形式。还有更为凶狠的形式：故意把矿井毁坏和放水淹掉，破坏工厂，进行直接的破坏活动，甚至把发电机炸掉，对工人进行虐待和挑衅，破坏劳动法规及其他法典，而且还直接施行政治手腕来制造纠纷。

这就是说，在新的建设、计划、机器设备以及在对工人的待遇上，即在一切实可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的地方，都在进行隐蔽的破坏“工作”，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所谓同共产党员的“良好关系”作掩护的，也就是说，常常是同经济工作人员、同那些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丧失阶级警惕性的上层工会工作者和共产党

员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及其上层分子是真正在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在其他方面也不排除存在这类组织的可能性；保不住在军事或化学工业中也会有这种卑鄙活动；尽管没有直接材料来证实这种假设，至少排除不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这就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组织，但是顿涅茨矿区最近时期的产量却增长得很快，达到了自己产量的创纪录数字。就是说，虽然工人们处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虽然上层行政管理和技术领导人员（至少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站在敌人阵营一边，但是处在生产阶级斗争战线的工人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顿涅茨矿区得到了成长，它作为我国一个巨大的生产单位，意义越来越大，在自己的生产效率上提供了创纪录的数字。这是第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说明无产阶级蕴藏着雄厚的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

第二个（消极的、完全消极的）情况表明，这伙人很多年来就在进行活动，而我们的经济和工会机构许多年来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组织的存在。更有甚者，工人，即最普通的工人上万次地报告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说，情况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尽管工人上千次地敲起警钟，但一切都等于白费，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以及经济工作人员闭目塞听，对指出这一危险的工人采取不屑一顾的犯罪态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种一目了然的情况。

沙赫特事件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我曾说过，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首先提出的

是关于党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非党工人群众同工会组织的关系问题、关于工会组织同经济工作人员的关系、党同工会和经济工作人员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更不用说专门问题即对待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实际上如果“从根子上看”，沙赫特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整个传送带系统——群众、阶级、工会、苏维埃、党——遭到了破坏。党组织脱离了工人群众，工会组织脱离了非党工人群众，经济工作人员脱离了这些工人群众。要知道，除非真正完全脱离了工人的生活，否则那就会看不到我们由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在中央全会前夕在那里工作期间所发现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情况。从这些同志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为了承受不得不承受的一切，必须要有顿涅茨矿区工人那样的莫雄气概。

我先从党开始谈起。在一系列视察过的地方，党的机构对技术知识分子丧失了阶级嗅觉。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党员同专家们勾结或半勾结在一起，有些地方在党组织的内部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报告提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说明：

“在3月22日斯拉维扬斯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当讨论梅什金同志就联共（布）中央关于阿尔季奥莫夫斯克组织的决议所作的报告时，有人向主席团递了一张纸条，提问在发言中可不可以涉及个别支部和经济工作人员。接着有一位同志站出来当着大伙说：‘我们现在才说，为什么早先默不作声？’所有500多人回答说：‘从前不让讲话，嘴被捂住了’。”

谈论任何一个经济工作人员或任何一个支部都不行。阿尔季奥莫夫斯克组织的领导被一小撮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把持着，他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从酗酒到强奸妇女！这叫什么组织！如果在党组织内部存在这样的现象，那它很自然地就会

继续蔓延下去。在非党工人群众和在工会组织的群众中，象这样的党组织能有威信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里还讲了第二个例子：“通常党的会议开得还不及非党群众的会议活跃和丰富多彩。在党的会议上使人感到很大的压力。党员还未从阿尔季奥莫夫斯克党组织的上层分子长期统治造成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非党会议不仅开得很活跃，而且表现了非党工人对我们的建设任务的极大关心，真诚地希望改正缺点。这些会议表明，非党群众对党组织的消极的一面知道得非常清楚，而对党组织的积极的一面却知道得非常少！”

既然在党组织内部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那很自然地就要对非党群众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但是，用托姆斯基同志的话来说，沙赫特事件和我们组织的各种错误“并没有损坏党和苏维埃在矿工眼里的威信。他们热情和自觉地爱护生产，他们真诚地和无限地信任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人们多年来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中央、对整个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

下面谈谈工会。我们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在各地视察中无论在破坏活动方面还是在工人阶级的待遇方面，都发现不少触目惊心的事实。调节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些标准，其中包括工作日、工资、直接生活和劳动保护等等规定，已被废弃。试问，工会到哪里去了？显然，既然党组织处在那样的水平上，那么工会也就会照此办理，它们也僵化了，大大脱离了群众，它们得到蜕化了的上级党组织的支持，发挥不出应有的积极性。

至于那些党内经济工作人员，从调查中可见，他们完全成了专家-破坏分子的俘虏。

沙赫特事件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在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策略原

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牢牢记住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即使对不周全的批评也不应该实行压制,因为在不周全的批评里往往也有好的东西,而如果要求所有的批评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意味着扼杀任何批评。必须大力开展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机关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僵化现象克服掉,否则它会继续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危害,离间我们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应该非常重视工会和它们的工作。为了解决沙赫特事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因为大家从报纸上已经看到。只是有一点应当特别加以强调。需要最大限度地注意我们的工会,因为这是最广泛的工人组织。现在工会正在改组。不久前视察了乌克兰的钢铁厂。发现了什么呢?发现工人的流动性有时比率达到了50%,甚至达到了80%。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即使在那些大的和稳固的生产单位里,也在出现新的工人阶层,这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就不打算在这里说了。有些人对1905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人数表示吃惊,对他们的比例的减少有些感叹。但是,既然人不能永远活着,他们的人数又怎能不减少。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不能想象工人阶级的成分还会和30年前一样,否则那就是地道的白痴。工人阶级将从农民、职员和失业者那里招募自己的成员。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在这里设置障碍。我们的任务不在这里。不能说这是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和“败类”,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把自己同人隔离开和安于现状,而在于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和按服自己的样子来改造新的工人阶级阶层。

尽管我们直到现在还在大力宣传这一任务,但是工会并未使这一任务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要注意,如果在基本工人同党或工会或自身组织的上层之间存在着隔阂,那么,新的工人阶级阶层同上层之间的隔阂就会要加大10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为了

粉碎我们工会的官僚主义恶习和促使它们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需要作一番非常特别的努力。应该说，这里需要把自我批评稍微扩大一些。要靠我们广开批评言路，促使工会的工作人员行动起来。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为自己带来损害，并且自己也变成苏维埃共和国工人事业的卑鄙破坏者的尾巴。

经济工作人员。通过我们所作的全部考察，从各机关所提供的综合材料中可以得出结论，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经济工作人员已沦为资产阶级专家的附庸。这样，中央便作了两个方面的指示：第一个方面是，扩大经济工作人员对技术经理的权限；第二个方面是，提高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在提高技术熟练程度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指示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要求他们熟悉他们所在单位的生产，丰富自己的实践，努力加强自修。此外，中央还作出指示，要通过高等学校和出国考察等等加快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我们自己的专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细节大家可以从中央通过的关于沙赫特事件的决议中看到。

加强无产阶级民主

相应决议充满的一个精神在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举行生产会议，加强注意工人的发明创造事业，消除一些破坏我们的准则和我们的劳动法规等等行为，关心各种细小问题，使我们的机关人员工人化。这是中央决议所依据的基础。

同志们，沙赫特事件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事件。它之所以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事件，特别是因为这里搀合进了外国资本。大家知道，自从我们逮捕了几个外国工程师以后，西欧开始对我们进行了极为凶猛的攻击。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国外加剧了反对我们的猖狂活动，加强了财政经济上的封锁等等。但是，同志

们，我还必须指出沙赫特事件的另一个方面。一颗星星，沙赫特事件的卑鄙星星是坐落在整个卑鄙勾当的星座上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这里发生过“梁赞”事件，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过这一点，我指出过我们这里发生过的“阿尔季奥莫夫斯克”事件，那里的个别党的工作人员强奸妇女、酗酒等等。不久前我们这里揭发出了“索契”事件，那里有一些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在带头做坏事（我本人就曾见过一个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腿的人，他和其他酒友在一起坏到如此地步，一个团支部书记为逢迎长官而招拢一些女团员供他寻欢作乐）。我们还发生过“沃罗涅什”事件，那里有一个秘密的盗窃股份公司，进行着名符其实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活动，东西“脱手”后就把现金存入共同的金库成为股份，同时这个集团还同党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我再说一遍，如果多一些自我批评，如果党内多一些真正的民主，那么这些坏蛋就藏不了多久。因此，从整个形势看，迫切需要开展自我批评，大大发扬党内民主，少搞一些委派制。同时，形势还要求我们坚决把党组织的方向扭转过来，即大力做好在广大群众中的工作，不仅要发扬党内民主，而且要发扬工会民主，特别是要挑选和提拔新人，从而制止官僚主义弊病的发展。必须做到这一点。为此，中央委员会作出专门决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各级党委会委员以及苏维埃政权中的主要工作人员每年分别派到地方工作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这不是一般口头上说一说，而是中央全会的正式决议，因此，我想这一决议的实现是有足够保证的。

不管在粮食收购工作上，还是在沙赫特事件中，令人快慰的事情不多。但是，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在粮食收购上的困难和我们在沙赫特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类困难是在迅速的、目前公认的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不是说明倒退，或不可能胜利前进，

布中隊

或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的，不是说明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等等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我们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进一步建设和影响广大群众的杠杆。我们手中掌握着建设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极为有力的手段。仅仅是由于我们文化普遍太低和由于我们本身机体中存在一系列不协调的现象，所以我们时而跑得过快，时而倒向这一方面，时而在自己身边发现巨大的失策。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前进！

如果党组织在中央的领导下能坚决纠正两大事件所暴露出的缺点，那就毫无疑问，我们党一定会在经济建设、团结工人阶级力量、加强我们同贫农的联盟、组织贫农和无情地同富农斗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胜利。（长时间的鼓掌）

译自《真理报》1928年4月19日。

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

(在列宁忌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在今天的忌辰纪念会上我只想讲一个题目：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目前这一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和我党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逝者的纪念日到他那儿去，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给我们的学说中汲取力量，这就是向我们伟大导师表示的最好的敬意。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世界”的任务，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天才奠基人马克思从理论上提出的任务。我们现在不得不进行斗争，克服罕见的困难，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与之进行斗争。这是实际上向我们宣布了你死我活战争的对手。这是武装到牙齿的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武装的强有力的敌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目前都在发展。成批的标准化生产，电气化，一系列新的技术发明，液体煤，瓦斯生产和输送的改善，人造纤维的制造（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按照权仗的指挥它也许可以用来制造炸药），最后，巨大的军事发明，如地上、水下、水上和空中的自控马达——所有这一切表示着资本主义技术上的“重新装备”，借助于这种重新装备，我们的资本主义敌人更牢靠地稳坐在自己的宝座之上。战时和战后危机给它留下很深的流血的伤口；这一危机还没有消除；在地平线上又出现了预示新的灾难的海燕。但是在尚未消除的危机的范围之内，我们的对手在其

力量和威力的基本中心暂且得到了巩固。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懂得，我们正处于同这些还强大的帝国主义敌人进行竞赛的时代。我们一分一秒钟也不应忽视这一点。我们注定还要长期生活在帝国主义的宝剑的包围之中。我们注定要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神圣同盟”进行长期的斗争，它不愿也不能给我们以安宁，因为我们的安宁，我们的建设，我们的和平劳动，我们的发展破坏帝国主义王国的“安宁”。因此我们的建设和我们国内正在解决的那些任务同国际“大”政策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这些问题实在分割不开。

我们的对手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同我们作斗争，我们的对手还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同我们作斗争。在这条战线上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利用我们经济技术落后，利用我们的不文明，利用我们尚未消除的贫困。帝国主义的所有头目及其歌手，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有仇视无产阶级铁的专政的人，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犬儒主义者，所有小资产阶级的糊涂虫，所有被疑难和怀疑主义所腐蚀的人和叫嚷我们灭亡的人——所有这些都利用我们的落后。一端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头号首领们，而在这一细小链条的另一端则是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友好的敌人”，他们——呜呼！——常常到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的意识形态武库中去选取自己的武器。经常可以看到某一老奸巨猾的生意人和资本的思想家不无虚假地热情宣称：布尔什维主义是场“大瘟疫”，有传染欧洲危险的亚细亚重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布尔什维主义将带来“整个文明和文化的毁灭”。某些特别卖力、特别热心和特别伪善的帝国主义空喊家，首先是前沙俄“思想上的王者”，他们超越兽性的疯狂的界限，竟然胡吡苏维埃政权是“恶魔”王国、“撒旦统治”的化身。贵族的歌颂者别尔嘉也夫先生就是带着反革命的激情这样写的。我们的社会民主党对手以同最好的遭遇相称的热心散布不怀好意的无稽之

谈，似乎我们在一个自古以来就习惯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的半亚细亚国家里建立了一个同霍尔第和墨索里尼政制毫无二致的政制。（顺便指出，当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某些青年人骂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时，他们完全是从自己的社会民主党同道那里借取这种恶毒的武器的。）整个社会民主党断言，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在从事空想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为这需要群众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的所有“企图”都是早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要破产的，是一定要毁灭的，不管我们怎样瞎折腾，也不管我们想出什么样漂亮的口号都无济于事。伟大的命运史册早就决定了我们的灭亡，因为据说我们违背了历史的铁的规律。而脱离我党的反对派残余也是这么干的，他们断言，如果西方不立即爆发[革命]，那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来援助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灭亡几乎是“早就注定了的”。这样，人们按不同的键盘，奏出的却是同一种调子。

很说明问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以落后，以不文明作为论据不仅仅是反对我们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我们的革命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非常说明问题的是，大体说来，很早很早以前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手就引用过这种论据，他们批判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证明”一个不文明的阶级，受压迫的阶级，帕利亚^①阶级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的，它只善于破坏，纵容野蛮的自发势力，因而它必然使社会退回到史前时代。说明问题的是，甚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半朋友从共产主义诞生之时起不止一次两次地战战兢兢地在他们有时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罪恶的救星的人物面前退缩。海涅曾被马克思称为自己的“朋友”，确实同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保持有最友好和最亲密的关系，象这样的大人物、大诗人在逝世前不久是这样描写共产党人和

^① “帕利亚”是南印度居民中一个受压迫、无权利的阶层，转义为无权利的人，被压迫者。——编者注

共产主义的(1854年)；

“不，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胜利使许多世纪劳动所获得的我们的全部现代文明、我们祖先的高尚劳动成果受到威胁，这时我就被一个艺术家和学者的内心恐惧所掌握。”

在下一年，1855年，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德国的革命诗人，德国舆论界最激进的人物之一，在自己临逝世之前关于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想象这些阴暗的反圣像崇拜者执掌政权的时刻。他们会毫不怜惜地用长满老茧的手去敲碎我的心如此珍惜的美的大理石雕像。他们会毁灭使诗人感到如此亲切的所有艺术的装饰。他们会砍光我的小月桂树林，然后在这块地上种上土豆。不用播种，不用收割而到处长满的鲜艳得象光辉的所罗门王那样的百合花将被从公有土地上拔掉。玫瑰这夜莺的快乐的姑娘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夜莺这无益的歌手将被驱散，而小铺老板将用——呜呼！——我的《歌集》做成小口袋去为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或烟丝。”

值得一提的是，象瓦列里·布留索夫这样一位我们舆论界的大人物、后来的我党党员，在1904—1905年间写了一首本身很漂亮的诗，题为《未来的匈奴》，以“阿季拉，踩烂他们的天堂！”的口号作为题词。“阿季拉”在这里是共产主义的别名；“天堂”则是资产阶级天堂。我们读到这样几节：

“你们在哪里，未来的匈奴，
一片乌云笼罩着世界！
沿着未开发的帕米尔
我听见你们的铁蹄声声。
趾高气扬的队伍从黑色的营地

向我们扑来——
用一股热血
使老朽之躯返老还童。

* * *

也许只有我们知道的一切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你们，把我消灭的人们
听到的是欢迎的赞歌。”

那时的瓦列里·布留索夫向我们和我们的阶级唱“欢迎的赞歌”，但是却把我们的阶级看作是“未来的匈奴”。

这种情绪不仅对小资产阶级庸人，而且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人物来说都是很典型的，甚至对那些由于自己的非凡的个人特性而企图跳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罗网的人们来说，也同样如此，甚至那些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预感到某种历史上伟大的新东西，觉得应当用“热血的激浪”使资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衰老的身体”恢复青春的人，甚至他们也把工人阶级看作新的“匈奴”，这些匈奴人把一切都捣毁破坏，摧毁人类天才的所有辉煌创造，先从地球上抹去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然后在新的田野种上“最简单的”黑麦。

写了这些句子之后又过了很长的时间。许多流水逝去，也许有更多的血流去。然而这些时间用铁的语言告诉我们一系列真理，这些真理现在对任何多少能思考的人来说未必能有所怀疑。

结果是，使文明和文化，使许多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全部成果和它的全部珍品处于刀斧之下，使其遭受毁灭危险的不是阴沉的共产主义的“反圣像崇拜者”，不是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象匈奴那样的军人，而是这样一些人物，用这种文明的全部成果武装起来的

帝国主义军队的“杰出的”和“出色的”尉官和将军；穿着更为优雅，外表更为漂亮的基督教国家的外交人士，他们说讲究的语言，戴软羊皮手套，“高尚地”关怀上帝和文化，“极其虔诚地”想扼杀共产主义；银行和交易所的大王及其穿着有如所罗门王的温柔的男女两性的“百合花”；他们的学者，这些学者把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才干锻炼得极其灵活精密，以发明资本所需要的摧毁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珍品的致命武器；神职人员、艺术家、文学家和歌唱家，他们用一切手段、各种语言为帝国主义的毁灭政策服务。

准备吞噬自身的资本主义的“高贵”文化有在钢铁的碎片中、在毒瓦斯中、在虱群中、在人的粪便和血液中被窒息而死的危险。然而不是我们这“阴沉的反圣像崇拜者”（这对我们多么合适！）带来这种灭亡。我们在拯救这种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在遭受我们的资本主义对手的打击。一切能思考我们时代大问题的正直人士都应当磨好刀去对付他们。

另一点也清楚了。我们的时代向所有的人揭示了另一个真理：已经清楚，经过暂时的破坏之后，阴沉的“共产主义的反圣像崇拜者”不仅拯救了旧社会留下的全部珍品，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比谁都快的速度，领导大量群众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创造伟大的群众文化运动，用文化的拖拉机把广阔的国家全都耕遍，引来的不是个别的钻石般的文化细流，而是群众性文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巨流。

最后，这段时间里揭示了第三个真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劳动的广阔前景，资本主义世界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前景。在经济领域、群众工作领域、科学创造领域、在整个文化领域，我们已站在大规模任务的大门口，我们已走出“室内”文化的小书斋，进入城市的大街广场，把文化的使者派往农村，派往穷乡僻壤。我们的科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动我们实践的飞轮转动。它不再是少数书斋中的学者的行当；它已经直接接触经济

建设的伟大任务，它从经济建设那儿——直接或间接地——领取自己的理论任务。工人阶级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工作范围。它唤起各受压迫、受折磨的民族投身于历史生活，伸出兄弟之手帮助它们发展文化，因此它也给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它把经济建设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体系，用自己的国家计划和统一的计划目标把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部门联合在一起。这些任务同样为科学提出了极其有意思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科学所全然不知道的问题。最后，工人阶级对人本身，对人的劳动，对人的健康给予极大的注意。这本身又诱发了新的知识领域的幼芽，提出新的任务，按新的方向使理论和实践、科学和生活相接近。

这样，工人专政的机器越来越威严地使文化全面卷入群众的生活的漩涡，使越来越丰富的科学听命于生活的新需要，使科学发展的节律符合整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的脉搏。所有这一切离甚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优秀人物所作的悲观的预言远得很，离社会民主党“批评家”尖声吠叫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那种同幸灾乐祸连在一起的灰心丧气远得很。不错，在革命搏斗时期有许多“百合花”被拔掉。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大炮声中有更多的“百合花”被拔掉，有更多的“夜莺”被赶跑。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自身的破坏工作同革命过程中的破坏一面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创造事业所花的耗费要少得多，而这个事业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文明的外表漂亮的野蛮人从事破坏工作的可能性。

在文化工作观点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而不是个别的祭司，不是个别异国的骄生惯养的人物。在我们这里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我们文化工作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些用来反对胜利的共产主义的指责，所有这些“文化论据”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怜，多么愚蠢！

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激烈的革命家，这位伟大的破坏者，这位率领工人阶级向资本主义堡垒、宫殿和私邸进攻的工人阶级的统帅，在自己的最后几篇文章里最尖锐地提出了文化问题，把它当作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中心问题。列宁同志完全有权宣布，在夺得和巩固工人专政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根本改变了。他写道：

“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而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①

想清楚领会本阶级的目标及其历史运动的每一个我党党员，每一个工人都应当懂得这一思想，懂得其全部深度及全部历史广度。马克思已指出这一思想的基本点。工人专政时期，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可以从一种特殊观点，即从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本身的改造的观点来进行考察。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巩固工人政权的观点来考察工人专政过程，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它，即从社会主义工业、运输业，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命脉”，或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的观点去考察它。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工人阶级本性的改变的观点去考察这整个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群众的改造、他们本性的改变和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本身的改造的观点去考察这整个巨大的世界历史过程。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写道，在伟大的国内战争中，在充满了把资本主义社会同共产主义隔开的风暴时期的各民族的战争中，工人阶级在改造自己的本性。列宁丝毫也没有离开过马克思的学说，而只是发展并加深了他的学说，他把“改造群众”这一问题看作摆在我党面前的极其重要、极其困难和很有份量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解释文化革命概念的时候是怎样提问的呢？

他说：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①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这些话时，不由地首先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在列宁同志的这整个方针中工人阶级被放到哪儿去了？为整个时代（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正是时代）提出两个任务：改造国家机关和全体农民的合作化。对那些到处寻找“民族狭隘性”和“农民倾向”的肤浅的“批评家”来说，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时代的任务说成是某种“堕落”的表现。然而，如何实际解决问题呢？当列宁同志说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时，他是把这一问题同提高工人阶级本身文化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的。因为苏联的国家机关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国家政权的骨架。而什么是我国的国家政权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在我们这里，国家是工人阶级的最广泛的组织。因此，改造国家机关这一列宁同志确定为时代的任务，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工作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应当按照什么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呢？按照同官僚主义斗争的路线，教育工人群众的路线，教给工人群众管理的艺术的路线。改造国家机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文化问题。列宁同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讲话中说：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文化落后性怎样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主义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①

在文化方面工人阶级只能一点点地“成熟起来”；它不是立即“成熟”的；它不是自己的一切阶层同时“成熟”的；它是可以说“一部分，一部分地”“成熟起来的”；并非所有工人都能进大学工人班和高等院校；并非所有工人都能成为红色厂长或苏维埃行政人员；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接近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如此等等。但是，尽管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工人阶级仍然一级一级地上升。一旦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稳坐在操纵杆旁边，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就将自然死亡。因此，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是真正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前提。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84—785页。——编者注

总之，以上所引文章中简略但清楚的线条所描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巨大的计划可分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民群众的合作化，为此需要整整一场文化革命；第二个问题是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关，用文化上成熟的工人去充实它的所有毛孔。全体合作化的农民同摆脱了官僚主义祸害的国家政权的骨干——真正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骨干之间的结合，这就是时代的伟大的文化组织任务。重复一遍，对列宁来说，处于最中心的是群众。我们许多年前（在党内，以及在党的周围）有过关于文化任务的论战。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自己的全部热情、怀着全部革命激情、举起自己的压倒一切的逻辑的所有沉重的圆石去反对我们队伍中出现的错误。许多人在十月革命后想立即升入无产阶级的天堂，心向神往，就无产阶级文化问题进行激烈的、热烈的争论，打算立即在科学技术的一切部门进行革命；某些人大概幻想用实验室的实验办法制造无产阶级文化。对这样提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各种各样的武器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为什么？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了。他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行动的。他正确地担心，人们热衷于臆造的、狭隘的实验室的、温室里的问题而抛开群众性的、最起码的，正因其起码而显得绝对必要的文化需要。他用同诸如贪污、共产党员的自大狂、文盲之类的东西作斗争去对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空谈”、“空话”，其原因就在于此。他说，敌人就在这里，需要予以痛击，要把我们的打击力量集中到这里来，那时就会收到一些效果。如果我们闭关自守，如果我们使工人阶级脱离群众，或者使阶级的一部分脱离整个阶级，或者使无产阶级的某个小集团脱离其社会脐带，那我们就会犯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误。问题不在于立即把所有的科学颠倒过来，问题在于瞄准识字和文化的最基本的敌人，以最快的速度摧毁之，把这些任务放在首位，把我党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用殊死的

战斗去打击这一敌人。

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第二个任务，这就是尽可能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的任务。要循序渐进，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初步的、起码的任务，不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解决那些不解决就会导致毁灭和垮台的任务，那就不能把重心转移到数学、生物学、物理学领域的革命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如此坚决地提出尽可能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的任务的缘故。在列宁格勒的群众大会上(1919年3月)列宁说：

“群众把它(即资本主义。——尼·布·)摧毁了。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在专家们的手中，在他们的头脑里。”^①

需要回想一下，那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并且还有我党党员——不懂得这种必要性，当时需要有列宁这样铁的意志和铁的逻辑，才不致于让“左的词句”断送正确的革命政策的生动的事业，通过极端复杂曲折的历史道路把无产阶级引出有巨大危险的迷官。

然而，如果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列宁认为必须把资产阶级文化完整地、不加触动地简单地搬到我们这儿来，那就是绝对不正确的了。列宁没有这种方针。列宁多次说过，应当借用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东西，坚决屏弃一切有害的东西。他对待宗教、哲学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等等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他多次抨击那些满脑袋资产阶级传统的人。其中甚至有他的这样一些言论：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编者注

他说，在艺术领域我们有许多来自资产阶级世界的人，他们在无产阶级艺术的外衣下给我们端来某种“完全是奇形怪状的东西”。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位天才的统帅，善于根据文化战线中这一或那一战场的重要性来配置力量。而这是正确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因为按照列宁的观点，我们的“和平组织”工作、“文化”工作等等不是什么和平的田园诗，而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甚至当列宁说“我们应当用敌人的手建设共产主义”，或“一个好的资产阶级专家胜过十个坏的共产党员”的时候，他说的也无非是这种用特殊方法进行的阶级斗争。

从列宁写作其最后几篇文章以来已经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的每一年都将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适用于每一个个别场合的现成处方将越来越少。然而，列宁主义决不能归结为这些现成的处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们具体地，抓住全部特点去研究现存的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那种认为可以把我们在二、三、四年前采用的口号和措施搬用于任何时候的思想甚远。而如果我们想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神行动，那么我们就应当看清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应当查明任务的哪些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任务的哪些部分尚有待于完成，如何另行安排这些任务，如何按另一种比例处置，在我们面前有哪些崭新的问题，等等。列宁的学生只应这样提问题。

在业已引用的论合作制的文章中列宁同志写道：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

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①

这些原理是否仍然正确呢?当然正确。不过,从那时起毕竟发生了某些量的变化。我们现在不再处于饥荒时期;尽管我们的国家预算极其紧张,存在一系列巨大的经济困难,但是从那时起我们的整个经济和我们的全部预算上升到了高得多的水平。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听起来只是良好的愿望(增加用于文化的物质资金),现在对我们来说不仅成了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们必须予以满足的必要,尽管在其他战线上还存在一系列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在教育事业上我们不能吝啬,现在应当更加尖锐地重申这一点,因为现在甚至一系列经济建设问题都要碰到文化问题上的障碍。例如,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工作中有一系列巨大的缺点:有失算和疏忽,有大量糟糕的设计方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这是我们的文化问题;我们甚至在直接生产方面也为下列情况面吃苦头:我们没有经常充分注意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以至于常常想去发现早已发现了的美洲;我们还没有学会很好地进行计算,虽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比对资本家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是大规模经济。我们的建筑造价太贵,因为我们的材料贵,因为我们采用过时的技术方法,而客观上是可以采取另一种建筑技术的。但这仅仅是事情的许多方面之一。难道生产的合理化没有遇到我们工人、我们职员、我们工程师、我们行政人员的文化水平这一更大的问题?难道我们城乡机关的恶劣工作不是与此联系着的?在群众有较高的文化习惯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提高小额储蓄的增长速度?难道不会去同不仅是社会祸害,而且也是我们经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官僚主义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如此等等。一句话,由于我们不够文明,我们常常在直接生产方面大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87—588页。——编者注

吃苦头。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有一定数量的资金，而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成果。请回想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所积累的2000万叫做巨大成就的情景。而现在我们拥有60亿的预算。这反映了我们苏联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第二，我们激发和提高了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高度积极性。我们也提高了群众的文化需求。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工人已不是革命前的农民和工人。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在最近四年也看到我们工人阶级文化水平、我们农民文化水平的很大提高，看到群众文化需求的提高。在农民中间工作的活动家之一、教育家、现我党党员沙茨基同志告诉我，甚至在卡卢加这样落后的省份，在农村有些农民家里可以看到有400—500册的藏书。“庄稼汉”有时在议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等。在十月共产主义的“匈奴”到来之前难道有过此类事例吗？我们现在已激发起群众的文化需求，以致于我们已难于实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所作出的诺言。因此非常自然地，我们党、工人阶级积极分子、最先进的农民阶层应当集中全力去满足广大群众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最起码的识字方面，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群众文化水平之所以提高，还因为全体群众的眼界大大扩大了。在政治教育方面群众的文化水平也空前提高了。

如果说到我们的成就，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一点也不违背实际地说，在政治觉悟、阶级觉悟方面，象我国无产阶级这样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也许甚至可以说，就我国农民所具有的政治见识而言，即就对世界政治大问题的政治认识程度而言，他们未必低于在经营等方面远为文明的西欧农民。

如果我们就这一文化领域而言，那么我们可以说，革命期间所完成的对群众的伟大的改造（有的是自发地，有的是自觉地进行，通过红军、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工人专政的全部机器），

使这些群众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全体劳动者的先锋了。

在工人阶级中间，在农民中间进行了极其大量的工作。在过去被认为是“异族人”的少数民族中间进行了极其大量的工作。决不应轻视这方面的工作。它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意义要大得多。我们还在最落后的劳动者阶层中间，首先是在妇女中间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工作。所有这一切没有工人阶级的专政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是工人专政在国内战争时期所使用的钢铁语言。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群众中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我们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干部队伍方面的工作中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我们取得了大量组织技能，我们取得了大量知识；我们取得了大量经验。难道我们现在没有提拔相当数量的我们自己的军事干部？提拔了。现在相当大量的红军指挥人员已不是旧专家，而是从社会“底层”提拔上来的熟练力量。加强整个军队的骨干已经由叫做工人专政的这一伟大的政治机器加工好的自己的社会材料、成份组成。我们已经开始提拔自己的技术干部。我们在全国拥有已经较有经验的我们的行政管理干部，他们首先来自经过国内战争、同饥荒斗争、同贫困斗争的严酷学校的工人。这些人是用非常结实、非常优良的材料造成的。这是些壮实的先进工人，他们在我们革命的战火中不仅使“膀、手和头”得到巨大的锻炼，而且也获得了同一定的理论修养联结在一起的大量的经验。正是他们直接掌握着我们这巨大机器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杠杆：经济的和政治的，苏维埃的和党的。所有他们这些人就其文明管理水平、就其经验、就其知识、就其技能、就其文化需求而言都远远超过投身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非常革命，但缺少经验的人们。我们干部的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最近以来我们开始提出(并解决)被弗·伊·推迟到遥远

的未来的那些任务，因为在那时候确实不可能提出这些任务。这些任务总的说可以叫做科学革命的任务，在科学中，在科学的方法，在科学的体系中的革命的任务。几年前还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而现在不仅提出了这一任务，而且已经在部分地予以解决。在一系列科学中，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早已拥有稳固的领导权的社会科学中，而且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正在进行深刻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探索到自己的阵地，并把自己的触须伸向那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惜在报刊上谈得太少了。我们已有来自旧学者的大生物学家，他们热烈地讨论生物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也充满了这种潮流。关于反射学、心理学、教育学也应当这么说。甚至有一个讨论数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问题的数学家协会。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已达到文化的最高领域，利用枪杆子、政治宣传、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在整个文化战线展开工作，登上文化大厦的每一层楼房，渗入到先前文化“最神圣”的领域，按照自己的面貌对它进行改造。在艺术领域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的任务不是列举这一领域中的所有新成就，但是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清楚，同我们极为密切的新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已在我们这里诞生。大家可以看出，今年是我们戏剧起根本改变的一年。象《暴动》、《铁甲列车》、《柳鲍芙·雅洛娃娅》、《决裂》的上演决不是偶然的。

不言而喻，这一切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如果艺术开始多少用真正的语言说话，并且不结结巴巴、含糊其词、目不正视，这就意味着相当多的群众“被提到”、“被调准到”革命的调子上来了。如果自然科学——更不用说社会科学了——开始经历一场自身的革命，这就意味着它们很快要成为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工具。如果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是“出于对强者的恐惧”而是由于信念，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站到我们的观点上来，这就意味着，新的一代

将更勇敢地跟我们走，将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发展。

这就是我们
在改造群众方面，
在改造和造就干部方面，
在科学和艺术革命方面的
成就和成果。

是否因此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呢？当然没有。我们只是迈出了最初的几小步。我们还飘浮在没颈的贫困与文盲的海洋之上。而我们面前的工作，热烈紧张的工作堆积如山。

不错，受旧世界神惠的我们的某些“文明的”敌人预言我们很快灭亡，因为据说我们“在历史上无用”。例如著名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比所有的“白军”要有毅力得多。然而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占星图的全部法则，我们仍然要灭亡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关于我们写道：

“具有铁心，机器灵魂和神经粗如缆绳的钢铁怪物……万尼亚舅舅或三姊妹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呢？”

我们的‘军事’方面军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对付得了他们用聚集的能量焚烧的可怕的反射器呢！

他们摧毁没落的文化，让新的意志统治大地。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将死于自己的空虚的细菌。”

不错，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预见到某些开始“内心空虚”的爱发牢骚的人，他们由于自己的“空虚”而甚至开始攻击我们的全部事业。但是这些“细菌”移到更北的地区去了。（笑声，雷鸣般的掌声）

至于我们的“空虚”，我党的“空虚”，那么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确实是个毫无用处的预言家。党是如此“空虚”，所以工人阶级对付那些企图在党的机体的毛孔中捣乱的“细菌”的办法是派出十万

战士组成的军队，他们直接由车床走向共产主义的队列。“钢铁怪物”之所以摧毁白军，决不是因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三姊妹的化身（他们也高喊“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但是这根本不象外省的小姐们；职业绞刑手，他们既有大炮，也有外国的黄金！）“钢铁怪物”之所以能摧毁他们，是因为率领了群众，依靠了无产阶级，并且这些“钢铁怪物”不仅不打算死于某种恶劣的细菌，而且要完全认清自己在所有文化战线的创造性使命，以日益增长的毅力更勇敢、更坚定地进行建设和厮杀，引导群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屈不挠地克服自己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如果我们现在自问，目前我们应做些什么，在这一文化斗争战线上我们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那么，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这样回答：在文化建设领域应尽快摆脱“旧的”业已打碎，而“新的”尚未建成这样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整个伟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规律性：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无不如此。有一个时候我们拆毁了旧的经济机关，当旧的劳动纪律摇摇欲坠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旧机关摧毁了。我们摧毁了这一旧的劳动纪律，但没有立即安排好新的劳动纪律。我们摧毁了旧的经济体系，旧的管理体系，但没有立即建立起新的。在军队方面，在军事领域也是这样。我们解散了旧军队，这样做是必要的，要知道不打破鸡蛋是做不成煎鸡蛋的。但我们未能立即组织起红军来。

国家机关方面也曾经是这样。在文化领域现在是这样，仍然是这样。例如，我们消灭了资产阶级市侩的道德，我们把它的骨架都拆了，它在我们旁边腐烂了，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建立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我们的任务适应的行为准则，那还不行。许多人鄙视旧道德（这很好），但还没有自己的准则，在某种没有阻力的真空中游荡。这很糟糕。这使我们遭受极大的损失。

在生活领域，在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方面，在艺术领

域以及其他一系列实际上构成叫做“精神文化”的领域，我们还没有“为自己建筑起房舍”，而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没有建设的草图。这经常起很大的消极作用。大家都知道在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的有关例子：摧毁（也应该摧毁）了旧的家庭两性“道德”，但正在制订的这一领域的新的行为准则起的作用还很弱；因此，由于这种过渡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某些反常的、极端恶劣的特点：摧毁了职员和官吏们“每逢20日领薪金”的旧思想，但却没有投入全部必要的力量去培养为劳动人民服务、尊重“申请者”，特别是尊重劳动人民的“申请者”、节约国家资财等等以及诸如此类的思想；我们粉碎了过去臣民听命于长官的“楷模”，但是要说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培养出——并且是大批的——自觉的社会工作者，在所有建设战线上打击阿谀奉承者、损人利己者的战士，那还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走向这个目标，但仅仅迈出最初几步。不仅生产，而且生活合理化的整个问题在我们面前只是个需要解决，或准确点说，开始解决的问题，任务。在这里我们需要加紧干，不管说的是群众，还是干部队伍，甚至是“上层”领导人。在这里我们不仅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事业，我们常常甚至还没有奠定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要说在这一领域摆在我们面前的某些共同的任務，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我们应当尽快消除旧的被摧毁，而新的尚未建立这种过渡状态的残余。从这种方针出发，我们必须在第一，对群众，第二，对干部队伍，这是这些群众的先进阶层，第三，对最熟练的领导阶层上，为自己提出一系列任务。如果说的是群众，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自然是尽可能迅速地沿着最起码的能读能写的路线前进。“削减”农村图书阅览室、图书馆甚至学校，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有时却有这种情况。在这里现在决不允许“吝啬”；不扩大教育机构网是不可能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我们应当更广泛地关怀群众的健康，特别是开展防治酒精中毒和梅毒的斗

争。只有文盲和确实不文明的人才会无视这些任务。不久前我看了一本用俄文出版的德国教授布姆克的著作，书名是《文化和蜕化》。布姆克以一系列资料证明，最近时期特别损害群众活动能力的正是酒精和梅毒，而这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强烈地感觉得到的。同酒精中毒作斗争，组织真正合理的娱乐，编制合适的电影和广播，全力发展体育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教会广大人民群众使经济合理化和善于正确计算。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而且也适用于农民。例如沙茨基同志调查了许多农户并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尽管预算水平很低，但是——甚至在这种预算范围内——也可以达到大得多的生产效果。列举了对农民预算及相应的结算所作的准确调查的例子，这些都通过学生通知了农民，它们造成了强烈的印象。这些结算清楚地表明，甚至在通常的预算范围下，农民经济也可以向上跃进好几级。其次，应当想出一系列措施帮助农民不仅关心他的农户，并且还要关心比如说整个乡，关心乡的预算，即“公共”经济。要知道，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方针：使这些乡变成列宁称之为“公社国家”的组成部分。关于工人预算、关于他的家庭预算问题，关于工人参加生产、关于对生产过程的更稳定的兴趣、关于以更自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明态度对待生产等问题乃是我们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还需要推进生活的合理化事业。应当说我们还是极端不文明的，特别是同我们面临的那些任务比起来。我们有时甚至未能略尽微力去改善一些小事情，而有好多事是取决于这些小事情的。关于娱乐、俱乐部、广播、电影问题，关于洗澡房、洗衣房、面包房、学校和图书馆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日常生活”问题常常是这样“解决”的：我们描绘一幅一般“任务”、“计划”、“方针”的美好图景，而把所有这些愿望付诸“实施”则极端缓慢。然而，列宁就曾指出，我们的宣传应当是展示、范例、认真的执行，而

不是“政治叫喊”，它在过去是有益的，而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有大量事实说明，如果用良好的指导取代目前的检查和书面报告形式，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完全可以获得胜利。现实的实际帮助决不会使农民、工人、一般劳动人民感到失望，这里可以感觉得到的是真正的生动事业，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因循。既然说的是群众，那么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然而，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干部队伍，这些任务就不能得到解决。一个农民很形象地说出了我们的缺点，他说：“你们共产党人中急性人很多，但是办事人太少。”（笑声）这相当正确。“急性”就是我们高速度地任意“拟定”和“作计划”。而检查执行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少次强调过这一任务！），我们还没有进行，然而正是实际执行通过的好决定才是以示范作宣传的最好方式。关心农村的实际经济和文化问题，甚至在极微小的“小问题”上给以实际帮助，这要比一大堆“政治叫喊”有说服力得多。应当把这种宣传形式和这种工作方式提到首位。但是还有许多起码的“美德”，我们的干部队伍在实践上还很少知道，还很少成为血肉相关的东西。提一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对建设时期来说最为重要的那些简单的口号是极为有益的：要懂得算钱，要节约地搞经济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做不到这些。如果我们的干部真正具有这些极其必要的品质，那么我们这里难道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失算？那就不会出现。“要一丝不苟”，这也是一条最起码的规矩。但是难道可以说，我们的干部队伍已掌握了这条规矩，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百分之百地做到一丝不苟？决不能这么说，至今在我们这里还有真正俄罗斯的粗枝大叶的遗风。需要学会更快地决定方针，更为善于执行，更为认真求实。需要培养自己具有群众的感情，联系群众的感情，经常不断地关怀这些群众的感情，要到处如此面不管你是否坐在托拉斯、辛迪加、工会、市苏维埃、省委和县委办公室

里。必须反复培养责任感：在我们这里经常有这种情况，由于我们组织上的杂乱无章，根本弄不清楚谁负什么责任。培养这种责任感，对我们阶级、对我们国家、对自己的责任感，这也是一项文化任务。在我党的某些阶层中有某种安于现状的倾向：感谢上帝，我们摆脱了饥荒！应当千方百计地打消这种官僚主义的自满情绪，因为自满的心理状态是非布尔什维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心理状态。怀着这种心理状态我们是走不远的。需要劲头十足地向每一个工作人员，向我党的每一位真正的、忠诚的战士提出这一问题。只要我们活着，就决不能满足于现状，决不能“高枕无忧”！

其次，我们必须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专门知识。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缺陷。例如，我们很少中级技术员，我们的新工程师不够熟练。中级技术员，中级农艺师，这种人材我们非常缺乏。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不熟悉许多要求有专门知识的具体的实际问题，因而现在常常不能完成自己的党的政治工作，因为现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对那种只谈张伯伦而一点也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农艺学，也不懂得技术的那种政治领导人是不会感到满意的。我党党员不仅执政，还要管理，不仅制定“路线”，还要实际贯彻；他们不仅是“一般政治家”，并且也是“行政管理人员”。既然如此，这些工作人员就应一年一年地掌握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的知识。在这里除了增加这些知识，增强对群众的责任感，还应特别注意所谓“小”问题。

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实验：从刊载在《经济生活》、《劳动》、《汽笛》、《真理报》、《工人报》等报刊上的“工人生活栏”，从有关的工厂通讯中剪取关于各种各样的缺点和胡作非为的评论。现在再试分析这各种各样的缺点，你们最后会得出结论，十分之九的各种胡作非为都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只要对事情采取用心的态度都是可以予以消除的。如果说在工人群众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

对国家利益的不自觉的态度的残余，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我们的管理干部，其中包括党员的不文明现象。如果说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有时有一种懒散的心理，那么在干部身上经常有一种“马马虎虎对付过去”的愿望（“过去活得更糟，现在能马马虎虎活下去也就行了”，“一切都已经不错了”等等）。这是腐朽的心理。每一个领导者，首先是共产党人，都应当是文化拓荒者的榜样，非常小心仔细地寻找所有的缺点并坚决地予以纠正。不应把任何一件小事看作是小事而放过它。不应当有这样子的“小事”。“生活”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这些小事甚至能成为政治因素。对这些“小”缺点采取无精打采的、奥勃洛莫夫式的态度是一种我们应当予以扑灭和消灭的瘟疫。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督促我们的全体干部——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工会、苏维埃和党的干部。“马马虎虎”对待这些问题的人不配做一个共产党人。对群众的直接需要采取这种马虎的态度，这种不经心的态度很容易变成丑恶的官僚主义，官僚的自满自负。这是我们应当动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的野蛮行为。应当告诉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如果你自己树立一个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和自满自负的榜样，那就不能教育群众，不能要求群众登上越来越高的劳动文化的阶梯。必须倾听来自群众的每一个批评性意见，而不应当把任何批评说成是反苏维埃行为，就象恶毒的弄臣或任意胡为的官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至于那些更“高”的领导干部，那么这里应当提出大致如下的问题：更多地熟悉西方和美国的经验，更多地考虑我们的巨大的经济的以及各种其他的计划和策略；深入研究专门领域的一系列科学问题，定期巡视苏联。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性和求实精神，革命性和美国作风是共产党人的任务。但什么是革命性？革命性，这就是使基本的革命思想——在我们的条件下就是国际革命思想——的每一个步骤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者同时并列，互相

依属。革命性并不仅仅是以这种思想的，理性的观念为前提的。革命性还要求有明确的情绪，革命的激情，革命的乐观主义。革命性要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明确的信念，革命性要求否定抱怨诉苦、悲观主义、灰心丧气和任何腐朽情绪。这种腐朽情绪是同任何真正的革命方针根本矛盾的。一个上升的阶级是不能对腐朽没落的心理表示同情或与之发生联系的。我们的乐观主义当然不能混同于愚蠢的乐观主义，后者断定世上的一切都是善的，伏尔泰的书中有一个人物潘格洛斯，他在地震和得重病时断定，“在这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也不能持某个怡然自得的奥古斯廷的观点，此人断定，上帝创造“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出“善”来。我们既不是潘格洛斯，也不是怡然自得的奥古斯廷。但是我们应当同蜕化、颓丧、瓦解的任何表现进行坚决斗争，不管它们是表现于文学（叶赛宁主义），表现于政治，还是表现于生活。自然，一个上升的阶级只有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它才能完成面临的任務，创造自己的伟大事业。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其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在这些艰难时期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它是个不屈不挠的党，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从来不失去对自己的伟大事业的信心。在这一方面它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新人新战士的典范。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有一首题为《护民官》的出色诗篇，其中几乎每一个字都适用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无产阶级群众的钢铁般的领袖：

死亡对他来说算什么？

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实现了尘世的心愿……

.....

在离开人生舞台的时候，
他知道，后有来人。
他率领怀有赤子之心的人们，
去揭开未来的幸福的帷幕，
暂时的落潮他毫不惶恐：
更大的涨潮就在眼前。
他的目光射向看不见的远方，
看得多么遥远！
不是人人都能照先知所指去做，
但他的思想终究得到了实现。
他把乾坤征服，扭转，
他把天地改换，
给它穿上新形式
——他那严峻的头脑的首次发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自己的严峻的头脑”发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新形式”。这已记载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中，它已成为世界革命的口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大家面前打开了我们的未来的帷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时还展示了这样一种典范的人，他不顾任何障碍，不管任何局势，甚至最艰难的局势，决不放下革命的旗帜，并且象钢铁巨人一样走向自己的目标。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广阔的世界历史前景。远方伟大革命的轰鸣声震撼着大地，革命规模之大甚至超过我们所曾经历和所曾感受过的革命规模。广大群众投身于运动，我们国家里为继续进行伟大的创造打开越来越多的大门。当我们读到出于对“野蛮的匈奴”的恐惧而写下的那些愚蠢的语句时，当国际资产阶级那“文明的”屠夫指责我们这新生活的建设者“野蛮”时，我

们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正在创造，我们一定要创造出这样一种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在这种文明面前看起来就象“犬吠圆舞曲”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前面一样。（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一次发表于1928年。译自《真理报》

1928年1月27日。

论农民政策^①(摘录)

(1928年7月10日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假使我们想要赶上西欧——而我们是想要做到这点的——，假使我们为了社会主义工业想要增加积累速度——而我們也是想要做到这点的——，假使我们考虑到我国整个经济的落后状态、我国的贫穷状态，那么，十分明显，由于这一切，我国的建设会有巨大的困难。我们想要一下子完成一系列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工业中最大限度的积累，农业中最大限度的增产，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的最大限度的消费额，以及他们精神面貌的最大限度的提高，等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同时解决的。我们总是碰到什么便解决什么，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自相矛盾。我们时时刻刻在矛盾中移动。这样一些困难是由于我国改造时期的性质产生的，这是合乎道理的。例如，我请你们注意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我们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又从那一方面而抱怨经济的比例失调。

伏罗希洛夫：把你的万应药方告诉我们吧。

布哈林：我并不想开一个万应药方，请你别拿我开心。我想要说的是，改造时期十分自然地带来一系列的混乱和困难，不过同时我认为毫无疑问，这里有种种不同的困难……现在当我们说——用斯大林同志的提法——，“我们的结合受到威胁”时，这是不是适

^① 此材料根据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译出。

合于可能引起破裂的那种情况呢？当然适合。对于结合的威胁就是可能引起破裂的情况。可是列宁说过，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不让这种不协调现象发展到严重的阶级不协调的程度……在国内开展改变我们的选举指示的极微小的运动，都意味着动员富农分子、许多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层等等来空前激烈地反对我们。这些力量的后备还非常雄厚，我们党的队伍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丝毫动摇都会产生无比重大的政治影响……由于实行粮食税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对富农让步、取消向富农大举进攻的口号来纠正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呢？绝对不是。当前的问题是要消除对同中农的联盟的——这是现在我们所寻求的——威胁。我们正在取消非常措施，而且我们决不把这些非常措施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混为一谈……我们今年会不会遇到我们去年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呢？可能。我们如何对付呢？如果在明年遇到这样一些困难的话，我们还要采取非常措施，但是假使我们采取的话，我们要不要做到同样的程度呢？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麻烦而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想提出一种设想或者类比，这乍一看来会显得荒唐而可笑。

请考虑一下：你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权，可是你们正在用强制手段把农民赶进公社。

伏罗希洛夫：比方象在 1918 和 1919 年那样。

布哈林：那时候你们就会招致由富农所策划的农民暴动；富农组织和领导这种暴动。

小资产阶级分子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对它迎头痛击，而进行一场残酷的阶级战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归于消失。这里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斯大林：基督是可怕的，但是上帝是仁慈的。（笑声）……

布哈林：我们决不应容许再度大搞非常措施了。

柯秀尔：这是对的。

洛佐夫斯基：目前这并不取决于我们。

布哈林：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的政策的中心是：我们决不应容许对于结合的威胁。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列宁的基本遗训……

译自罗伯特·V·丹尼尔斯编《共产主义史料》，
纽约1960英文版第306—308页。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

新的经济年度正在来临。每一个有思想的工人，特别是每一个党员工人，都感到需要作出某种总结，需要指出一个远景，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全貌，这是十分自然的。请读一读许多工人的来信和在许多集会上递交的条子，请听一听许多普通无产者的发言。文化上和政治上有了多么巨大的提高！群众脑子里所想的问题和任务的水平多么高！对这些事情“寻根问底”的需要是多么迫切！老掉牙的，死板的空话多么令人不满！这些空谈简单得象一块木头，而且千篇一律，就象一粒豌豆与另一粒豌豆相似一样。必须承认，在这里对群众要求的和向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我们常常提供冰凉的或者马马虎虎热一热的食粮）之间的“剪刀差”，大部分要归咎于我们，特别是归咎于我们的报刊。难道那些经常在人们脑海中盘旋的迫切的和“敏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足够活跃的反响吗？难道我们对所出现的各种疑问作了充分的解释吗？难道关于我国经济的状况作了令人满意的严肃认真的报道吗？难道我们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群众充分地提出过我国经济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吗？没有，根本没有，我们这里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我们必须在填补这些漏洞以后，才有权利谈论认真努力吸引群众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这不仅在于宣传。为了从我们的过去吸取各种教训，为了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我们本身对改造时期条件下所出现的全部新事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正是我们“行动缓慢”的原因：我们只是在沙赫特事件以后才提出了我们的专家问题；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和与此相联的震荡等等以后，才注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一句话，我们的行动多么象真正的俄罗斯谚语：“天空不打雷，庄稼汉就不祈祷。”

当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开始用最勇敢、最坚决的方式来重新部署我们的全部队伍。这样大规模重新部署各种力量，加上大力宣传象“学会做生意！”之类的口号，曾是我们取得经济成就的前提。

当然，向改造时期过渡，并不是象在1921年那样，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根本转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过渡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比方说，修桥和造桥之间就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既要求精通高等数学，又要求通晓材料力学和各种其他知识。现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情况也是这样。改造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极复杂的技术任务（设计新工厂，新技术，新工业部门等），提出了一系列极复杂的组织-经济的任务（组织企业劳动的新制度，工业的标准、分区，整个经济机构的形式等等问题），提出了整个经济领导方面的一系列极端困难的任务（各种基本经济成分在新条件下的结合，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在阶级斗争新条件下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着的经济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一系列有关人员机构的问题（一方面是吸引群众参加实现合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熟练干部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德国和美国）所取得的巨大技术成就和世界生产的增长，使我们的国内问题变得特别尖锐。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重新部署我国各种力量这一必要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我们

还没有按照事物客观发展所要求的规模、速度和毅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上一经济年度对我国经济在整整三年改造时期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国家已经大大向前跃进了。我国的流亡者布鲁兹库斯、札哥尔斯基和形形色色的外国科学“明星”，从里加出版的大量“新闻”收集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自命不凡和煞费苦心力图证实张伯伦之流在他们的失眠之夜所想象的“苏联经济破产”、“共产主义破产”、“布尔什维主义破产”和诸如此类的“破产”这个题目，读到他们这些博学多才的论调，简直令人发笑。但是对于每一个不抱成见的观察家来说，只要他具有最起码的客观判断力，都会了解，不管人们如何歪曲事实，苏联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曲折路线本身尽管表面上好象是突发的特殊的经济“危机”，但决不是白卫分子心中所渴望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破产”的先兆。

最近几年，我们在许多生产部门，首先是工业生产部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已在巴库地区牢固地扎下了根，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技术革命，几乎按美国的水平更新了设备；我国的机器制造业，国家进一步变革和工业改造的主要杠杆，已有长足进步；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达到了战前水平的3倍；电气工业这个崭新的工业部门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也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一次能够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电气化和发电厂的建设正在占领更多的新阵地；经济技术革命正把自己的触须伸入乡村：它正在大力支持和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它已经把30 000台拖拉机送到了我国的田野和草原，在我国的最落后的真正荒凉的地区，作为技术改造队的拖拉机队已经不是稀客；拖拉机犁第一次耕翻了萨利斯科的、乌克兰的、哥萨克居住区的和伏尔加河沿岸的草原地带的荒地，荒草最后一次唱起自己的挽歌。

让我们来看一些枯燥的数字，它以严格的语言说明了我国正在继续进行的这种革命。

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全部国营成分和合作社成分的固定资本，以1925—1926年的价格计算，在3年内（1925—1926年度到1927—1928年度）增加了40亿卢布（增加14%以上）。

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固定资本，按上述价格计算，在这3年内已经从63亿卢布增加到88亿卢布，即增加了25亿卢布（增加39—40%），而且，去年的增长速度就达到了15%的巨额数字。

这些材料说明了实际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如果看一看投资总额，也就是说，把补偿用掉部分的“资本”算在内，我们就可得出下列数字：

全部公有成分：这里的每年投资额从20亿卢布增加到34亿卢布（按上述价格计算）。

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在这里，相应的数字1925—1926年为89000万卢布，1927—1928年则为15亿到16亿卢布。

值得注意的还有新的工业建设也在不断增长。用于这种建设的资金在分配给工业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不断增大：它在1925—1926年占12%，在1926—1927年占21%，在1927—1928年占23%。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成分中的比重增长得特别快，等等。这里的特点是：根据最近调查，农民的收入几乎有一半来自工业的（手工业、建筑业、木材加工等等）收入^①。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是多么迅速，同时国家整个经济的社会化（公有化）进程是多么鲜明。排挤私人经济成分的数字是人所共知的。全国的商品贸易额，特别是城乡贸易额，

^① 见计划经济委员会1927—1928年的《控制数字》第16页。

正在增长。商品运输量扩大了。预算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在逐年增多，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如此等等，等等。

但是，在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主义的肯定无疑的增长的同时，产生了独特的“危机”，尽管我国的发展规律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性截然不同，这种危机却似乎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再现”，当然，它是歪曲地反映出来的。在这里和那里，都出现了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失调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群众的求大大低于供，这里是求过于供）；这里和那里都投入巨额“资本”，但这种投资与特有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困难”（在我国）联结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是“颠倒的”（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缺乏）；这里和那里都存在着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比例失调，但在我国典型例子是金属荒。在我国，在工人就业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存在着失业现象。甚至“农业危机”在我国也表现出一种“颠倒的”景象（粮食供应不足）。一句话，特别是去年，向我们提出了我国的“危机”问题，即出现在由落后的，就居民成分而言是小资产阶级的，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过渡经济的最初时期的危机问题。

大家知道，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之间包括生产和消费之间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或换句话说，他是根据资本主义不能使生产的各种要素“保持平衡”而得出这种危机的结论的。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回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群众的消费、它的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生产增长和分配关系之间发展着的矛盾的整个机体中，就已经包含着这种穿上经济范畴外衣的阶级斗争。

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企图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同经济关系分开，他在自己的“社会分配理论”中仅仅强调“阶级斗争”的因素，抛掉它的经济定义，而他在自己的危机理论中则排除群众消费的因素，从而也就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的因素。然而，唯一正确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资产阶级理论。因此，我们可以并且也应当用马克思的方法论，而不是用表面上也似乎“建立”在“阶级”原则上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社会分配理论”，来考察我国的“危机”问题。另一方面，例如责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图式忽视了阶级问题，那是可笑的：谁要是这样看，他就是既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懂得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会尖锐化。但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人们对于这个社会也能够（当问题已经是关于这个社会的时候，更有“权利”）参照《资本论》第2卷来规定再生产的图式，即规定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致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确定动的经济平衡的条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实际上就在于此，这一计划愈来愈近似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表；这样一个自觉地提出的计划既是一种预测，又是一种指示。

现在，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如果我国“危机”似乎具有“颠倒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如果群众的实际需求超过生产，那么“商品荒”是不是我国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否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另一关系面注定要经受颠倒的基础上的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性的”困难是不是我国发展的铁的规律？

在我国的经济著作中碰到的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其出发点就包含着一定的错误。这里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

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落后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更为迅速增长的需要(落后于广义上的“需求”);另一种是特别尖锐的“危机”形式即商品荒的形式(这里问题在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第一种现象只是表明一个事实:社会确实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的增长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成为手段,等等。破坏再生产过程的危机性质的因素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只在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也就是在再生产的各种因素(包括消费因素在内)不能正确协调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和资本主义相比是歪曲的“危机”性质,是由群众需要和生产之间确实崭新的关系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发展着的对抗(恰恰相反,生产不断追赶作为整个发展基本动力而走在前面的群众消费),因此,这里没有“危机规律”的基础,不可避免的危机规律的基础。但是,这里也可能出现危机,它是由相对无政府状态即由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产生的。

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或相对计划性——是建立在小经济和市场联系的形式,也就是说,存在着大量无政府状态的成分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计划本身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远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备的”计划。这种计划有许多对自发的合量的预测的成分(例如,对粮食产量、商品粮食额、全部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商品量以及价格等等的计算),这种合量是这种或那种指令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有“理想的”计划。正因为如此,这里可能出现某种程度错误。但是,一个能够得到解释的错误,甚至不可避免的错误,仍然是个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基本比例的严重破坏(例如我国谷物经济的情况就是如此。下面要说到这一点)和与此相应的错误计算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如果说任何好的计划都不是万能的,那么坏的“计划”和所有坏的经济调度则会把好事也都办糟。

我们过去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争论时(见《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文集)曾经证明过:不能过高估计计划经济的因素,也不应当忽视大量的自发性成分;我们当时就应当领会这条真理:“自在”的,即与农民市场无关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的概念是一种荒谬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计划的力量是相对的,它的结构是特殊的。我们在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争论(见《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时曾清楚地说明:在分析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性时不应当撇开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因为这里很大一部分经济是国营经济(和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组织,等等。因此,尽管我们计划工作具有相对性,其作用确实是巨大的;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

从“商品荒”不是过渡经济的绝对发展规律,从基本经济比例的“危机性的”破坏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

任何抛弃这项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任务的行为都是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投降,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这种反映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有名的历史口号的体现。本来论证这种公理是可笑的和多余的。但是,我国官僚主义机构的保守主义和习惯势力竟如此严重,以致人们必须“论证”它,因为在这种机关里,这样一种奇怪的思想还完全占着统治地位:既然反正会有困难,那就睡大觉去吧!

改造时期要求经济领导仔细考虑现行政策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又提出了城乡关系这个“讨厌的”老问题，而似乎能包治百病的旧“药方”也重新提出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腹语术者，这些握苗助“长”者，还有为“加紧进攻富农”而痛哭流涕的殷实农民的小资产阶级骑士们，他们这些人都由于粮食收购困难而忙乱起来，他们活跃起来，开始重新炮制他们的灵丹妙药，并且提出了（提过多少次啊！）种种希望、要求、警告和威胁。我们现在也要再一次从批判地检查我们的路线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中的问题”。

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之间划了一条历史分界线，但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是有益的。甚至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角度，利用这些经验对我们也是有益的，何况我们记得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些关系不难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赤贫如洗，实行充饥租佃，庄稼汉遭受残酷剥削，国内市场的容量极小（例如革命前的俄国）。

第二种类型，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等等。

第三种类型是“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自由”，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不存在绝对地租，存在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

我们看到了什么？不难看出，工业发展的力量和规模、生产力提高的力量和规模正是在美国达到了顶峰。

托洛茨基分子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抽取的问题（抽取“技术许可”抽取的一切；要比沙皇制度拿得更多，等等），他们想在上述历史系列中用苏联“代替”旧俄国，而应当做的本是用苏联“代替”美国。因为如果美国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最迅速地发展农业和全部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斗争的基础上，在同起决定作用的农民群众结成紧密的联盟的条件下更快地前进。

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家天真地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但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才会打破纪录。然而，这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因而远不是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为前提。过渡时期开辟了一个城乡关系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将结束农村一贯的落后状态，结束“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为消灭城乡对立这一方针奠定基础，使工业本身“面向农村”，使农业实现工业化，从而使之由历史的后台转到经济历史的前台。可见，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骑士们要“保护”农业免除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他们的立场实质上是要永远保持小经济和它的可怜的技术，永远保持它的家庭结构及其低下的文化水平。这些“小业主”思想家保守透顶，他们把小农场看做技术、农艺和经济的主要东西，在以实行革命改造和集体主义为标志的时代，保护守旧习气和个人主义；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真正的富农分子开辟道路。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则不懂得农业的发展要依靠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

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他们不懂得，正是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

我们必须从克服这两种“社会思想”的必要性出发，现在就解决目前时期我们苏联工业和农业关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这些引人注目的基本事实是：在城乡周转普遍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商品荒，这就是说，农村的需求不能（严重地不能）得到满足，因而似乎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存在着粮食困难，与需要相比粮食供应不足，这就是说，似乎农业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生产巨大增长，基建投资大量增加，同时商品极为缺乏。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有这些“反常现象”必须得到解决。我们政策的基本准则也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托洛茨基有时从不断吵嚷中得到片刻休息的时候，他就企图在他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声明（《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一个闻所未闻的诽谤性的、大吹大擂的文件——中到处提出论证。他的论证的最重要论点如下：

1. “农业落后是一切困难的根源，这自然是无可争辩的”；
2. “目前的农业就其类型来说，即使与我国极落后的工业相比，也是处在严重落后的状态”；
3. “尽管与农业相比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高得不可比拟，但是，它不仅没有增长到起领导作用和改造作用，即对农村起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作用的程度，而且甚至不能满足当前商品市场的需要，因而也就妨碍了农业的发展”；
4. “只有通过工业才能向上提高农业（好象还能向下提高农业似的！——尼·布·）。其他的杠杆是没有的……把农村在历史上总是落后于城市和城市不能满足今日农村的市场需要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是取消城市对农村的领导权。”

从这些见解也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党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以来执行着右倾政策，即工业化实行不够，因而也是损失时间的政策，由此就产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托洛茨基断言，党在2月承认了工业落后，但是，党现在(在七月全会和取消非常措施以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如此等等。总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工业化，而且要超过现在已做的一切(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谈作者的其他“结论”)。

人们对这些意见感到吃惊的不只是它们与不断革命论作者从第一批控制数字(大家知道，这些控制数字是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很晚才发表的)中所听到的“社会主义音乐”是极其矛盾的。这些意见之令人吃惊，首先是对发展的进程没有作任何分析。不论是同农业固定基金相比的工业固定基金问题，还是工农业生产的产量问题，或者是这些比例的变动问题，作者都不感兴趣。但是，许多与此有关的事实，即使对那些大大被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诽谤所蒙蔽的人也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些事实表现在下列数字中①：

A. 固定基金的增长(与上一年度的百分比相比)

I	1925—26年	1926—27年	1927—28年
国营工业	+8.0%	+10.7%	+13.1%
电气化	+21.3%	+44.1%	+44.0%
国营工业和电气化	+8.6%	+12.4%	+15.1%

II

全部公有成分(国营工业+

① 这些数字是我们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中引用来的，不过不是1925—1926年的控制数字(象托洛茨基在1925年所做的那样)，而是1927—1928年的控制数字(第520—522页，——百分比是我算出来的，——第464—467页)，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现有工业的统计数字除外，后者是从1927—1928年《工业和财政计划汇编》中引用来的(第97和99页)。应当注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材料对工业生产估计偏低，对农业生产则有点偏高。同志们可以从国家计划委员会1928—1929年的《控制数字》(它大概很快就会发表)中找到更新的材料。

电气化+运输业+住宅建设 和公用事业+合作社)	+3.5%	+5.5%	+7.6%
III			
农业(总数)	+4.6%	+4.3%	+4.7%
其中个体农业	+4.5%	+4.0%	+4.3%

B. 生产总额的增长(与上一年度的百分比相比)

I			
全部工业(按战前价格计算)	+39.3%	+13.7%	+13.4%
其中注册工业①	+45.2%	+15.1%	+14.3%
其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 属工业(与1926年10月1日 的出厂价格相比)	—	+19.6%	+23.1%
II			
农业(不包括林业、渔业和 狩猎;战前价格)	+20.6%	+3.9%	+3.0%
其中谷物	+32.4%	+3.8%	-1.9%

C. 商品生产的增长(与上一年度的百分比相比)

I			
全部工业(战前价格)	+38.5%	+13.5%	+13.9%
其中注册工业	+45.2%	+15.0%	+15.1%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工 业(按照1926年10月1日 的出厂价格)	—	+15.1%	+17.6%
II			
农业(不包括林业、渔业和 狩猎;战前价格)	+11.3%	+8.1%	+8.9%
其中谷物	+30.8%	+10.2%	+6.8%

从工业的这些破纪录数字可以看出:问题不简单是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比农业的“类型”高得多(这条神圣真理几乎用不着再提);不只是“类型”,而且具体的发展进程都显示了工业和整个公有化部分的巨大优势。从工业的这些破

① 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1933年前指拥有16名工人以上的有机动力的工厂和30人以上的无动力的工厂。——编者注

纪录数字还可看出，我国工业不能满足农村需求的根源，不能用所谓发展速度低（在现有的资金、后备和可能性的情况下）来解释，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各国简直高得无可比拟（甚至工业品生产的增长也比农产品生产的增长快得多）；这些情况说明，问题决不是工业落后于农业。总之，从这些数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另找一种不太简单的、但更符合实际的解释。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对上述事实不仅“不感兴趣”（在1925年他们对于类似事实确实发生过兴趣，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也“没注意到”另外一些极其重要的事实。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皮相的论据，断定农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他根本不力图说明，这种需求的性质是怎样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为什么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主义者”把农村的需求同农业的需求，特别是同谷物业的需求，从而同那种建立在相应的农业生产或甚至谷物生产的变动的基础上的需求混为一谈呢。（只有在把这两种需求混为一谈的情况下，才会根据农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提出工业“落后于”或“不落后于”农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根本，正是根本，不试图分析一下农村需求的构成呢？

我们在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中已经看到，“根据最近调查，这些收入（即非专门农业性质的收入。——尼·布·）的总额几乎等于出售农产品所得收入的总额。”^①在1927—1928年度，出售农产品（除农村内部的售卖以外）所得收入为263400万切尔文卢布，而非农业劳动（农村外的）收入为24亿卢布^②。

因此，实际上农民的几乎一半收入（从而，农村的几乎一半需

^① 1927—28年度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数字》第16页。

^② 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第468页。

求)不是来源于农业,而是来源于别的收入,首先是来源于与工业本身(建筑劳动等等)相联系的收入。因此,根据农村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一事实而得出工业落后于农业的结论,是荒谬的。

第二,如果在作这一结论时(象批评者先生们所做的那样),把它同粮食收购危机联系起来,即同谷物业问题联系起来,那更是加倍地荒谬了。今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反对派关于农村有“极其巨大的”粮食实物储备的童话,一切关于有9亿普特储备的大话,已经象美丽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没有人再相信这些童话了。相反地,愈来愈明显的是,在我们这里生产的粮食很少,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常常把农村中增长着的收入,农村的总收入同出卖谷物得到的收入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根据农村收入总额的增加错误估计谷物生产变化的情况。

甚至按照预定的1927—1928年度的控制数字的材料(结果发现,这些材料过高估计了1927—1928年度的谷物产量)也可以看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根据这些材料,1926—1927年度谷物产量为377 900万战前卢布,1927—1928年度为370 800万战前卢布;1926—1927年度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度提高3.8%,而1927—1928年度却降低1.9%(实际上降低得更多)。用切尔文卢布计算,两个年度都是降低的,1926—1927年度降低15.5%,1927—1928年度降低0.6%。^①

因此,在工业蓬勃发展、人口大大增加、居民的需要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粮食数量却没有增长。难道还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粮食问题抱漠不关心的态度就会是一种真正的犯罪?难道还不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对问题的提法和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将直接导致真正的而不是想象的破产?

^① 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第464、465页。

粮食收购危机决不是工业品商品荒下的粮食“过剩”的表现。这种“解释”经不起任何批驳。粮食危机毋宁说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谷物业的稳定或者甚至下降造成的，它是在下列情况下出现的：1. 谷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之间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2. 非农业来源的收入增加；3. 对富农经济的税率提高得不够；4. 对农村的工业品的供应不足；5. 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影响增长。

实际上这一危机是同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同谷物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比例极不相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从谷物业中（相对地）转移了。不言而喻，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在产粮区。北高加索提供了一个不正确地运用价格政策的突出的例子（这个例子虽不典型，但终究是一个例子）。在这里，1 俄亩的小麦产量 1925—1926 年为 69.9 普特，1926—1927 年为 37.9 普特，1927—1928 年为 29.8 普特。当产量为 69.9 普特时，收购机构规定的价格为 1.15 卢布，当产量为 37.9 普特时规定的价格为 1.02 卢布。其结果是：扣除种子，农民每一俄亩的收入 1925—1926 年为 72 卢布，1926—1927 年为 32 卢布，1927—1928 年为 24 卢布。即使这些材料不完全精确，它们也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倾向。当然这是一种例外情况，不能由此判定总的情况。但它不仅表明了我们整个计划经济工作的巨大缺陷（对苏联全国的谷物作了错误的估计），而且也表明了各地区做法上的巨大缺陷。

如果说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产粮地区，那么它最后也必然会表现在消费地区；这些地区粮食供应的缺乏必然会导致自然经济倾向的增长。

这里谈一下价格规律的意义。由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首倡，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家们认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必然愈来愈强制作用于作为商品生产的平衡规律的价值规律。分析这一论断

的全部荒谬性超出本文的范围。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单是把作为商品生产规律的价值规律同作为价值规律的代替者和继承者的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对立起来，即使根据下述简单的理由就已经是荒唐的了；在资本主义下也存在着积累规律，它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生作用的；因此在我国条件下，价值规律可以转化为任何东西，只是不能转化为积累规律。积累规律本身以另一规律的存在作为前提，是在这另一规律的基础上“发生作用”的。至于这另一规律是劳动消耗规律或什么别的规律，在这里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某个生产部门不能经常地收回生产费用并加上一个增加额（这个增加额相当于一部分剩余劳动，能够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来源），那么这个部门就会停滞或退化。这个规律也“适用于”谷物业。如果它的邻近的农业部门处于一种较有利的地位，那么就会出现生产力的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我国条件下在农业中就会出现自然经济倾向的普遍过程。如果认为，计划经济的增长会造成（在价值规律消亡的基础上）一种按我们意愿行事的可能性，那他就是不懂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这些意见足以成为规定“抽调”界限的基础。工业化的反对者反对任何让渡，甚至让渡部分剩余产品也不行，也就是反对任何“抽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的速度就会减慢。托洛茨基分子规定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抽调的数量（也就是说，甚至超越剩余产品的界限）。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农业或其谷物业的发展，而农业或其谷物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这里真理在于适中。

但是整个农业（既包括原料生产也包括谷物生产）的发展（正是发展，即扩大生产），从进出口角度来看也是必要的。进口设备必须付钱，进口原料也必须付钱。如果我们由于谷物危机不能出口粮食而改变方针，搞得永远放弃粮食出口，那是极其荒唐的。我

们暂时在设备进口方面依靠外国,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受的了。如果我们在设备、原料和粮食方面都要依靠外国,那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应当依靠我们的农业基地,应当利用农业基地的生产,用“农业外汇”来支付进口的设备(这当然不排斥增加工业品出口的必要性),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在设备方面也逐渐摆脱依赖状态,用这种办法愈来愈使自己自立(这当然不排斥进一步利用国际经济联系的必要性)。

第三,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提农村以外的需求呢?难道我们能够充分满足工人居民的需求吗?难道我们能够充分满足工业本身的生产性需求吗?难道我们的生产能够满足公有经济其他部门(运输业、住宅建筑等)对工业品(金属、燃料、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吗?应当了解,这些事实对理解我们这里商品荒的原因,对理解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诚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我们的经济机构还不了解对工业品需求^①的构成进行仔细而周密的研究有着绝对刻不容缓的必要性,尽管从分析再生产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根据极为粗略的只是大致的计算(这些计算是一些同志应我的请求作出的,它们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数字的精确比例的概念,不如说提供了一个这种数字的顺序的概念),情况如下:

	在工业品全部需求 中所占的百分比
1. 工业本身(包括经常生产和基本建设)对 工业品的需求	37—39%
2. 公有经济其他部门的需求	15—16%
全部公有经济(不包括工资)需求总计	52—55%

^① 这里所说的“需求”不仅指货币需求,而且还指比如某生产联合体用自己的产品供应自身的“需求”(例如南方钢铁托拉斯的各加工厂对该托拉斯自己生产的生铁的需求,等等)。

3. 工资收入者的需求	15—16%
4. 其他城市居民的需求	约 5%
5. 农民的需求	23—25%
6. 工业品的出口	2—2.5%

在这里公有经济的基本建设的需求(包括建筑工人的工资)大致占对工业品全部需求的 16—17%。

这种关于本经济年度(1928—1929年度)对工业品需求的构成的大致的计算表明,农村的需求甚至就其总和来说只占对工业品全部需求的 1/5,或者至多占 1/4。

至于需求的其他组成部分(也就是需求总量的 3/4 甚至 4/5!),那么在这里也存在着“落后状态”!以破纪录速度蓬勃发展的工业本身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对工业品的同样蓬勃增长的需求,但它不能得到满足。当托洛茨基说,工业落后于农村需求的增长,落后于农业的增长,那么这个论据只是在乍一看时才有说服力。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工业“落后于”其自身!!“工业落后于其自身”,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这种说法呢?这意味着,工业在其发展中遇到了这种发展的极限。超工业化主义者托洛茨基回避了这个结论,并且企图用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这是撇开对工业品整个需求孤立地来考察的)这种理由来抹杀这个结论。而工业的发展“遇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1. 显然采取了工业本身各部门之间不完全恰当的比例(例如冶金工业大大落后);2. 显然采取了工业的经常生产的增长和基本建设的(既包括工业的也包括整个公有经济的)增长之间的不完全恰当的比例;如果没有砖头,而且(由于技术条件)在一定季节内也不可能生产多于一定数量的砖头,那么就不应当编制一个超过这一极限从而使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建筑计划,因为不论你如何进一步加强建筑业,你毕竟不能凭空建造厂房和住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投资问题时还要谈到);3. 此外很清楚,发展的极限取决于原料的生产:棉花、皮革、羊

毛、亚麻等等也不可能凭空取得。但是众所周知，这些东西是农产品，这些东西的缺乏是整个工业生产不够发展的一个原因，这种工业既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也不能充分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因此，如果出现原料不足加粮食不足（这还意味着出口和进口的“不足”），再加上建筑材料不足，那么，只有确实绝顶聪明的人才会要求一个“超工业化的纲领”。

总结一下，应该说：1. 在固定资产、整个生产和商品生产方面，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农业的发展速度；2. 被置于非常不利地位的谷物业有落后于最低限度的必要速度的危险；3. 农村居民的需求一半是非农业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工业、公有经济的发展造成的；4. 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农产品的出口额；5. 同样清楚的是，在分配工业内部（而在基本建设中，是指整个公有经济内部）的资金时，必须力求全面地估计到能保证“比较无危机的发展”（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决议）、能保证工业各部门和公有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较正确的协调一致的一切因素。

在这里产生的所有问题中，基本建设和谷物业问题占首要地位。至于谷物业问题，那么党特别在自己最近的决议中强调了它的全部重大意义，由此就要修改价格政策，由此提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问题，由此有必要在这方面付出最大的实际努力。自然，如果谷物业不是极其严重地落后，如果它不是分散的，它的商品率没有下降，等等，那么比方说，把投到国营农场的钱投到黑色冶金工业这一我国工业的“薄弱环节”中去，当然是更合理的。但是，甚至“超工业化主义者”也不敢侵犯国营农场。为什么？正是因为谷物业的明显落后。“纯生产观点”即“增加生产”（列宁语）观点在这里是同“阶级取代”观点，同通过日益增长的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的集体化、通过农业生产改造为大经济、通过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来逐渐

取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成分相一致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问题，这个问题远不是以轻视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为前提，而是相反，必须在发展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列宁同志正是这样提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对这个问题要予以特别的注意和进行特别的努力。这项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业中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它既要求有新技术（拖拉机化、机械化、化学化等等），也要求有熟练的干部。在正确的价格政策下，在把农民群众合作化等等条件下，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特别是发展谷物业，限制富农经济，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等等，应能克服极其巨大的经济比例失调，这种失调表现在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和整个农业很少发展。整个说来，我们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记住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

“要求尽量把资金从农业方面抽到工业方面去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会在政治上同农民决裂，并且也会破坏工业本身的原料基地和国内市场，破坏出口，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平衡。另一方面，拒绝吸收农村资金来建设工业也是不正确的，这在现时就等于延缓发展的速度，破坏平衡而有害于我国的工业化。”^①

三

我们整个计划计算的轴心，我们全部经济政策的轴心，应当是对日益展开的国家工业化的关怀，党将与任何企图使我们离开这条道路的人进行斗争。从任何角度（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扩大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强国内的结合，提高我们的国际经济比重，加强国防能力，群众需要的增长等等）来看，苏联工业化是我们的法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79页。——编者注

律。同时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实行的，它对农民经济产生另一种影响，它对整个农业抱另一种“态度”。资本主义使农业受轻视。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村来说不是寄生性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农业在工业的影响下得到了发展，但存在着这种寄生的成分），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巨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它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作准备。

自然，工业化的过程不可能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均衡地顺利地进行。同样自然的是，它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问题：必须在一个半贫穷的国家里筹集巨额“资本”，有效地使用它，使之变成新技术、新建筑物等等。因此，基本建设问题被提到第一位。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决不是用大叫大嚷，凭“直觉”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所能解决的。在这里必须对问题作周密的研究，在这里不能抱任何不求甚解的态度，在这里必须对问题作集体的探讨，在这里必须计算。

我们必须力求使工业化有一种尽可能高的速度。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呢？这个问题是相当荒谬的。但是这个荒谬的问题却包藏着另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这就是积累的界限问题，投资的最大界限问题。

首先，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党关于后备（外汇后备、货币后备、粮食后备和商品后备）的指示。最近，对后备政策保持沉默成了一种时髦。

另一条石子路，

路滑难行。

至于此路很近，

我们最好默不作声。

虽然“沉默是黄金”，而我们黄金短缺，但在这里仍然不能玩弄沉默的把戏。我们不仅没有后备，并且供应经常中断；“排队”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扰乱我们的生产生活。

我们说，计划经济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巨大的困难，国际局势是紧张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能否在没有后备的情况下来从事经济建设呢？从一种在经常没有后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政策中会闻到一点冒险主义的气味。正因为如此，最近几年党把后备问题提到了首位。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指示执行得显然很不够。这里必须来一个坚决转变，因为党通过决议决不是闹着玩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修改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后备的决议。相反地，整个形势要求我们执行这些决议。我们特别关心在制定我们的远景规划时贯彻这些指示的情况。以最近编制工业五年计划作例子。根据我的印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制定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时，甚至忘记了考虑一下后备政策。例如从《经济生活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五年计划对预算提出过高的要求，这就使这个计划的“现实性”成为问题^①。而“缺乏现实性”，那是一个“相当”大的缺点。

自然，后备问题既同生产性消费（其中包括基本建设）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同个人消费（群众的个人消费）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弦已经绷得太紧了。把它绷得更紧，使商品荒更加尖锐化，已经不行了。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指示：

“也不能在现阶段片面地追求积累（托洛茨基所要求的就是这

^① 见《经济生活报》第188号：《五年计划的问题》。

样)或片面地追求消费。”^①

遗憾的是，在商品荒和工业五年远景规划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同后备问题上相类似的情景。《经济生活报》报道中关于所提出的工业五年计划说，这里没有供求平衡表(见梅日拉乌克同志的讲话)。一个在供应危机时期编制的计划，不从供求平衡角度作详尽的分析^②，这自然不是“表面的”缺点，不是“形式上的”疏忽，而是一个深刻的内在的错误。应当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这方面必须现在就采取一些措施。

其次，必须提出基本建设的物质因素问题。为了使国家工业化得到实现，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为了使基本建设成为现实，而不是停留在官僚主义的“数字游戏”上(列宁语)，不仅应当保证表现对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的相应的货币，而且应当保证这种建筑材料相应的供应，保证它的自然的物理存在，保证它的真正的存在，并且不是未来的“存在”，而是当前的存在，因为即使按照柏姆-巴维克的办法，也不能用“未来的砖头”建造“现实的”工厂。但是在我们这里常常还有一种特殊的“货币拜物教”的奇怪观点，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然而，如果没有必要数量的这种或那种材料(在考虑到节约的条件下)，如果生产这些材料所需要的期限超过它们应在生产中被消费的期限，那么任何金钱也帮不了我们。人们可以拍拍胸膛以示自信，可以为工业化宣誓，可以咒骂一切敌人，但这一切并不会使情况有任何改善。可以指望“也许过得去！”的办法，可以玩猜单数还是双数的游戏、“占卦”等等，但是，呜呼，客观关系反正会爬向阴曹地府的。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79页。——编者注

^② 根据某些大致计算，按照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赤字大大增加了。

然而，明年我们这里的状况怎么样呢？下表对此作了回答。

1928—1929 年度建筑材料平衡表

材料	需求量	生产量	盈亏量	差 额 以百分数计算
水泥(百桶)	15100.0	13460.0	-1640.0	-10.8%
砖(百万块)	2677.0	2445.0	-232.0	-8.7%
石膏(千吨)	335.0	281.0	-54.0	
石灰(千吨)	734.0	700.0	-34.0	
白粉(千吨)	250.0	252.0	+2.0	
耐火材料(千吨)	758.0	683.0	-45.0	
锯木(千立方米)	10368.0	10191.0	-177.0	
窗玻璃(千吨)	184.8	158.2	-32.0	-17.4%
梁用槽钢(千吨)	208.8	147.0	-61.8	-29.7%
铁丝(千吨)	157.3	122.0	-35.3	-22.4%
各种型钢型铁 (千吨)	1246.6	958.0	-288.6	-23.2%

这些材料^①表明，如果说在砖和水泥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虽然 8.6% 和 10.8% 毕竟不仅仅是一个“相当大”的亏空而已），那么玻璃、梁用槽钢、铁丝、铁和钢材方面的亏空是非常大的。可惜，我们引用的数字的文章的作者没有说明，是在建筑的实际规模增长多少的情况下出现这些亏空的。但如果对亏空的这种计算是正确的，那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如果我们拥有的建筑材料比我们需要的少 20%，那么我们怎样进行实际的建筑呢？难道不能在这里提出一个比较精确的计算，提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建筑在实际的而不是非尘世的、想象的梁用槽钢和铁的基础上的计划吗？

研究一下我们大工业最落后的部门，即黑色冶金工业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它生产的是铸铁、轨条、梁用槽钢、铁板、瓦陇铁、镀锌板、白铁、钢铁管、线材等等。《1928—1929 年度黑色金属平衡控

^① 见巴尔斯著：《建筑材料工业》，《经济生活报》第 220 号。百分比是我们计算的。

制数字》向我们提供了三年发展的全景，

	需要满足的程度(以百分比计算)		
	1926—27年	1927—28年	1928—29年
运输业	95.1	91.0	87.0
人民委员部和机关	97.5	96.0	78.5
金属工业总局管理局所			
属冶金工业	91.5	87.4	77.2
地方冶金工业	75.2	87.2	66.0
其他非冶金工业部门	81.3	81.8	77.5
市政建设和建筑业	79.4	73.6	57.7
手工业	62.4	67.8	48.5
城乡的个人需要	68.2	60.5	56.5
总计	82.3	80.0	71.0 ^①

可见，在所有一切消费部门，亏空（亏空！！）增长（增长！）得很快。

我们在一切战线上——既在个人消费上也在生产性消费上——的亏空都在增长，而且正是在1928—1929年度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为了弄清怎么会有如此反常的现象，我们就必须研究，在我们这里是怎样拟定基本建设增长的数字的。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方而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呢？

“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必须……注意这一任务的极端复杂性。这里必须考虑的不是最近一年或数年内积累的最高速度，而是能保证长期的最快发展速度的国民经济各个因素的对比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比重方面同样必须使二者达到最完美的结合。将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是正确的，但同时必须估计到将国家资本过多地投到大规模工程上的危险性，因为这类建设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出产货品；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轻工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周转较快，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轻工业的条

^① 《1928—1929年度黑色金属平衡控制数字》，全苏冶金辛迪加出版（和资料），第8—9页。

件下，利用其资本来从事重工业的建设。”^①

我们看到，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是很谨慎的。关于速度问题，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直接反对把最初几年的速度提得过高，防止以后不可避免的下降。党的这一指示在实际中是怎样贯彻的呢？可惜我们没有关于全部公有经济基本建设方案的新材料。下面是关于工业基建规划（就是说约占全部公有建筑工作的35%）的材料。

根据已经制定的五年计划（幸亏这一计划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否决），与上一年度相比，投资的增长率为：

1929—30年	1930—31年	1931—32年	1932—33年
+39.6%	+7.3%	-1%	-8.3% ^②

可见，在这里情况“恰恰是倒过来的”。1929—1930年度有一个几乎增长40%的跳跃式的发展，目的只是为了以后退到7%，乃至下降1%和8%。这是一个缺乏恰当安排的计划，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在象基建这样严肃的事情上，什么样的前提成为巧妙的筋斗的基础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得不到哪怕稍为满意的回答。这种虚幻的跳跃只能不带任何亏空地满足对劣等“商品”的迫切需求……

难道在这里，在速度问题上不能要求严格执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吗？

基建投资过于紧张将会产生如下结果：1. 使实际的建筑工程不能以同样规模跟上；2. 一段时间以后将导致收缩已经开始的工程；3. 会对其他生产部门发生非常不利的影响；4. 使各方面的商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79—380页。——编者注

^② 《经济生活报》第188号。该报没有提供1928—1929年度的百分比，但是据稍晚的消息，达25%。

品荒更加严重；5. 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

这种情况甚至在价格稳定和半稳定的条件下，也会对货币制度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题，但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论题。

每个共产党人都懂得，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自然我们极不愿意减缓已经达到的速度，需要记住，这个速度我们是以预算的极端紧张、后备短缺、削减消费部分等等为代价达到的。我们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前进的。应当明白，如果我们既要保持（不是过分提高！）这种速度，同时又要第一，缓和商品荒，第二，改善后备状况，第三，保证一种比较无危机的发展，为此就得采取极其坚决的措施，以保证建设工作更有效地进行，我们所有生产单位有更高的生产率，投产的新企业有高得多的生产率，——一种大大超过现时在这方面的要求的效率和生产率。

工农检查院所作的具体调查表明，在我们这里非生产性开支多得可怕。这种同一系列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非生产费用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竭力降低建筑材料的指标。必须竭力缩短生产时间（在美国两月能建成的，在我们这里要两年！）。必须大大改变建筑型式（建筑物过于笨重）。必须更加节约材料的耗费（例如，在我们这里五金的耗费量超过必要量的百分之五十乃至一倍）。所有这一切会带来巨大的节约，如果注意到工业基建只占公有经济全部建设的1/3的话（1927—1928经济年度总额为34亿卢布，而不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工业占125000万至130000万卢布）。

用这种办法腾出来的数额应当用来：1. 缓和市场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既对工业和整个公有经济，对工人和农民（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需求构成中所看到的）产生有害的影响，也对货币制度产生有害的影响；2. 建立后备；3. 保持我们实际达到的速度。

同时必须用各种办法提高我们企业的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必须保证实际的成批生产)。最新发明,最重要的技术成果,严肃认真的合理化工作,吸引群众,发展和运用科学(其意义现在重要好几倍)——所有这一切应当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我们必须消除俄国的闭塞性;我们必须注视欧美科学技术思想的每一个进展并利用它的每一项实际进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统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肃清我们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烦琐等现象。我们必须在改造时期的复杂条件下学会文明的管理。

只有我们理解到,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队伍改组得象改造时期所要求的那样,我们才能解决这项任务。

我们必须把那些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经济成分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来使之变得极其灵活机动。这就要求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精神错综地配合起来。我们是过分集中化了。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应当朝着列宁的公社国家的方向采取一些步骤?这决不意味着“放松缰绳”。恰恰相反。根本性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更加坚决、更加严格地(但为此要更加深思熟虑地)“在中央”解决。下级机关在这些决定的严格范围内行动,它们对自己的问题范围负责,等等。由于许多领域过分集中化,我们使自己丧失了额外的力量、资金、后备和潜力,而且由于许多官僚主义的障碍不能利用所有这些潜力。如果我们从个别的国营企业开始,能够使我们更适应实际的具体条件,而不干成千上万带来很大损失的大小蠢事,我们就会灵活得多,机动得多,取得的成果就会大得多。

* * *

粮食收购危机向我们发出了巨大危险的信号。经济在这里也显示了它的阶级的一面。

这些危险还没有克服,要克服它们,还必须进行巨大的工作。毫无疑问,敌视我们的力量在国内活动着,这就是农村中的富农、

城市中旧资产阶级的残余和新资产阶级集团。在我们庞大的机关的毛孔中也有官僚主义蜕化分子，他们根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生活、群众的物质和文化利益。如果说中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思想家伸展他们的触须，企图悄悄地动摇我们的政治路线（工业化的敌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敌人等等就是这种人），那么念叨“您有什么吩咐？”的官员们则准备制定任何计划——即使是超工业化计划，为的是明天“在小圈子里”嘲笑我们，后天去帮助我们的敌人。

但是工人阶级手里有很多王牌。在反对那些政治上越来越活跃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将依靠贫农，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反对富农，同时在自己的队伍中大胆地开展自我批评，这样也就会越来越有效地克服自身的缺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文化，学会更好的管理，我们就会成长，就能够而且会较少动荡地成长。列宁同志在他的晚年所谈的正是这些问题。

原载《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译自《俄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哈林选集）》，纽约，1967年俄文版第375—397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

(在第四次工农通讯员会议上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首先，我受我们党中央的委托，向你们，向来自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苏联的各个地方的、在阶级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的工农通讯大军的代表们致敬。（热烈鼓掌）我们的全国性会议——按次序已经是第四次——是在无产阶级国家历史上一个最困难的转折时期召开的，转折时期除了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队伍的组织性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外，同时还展示了新的困难，并向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提出了极重大的新任务。

正是由于提出了这些极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要谈一谈我们报刊的任务。

* * *

即使不是按照几世纪的规矩，那无论如何也是按照几十年的规矩，首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我们的国际形势。

苏联当前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基本上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出现了进行财政封锁的企图和迁延性的军事危险。这种危险没有从日程上消除。当然，我们中间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战争是近几天，近几个月，或者甚至是最近一年将发生的事情。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对我们苏联的进攻，这个“苦杯”一定不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派了代表出席最近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它们正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它们工作的中心。

资本主义强国反苏战争的迁延性危险是十分现实的，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应当牢记，如果我们的朋友增多了，如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左倾了，如果劳资之间的巨大街垒的我们这一方的力量无疑在增长，那么，从另一方来说，我们的还很强大的、全副武装的凶恶敌人——国际资本近来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国际资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它在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无疑的胜利；它在军事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成绩。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忘记这一切。

那么，这里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我们的报刊（首先，我说的正是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任务）是否做了我们所能够做到和应当做到的一切以增强我方的力量？我们是否做到了一切以便在我们苏联遭到任何进攻时使千百万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我们远远没有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

我们应当如何团结和用什么办法团结人民群众并且使他们在同准备对苏联实行军事进攻的资本主义敌人的斗争中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应当团结他们，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揭露敌人的目的和计划。苏维埃政府从成立之时起就奉行公开的同时也是原则性很强的和平政策。苏维埃政府近来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极重大的和勇敢的步骤。对于伦敦外交家的花招，对于最肆无忌惮的和最狡猾的战争挑拨者的军事阴谋，对他们关于和平的虚伪言辞，苏维埃政府用彻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来回答。我们可以自问：我们的报刊，我们的出版物一般能使我们苏联的穷乡僻壤的每个农民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吗？我们的报刊是否用简单明瞭的语言来讲述这些建议呢？是否把对我们政府建议的答复告诉了每一个人呢？不，这一切做得非常非常不够。就连我们最大的几家报纸也没有做到为此必须做的一切，而

这是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如果在发生军事冲突或保卫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备战时刻，我国最广大群众不是完全地、坚定地、绝对地、无条件地相信，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使我们免遭战争灾难，那是很不好的。我们应当这样来传播苏维埃的裁军建议，这样来解释建议的每一段话，即让最落后的工人，农村的雇农，城市的季节工人，每一个劳动农民都明白裁军建议的意义，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中央各省，在高加索的遥远山村，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在白海沿岸和克里木，在乌克兰和乌茨别克斯坦。这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然而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它。也许应当让每家报纸都出版有关的单页或小册子，以便确实以成千上万份宣传品来传播我们苏维埃政府过去为之斗争而将来还要为之斗争的东西，到那时，我们要揭露我们的资本主义敌人就容易得多了。要补救这一点还为时不晚。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宣传不断遭到资本主义强国拒绝的苏维埃政府的建议，是我们的报刊，我们的所有报纸和我们的通俗读物的首要义务，因为这种宣传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团结、联合、组织千百万群众，而不是个别的集团。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国内战争时期，在1918—1920年，外国军队，即支持沙皇旧军人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子及其他人的干涉军大规模入侵我国的时期，我们手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揭露地主、资本家、银行家、统治阶级的全部队伍、整个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败类煽动反对劳动群众的血腥战争的一切欲望。

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忘记了，俄国白卫军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敌人军队中的一支战斗纵队，并且他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我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发动者和挑拨者，这些都是以前的我国工业大王，以前的农奴主，以前的“大”公爵、“非大”公爵和

伯爵。

其实，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计划。这些计划又重新提上了日程，而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对此几乎保持沉默。报刊的第一个任务，准备保卫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应当是——除了揭露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外——揭露劳动群众痛恨的敌人，劳动群众对他们的欲望的了解，要比对所有的希克斯分子、皮尔苏茨基分子、彭加勒分子、墨索里尼分子及其他外国资本主义活动家的欲望的了解要深得多。我们把这许多敌人都忘记了。我们应当坚决地向他们进行射击，“揪着他们的耳朵到太阳下面去”，揭露他们，指出他们是与我为敌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这是我的第二个意见。

第三：尽力帮助我们的红军。在资本主义国家，对军队的迷信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我们当然一分钟也不应当把红军捧上某种脱离人民的偶像的宝座。红军的力量恰恰在于，它同劳动人民群众是一致的。我们尤其应当对加强红军的力量及其同我国人民群众的联系表示关心。我们并不是经常牢记这个任务的。这个任务在演习、“突击”运动、庆祝会期间常常闪耀着奇妙的光辉，但这是我们应当每天不断解决的经常性的任务。这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我们的报刊——具有许多战斗队的极大的力量——应当永远牢记这一点。

不言而喻，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决定性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尽量扩大我们的国际联系，扩大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和其他国家的劳动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联系。

应当尽量扩大和加强各个方面和渠道上的国际联系：从工厂到工厂，从矿山到矿山。在我们的同志和国外同志之间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应当大大加强。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小册子中，在这本很好的小册子中，收集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我们应当在这次会议上给自己提出尽量加强我们的新的国际联系的任务，使

这些联系向纵深发展的任务。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并在此试验各种各样的联系方式和方法。报刊应当在这方面成为忠实的和聪明的助手。

关系到第一个问题，即关系到我们的国防问题的意见就是这样。

当然，建设任务直接落在我们苏联身上。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赶上和超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口号。可是需要清楚地了解，赶上和超过技术特别高超、特别富有、武器精良以及有其高度文化的国家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赶上和超过象德国、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国家，意味着重新建设强大的工业；意味着完全改建和改组整个运输业；意味着给工业和农业打下极广泛的电气化基础；意味着根本改造农村生产的一切基础，因为我们从沙皇时代继承下来的农村生产按其技术还十分象半野蛮的中世纪。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必须在特别落后的国家，在实际上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半封锁下的国家，在没有多余资本、多余资金、多余资源的国家来实现“赶上和超过”这个口号。

在过去的年代，在所谓的“恢复”时期，我们修复了老的工厂，开动了停工的工厂，投入了为开工所必需的资金，首先是用作流动资本，即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用于购买辅助材料等等的资金。这种开支是大的，但不是巨大的。当我们需要把“生产技术完善的新机器，生产拖拉机，建设新工厂、新矿井、新电站、新铁路！”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当问题这样提出的时候，当再不能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转，而需要压一压新建设的杠杆的时候，资金问题——巨额的“基本建设”资金的问题——就完全出现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系列巨大困难的基础之一——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基础。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越过这个障碍物，并且我们

一定会越过这个障碍物。必须充分想象基本建设资金问题的全部意义。我们不仅必须建设新的工厂，而且必须建立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要知道，我们大大落后于西欧和美国，例如我们几乎根本没有化学工业，然而它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起着极大的作用。它对于军事，对于农业，对于其他工业部门都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业。现在国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生产：人造丝的生产、人造纤维的生产、新金属的生产，出现了生产液体燃料的新方法，等等。为了赶上西欧和美国，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

现在西欧和美国在运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须根据《田地》之类的战前杂志的老期号来想象“国外”和它所生产的东西；技术是大大地前进了；不仅铁路运输更换了装备，而且汽车运输以及新的航空队、海军舰队、商船队和客运船队都建立起来了。我们只是开始搞。在海上运输和内河运输方面我们也只是迈了头几步。也许有人说：“唉，想到哪里去了！”下面我要谈谈这一点。我们的出口之所以受到巨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要向外国船主支付巨额运费。我们的内河运输很薄弱，国内流转因此吃亏。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着重新装备和新建我们的铁路和公路的巨大任务。在我们的道路这样可怜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商品流转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谈文化革命吗？现在请你们试算一下，建设新的公路、新的铁路、新的桥梁，组织汽车运输，建设海上船队和内河船队，将花费多少，且不要讲航空队了。建立航空队也要求巨额的资金。

如果看一看我们的经济，我们往往发现其中真正发出中世纪味道的一些现象。例如，同样一种产品常常在一个省内是一种价格，而在邻省却高许多或低许多。如果商品流转迅速，那当然不会有这种情况，但商品流转迅速也要求有发达的和装备好的交通。

国家的一切经济部门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没有新的工厂,就不能建设足够数量的铁路,因为建设铁路要有铁轨、车厢和机车;而另一方面,产品的运输需要有铁路。不发展冶金工业和整个重工业,不为电气化打基础,就不能改造农业;而另一方面,没有足够数量的粮食,则不能建设新的大工厂。一件事同另一件事是联系着的。一件事离不开另一件事。现在生活本身提出了根本改造农业的问题。要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说:“拿金属来,至于粮食,——不关我们的事”。为了得到金属,为了给重工业打基础,也需要关心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而在我们的农业中还存在多少野蛮情况啊!这里就产生了怎样得到新的资金来建立新技术的问题。拖拉机不会从天上掉给我们,或者需要从国外购买,或者自己生产,最好是自己生产。但是自己生产,就需要建设拖拉机工厂,因此又必需额外的资金。只有创造额外的物质财富,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量,才可能得到这些资金。要更多地生产!更好地生产!更省地生产!不实现这些任务,我们就不能以我们应有的步伐为“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而向前迈进。改变农业技术(用新机器代替木犁!)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向人造肥料过渡也是确定不移的。用大叉撒粪是老祖先的办法,归根到底必须让位给人造肥料的使用!为此必须建设化工厂。因此,不解决建设化学工业的任务,我们就不能真正改组我们的农业。其次,一系列农业部门要求巨额的基本建设费用。拿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生产来说吧。在那里,整个事业取决于调节从山上奔腾下来而顺着无数渠道分布的水流。这种所谓的“灌溉”或“水利”系统要求巨额费用进行大的基本建设。再进一层,我们的农业由于没有相应的工厂直接加工农产品而大受损失。在我们这里,干酪制造厂很少,罐头工厂很少,烘烤房少,把农产品变成罐头以满足国内需要和出口需要的工厂少。

在我们这里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在水果丰收之后，大量的水果由于缺少烘烤房或罐头工厂而烂掉。同时在其他地区根本没有这些产品，虽然有需求。

总之，为了农业的真正发展也需要额外的资金。农业需要改造。在这里也需要进行基本建设。这种农业改造以农业的合并为前提。拖拉机不能在手帕大的份地上耕种。复杂的机器不能在极小的经济中使用。所以，必须在同富农作斗争之中，在同贫穷作斗争之中把经济联合起来，建设集体农庄，组织国营农场，把它们变成影响农户的杠杆，变成农民经济进一步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杠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关怀小的或极小的农户了。在我们这里大约有 2500 万小的或极小的农户。粮食的决定性数量或绝大多数是这些农户生产的，并且还将长期由这些农户生产。而且为数根多的活人，即苏联居民也正是由中农和贫农组成的。他们生活得愈好，他们生产得愈多，他们出售得愈多，对于苏维埃国家就愈好。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荒谬的，即：只要没有拖拉机，就不能前进一步！或者：只要没有把人们联合成集体农庄，就谈不上要他们改善自己的个体经济！我重复一句，不客气地说，这种立场是荒谬的。但是，为了根本改造农业，为了真正广泛地过渡到大的集体经济，需要有新的技术，因为一干部木犁无论如何不能构成一台拖拉机。如果你把一干部木犁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么好处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这还不能解决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

总之，无论对于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还是对于农业，都可以说，问题在于同必要的费用相联系的困难。

还有一个方面，这个问题也很尖锐：这就是住房建设的问题。人们生活，时间流逝着，房屋变旧、变坏、逐渐剥落，所有这些都是不知不觉地进行的。五年、六年过去了，房屋开始损坏，而城市扩

大了,无数的人挤进了城市,居住面积在减少。可以在一个房间里放四块间壁,然后在每个间格里再放四块间壁,但是根据物理学的一切规律,以后总会有那么一天人需要爬进衣柜里去。(笑声)在我们的许多城市里正是存在这种情况。住房的危机是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要求巨额的费用。而学校的情况怎样呢?对于工人来说,子女教育的问题是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现在这也需要大笔补充费用。诚然,古代希腊的某些哲学家同自己的学生在露天里散步。但是,哎呀!这在希腊是可能的,在我们的严寒天气里,你不会常常去散步吧!(笑声)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工业问题、生产资料生产的问题、生铁生产的问题、金属生产的问题、大型机器制造的问题、拖拉机生产的问题、我们的电气技术生产的问题、我们的电站问题、化学生产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建设部门,组织这些部门的建设的任务极其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总之,我们要前进,就必须从各方面积累资金来发展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这样做,这里应当作重大的牺牲来建设新的基础,应当反对违背这条路线的任何情绪。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发展工业和发展工业的农业基础之间不一致的危险。在这里我们接近到了我们现在的特殊困难的基础。必须看到下面这一点:如果我们建造新工厂,如果我们建设新矿井或者建筑新房屋,那么,我们正在建设的,譬如说需要三年建设起来的这个工厂、电站等等在这三年内就不能生产任何一件商品:任何一块呢料、一吨煤、一普特金属。如果我们建设巨大的工程,如沃尔霍夫河建筑工程或第聂伯建筑工程等等,那么在建造这些巨大的生产单位的所有年代,它们不会生产任何东西,而要拿走大量的生产资料(砖、水泥、木料、金属、玻璃等等)以及在那里工作的工人所必需的大量消费资料。现在正在建设工厂的工人也要消费;他们要为

自己购买裤子、围裙、食品、酸白菜、肉类、粮食等等。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而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对各种商品：金属、水泥、玻璃、砖、粮食、肉类、白菜等等产生大量的需求。因此，当新的企业正在建设的时候，它们提出大量的需求，而自己并不生产任何东西。

当工厂投入生产的时候，它自己或者生产钉子，或者生产金属，或者生产机器，或者生产布，或者生产呢料，或者还生产进入商品流转的其他东西。但是当工程十分巨大的时候，当工程还未完成的时候，它象巨大的贪食动物一样，从各方面为自己吸取东西，而不从自身放出任何东西。在这里就需要等待，需要作一定的牺牲，需要忍耐。

经过一定的时期，愈来愈多的新企业将加入我们的工厂的“作战军队”，它们生产出的东西将多于吸取的东西，它们将抛出新的商品。但是现在我们正是处在很困难的关口。

在我们不能从国外取得大批贷款的条件下，为了大规模的建设，为了我们的工业基础，我们必须作许多牺牲，即我们只能把少量商品投入广大的消费市场上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商品缺乏的现象，即我们叫做商品荒的现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放弃往后以同样的速度发展我们的工业建设。当然，如果某些疯人建议现在多搞些建设，比我们正在搞的建设多一倍，那么这正是疯人的政策，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工业品荒会尖锐好几倍，而这种商品荒会反映到粮食荒上而。如果农民不能从城市产品中得到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出售粮食就不合算。所以，工业品荒意味着粮食荒。我们必须把弦绷紧，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不应当减低我们的工业建设速度。我们应当保持我们的建设速度，并根据可能增加这种速度，但同时也不应当忘记事情的另一面，即不能绷得太紧。目前我们正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况。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进行建设，而建设对我们是很困难的，

需要忍过这个时期，越过这个时期，那时候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容易得多。

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要求我们的工农通讯员队伍给予怎样的帮助呢？我们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动员全体劳动人民去进行我国经济建设事业，我们才能克服我们面临的困难。我们的阶级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应当怎样动员我国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去解决我们的建设任务。

你们都清楚地知道，现在某些地方有时出现相当大的不满，特别是在农村，并且也在粮食供应工作做得不好的那些城市。当然，对此需要加以重视。要知道，城市和农村脱节的危险是我国最主要的内部危险。作为领导者的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是阶级斗争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还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动员千千万万人，首先使贫雇农阶层和绝大多数中农同工人阶级一道走，使人民的这一大部分能够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耐普曼、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事业服务，现在富农活跃起来了，竟敢用短枪射击农民通讯员。对官僚主义、富农、资本家必须进行不断的战斗、不断的进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前进的贫农和中农群众的人数愈多，这种进攻就可能愈有成效。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重要思想在于，劳动群众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一切劳动者的领袖，它能够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只是因为它善于带领千百万劳动者；无产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愈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愈有成绩，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愈是成功。我国的阶级斗争在现阶段大大地尖锐化了。在某些地方，富农拿起了枪。但是，为了真正平息富农，必须使中农跟我们走，而不是跟富农走，必须使富农在农村没有代理人，使它不能从贫农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而在农村被仇恨包围起来。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这个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是困难的，因为中农阶层在困难的时刻会动摇；但是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同中农的联盟尽可能更加巩固，使富农被孤立起来。这是特别困难而又必要的任务，在我们建设和我们斗争的任何阶段，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我们都不能放弃这个任务。可是要使我们同中农的联盟尽可能更加巩固，我们就必须真正团结我们在农村的支柱，首先是团结雇农，团结贫农。也必须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使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新阶层（建筑工人、一般季节工人、在最近几年进入我们工业的工人阶级的新阶层等等）成为同无产阶级的骨干，同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肩并肩和手挽手的一般无产阶级队伍。进行十月革命的老的工人骨干渐渐死亡，渐渐衰老，新一代成长起来，走进工厂，有一部分是从农村、从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走进工厂的。工人阶级应当改造和重新教育这个阶层。我们不应当以一种工人贵族的鄙视态度看待他们，我们不满足于说什么“乡下佬”工人来了。不，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快地使他们成为劳动、斗争和建设方面的同志。

无产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来领导阶级斗争，领导反对富农和私人资本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基本战略路线。当然，保证这条路线也应当是工农通讯员队伍关心的对象。

为了切实解决这些阶级斗争的任务，而且尽可能更好地、更巧妙地去解决，以较少的开支取得较大的成效，就必须注意：我们多次并千百万次谈到的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我们道路上的这个巨大障碍的斗争。然而这个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们这里至今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应当说，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甚至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官僚主义也是一个大祸害。最近我读了一位相当聪明的极右的德国将军冯·塞克特不久前出版的著作。这位将军在题为《士兵的思想》一书中，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有三件事是人的本性一心要反对的：愚昧，官僚制度和流言蜚语”。诚然，

可敬的将军说，他要让比较聪明的人（我真不知道，这位《士兵的思想》的作者的这种谦虚从何而来）去同愚昧作斗争，但官僚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祸害之一——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很难说那一个对我们更有害——是愚昧，还是官僚制度，在这里应该把冠军授予谁。（柯恩同志喊：“两个都坏”）柯恩同志在这两个“美人”中间扮演了帕里斯的角色，说两个“都好”。（笑声）既然如此，同志们，我要问：现在应当提出什么口号来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呢？我认为，现在应当提出一个口号——多一点地方的、集团的、个人的首创精神。我们现在应当再三重复和贯彻这个口号。我们自己经常在我们工作的许多方面不知不觉地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这种首创精神，而这种首创精神是应当得到发挥的。事实上，在这种束缚上正表现了官僚主义“脉搏”，官僚主义“倾向”。它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几乎一定要把每一项好的创举直接和完全塞入国家机构的框框。有时事情因此而难办，棘手，而我们横加干涉并常常拚命把它塞入官僚主义框框里。可见，某种官僚主义僵化现象不仅是在我们国家机关中产生的。我们的不幸不仅在于，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往往染上了官僚主义，——这还不算大不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的工作人员变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他们本应纠正苏维埃国家的缺点，但他们对官衔和勋章的看法，对来往公文的态度，对活人的关心，同任何官僚都没有区别。可见，正象前面所说的，党的工作人员“具有”变为官僚的“倾向”。工会工作人员不愿在这条道路上落伍：工会的衙门在有些地方愈来愈代替了同群众的交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赶上了自己的同志，甚至工人通讯员也暴露了这些毛病。（笑声）有时工人通讯员感到自己似乎进进出出有委任状，有官衔，已经可用鄙夷的目光看人，一句话，国家政权的光辉，国家政权的洪福在他身上打上了烙印。并非纯粹出于良心而帮助无产阶级国家。不，他觉得自己就象旧制度下的七

品官一样。(笑声,鼓掌)这不仅对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而且对机构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事,而对机构危险本身就是对人的危险。事实上,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合作社和普通的国营店铺几乎一模一样,这好不好呢?我们到处叫喊:“主动性,社会性,合作社的社会性”等等,而结果——白搭。因为好象应当用望远镜(不是通过普通的放大镜)来观察——国营的普通店铺同合作社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这种“社会性”在哪里,是不是藏在店铺下面呢?我们的合作社应当是合作社,应当联合群众,应当在农村代表社会性,应当提倡主动性。当这里坐着不受监督的官僚时,有什么鬼主动性可言。在我们的工会中,经常存在着此类倾向。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会机关同行政机关区别不大。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的机关同国家政权机构毫无区别。在办公室坐着党的某三人小组,他们“不顾理智,违反自然”直接“代替”苏维埃机关。谁也没有去过任何苏维埃,没有直接找上门去,而这些同志坐着,审判和管理,宽恕和惩治,为所欲为,似乎党的机关就等于国家政权机关!党的任务在于,使党员决不致成为官僚,而是国内最生气勃勃的人,他们可以“揪着”官员的“耳朵到太阳下而去”,他们可以纠正、改善和指导国家机关;而如果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那他们就不会揪着“耳朵”,而只会去拉“手”。(笑声、鼓掌)工人通讯员运动在壮大,新的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不断涌现,伟大的运动日益发展,同时工农通讯员阶层也已经出现,他们从后台阶走到长官跟前,必恭必敬地问道:“请指示写什么?”而爱“作指示”的人在我们这里多到了极点。我们这里的头衔是很有意思的,例如:“艺术事业管理总局局长”,“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局长”,不过,注定有这些头衔的同志是完全无罪的。但这只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总之,工人通讯员本应去改善的,而一看,他早已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请看,我们这里的事情多么复杂。当然,我们应当牢记:我们

有经济工作人员；他们当然也是我们阶级的儿女；诚然，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不是没有毛病的，但须知我们阶级的各阶层都有毛病；也许他们的毛病多些，因为诱因多些，但他们在从事我们的事业。然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复杂的事情，你毕竟应该识别和看到工会工作人员的任务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之间的区别。工会工作人员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是的，说得对。经济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是的，也说得对。经济工作人员也好、工会工作人员也好，共产党员也好，忠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好，他们统统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对这几种人应当有区别；他们之间应当有分工；当我说话，而你们听我说时，我们干同一件事，但是我们没有立即大家一起喊起来。这里也存在着分工。早晨我召开了一个工农通讯员会议，他们说，我听；现在由我来说，你们听我说。（笑声）所以我们要更有秩序并互相帮助。总的来说，我们干同一个事业。在我国巨大建设范围之内，情况也是这样。经济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注意在工厂中建立秩序；建设新工厂；使不致浪费任何东西。安排好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攥紧、爱惜每一个戈比等等。而工会工作者的任务呢？他应当在建设中支持经济工作人员，但他有特殊的任务：你想把生产搞得更好，——很好，但你不要对工人施加压力，如果不这样做也行的话，如果通过技术改良、比较完善的劳动组织，节约开支等等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的话。一句话，工会工作人员有其他的任务：他首先应当联系群众。这种分工完全不奇怪。你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好吧，我来帮助你；但请按时发工资，按时发工作服，设法安装通风设备。相反地，比方说，如果我们的商业人民委员部不去关心粮食供应，而去盖工厂，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跑遍全国去抓粮食投机商，那才奇怪呢！我们这里应当有分工。经济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机构、工农通讯员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也应当有分工和互相帮助。

每个人都应当干自己的工作，如果他们开始弄错了自己的任务，那除了胡闹以外，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

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疾病”。烟草工人有结核病，一部分经济工作人员有官僚主义病，（鼓掌）共产党员——过于自信和自高自大，其他人有许许多多自己的毛病，这些毛病后来不断发展，有时变成了赘瘤，造成呼吸困难。

如果我们自问，如何更简单地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当前主要任务，我认为，应当这样说：必须竭力加强整个苏维埃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应当用实际的苏维埃舆论这把刀子切除我们国家机构上的多余的和有害的赘瘤。

当然，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不是某种脱离苏维埃舆论的东西。我们的工会的触角伸到了苏维埃机关，例如，它们预定经济工作人员候选人，它们掌握着劳动人民委员部等等。各种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手指联合成一个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拳头。但是不应当忘记，每个指头都有特殊的职能。

现在苏维埃舆论机构应当组织千百万广大群众，从各方面铲除官僚主义和根除一切邪门歪道（这些现象在社会组织中也有）。

务必使苏维埃舆论在党、工会和合作社等方面加强起来和积极起来。多一些首创精神，多一些主动精神！多一些群众性的创造！

我应当在这里就官僚主义的特征和官僚主义者的特征说几句“心里话”。对官僚主义者来说，突出的是某些互相联系的特征。通常人们说：官僚主义者，这就是同纸打交道的人，就是“纸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没有纸就很难写。有些天才人物在板墙上写，但这种做法不宜提倡……（笑声）纸本身是财富，但它同任何财富一样，可能“被滥用”。例如，有一个农民因农事或其他事情来到莫斯科，来到省中心或州中心，谁也没有头头是道地向他谈一

谈，没有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拿到的是一张纸，而且是上面盖着各种印章的纸；他拿着这张纸前往另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又得到另一张纸，他拿着这张纸去到第三个地方，如此等等。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纸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使用纸、墨水和象印章这样的文明生产工具。一切似乎都很顺当。而事实上这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除了耗费纸、墨水、不必要的劳动时间和激起群众的正当的愤慨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官僚主义的最令人厌恶的东西，是形式主义的办事态度，持这种态度，则不断突然摆出作威作福的架势和意识到自己对人的“权势”，不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总想设法尽快地把事情推掉。我劝你们读一读老的讽刺作家，例如谢德林的作品，即使读读他的“愚人城的历史”也好。我们这里还有些老的坏家伙，在新人中有时也会出现“初出茅庐就露出丑恶面目的人”。稍稍揭开我们行政管理干部的面目，就可以看到格鲁斯启洛夫之辈，看到涅戈佳也夫之辈，看到维里坎诺夫之辈，看到乌黑溜—布尔切也夫之辈。

形式主义的办事态度的表现是，人（“请求者”，“申诉人”）消失了，因为对官僚主义者来说，在人和木头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对官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长官眼里是清白的，——仅此而已。如果官僚主义者的地位更高，那么，这就会反映在全部工作上，有时甚至反映在某些行政命令上。这种人不愿意也不可能弄清楚和事先估计到，这个或那个决议对群众，对工人，对贫农—中农阶层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没有对自己的杰作感到不安，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或行政指示而造成这样的事情，例如，一个区区农民骑着一匹劣马，要徒劳无益地走几十里地，然后返回来，或者慢慢地步行回来，即使磨出了血茧，也活该。这就是我党决议中所谓的“不关心群众的疾苦”的恶习。这就是恶劣的官僚主义的“杰作”。列宁总是看到面前的劳动群众和他

们的一切疾苦，他们的一切需求，他们的一切利益，他们的一切思想，他们的一切怀疑。

在工农通讯员会议上，同志们指出了那些命令，即正象一个农民通讯员所说的，那些应当被认为是“对贫农的侮辱”的命令。确实应当用烧红的铁块，而不仅用烧红的笔尖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杰作烫掉。而这些官僚主义作者从不承认他们有什么过错；相反地，他们总是肯定地说，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平安无事。应当好好抓住这种人物，以便从一堆废话中揭露真实的情况。我们共同的机关中无处不在的这种官僚主义疮疤，应当千方百计剥去，揭掉，首先应当用苏维埃舆论的力量把它揭掉，这种舆论应当切除官僚主义赘瘤，正是用这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而这也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和更大胆的批评，要求一切舆论机构有更多的积极性，要求它们有更多的首创精神。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官僚主义僵化现象——而这是主要的祸害之一——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同一个人身兼数职，并且必须自己监督自己，因为他既是行政首长，又是党的活动家，还是工人通讯员的领导人，一句话，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有点夸大，但这种情况是有的。（喊声：有，有）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纠正自己，自己监督自己，也就是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让任何人监督和纠正自己。或者有一帮人，有一群“朋友”，他们把互相监督化为乌有，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等等，于是他们很难互相监督。友谊也许并非一种坏的情感，但从客观上得到的结果是，这种“至爱亲朋”使监督化为乌有了。真正俄国榜样的令人厌恶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至爱亲朋——酒肉朋友的形成。“连结”一词在我们这里有两种含义。一种连结是从好的同志关系形成的意义上说的，另一种是从酒癖的意义上说的。（笑声）但经常是这种和那种“连结”和谐地溶为一体（笑声），怎么也没法把这样一些人

扯开,只得使他们“开焊”。甚至在党组织内,在工会组织内和共青团组织内都有那种“连结”的一伙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这些“至爱亲朋”按国外的说法有自己的秘密“联合会”,或者自己的起着“社会灵魂”作用的“中心人物”。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比方说,如果把这样的“人物”从敖德萨调往阿尔汉格尔斯克,那么,他那一伙人就会钻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安顿下来”。如果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调到另一个地方,那么,他那一伙又会跟着迁过去。这一伙人称此为“全套工作人员”。(鼓掌)我们在一个地方使他们开焊,他们很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又连结起来。对于这种“可爱的性格”也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进行攻击。当然应该把真正的同志的连结同刚才说的那种连结区别开来;必须同后者进行无情的斗争。

现在就我们报刊的某些局部的任务谈几句,我把早已说过的思想作为本报告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为了在改造时期克服一切困难,应当把千百万人投入斗争。而为了把这么多人投入斗争,应当提高苏维埃舆论的比重并用这个杠杆来除掉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疮疤,帮助它同它自己的疾病作斗争,即同阿谀奉承,同官僚的巴结逢迎作斗争和实现真正的自我批评。应当抱着这个目的来弄清楚某些相当基本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指示。

首先,我们的报刊应当尽量正确地报道情况。当然,有些事我们不能采用“公众注意,公众注意,公众注意”的形式通告,之所以不可能,因为这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损害。比方说,我们不能把任何有关我国军事秘密的东西登出来。须知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紧闭的瓶子里面。不能象有的人那样,提出这样的口号:把所有的东西统统登到报上去。但是我们应当正确地报道现实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对某些东西避而不谈,或者没有很大胆地报道,那么,这最终会向坏的方面影响我们的共同事业。你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隐瞒我们现有的困难和还会发生的困难的情况吧。处于这种困难的

时期，人们会很有道理地向我们提出问题：这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你们对此保持沉默？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作出巨大的牺牲，但他们要求我们——同时他们也有权要求我们——及时地有什么说什么。否则不可能指望工人阶级，否则不可能动员劳动群众。

其次，我们应当正确地估计群众的情绪。我们之所以有力量，因为我们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甚至当群众产生错误认识时，我们作了耐心的解释，说明了困难在什么地方，一五一十地分析了情况，并且使群众理解和明瞭党所走的道路。但为了这一切，应当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而首先，这是工人通讯员的任务，因为正在变为官僚的工人通讯员，正在失去同群众的实际联系的通讯员并没有反映群众所说的东西，这样的“工人通讯员”不再是工人通讯员。这样的“工人通讯员”不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任何利益。

当然，工人通讯员的作用不仅仅是伸着耳朵听。他的作用同我们全党的作用和苏维埃的作用一样，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工人群众中存在的怀疑，他应当进行解释。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这种解释工作是特别需要的，因为我们经常坐在编辑部、办公室及其他地方，而这时人们在工厂内，在街头巷尾，在电车上和在啤酒馆里所谈论的，在我们报纸上则反映极少。报刊应当反映这些情况，因为这是群众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同我们的敌人散布的荒谬的谣言的斗争中，也不妨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的任务完全不在于“背对着”各种谣言，——这是很容易的。我们的任务在于解释这是胡说八道，解释是怎么回事和应当揭露谁等等。

再次，必须使工人通讯员同一切其他的报刊工作人员完全一样，争取少一点毫无意义的人云亦云，多一点对当前生活问题的明智的理解。不久前我读了一本新小说《十二把椅子》。这里相当辛辣地描写了一个敷衍塞责的、俨然是无产阶级的诗人的形象，这个

人跑到各工会机关的编辑部去，到处捞稿费，以特殊的方法编写了自己的“生产”诗歌。比如，他去到联合林业工人的工会机关，并带去了关于加甫里尔的“叙事诗”，这篇诗文的开头是：

“加甫里尔穿过茂密的树林
加甫里尔砍伐竹子”。

然后他到了农业工人工会，他把大名鼎鼎的“加甫里尔”改写

成：
“加甫里尔一清早就耕地，
加甫里尔珍惜自己的犁”。(笑声)

然后他到了邮电工人那里并写道：

“加甫里尔当了邮递员，
加甫里尔分送信件”。

后来又到了面包师联合会，就是那个加甫里尔又出现了：

“加甫里尔当了面包师，
加甫里尔烤熟了面包”。

(全场笑声)就是这个“加甫里尔”到处给这位随机应变的作者

的口袋带来丰盛的食物。就在这部小说中有针对我们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相当成功的讽刺诗。在小说中还描绘了一个省社会保险机构里的情景：那里坐着一些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就在那里贴着一个口号——“细细地咀嚼食物，你就会对社会有帮助”。(笑声)或者在溺水者救生协会的救生站上，处处都挂着一幅招贴画，上面写着非常“革命”的口号：“拯救溺水者的事情是溺水者自己的事情”。(全场大笑)

我们这里常常有这种情况：这类加甫里尔之歌的作者钻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即经济生活，工会生活，党的生活的许多部门里来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宣传和鼓动多样化；我们应当弄清楚实质，而不是用“文艺创作”来自我欣赏。不加解释，不加深思熟虑的

分析,不加宣传,我们的口号就可能变成几文磨损的小钱。总之应当懂得,我们面临的建设时期对待人的任务不在于培养不论什么时候,特别在首长警觉的目光下能够重复同样的话的应声虫,而是培养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分析问题后能够作出正确的指示,他们在斗争中实际上能够给任何敌人,无论是富农,无论是耐普曼以正确的“回答”,他们坚定不移,凭良心行事,能够说服动摇者。

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当必须领导千百万人的时候,当必须同那些在某些地方很嚣张的富农作斗争的时候,当必须持久地争取中农群众,促使他们中间的动摇得到克服的时候,形式主义者—官僚是不能迅速解决这个任务的;这里需要团结的、忠实的、经过锻炼的有觉悟的战士的干部。也需要有极高的觉悟来同党内的倾向,同表现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的右的危险作斗争。

现在相当多的事情要以我们的演说、决议、决定为根据。这不只是“文学作品”,这里加进“一句话”,那里“插入一句”,这里象夜莺般的歌唱。不,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用实践,用建设的实践,用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检验。

千千万万活人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谁不想理解这一点,他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体现,因为官僚主义者的基本特点就是,他看不到自己面前的活人。而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苏联的真正建设者在自己面前经常应当有活的群众,我们同他们一起、在他们前而和为了他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官僚主义的木头人,因为革命需要我们的全体干部每小时,每分钟,每秒钟都考虑劳动群众的需要和要求,考虑如何正确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当前的需求和长远的需求,主要的需求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需求。正确地满足这些需求,其实就是更快地、更顺利地、和尽可能平稳地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党关于自我批评的口号具有巨大的意义。

当然，必须使这种自我批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武器，因此完全有必要使这种自我批评不光是谈些鸡毛蒜皮，必须使这种自我批评看得更远和更深，使它说明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使它力求超出一个“自己的村子”，一个工厂的界限；必须使它不致变成贸易广场上卖咸鲱鱼的妇人的集市吵架。我们这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重视区区小事而放过这些小事背后的重要东西。也有这样的情况，自我批评就是算个人的旧账和勾心斗角。还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巧妙地限制自我批评的范围，使自我批评局限于无谓的争吵。既然谈的是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问题，我要重复说，不应当把自我批评局限于一些小事，而应当更大胆地开展自我批评，看得更远些和更深些，从而教育工人这些社会主义建设者，并吸引新战士来参加这一建设。其次，同志们，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需要的自律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的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内在的文化发展，为的是解决改造时期的复杂任务。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常常从表面上理解文化革命的人。可以给自己挂上各种官衔和勋章，前前后后挎着许多公文包；可以使自己掌握主持会议的技术和成为巧于组织游行和节日活动的能手；但是工作不会因此面向前推进。我们的任务不是表面上的。问题在于内在的文化，它表现在认真地对待工作，意识到我们每个人所承担的微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意识到这种责任，将有更多我们极其需要的内在的端端正正的品质，那么，自我批评也就是真正的自我批评，而不是无谓的争吵，自我批评就是确实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强大的杠杆的真正的自我批评。

我们应当抱着这种处事态度来参加战斗和争取完成我们的当前任务：争取很好地完成粮食收购工作，争取扩大播种面积，争取使我国工业合理化，争取无产阶级在苏维埃选举中获得胜利等等。

所有这些任务都服从于我们伟大斗争的任务。我们将在同无

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斗争中，动员千百万群众，实现我们高度概括的口号——金属，粮食，文化，国防。我们的大军，即工农通讯员大军，是在改造我们社会的这一伟大过程中的极庞大的辅助部队之一。如果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充分意识到自己对无产阶级的责任，看到有明确的前途，知道如何前进，向哪里前进和为什么前进，他将去做自己的工作，团结群众的工作，同时，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团结这些群众，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率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战斗，组织千百万群众同困难作斗争，那么，世界上的任何力量，无论是内部的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折断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强有力的脊椎骨！（热烈鼓掌）

第一次发表于1928年。译自《真理报》1928年12月2日。

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任务

1918年3月，列宁在我国革命最严峻的时刻写道：

“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赞成‘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也就是保卫祖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

‘仇恨德国人，打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的口号，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可是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仍然忠实于与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事实正是这样：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外，同时还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终结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①

从这些话发表到现在已经十年多了。但是，我们给自己提出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1—492页。——编者注

的任务——“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向“德国人”学习的问题成了更加尖锐、更加迫切的问题。资本主义“包围”尽管被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分散了力量，却依然非常强大。它的破坏作用被世界战争的聚光灯无情地照得原形毕露，甚至引起了资本主义思想家的注意。例如，人们公认的资产阶级科学大师威纳尔·桑巴特教授写道：“资本主义将在地球上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的战斗力和它的技术、科学与经济重新发展的时代，这就说明，为什么列宁所提出的任务决没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消失。这就说明，为什么它这样坚决顽强地使人对它牢记不忘。

一般地谈论“科学的用处”，似乎多此一举。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伊里奇深恶痛绝的“共产党员自大狂”已成通病的时候，当公文包和党证在官僚主义蝗虫之中被认为能取代真才实学和对事业的真正忠诚的时候，不妨牢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尽管实现了胜利的革命，但是，我们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终究还是外行。

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胜利，获得了一系列极为巨大的成就（对我们的规模来说，是巨大的成就），但没有经常看到别国的技术和科学的规模。而“事实是”：掠夺全世界的美国“现在体现着”科学领导企业的原则、最新的技术和最广泛的科学运用。“事实是”：依靠美国贷款而跃起的德国，重新成了整个欧洲技术改造和迅速改进生产的榜样。“向德国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的口号现在提上了日程，而且实际地、为一个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的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正是我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软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① 威·桑巴特：《资本主义的变化》，见《世界经济文库》第28卷第2册第245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是在各种痛苦的和日益加剧的矛盾中进行的。但是，这些矛盾是在紧随着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明显增长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列举某些说明先进资本主义技术强大力量的材料。美国几种主要发动机的生产能力的概况：

	马 力
各中心站和工业·····	45,000,000
电气化铁路·····	4,119,000
矿 业·····	5,147,000
非工业站·····	4,000,000
蒸汽铁路·····	130,000,000
水路运输·····	16,000,000
农业和牵引力·····	200,000,000
汽 车·····	300,000,000
<hr/>	
总 数·····	704,266,000 ^①

美国在战争时期打破了发动机发展的世界纪录。从1914年至1919年期间，仅工业中的马力就从2230万增加到2930万，即在五年内增加了700万。但是，这种技术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被德国超过了。德国从1920—1921年起，在战后五年内就把这个相应的数字提高到800万至900万马力^②。同时，增长最多的是下列生产部门(绝对数字)：

	马 力
铁和其他金属的开采·····	2,786,100
矿 业·····	2,728,000

① 德克斯特，S·基姆巴尔，《机器与动力》，见胡佛主编的文集《工业进步的世纪》，纽约1928年版第140页。

② 参看WL·沃廷斯基，《德国经济中的劳动和机器》，《社会》杂志第5年集第2期第139页。

机器制造业.....	1,095,000
化学工业.....	735,700①

电气化的成就特别显著。关于这项事业的技术方面，下列事实值得注意：电气总公司1903年制造的第一台强大的涡轮发电机具有的发电功率为5000瓩；现在功率为50000瓩的发电机已司空见惯，而且正在制造90000瓩、104000瓩，甚至208000瓩的发电机。② 化学工业和汽车制造业蓬勃发展，人造纤维和液体燃料等产量日益增长，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美国农业研究员阿尔图尔·卡别尔写道：“从1920年至1926年的技术进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最显著的特点是机械化发展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从前需要用于生产活劳动力消费资料的土地腾出来了。从1920年1月至1925年1月，农场的拖拉机从246000台增加到506000台，给全国农具增加了700万马力。由于农场的运输汽车增加，新增马力在400万以上，而由于煤气发动机设备的发展而增加的马力则在200万以上。与此同时，农场用的骡马总数减少了，腾出了1500万到2000万英亩土地来种其他作物，不再种饲料。”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1926年有12000个合作组织，1915年仅有6000个）——这就是高涨的主要杠杆。③

德国的发展趋势就是这样。“最近的生产调查表明，农业机械化已经向前大大推进。在农业中采用电力取得了特殊成就。”④ 这

① 参看WL·沃廷斯基：《德国经济中的劳动和机器》，《社会》杂志第5年集第2期第139页。

② 基姆巴尔：见上述杂志第133页。

③ 阿瑟尔·卡帕尔，《农业一百年》，是胡佛主编的文集《工业进步的世纪》第18—19页。

④ 罗伯特·凯普尔伯爵：《德国农业的合理化》，《德国经济合理化的意义》文集第190页，柏林，工商业书籍出版社，1928年版第190页。

一点不仅城市工程师予以确认，就是对于“压迫”土地所有者感到牢骚满腹的地主公爵也承认。根据 H·普拉尼施尼科夫教授的计算，德国钾的总产量有 93.5% 用于农业，只有 6.5% 用来满足工业需要。^① 换句话说，化学工业在军事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使一系列工业部门发生革命，同时也是农业技术改造(广义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在饱受分裂矛盾折磨的资本主义世界(我们的“周围”)在疯狂地向前跃进。不仅在技术领域是这样，而且在经济组织领域(托拉斯、银行、合作社)和在科学领域都是这样。如果没有为利润的利益服务的科学的日益扩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的最新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所谓“资本主义合理化”就是在按照科学的全部规则进行冷酷无情的计算。它给资产阶级腰包塞满了追加利润，而把千千万万无产者抛上街头。科学在任何一个涉及企业主经济利益的领域都享有非常光荣的地位。工程技术人员在无数工业实验室，在国家、大学、托拉斯和工厂的研究所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原料、金属、机器、成品和各种新思想都成了进行最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对象。人的活力导致了劳动生理学和心理技术学等许多新科学部门的产生。过去是由一批特殊监工用手粗暴地摸试“劳动牲口”的肌肉，“用目力”测定它的熟练程度，现在则是用特别精密的科学感触仪对“劳动力”进行细致的摸试，在精心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加以分类、定级和剥削。工厂和车间中机床的配备，人力的配备；停歇；机器的“休息”和工人的休息；充分利用劳动日和自动控制(传送带)问题；利用工人阶级的创造发明能力和防止“不满”、暴动、革命——所有这一切几乎都象工艺学、化学、农艺学、正确的会计学等等中的问题一样，成了科学分析的对象。“现在合理化采取了精密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形式，而这种研究是在非常明确的试验基础

^① 普里尼亚施尼科夫教授，《国家的化学化和农业的需要》。

上、有计划地和从紧密地互相依赖的角度来进行的。”^①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具有高度的阶级自觉，他们深知这种“紧密的互相依赖”。邦洪教授清楚地说明了技术观点与经济观点之间的差别，认为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并不是经常有利的（“在有廉价劳动的印度或中国是否需要采用机器，这是一个成本计算问题”），并且恬不知耻地说：“当代有组织的群众不会沉默地忍饥挨饿。正如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用昂贵的预防工程来防止自然灾害一样，现在也需要用各种社会研究所或者预告社会灾祸，或者缩小它们的影响……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计算应当包括社会思想。这种过程已经开始了。”^②

伯利夫斯教授在同样突出地描述了把“雇佣的人”变成“生产费用的简单要素和企业物质”之后，毫不掩饰地写道：“但是，人的反抗可能上升到原则的高度，而人的生活的成功可能与废除经济和财产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把一般劳动者变成生产费用的简单要素和企业的物质。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正是在这里。”^③

他具有高度的阶级自觉，把依靠“现行制度”的改良主义黄色工会——看够了本国和美国的同事——的理论与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但是，这并不妨碍邦洪教授对美国资本大王的“科学”策略做出这样的评价：“当然，许多美国企业主从社会角度思考问题，并不比他们的欧洲同事高明。但是，他们思考得更加合理。因为他们不受各种等级偏见的束缚，而让工人这个阶级保持某种程度的收入，所以，他们按照‘赞美傻瓜，他才会好好干活’这句俗语行事。”^④

① F·德莫斯：《德国经济合理化的意义》一书的前言。

② J·邦洪：《技术与经济的合理化》，见《德国经济合理化的意义》第21页。

③ G·伯利特斯：《劳动合理化》，见上引书第36页。

④ 邦洪：见上引书第17页。

对于资本家老爷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傻瓜还很多，多极了。资本家真幸运，无产者真倒霉，现在竟存在一种由于背叛和受贿而加深的有组织的愚蠢，这就是各改良主义工会加上各个社会民主党。甚至就连这样的“愚蠢”，资本家老爷现在也要精通业务，有“科学”核算的根据，才能加以利用。

剥削阶级的肮脏目的就是暴利、赚钱和压迫，这是明明白白的；这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和懂得，资本怎样狡猾地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怎样把科学变成巩固自己、增殖自己、首先发展自己经济的杠杆。

莫里士·霍兰德，全国研究委员会——美国一个大科学组织——工业研究处主任，对当代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认为，从工业观点来看，我们将要结束机械效能的时代；自动化机械发展了；扩大了电力的应用范围；标准化具有了重大意义；建立了经济管理工程和各种效用体系，总之，一切实用的或技术的科学设备都在现代工业进化过程中运用起来了。我们正处在工业科学时代的第一个繁荣高潮，它是由各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先锋宣布的。”^① 这些实验室现在成了工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工业的科学研究的经费每年要用 2 亿多美元。不久以前发出的《全国研究委员会》公报登记了 1000 个工业实验室，属于政府部门和各大学的实验室还未包括在内。在全国各研究机构中约有 3 万科学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纺织工业实验室是最大的私人实验室之一，现在有一系列科学部门的学者和专家共 87 人；植物学家研究各种棉花作物；物理学家研究纤维的物理性质；化学家研究化学元素的基本属性；工程师和机械师把各种科学原理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最后则由工业家负责把各种研究成果应用到整个生产的全

^① 莫里士·霍兰德：《研究、科学与发明》，见上引书第 312 页。

部过程中去。^①有一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每年花1300万美元用于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各种工业研究实验室是“电气化学工业的摇篮”。汽车和飞机是直接同钢铁工业实验室联系在一起的，无线电也是在这样一些实验室中诞生的，如此等等。

“隶属于”“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联合了许多研究性的实验室和机构；它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但同政府保持着工作联系。

在德国我们同样看到科学-工业活动的繁荣景象；在化学、电气技术等工业领域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科学思想对生产过程的巨大影响。И·普里亚尼施尼科夫教授写道：“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形就够了：按照英国1914年的计划，只要实行封锁，德国在1915年春季以前就会被迫投降，而且其办法不是使它缺粮，而是使它“缺硝”。这就是说，按照英国人的如意算盘，使德国与智利隔绝以后定会缺少炸药，但是，德国的化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努力建立了新的制硝工业部门（合成氨），使英国人的全部打算落空，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在供应农业氮肥方面成了不依赖智利的独立国家。”^②从此以后，这个事业就一日千里向前发展了。

许多委员会和实验室是通过一个特殊机构（“帝国经济董事会”）联合起来的，在这里汇集着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建议，主要是与标准化、定型以及合乎规格的大批生产等有关的问题。^③

总之，毫无疑问，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沿着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了；毫无疑问，在技术方面，在“劳动组织”方面，在有组织经济形式方面，在利用改良主义方面，资本取得了巨大的

① 莫里士·霍兰德：《研究、科学与发明》，见上引书第318页。

② И·普里亚尼施尼科夫：见上引书。

③ 《德国经济合理化的意义》，第8页。

成就。(这些成就有其“相反的”一面：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加深，革命震荡新高潮迫近，如此等等；但是，分析这些现象不是我们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科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增长过程中现在发挥着它空前未有过的作用。因此，超过资本主义的技术，这就意味着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科学。

上述那位邦洪教授也“顺便”谈了我们的弊病，即谈了苏联。而他在这里非常冷静地提出了问题(要知道，这不是用不可避免的无聊废话写成的“民众”通俗读物，而是柏林工商业局的“内容丰富”的出版物！)：

“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让居民享有同样好的——而不是同样坏的——经济福利。因此，合理化问题在苏维埃俄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苏维埃俄国。——尼·布·)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不能建立一种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私人资本家所创立和领导的更加有效的技术机构。”①

问题的这种提法基本上是很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这种提法正确，那么，显而易见，它就交给了我们某种追加的任务。

首先，应当彻底弄清，要么我们在实行科学的经济领导的条件下取得胜利，要么我们就根本不会取得胜利。也许，这显得有点夸大，或者有点——上帝保佑！——“学院式倾向”。但是，这是改造时期的历史真理。

二

永远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能够取得胜利，不仅是由于人民的热情高涨，好象汹涌的大海洋，不仅是由于无产阶

① 邦洪教授，见上引书第16页。

级自己万众一心，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的战斗，而且是由于它有卓越的领导，它有无产阶级军队英明统帅，即有善于正确地科学地分析形势，因而能够正确地科学地采取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就拿伊里奇的这样一些文章来看，例如，他的名著《危机成熟了》（十月起义前写的），或者他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几次演说，或者论粮食税的小册子，或者他在逝世前写的几篇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科学分析、科学预见和科学政策的光辉典范。我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做到这一点。国际资产阶级对此也完全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在其他领域却还远远没有学会科学地进行活动，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里本应投入更多的阶级力量。

在1917年10月，当时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现在的任务则是发动群众参加紧张的建设工作，并且要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在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善于经营业务，尽量减少缺点。

现在向经济领导和一般领导都提出了非常特殊的要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自发势力解决许多基本问题。“晴雨表式的价格波动”分配生产力。严格核算，样样计价，细扣赢利和准确的科学会计，这首先是私人“企业”、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具有的精神。各种错误和失算也是以这些范围作为自己的范围。在我们这里，生产资料、运输业和金融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前所未闻的集中一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任何失算和任何错误都在社会范围内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小店主、买卖人、工厂主和银行家的各家行动或多或少地彼此互相抵消，而各种矛盾的积累会通过危机来取得平衡。

在我们这里，主要生产部门的经济领导在过渡时期一开始就掌握了大型经济企业，而在这里不可能有这些分子的相互抵消。因此，如果政策不正确，整个过程的无益耗费完全可能超过资本主

义自发势力造成的耗费。而反过来说，如果政策正确，掌握数以百万计的巨额财富的可能性将向无产阶级提供胜过资本家所拥有的各种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有力王牌。这就是说，只有在科学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计划政策应当成为一门（它已在开始成为）依靠自己的理论和依靠一系列科学的学科的特殊实用科学。为此应当建立会计和统计。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计价和核算在我们这里应当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用得更少。这种核算的原理、方针以及对待财富和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计算的准确性和范围，计算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应当更大得无比。统计的客观性是正确政策的起码前提，正如伊里奇所说，它应当符合实际，而不是符合主观愿望。如果注意到在制订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自发势力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重新划分各个经济地区的必要性，以及不得不考虑采用新技术，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对付资本主义包围的各种极端复杂多变的办法，那就不难理解拟订国民经济计划在科学上、理论上同时在实践上的艰巨性。这项工作要求人们不但具有一般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特别是极为复杂的数学统计知识。国家计委和与它有关的各个科学研究所的巨大作用就在这里。

但是，国家机构——国家的全部机构——是一部如此庞大的机器，以至它本身就应当是一种研究对象，而管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研究材料作为根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过：“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性急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这种知识的缺陷。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

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决心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就料到“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践家’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②但是，他认为，工农检查院如果不实现这个要求，它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不怕人议论，他把按他的计划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同“学院式的机关”进行比较，要求把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同理论工作，即同“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和“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③的工作联系起来。

正如列宁所说，如果在社会范围内需要“组织理论”（计划问题、整个国家的机构问题，最后，组织群众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在各基层生产组织，各托拉斯和各生产部门，等等，就需要行之有效的组织劳动的理论。因此，泰罗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④

但是，经济核算的另一方面是与计算新的机器、设备、工作方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9—70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702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704页。——编者注

④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11页。——编者注

法等等的技术效果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实质不仅在于拟订计划、管理和科学的劳动组织。改造时期就是要进行技术改造。这种技术改造（采用新机器、建设新型工厂、建立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采取新技术生产方法，如此等等）意味着不断地更多运用自然科学，而首先是运用技术科学。我们可以以有一系列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所而自负，但是，同我们的许多资本主义对手比起来，我们是太落后了。我们在技术领域应当依靠西方的成就，从敌人那里吸取一切能够吸取过来的东西。

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它为无产阶级输送了一大批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文化较高的一些民族，首先是德国人，创立了许多思想，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智慧”再去创造它们。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输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德国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生产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对资产阶级科学进行批判的革新的研究和改造的结果。技术上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应当——这一次首先是在技术科学领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过程不是从它的“初步知识”开始，而是相反，要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这在经济上对我们是绝对需要的。既然“资本”严重缺乏，我国的预算极度紧张，既然我们非常讲究节约、讲究最快的建设速度和新生产单位的最大效果，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就应当竭力利用“外国的”技术经验。我们应当加紧对这种经验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派遣一些严肃认真的人出去——必须极除那种只求一知半解的人的习气，因为那种人既不尊重科学，又不尊重人，也不尊重无产阶级。我们的学者应当比西方学者更熟悉西方的科学文献，不管这件事多么困难，多么艰苦。我们的学者应

当在经济机关的充分支持下，建立供试验用的研究实验室网，并在实践中检验西方的成就。我们的学者应当摆脱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公文往来，因为它会窒息一切生气勃勃的事业，浪费大量的时间。我们的青年应当经受严格的训练，应当证明自己有知识，而不是求助于自己的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必须使那些真正的学者在工作中能发挥必要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特别是当问题涉及新经验、新科学学派等等的时候。

科学，这是巨大的补充的社会生产力。并且，它愈是掌握更多的群众，就愈是成为更加强大的杠杆。这就说明，为什么群众的教育事业，把科学推广“到血肉中去”（列宁语）的事业，是文化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因而也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他是天才的战略家，因为他科学地估量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他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天才领导人，因为他不是从死板公式、各种词句、空洞条文和陈词滥调出发，而是从科学地分析实际生活出发。他是天才的建设者，因为他深知文化、它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及其互相依赖的关系。他是天才的创造者，因为他本人吸收和批判地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主要东西。列宁通晓欧洲各种语言，阅读大量书报，并对一切新鲜事物作出反响，他决不是“俄国佬”；他既是实践家和理论家，又是事业和思想的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者和国际革命的学者。因此，他能够对我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事业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我们现在沉痛悼念他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应当牢记他的一个遗训：“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①

第一次发表于1929年。译自《真理报》1929年1月20日。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9页。——编者注

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们已故的导师和领袖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伟大人物的作品是一个神奇的思想宝库。从这个极其丰富多采的宝库中必须加以选择。我必须把自己的题目加以限制,因为思想遗产的财富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所以我把自己的发言的题目限定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自己最后的、最英明的、最有分量的话,作为自己最后的、最周密的指示而留下的那些思想的总和。我想谈谈关于给党留下的一个充满热情的、极英明的全部工作的计划,列宁建立了这个党,领导了它,引导它走向了胜利,在国内战争的英雄的严酷的日子里领导了它,在伟大的经济工作业已开始的时期改组了它,并又引导它投入战斗。

列宁同志给我们的遗嘱中的最主要的东西,包含在以下五篇内容十分精采、十分深刻的文章中,即:《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制》。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文章不是一些孤立的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构成列宁战略和策略的一个大的计划的各个有机部分,这个计划是根据世界革命力量的统帅的英明而敏锐的眼光所预见到的十分明确的前景制订的。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文章都被频繁地引用过,几乎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研究过。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个空白点,在这个隆重的纪念晚会上,我想来填补它。这个空白点在于,

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试图分析这几篇文章的相互联系，把它们理解为构成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工作的巨大远景计划的一小部分。

在进入我们的导师令人沉痛地逝世后的第六个年头时，也许有人担心，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过分卖弄聪明，是不是我们自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是个别的、尽管是英明的意见胡乱拼凑起来，人为地联系在一起呢？对我国整个革命的估计和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意见之间果真有什么共同之点吗？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本人却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完整计划的表现。

正是在谈到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中——这里似乎“仅仅”是一个“局部”问题！——列宁写道：“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①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列宁逝世前的几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在这些文章里，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对我国革命作了总的估计；对我国发展总路线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描绘；对国际形势作了虽很简短但很深刻的分析；谈到了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关于基本的阶级关系问题，关于国家机关问题，关于组织群众的问题，最后，关于组织我们党及其领导的问题。实际上，举不出我们政策中任何一个稍微重大的问题，列宁同志最后指示中所阐述的这个总计划没有对它进行过分析。列宁阐述这些最主要的政策问题，不是从一时的、瞬息即逝的形势着眼，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从我国发展的“重大政策”、最广阔的前景、总的路线和主要道路着眼的。他的分析不是对一个小小的局部进行舍本逐末的分析，而是一幅宽阔的画面，他以非凡的力量、以最令人信服的朴实笔调和最大的表现力在这幅画面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1页。——编者注

上描绘了历史过程的一个稳重的步伐。从这种分析出发，列宁作出了一些重大的结论；根据这种分析，他也拟定了一些比较次要的组织上的细节。把伊里奇的整个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叙述，这就是我今天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一 从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观点 对我国革命的总的估计

首先来讲讲关于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性的观点对我国革命的总的估计问题。有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题目就叫《论我国革命》。初看起来（表面上看来）可能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偶然的、几乎是评论性的“札记”。但是这种看法是极不正确的。《论我国革命》这篇“札记”，就其思想来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有独创性和最大胆的著作之一。当然，他不是偶然地选择《论我国革命》这个题目，即关于对这个革命以及对它的总的潜力的估计这个题目。他预见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能产生种种怀疑，他知道，也许我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不止一次地经受各种各样的“攻击”，这些“攻击”既来自以往就作为我们的政治敌人在国内进行积极活动的人，也来自它们的继承者，来自我们党的变节分子。他清楚地了解：建设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会把关于能否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一面再、再而三地摆在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面前；一定会有一些暗地里崇拜“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人，路标转换派从消灭旧的贵族的纹章、封建的马厩和沙皇的中世纪制度的观点，同时也从耐普曼的美好生活和未来胜利的观点来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好处，他们的各种胡言乱语将一天天有增无已。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怀疑曾经有过，现在某些地方有大概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再一次提出“论我国革命”，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关于对它的总的估计这个根本问题。

列宁同志提出一个根本问题：有些人断言，我国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充分的客观经济前提和文化前提。好的。但这还不解决问题。学究气的考茨基主义者所不了解的是什么呢？他们不了解根本的一点，这就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应当是发达的国家，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常发达、十分“充分的”（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种充分程度从哪一个发展阶段开始）经济基础的国家，但是也可能有一些由国内外形势的特点所决定的特殊例外。当时我国恰恰具有这种形势的特点，因为我国革命，第一同世界大战相联系，第二同东方千百万各族人民掀起的巨大革命浪潮相联系，第三同国内阶级力量的一种特别顺利的结合相联系，而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认为这是一种最有利的结合，这就是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正是这些情况，正是这种十分特殊的和独特的形势，成了我国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我们首先夺取“工农政权”，然后应当“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①，这样的独特形势已经成为可能的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以需要这些非常大胆的论断，是为了从这里拉一条线通到未来。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马克思早已估计到的阶级力量的特殊结合而实行的，那么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的结合”（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②）无论如何应当持续和保持下去；因为如果失去这种特别顺利的阶级力量的结合，那么在我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页。——编者注

② 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命的整个基础就要丧失。

列宁再一次把“我国革命”估计为社会主义革命，驳斥了那些挤眉弄眼想要回到“健全的资本主义”去和实行资产阶级复辟的人的最主要的论据，对“我国革命”作了充分的评述，同时非常关切地提出了关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以及关于我们的策略的基础和方针这个总的问题。列宁预见到一种危险，即有些人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不了解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整个发展中所发生的全部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和原则性的变化。

二 我国发展的总方向 and 政策的总方针

由此又提出一个对这个问题非常大胆、鲜明、清楚而且特别有力的论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著名的《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论点。

列宁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论点呢？我断言，在所有文章中，以最严谨和最热情的政治毅力最清楚地提出这个论点的正是《论合作制》一文。

列宁同志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而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①

这决不是说，列宁在这里否认阶级斗争，因为“和平组织”“文化建设”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它保证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伟大的集体组织者，发展的方向不是按照扩大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别的路线进行，决不要再搞“第三次革命”，等等。

当然，正象一句带讽刺意味的格言所说的那样：“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生活的实际进程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客观条件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的策略也可能不是完全理想的。因此实际上可能有阶级斗争以及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这种阶级斗争是与社会阶级的重新配置相联系的。我们现在正经历着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这种时期之一，现在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工作“在于”“文化建设”。当然，如果我们不考虑我们斗争的每一个别阶段的特点，那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列宁同志关于我国发展性质的基本原则却是非常正确的。因此这应当是确定我们重要的策略路线时的理论基础。

三 国际形势和对它的估计

列宁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决不限于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从一般的到个别的、到越来越具体的问题，而且以能工巧匠的生花妙笔勾画出那些越来越迫切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国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

际的革命家，头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当然了解，那些最大的困难、最阴险的威胁和危险都与我们的国际形势有关。我们有时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关于我们的国际形势写了些什么，然而他在那里所做的分析，除了少数例外情形，都被以后世界事件的全部进程证明是正确的。只有我在下面提出的第一点被实际生活作了极大的修正。列宁同志曾经这样描述国际形势：(1)在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分裂：德国被压在底下，各战胜国都在啄食德国，不让它抬起头来。这一点在颇大程度上已被“取消”，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在美国大量黄金的有力援助下已抬起头来，尽管还存在巨大的困难；(2)另一方面，列宁分析形势说，战胜国即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可以向工人阶级作一些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①。这个提法是准确的，正确的，是充分慎重的；(3)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人类的大多数正在卷入革命的漩涡；(4)正如列宁说的，“西方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②之间的外部冲突正在成熟；(5)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和物质力量还很薄弱的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在成熟；(6)帝国主义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成熟。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没有对这种稳定作过说明。其实，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基本上作了我们只是在以后几年中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出的那种分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不怕被怀疑有机会主义或某种类似的致命的罪过，他写道，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稳定所产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9页。“社会和平”原文带引号。——编者注

^② 同上，第710页。——编者注

生的种种矛盾。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下一次的革命爆发直接与将要发生的战争联系起来。

至于大规模的人民运动，那么他首先在东方寻求，他看到东方有革命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革命爆发的可能。难道历史没有完全证明这个预测的正确性吗？

四 从国际形势着眼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分析也确定了我们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列宁同志首先从战争危险着眼来观察我们的国际形势。他断然认为这是主要的。

那么他如何提出问题，又如何阐述这个问题呢？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跟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避免将要发生的冲突呢？”

我国应当坚持怎样的策略，以便“不让西欧反革命国家扑灭我们”呢？^①

谁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的精确性，谁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使用“大”字眼时多么严格，谁记得这是他作的政治遗嘱，那么谁就不能不在这些问题的提法里看到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整个革命的命运的最深切的担忧（严肃的思想家和英明的战略家的担忧）。列宁决不是一位轻率的“假爱国主义者”，他严肃地估计到敌人的强大力量。他也公开地说我们的一些弱点，号召群众克服这些弱点。首先，他一再指出国民劳动极低的生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9、710页。——编者注

产率，他指出，帝国主义者无法消灭苏维埃国家，但是能够使它陷于贫困，使它难以发展，阻挠这种发展，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一半（“半完成任务”）。

必须承认，虽然我们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跃进，但是我们仍处在半封锁的形势下。至于“国民劳动极低的生产率”，则我们在这里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跃进，但是同西欧和美国相比，我们还是处在非常低的、半野蛮状态的发展阶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究竟怎样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呢？他非常慎重地作了回答。他说：巨大斗争的结局这个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预先考虑不到的“许许多多的情况”。但是我们的胜利归根到底基于巨大的群众力量。人类的基本群众（苏联、印度、中国等）决定着斗争的结局。但是，这种结局要以明确的策略为前提。

所以：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必须极其慎重地维护我国的工人政权，保持住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最小农中间的威信和对他们的领导。”^①

因此，当列宁提出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斗争中国内主要的保证是什么，要使无产阶级革命在反对西欧各国的反革命政府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所必需采取的基本策略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是在涉及工人政权同农民的关系的那些政策上极其慎重。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他清楚、准确、极简要地做了说明，这些说明愈是简短，就愈明确：

“为了自救，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9页。——编者注

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①。

初看起来，在西欧资本主义列强进攻时为了“自救”，这似乎有点儿不够。可是列宁同志接着从这些似乎是“贫乏”的指示当中全面地展示了一个由越来越具体的指示构成的极其丰富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一环扣着一环，于是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整个复杂的和活生生的实际情景就呈现出来了。列宁用最有分量的语言特别强调指出的那个思想似乎是贫乏的：对农民的领导，“极其慎重”，农民的信任，尽量缩减机关——这似乎很不够，这一切似乎太简单了。

但是简单往往有两种：一种“简单”，“它之为害，甚于盗窃”，还有一种天才的简单，这种简单是深刻洞察事物本质和深入精通这个事物的结果。在艺术创作方面，列甫·托尔斯泰有这种天才的简单。在政治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种天才的简单。

根据我已经说过的东西得出的结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军事冲突迟早是不可避免的，他断言，只要工人政权取得农民的信任，我国革命是能够胜利地摆脱这种军事冲突的。根据列宁的遗嘱，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整个革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当然又要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厉行节约为前提。为什么呢？列宁同志在这里揭示了这些口号的全部丰富内容，“厉行节约”的思想比初看起来要更深刻得多。

五 经济政策的基础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著名论文中，跟关于工农联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0—711页。——编者注

盟的指示和关于节约的指示一起阐述了两方面的计划。这就是工业化计划和居民的合作化计划。列宁同志在提出我们应当保持农民的信任,把我国社会关系中一切无用的东西铲除干净,尽量精简国家机关,逐步进行积累等问题以后,接着问道:“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了解我们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可能有这样一种非难,说似乎他在宣传“农民的狭隘观点”,说似乎他谈论农民谈得太多了,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②

那时我们就定能坚持下去,而且“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③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这里把列宁主义方针同任何其他方针区别开来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第一是,全部计划的基础就是工农联盟以及在这方面的“极其慎重”,这种慎重使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有“天壤”之别;第二是,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用什么来建设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用于国家工业化的越来越多的追加的资金的来源在哪里。这些来源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可以是花掉我们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原有的后备(不断增加的逆差),来源可以是冒通货膨胀和商品缺乏的危险而发行纸币,来源可以是过分加重农民的赋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工业化的健全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不巩固的;所有这一切可能有与农民发生决裂的危险。列宁同志指出了另一些来源。这些来源首先是尽量缩减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这笔开支在我们这里确实是巨大的)以及提高质量的指标,首先是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不发行纸币,不花光储备(黄金的、商品的、货币的储备),不过分加重农民的赋税,而从质量上提高全民劳动生产率,并且同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进行坚决斗争——这就是积累的主要来源。这是一个明确的指示,明确的政治路线;它的英明在于,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路线,根据这条路线,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积累等事业就会在经济方面和在社会阶级方面拥有真正的坚固的、健全的基础。工业化的方针,对关于积累来源问题的回答,关于工业化政策不仅不要同农民发生决裂,相反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指示,关于对工业化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个总的估计(列宁就大机器工业写道:“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①),——这就是列宁根据整个社会经济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所作的指示。

列宁在具体说明应当在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上使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小的以及最小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时,阐述了自己的“合作制计划”,即通过“合作社的流转”^②实行结合的计划。这种结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合作社呢?为什么提出合作社作为决定性的方法呢?弗·伊·非常慎重地说:因为这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向“新制度”^③过渡。那时候居民根据个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3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682页。——编者注

人的利益通过合作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问题(从经济和社会阶级的观点来看)当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出。可以这样提出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将建设社会主义,而农民则不会去建设任何社会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私有者),它在任何条件下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有任何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指出合作社是吸引农民的最简便易行的方式,然后接着说:

“要知道这一点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组织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项建设,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段阶梯。毫无疑问,我们虽然达到了这段阶梯,却绝少利用它。”^①

直到今天,后一种意见还是正确的。

列宁同志一般地是怎样评价合作社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在我国条件下,使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需要作的“仅有的”事情。

“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②

当我们现在在同农民的关系上遇到一系列新的困难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同时是非常英明的准则。我们必须用农民的利益吸引农民,不卖聪明,不要花样,我们需要找出对于农民最为简单的方法。为了实现合作社计划需要进行文化革命,因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3—684页。——编者注

为为了实现个个参加合作社，首先需要使合作社工作者文明地做买卖。列宁同志一字不差地这样写道：我们的合作社工作者“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为了善于做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①。

因此，要把下述原则作为基础：必须从对农民简便易行的方法出发把“我们的事业”同农民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以非常尖锐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他写道：新经济政策是“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在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②。列宁教导说，要用农民的切身利益吸引农民，而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合作社的流转，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为了使合作社通向社会主义，就需要有文明的合作社，为此就应当不按亚洲方式，而按欧洲方式做买卖。

六 基本阶级关系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从某种非阶级的经济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经济问题：他把任何重大的问题一方面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同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经济总是随着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的经常更动和错综复杂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保证，就是要关心最有利的阶级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关心“无产阶级”同“农民战争”在新形式下，这一次是在“建设的”形式下的结合。这就是主要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曾经一再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82页。——编者注

指出过的东西，它与拉萨尔传统相反，与一切考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等相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继续。严重的和困难的国际形势特别需要最巩固的工农联盟。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心论点，有一个写得非常精采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再提醒一下：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足以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①

我要提醒注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某些事情。大家知道，工人阶级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哪怕讲的是中农和贫农——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弗·伊里奇在这些文章里一般不提富农）。任何人都知道，只要存在着两个阶级，那么这两个阶级之间就有阶级差别，于是弗·伊里奇有这样一个提法：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不再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编者注

呢？如果持着平凡的、庸俗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如果不了解独特的、“苏维埃”的发展过程的全部真正的辩证法，那么无论怎样也不能了解这“回事”。现在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是不断地改造农民，“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它，不是跟它隔绝开来，而是同所有群众打成一片，以实现对它的领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完全是另一种相互关系。我们的红军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的，这是改造农民的最强大的文化机器，农民离开那里时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完全对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即它们之间出现的严重的阶级分歧，意味着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因为这种分歧可能使一个阶级改造另一个阶级的过程化为乌有。因此十分显而易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任何一个原则的。也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他的总指示：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

七 文化建设问题

总之，是工业化加上合作化。但是合作化要以文化革命为前提。这里列宁在提出文化革命口号的时候，决不局限于这个干巴巴的口号。他就在这里揭示了它的具体内容，他说明了，应该做什么，应该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面，这里的“环节”在什么地方。他的题为《日记摘录》的文章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当然，列宁也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①总的方针是明确的。我们没有作“主要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79页。——编者注

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人民教师提高到应有的地位。这是一个指示。列宁马上又接下去：他在研究了我国国家预算的情况以后说，如果你们想要进行文化革命，那么我给你们指示是，必须朝着有利于初级国民教育的方向重新安排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这就是说，列宁不仅仅是宣布了文化革命的口号，他还随即由此作了一些切实的指示，并且是范围非常广泛的指示。谁也不会说，这立即而且甚至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做到，但是这个指示是大胆的、革命的、非常正确的。你们考虑一下：把我们社会关系中的一切多余现象、一切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一切不需要的东西都铲除干净，使国家预算朝着有利于初级国民教育的方向改变，把我国的人民教师提高到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当然，这是一整套“革命”。这个革命可以实行，但是生活、习惯、偏见、官僚主义的守旧习气、模仿老爷派头等各种自发势力在抗拒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农村，除了正式预算和正式联系之外，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①。根据文化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建立群众性工人组织深入到农村去的思想，提出建立辅导团体的问题，指出先进工人应当把共产主义带到农村去。但是列宁同志马上对这个概念的内容作了解释，这又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这里有些人爱用说空话和敲锣打鼓代替实际行动。他阐明自己的思想是：

“不能……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

不能这样作。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②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79页。——编者注

这表现一个组织家的英明，因为他要组织的不是苏维埃职员中青年人中的一个支部，而是千百万人，他知道如何对待这千百万人。讨论农村与城市联系的形式问题（辅助等等）时，他坚持说：不要官僚主义地做这件事情，于是提出建立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同时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的口号。

所以列宁提出文化革命问题而且特别提出农村问题，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高度地评价这个工作。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我们面前摆着两个主要任务：（1）改造国家机关，（2）对农民进行文化工作。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在农民中进行的这种文化工作估计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任务。

这样，你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工作的多么广泛的计划，这个计划和列宁的其他许多论点，即关于合作社组织、关于国家工业化、关于同国际资本主义作斗争等等，多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多么“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

八 国家机关以及国家的和党的领导问题

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一个看法：国家机关的状况和领导的质量是文化革命极其重要的组成因素之一，是社会主义积累和吸引群众参加建设——每个小农都应当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杠杆之一。

这个问题是在《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里讲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本身就很值得重视：

“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

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要求“可靠”、“扎实”、“被理解”——这是十分简单的事——这一方针出发，来看待关于我们的国家机关的问题。

你们记得，关于机关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过一些怎样的前提：必须节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必须精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群众；必须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从吸引群众、节约、劳动生产率方面来看，国家机关问题同一切问题都有关系。一切问题——从经济问题到文化问题——都以国家机关问题为焦点而联系在一起。

这是显而易见的。归根到底，国家机关就是这样一种杠杆，就是这样一种机器，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战无不胜的领导者要通过它来实行自己的全部政策；归根到底，从远景来看，我们的国家机关是这样一种组织，往后它应当包括千百万人，包括全体劳动者，成为向公社国家过渡的一定阶段，可惜我们距离这种公社国家还很远很远。同志们，弗·伊里奇问道：如果国家机关问题是这个样子，那么用什么办法处理它呢？我们应当向哪里去寻求依靠呢？我们应当抓住怎样的杠杆？于是他作了出色的阐述。他说：我们应当依靠专政的最深刻的泉源；而这个最深刻的泉源是“先进的工人”。

所以，第一，我们要依靠先进工人；第二，要依靠我国“真正受过教育的”分子^②。必须关心把“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真正好的东西”^③，把“具有真正现代水平的人材，即不亚于西欧优秀模范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9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700页。——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人材”^①都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

必须从这方面着手来清洗国家机关。

“真正受过教育的”分子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他们决不相信空话；第二，决不说昧心话（正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在政治上是昧不得良心的）；第三，不怕承认任何困难；第四，不怕为达到自己庄严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人提出的要求。

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刷新国家机关，并且从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的工农检查院开始做起，列宁同志建议实行特殊的考验、“考试”（工农检查院预备录用人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挑选候补委员的考试）。这些考试应当考核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的结构和关于他们愿意工作的那个劳动部门的组织工作的理论知识。

把工农检查院变成储备合理化能量的头等的蓄电池之后，必须把它变成决定一切其他人民委员部、改造整个工作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杠杆。但是为什么列宁提出要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呢？这点与整个计划又怎样结合起来呢？同志们，只要研究弗·伊里奇的整个计划，这点就很简单明了。他的计划有两个主要的中心：第一，更好地工作，厉行节约，实现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质量指标；第二，建立正确的工农关系，注意别让这两个阶级通过我们党、通过我们党内的分裂而发生分裂。因此要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要组织这个合二为一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当负责两个最主要的任务，它由国家最优秀的人材组成。所以，这个组织草案是完全与从国际政策起的上述一切密切联系着的。最后，在这个计划里也提出了关于群众的相应的要求。弗·伊里奇把这些要求概括为一个非常简短的、但富有表现力的公式：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8页。——编者注

“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①。因为可以召集一群人，但这不是真正的群众；可以这样召集他们，似乎他们“参加”了，但他们并不确实参加。因此要提出“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公式。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把全部计划通盘考察一下，那么我们就看到，除了对我国革命的总的估计外，还对国际形势作了估计，根据这个国际形势提出了确立和巩固政权的问题，对工人阶级作了一个主要的指示，即要保持住对小农和最小农的控制权。由此提出了要在实现农民的合作化的条件下——即用最简便易行的而不需要任何暴力的方式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储蓄和提高工作质量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由此又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以及把机关改造成成为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能吸引群众的机关；从要关心正确的阶级关系引伸出要关心党的路线，关心我们党的统一。因此又制定了把两个机关合并为一的计划（工农检察院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机关一方面要负责管工作质量，把组织劳动方面的检查工作、实际工作和科学理论工作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负责管党的统一，并且通过党齐心协力地实现工农联盟。

全部计划是宏伟的，全部计划是为许多年而制定的。全部计划是从最广泛的远景出发的。全部计划是建立在列宁的基本原则的坚固基础上的。同时全部计划又是具体化了的，即作了许多真正实际的指示。

* * *

同志们，这里我打算不漏掉一个列宁的重要思想，但是自己绝对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只是发挥了某些议论，这些议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相应的文章中原来都有的。我力求把计划作为一个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3页。——编者注

整体,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政治遗嘱提出。十分清楚,在列宁逝世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重要历史时期内,在国际的阶级对比关系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方面,在我国的经济建设方面,在各阶级之间的对比关系方面(这里也包括富农日益活跃),在我们党内的变动方面等等客观发展条件都起了重大变化。大概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过去我们中间没有人期待我们能够例如在工业建设事业方面创造许多庞大的纪录数字。而实际上我们却创造了许多纪录数字,在我国工业的合理化方面,在采用科学促使经济繁荣方面,在直接的技术改组方面,在增加产品方面等等,我们都有许多成就,在经济上我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巩固起来了,虽然发展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更为尖锐。不过我们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就引起了现在我们谈论得很多的一系列的困难。近来我们党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这些任务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嘱中没有一字一句地写出来。

我们提出了集体农庄建设问题(这与合作制有关,而且是我们现在抓的重点),国营农场建设问题,技术改造任务,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是概括地提出过的问题和任务。我们的许多问题有些不同了。但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战略、我们的策略的基本轮廓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明地预先料到并且预先决定的。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现在经受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们去向无穷无尽的政治智慧的泉源之一,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嘱请教,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以最小心谨慎的态度去考察工农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因为工业化、粮食、商品缺乏、国防等问题,这全是关于工人和农民的问题。无怪乎我们党在最近将要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同志们,五年以前,在一个寂静的冬日,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

离开了我们。我们当中许多人很幸运地同这个人，同这位钢铁般的“老头子”——象我们曾经称呼的那样——，同领袖、革命家、学者一起工作过。

经过列宁逝世以后的五年，在他的遗嘱受到实际生活经验的严峻考验之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更勇猛、更顽强、更谙练实际情况地高举我们的红旗，前进再前进！

译自《真理报》1929年1月24日。

十月的纲领

(纪念我们党的纲领发表十周年)

今天是俄共(布)纲领,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政党制订的第一个纲领,而且是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下制订的第一个纲领的十周年纪念。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有它自己的漫长历史。它的起源要回溯到围绕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几个草案发生的几次理论战役。当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多次进行过精彩的理论决斗。普列汉诺夫的本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天赋的天才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别,那时还只刚露一点难以捉摸的苗头,而在列宁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已经能听出群众革命运动日益增强的呐喊声。但是,所有这一切,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订的党纲和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所谓“统一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只不过是十月纲领的“史前史”。这个纲领的“真正历史”是从1917年2月实现的历史大跃进开始的,当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并在资本主义俄国大厦整个建筑下面安放了一颗威力猛烈的地雷。

这里的出发点是列宁同志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即那个甚至使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这次革命的“精华”吓得目瞪口呆的提纲。现在,当苏维埃政权存在了十二年之久,当它的现实甚至“把辩证法

钉入”我们敌人最迟钝和最“神秘”的脑袋的时候，人们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感到难以思议了：在1917年的时候，那个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提纲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象是一个从革命的地下状态钻出来的野蛮的狂热分子，出于“绝望的生活”而扔出了一颗炸弹，发出一声轰然巨响一样，这个狂热分子的幻想就象一团迷雾，浮游在与我们的三维空间毫无共同之处的虚无缥缈之中。

不过，这一出——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幻想滑稽戏”（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为了评论列宁的提纲使用了女客厅雄辩家伊哥尔·谢韦里亚宁的这个词汇）是非常清醒地估计现实的各种社会力量、细心地钻研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透彻地理解“历史转折”（列宁）和出色地运用革命辩证法的产物。

被公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领袖的列宁，——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又是它的实践家——，在1914年侨居国外研究黑格尔著作时在自己的《逻辑学》摘要中写道：

“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

这前面，他在《大逻辑》的同一本摘要中写道：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对立面的一致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②

毫无疑问，列宁具有天赋英明睿智的灵活性。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列宁付出了顽强的科学劳动，做了大量的——如果可以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112页。——编者注

这样说——辩证法自学练习，才能非常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他既能卓越地“在理论上掌握”最伟大的“历史转折”，又能很敏感地预想到一大堆庸人和社会党“诡辩家”无法理解的历史的疯狂旋律，因为他们的“概念的灵活性”只是一种“适用于卑鄙勾当”的可耻灵活性。

格·瓦·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本本上的辩证法家，一位“聪明”人，很有学问，但极端保守。他在战争时期论证沙皇制度有反对德国帝国主义而实行“自卫”的“权利”，把革命的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权利与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愚蠢诡辩。二月以后，他又用类似的手法论证资产阶级有反对“暴力分子”（即布尔什维克）的“自卫权”。关于被《统一报》骂为“梦话”的四月提纲，他在一篇题目叫做《列宁的提纲和梦话有时为什么有趣》一文中写了下面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我……拿他（指列宁。——尼·布·）的提纲和上述伟大艺术家（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契诃夫和果戈里。——尼·布·）作品中精神失常的主人公的言论作了对比。我颇为欣赏它。我觉得这个提纲很象在阿夫克森齐·伊万诺维奇·波普利逊写自己的一页文稿时的那种环境中写出来的东西。这种环境的特点从下面的附注可以看出：

‘日期我不记得。也没有月份。鬼知道是什么日子。’^①

我们看到，列宁的提纲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完全脱离了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中写出来的。这就是说，《统一报》采访记者称列宁的话为‘梦话’，是非常正确的。”^②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对它的作者是多么厉害的讥笑！多么辛辣

① 见果戈里，《狂人日记》，《彼得堡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3页。
——编者注

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俄文版第1卷第21页。

的讽刺!

普列汉诺夫的议论是一种多么灰暗、迂腐和苍白无力的诡辩!其中没有一点正在发展的现实生活。与此相反,列宁感觉到和理解到已经开始的时代的一切伟大特征和一切具体的“生活的精英”。一切资产阶级国界都无法阻挡的这种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澜,无产阶级的这种突然显出的作用,俄国革命的这种最独特的国际环境,这一切难道不应当讲出新的——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新的——语言来吗?

列宁的提纲和苏维埃政权口号就是这种新的语言。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共产党的纲领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二

“事业伊始”。而革命的“事业”,它的疯狂的辩证法,是在激烈的事变进程中,是在历史画面极其迅速的变换中,是在各阶级多变的重新组合中,在日新月异的“形势”中不断发展的。理论思想勉强跟上了历史的这种跃进步伐。^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序言中谈到辩证法时写道: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式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

^① 纲领的形成情况如下:列宁的提纲:《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4月);他的《关于修改党纲的理论部分、政治部分和其他部分的草案》(4月);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修改党纲的材料》,附有列宁写的序言(1917年5月);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文集《关于修改党纲的材料》(米柳亭、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未能讨论党纲;以后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在《斯巴达克》杂志上);在此以后发表了列宁的批判文章《论修改党纲》(在《启蒙》杂志上,〔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1—158页〕);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散发了列宁所写的《党纲草案草稿》(以后的情况见本文)。

现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革命进展得这样快，列宁的革命辩证法在一切普列汉诺夫之流看来当然是“罪恶的诱惑和疯狂”，也就是“梦话”。但是，这种“梦话”实际上揭示了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列宁的提纲非常客观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同时彻底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粉碎了“保卫祖国”的思想，用联欢口号等这样一些口号突破了帝国主义的纪律防线。提纲非常“适合”时间和地点，尽管资产阶级政客大喊大叫百般加以诅咒。列宁的提纲根据无产阶级专政雏型，非常客观地预见到了公社国家新形式。同时，它摧毁了几乎一切“关于事物的旧观念”。提纲撕去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画皮，戳穿了它的阶级实质。它揭露了李沃夫、克伦斯基、米留可夫之流和所有的“社会主义”伙伴。另一方面，提纲用自己政权即劳动者政权的口号唤醒了群众，群众欢迎提纲的热情如火山爆发。它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相反，非常适合“局势”。列宁的提纲提出了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和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②的口号。因此，它发动了千百万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与渴望土地、工厂和政权的工农起来进行斗争。最后，它提出了建立革命国际，即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中派”^③的国际的口号。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适合“目前局势”，如果把这种局势正是理解为“目前”的话。因此，尽管1917年7月发生了剧烈的可变转折，尽管科尔尼洛夫妄想八月骑着白马进入革命中心城市，无产阶级却团结在“梦话”的周围，即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周围，轻而易举地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页。——编者注

③ 同上。——编者注

溃了敌人，拘捕了临时政府的所有总长，在斯莫尔尼宫宣告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

在这个时期起作用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成的”纲领。众所周知，它的要点是和平、土地、工人监督、苏维埃政权、国际革命方针和社会主义。没有成文的（即完成了的、正式通过的等等）纲领。当时又能在哪里去写它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是作者在秘密“休假”期间写成的，当时克伦斯基的暗探、士官生和特务都在追踪他。这部著作也是未来纲领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列宁曾在《第一版跋》中写道：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二分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①

大约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共同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作者），俄国马克思主义杰出的创始人，完成了自己的悲剧性的发展，他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同志们！毫无疑问，你们许多人对于使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垮台和使政权转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的许多事件感到高兴。

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件使我感到悲伤”。^②

事情水落石出了。《纲领》和《策略》经住了检验。千千万万的人用行动“进行了表决”。世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波普利逊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6页。——编者注

^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俄文版第2卷第244页。

之流”、“梦话”、“幻想滑稽戏”等这些范畴原形毕露了：“最低纲领主义空想家”装出一副“令人悲伤”的姿态，他们的“联合”梦话正好暴露自己是“阿夫克森齐·伊万诺维奇·波普利逊的九品官”^①梦话。历史将他们扔进了垃圾堆，继续走自己的路。

五

1917年四月会议以后，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布列斯特事件时期）上所做的尝试就其实质来说是讨论党纲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外部困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内在进行深入的斗争。党被各种矛盾分散了力量。在这里应当珍视我们党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沉着冷静的英雄集体：党在敌人的刀剑声中，一方面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一方面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解决和约问题，并且提出了讨论党纲的问题。

这里很清楚，列宁在理论上的领导彻底贯穿了辩证法的大无畏精神。列宁用惊人的才能阐明了发展的基本路线（“这个遭受巨大破坏、实行大规模军事强力和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错综复杂的情景（“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俄国发展的特点（“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和我们可能被“拉向后退”（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拒绝“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②

列宁在推动一切新的、一切还要争取的东西和“改造世界”的同时，抱着非常现实的态度，提出了必须保留旧的关于商品经济的

^① 见果戈里，《狂人日记》，《彼得堡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6页。

——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79、480、484页。

评述的问题，以便在纲领中保持适合于我国落后制度的限度。群众运动，群众国家，作为国家新类型的苏维埃，通过法律向社会主义和大农业生产过渡（“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土地社会化”）^①，通过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强制联合成为消费生产公社，普遍义务劳动制，等等，——这就是纲领总的特点，其中非常明确地突出了苏维埃的国际革命作用。

列宁的《草稿》是在刚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的纲领草案。当时还没有——而且，看来也不可能——探讨出经济政策的正确原理（尽管已为解决这一任务作了某些准备）。列宁当时已经在理论上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可能的过渡阶段。但是，它们的准确表述还未“找到”，只有群众的经验能够得出以后的解决办法。某些放马后炮的“聪明人”当然可能在这个草稿中发现不少“幼稚的东西”（每次交易必须在工人消费本上登记，家务由家庭大集体生活代替，有钱必须存入银行，如此等等）。但是，应当记住，即使伟大历史事件也必须用一定的历史尺度去估价。

无产阶级革命在布列斯特的“历史转折”中显然濒于灭亡的边缘，只是由于各种国际事件与党的正确政策相配合，才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出了最危险的歧途。需要真正巧妙的“概念灵活性”，需要深入探索历史的道路，需要非凡的思想勇气，才能从“胜利的革命进军”转向“耻辱的和约”，从英勇壮丽的共产主义火炬游行，转到同霍夫曼将军进行谈判，并签订屈辱性的和约条件。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没有结束研究党纲的工作。这个任务落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身上。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4月）以后，列宁立即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用十分明确、坚决、甚至是严峻的方式提出了最近时期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41页。——编者注

的许多问题。这本小册子和紧接在它后面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党的当前全部工作的纲领性的指示。这里充满着时代的无情辩证法：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需要进行组织和建设工作，整顿秩序，振作起来。

“试将‘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口号：随机应变、退却、等候、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比较一下吧。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以后，不觉义愤填膺，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主张与资产阶级专家妥协，与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赞成什么小资产阶级性、改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等等，这值得惊奇吗？”^①

党的方向盘已经转向，它转向了进行有纪律的劳动的方向。

四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23日)是在剧变的形势下召开的。国内战争极端激烈。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发动叛乱。阴谋与暴动四起。白色恐怖猖獗。饥荒抬头。为粮食斗争。成立贫农委员会。没收富农财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威廉君主制的灭亡。共产国际的成立。布列斯特和约的废除。苏维埃匈牙利共和国的建立(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曾互致贺电)。这是战斗极为紧张、农村工作异常复杂(那是同富农进行无情斗争的时期)的一年，无产阶级先锋队大动员的一年，实现国有化的一年，调整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一年，建立红军和肃反委员会的一年，成立最广泛的群众组织的一年，英勇斗争的一年。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7—528页。——编者注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年做了总结。俄共（布）党纲就是——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到现在仍是我们党的正式纲领。

现在来研究代表大会上就纲领的那些主要问题发生过争论，列宁同志怎样坚持自己对这些争论问题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点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许多紧迫的具体的时代要求是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掩盖下提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对正在出现的巨变异常敏感的统帅，按照伟大斗争的客观使命，出色地组织了党的“舆论”。他最怕粉饰现实，他在关于党纲的结束语中说道：

“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初步措施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①

他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论述纲领的各个问题的。他反对删去评述“旧”资本主义的话。他坚决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②。他坚决主张“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③在旁观者看来，这些争论可能是关于纲领结构的抽象争论，仅此而已。然而，列宁同志在谈到自己方针的实际政治基础时，却说得非常明确（这一点，当时——唉！——很多人都不理解）：

“引我们来（到社会主义革命。——尼·布·）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例如对中农态度的问题。”^④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5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774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776页。——编者注

第二个争论问题是民族问题。在这里正如在其他重大问题上一样，国际革命的历史，它的奇特的进程，殖民地的革命幼芽。——都有力地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在斯巴达克起义后向自己的论敌勇敢地地质问说：“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①他得出结论说：“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②

这些话从实质上说透了发生争论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看看列宁认为在自己的党纲报告中哪些具体问题非常重要，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③。列宁引用党纲草案的地方，那里谈到反对“镇压措施”，强调必须“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④向中农让步。他还说：“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⑤。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合作社问题（“消灭反革命阴谋”、使“机构”服从我们）；^⑥资产阶级专家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成共产主义”^⑦、“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⑧）；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普及选举权”的问题^⑨（“一旦我们提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779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782页。——编者注

④⑤ 同上。——编者注

⑥ 参看同上，第784页。——编者注

⑦ 同上，第784页。——编者注

⑧ 同上，第785页。——编者注

⑨ 参看同上，第789页。——编者注

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选举上的’不平等”^①）。

党纲决不限于阐述这些问题。它的内容当然要丰富得多。必须指出，许多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许多一般性原理——根据约定的分工——在本文作者的报告中作了说明。党纲的条文大都是列宁同志写的，其中包括某些真正是经典性的地方：例如，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作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评述就非常精彩。此外，还有党对农民各阶层的态度的提法也是如此。党纲的整个总则，也是如此，因为都是列宁重新写的。如此等等。

党的纲领是在艰苦奋斗的时刻，即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写的。它记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它的英雄主义和各种空想，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种种尝试，生产力的破坏，群众运动的高潮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党的纲领带有这个暴风骤雨般的英雄时代的烙印。这一点在党纲的经济部分特别明显：市场问题，货币流通，信贷，整个商品流转，其中包括城乡商品流转，在党纲中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客观原因是由于实行了封闭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堵塞的商品流转”制。当内战连绵不断，暴动四起，白匪进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把战火燃烧到光荣的苏维埃公社边境的时候，国防的利益摆在首要地位。俄共（布）党纲如同警钟一样响彻了全世界，它是胜利的消息，伟大的斗争旗帜，新的建设信号。

五

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存和巩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1页。——编者注

固而斗争的时期。问题的这个方面，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党纲中发挥得最出色。因此，俄共（布）党纲立刻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苏维埃思想”传到了地球上似乎最“安静的”每个角落，争取了愈来愈多的群众站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同时，它成了集结各种力量在共产国际周围强大杠杆。

内战结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出来了。军事需求退后。经济需求提上首要地位。“堵塞了商品流转”的集中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高涨的具体需求发生矛盾。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客观的必然性。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论粮食税》小册子奠定了“同农民保持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实现这种过渡时必然要重新组织队伍，改组整个经济机构，采用“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经济让步办法，然后是转入进攻的办法。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商品流转额增长的基础上从半瘫痪状态中活跃起来了。几乎所有停工的大工厂都已重新开工。四散的无产者开始在城里集合。种在荒地上的庄稼开始结穗，停开的机车开炉升火。“恢复时期”开始了。被凶恶的武装敌人打得七零八落而陷入破产深渊的国家，在很短时期内就恢复到了战前的基础。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担负起了新的重任——关心国家的伟大改造的事业。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个体经济合作化，新技术，新经济，新文化，新人——这一切都写在旗帜上，坚强的战士队伍高举着它去参加经济战斗。我们在这里还会遇到各种困难，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从群众的经验中，从政策的最好检验中学习。我们要认真考虑“过去”年代的成就，使这些教训系统化，加以概括。

党纲中的许多东西已经过时。与此相反，有许多东西我们还只刚刚研究。有许多新的东西已综合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了，还

有许多东西必须加以总结。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它的各个阶段，它的各个发展时期，这种发展的规律性，这条道路的危险与困难，通过新经济政策本身的发展到以后取消它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俄共（布）党纲应当联系实践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重新加以修改。共产国际的纲领应当成为它的每个“民族”支部纲领的总纲，后者，在这个共同的国际基础上又用具体的“民族”纲领加以补充。许多凶恶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象波特列索夫等人（见他在《社会》杂志第1期上的文章）把共产国际纲领说成是赞扬莫斯科“帮会”即新的莫斯科“统治者”阶层的文件。可怜的头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斗争报》上煞有介事地提了一个问题：为了拯救似乎正处在衰微中的、甚至濒于死亡边缘的俄国革命，“列宁怎么办”。社会民主党的这帮连话也说不清楚、专会诬蔑人的老家伙和年老的幼稚人将从事变的客观进程中得出自己的答案，列宁的纲领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纲领的胜利存在就是这种答案。

第一次发表于1929年。译自《真理报》

1929年3月23日。

技术经济革命,工人阶级 和工程师^①

各种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我们的革命正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正在以其江河奔腾之势给社会生活方式的一切方面带来一系列重大的质的变化。作为重大的转折,作为急剧的历史关头,它们在自己身上显示出一连串新而又新的细微变革,展现出强大革命过程的新而又新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发出自己的战斗呼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它就是这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译解出来”并翻译成具体语言的。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半至两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十月革命的基本目标——“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的经济”等等都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就会看到,群众性的创造发明活动,形式新颖,多种多样;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新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源源不断地出现。这些新任务的不断提出和不断解决就构成了对旧社会全部基础的根本性的革命改造。

其实,我们列举的只是最近一年半至两年时间出现的新事物:“五年计划”、“自我批评”、“社会主义竞赛”及其派生部分(合理化小组、技术小组、突击队、经验交流活动等等);“七小时工作日”、“连续生产制”、“合同制”、“大型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全

^① 本文根据在索科里尼奇区企业工程师和突击队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的速记记录整理。

盘集体化地区”等等。所有这一切多半都是第一次出现的新“术语”。但是这些新术语里包含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内容。这其中的每一个“术语”都反映着实际生活的变化，包含着整整一个努力和斗争的特殊世界，包括要最彻底地摧毁一切陈旧、古老、“永恒”和野蛮的基础；摧毁旧的技术，旧的经济成分和阶级关系，旧的根深蒂固的生活条件和传统，“祖辈的”因循守旧的旧习惯和旧风俗，即列宁所说的“最可怕的势力”。

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英勇斗争并正在创造这一社会主义的群众所使用的这些“新术语”，样样都很成功。“连续生产制”。难道它不是对一切牢固形成的关系的全面变革吗？难道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物质价值的巨大增长吗？这种增长任何人也没有预见到，并且任何人事前也没料想过。难道它对各工厂、各矿山的人员的重新配置是不应该的吗？难道它没有进一步地加速我们的发展吗？难道它不是对消除人们对世界的奴隶观念大有帮助吗？这种观念是在宗教及其祈祷和叩拜中巩固起来的，归根结底，它意味着对富人、对统治者和资本主义国土上的皇帝的依附。所有这一切加到一起，意味着缩短了五年计划的期限，进一步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大大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阵地，给了正四处逃散的资本主义队伍以新的打击，难道不是这样吗？

再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口号为例。机器拖拉机站。在革命辞典的无数词汇中似乎这是一个很小的单词。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小的单词”在这里却表现了人们相互关系的复杂的新的布局和农村经济中极不寻常的集体形式的发展。而农村经济至今仍是最顽固保守的经济成分。

机器拖拉机站（合作社的和国家的）——这个“新术语”意味着今天整个旧的农村关系已经开始变革，而明天将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因素。因为从技术、经济、阶级斗争以及整个加速走向共

产主义的观点看来，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进行彻底革命改造的最大的杠杆。

拿我们建立的大型国营农场为例。我们提出“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口号。当然，我们目前距离“赶上”它们还差得远，更不用说是“超过”了。但是就反映的新型关系来说，就我们能够做到和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敢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创造了创纪录的数字，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大型国营农场再大的农业生产类型了。

我们不打算去谈论我们时代的其他一些口号以及在我国生活条件下发生的一些与此相应的实际变化，因为这意味着要非常详细地说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实过程。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近几年来尽管有历史抛在其道路上的一系列巨大困难，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创造了这样多的新形式，揭开了其内部如此丰富的内容，取得了这样多的成果。要知道，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取得这么大的数字，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敌人的希望被打碎和破灭了，不是偶然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从大洋彼岸迁到我们这里，我们自己的拖拉机又摧毁了旧的犁杖，不是偶然的。大型工厂在我们的土地上开始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小农业主“加入了集体农庄”，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的老根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撬杠掘出来，不是偶然的。近几年来所有这些巨大的质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需要弄清内在的“原因的原因”，正是它促使了和正在促使这里所说的那些成就的实现。

当然，工人阶级通过同敌人的浴血奋战而取得的我们制度的革命特点，是取得成功的最广泛的条件（无产阶级专政、大工业和

土地国有化、计划经济、压缩非生产开支等等)。恢复时期和改造过程的初期所创造的先决条件(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的迅速提高,工人阶级的阵地及其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的巩固)是较为狭隘的,但却是绝对必要的历史条件。在这里党的正确的政策,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并在后来继续加快实行的及时的策略转变,以及对群众的积极领导,都是政治前提。这一前提在我国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但是,除了这一切以外,应该注意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根本不同的地位,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整个无产者,苏维埃经济制度下的体力劳动者之间所存在的最深刻的质的区别。正是我国的这种特点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这样惊人的效果。

诚然,连一些旧的资产阶级作家都认识到这也是人类的劳动。诚然,一位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有一句相当老的格言,意思是说,可以把一座繁华的城市统统毁掉,但是只要留下劳动力及其技能和创造的本领,那就可以在城市的废墟上建造起一座生机勃勃的花园。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跳得高过自己的耳朵。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剥削工人阶级;按照其本性它一定要对工人在经济上榨取,在政治上压迫,在文化上贬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只能执行主人的意志,执行另一阶级的意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使自己的雇佣奴隶保持仅能使其物质生活水平维持在最可怜程度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让工人阶级去接近实际权力的杠杆,不管是在整个社会里,还是在生产中,即在各个工厂里,统统拒之于千里之外。某些最机灵狡猾的托拉斯和辛迪加资本巨头有最完善的技术为后盾,并且在通过自己的财富搜刮机构的贪婪吸管吮吸着科学的液汁,他们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小恩小惠,兼用大量

恶毒而狡猾的办法把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工人贵族的上层分子拴在自己的马车上，但即使对于工人阶级中的这一层人，他们也要把他们分别单独圈在唾沫满地的马棚里，并通过不需任何脑力的纯粹执行命令式的零碎工作来束缚他们的精力、主动性、要求和创造意愿。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形式上改变先前社会制度的野蛮传统：奴隶制度及其对体力劳动的贵族式的蔑视态度，把工人等同为会劳动的牲畜、“会说话的工具”，强盗式的封建主制度，农奴主制度，在这里，半自由的，并因此而完全沦为农奴的“平民”做着自己的“粗”活，在凄凉的高原上开放出贵族文化的玫瑰花和被压抑的宗教思想。在不久前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手稿（《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中正以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予以愤怒的评述：“在一方……需求和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越来越讲究，而在另一方——需求越来越禽兽化，十分粗糙、抽象、简单……甚至对清洁的、自由的空气的需求也不再是工人的需求。人又重新迁到山洞里，但是山洞已被文明的瘟疫气息所毒化，他对待山洞，就象对待每天都可能从他那里溜走的别人的力量一样，感到自己没有信心，如果他不付清租金，他每天都可能被扔出洞口。工人必须为这些停尸间支付租金。被称为埃斯库罗斯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的普罗米修斯光明住宅（他通过这件礼物把野人变成为人），对于工人不再存在了。光亮、空气等等，最简单的、甚至动物所固有的清洁也不再是人的需求。污秽，即人的退化和腐败的这种征兆、文明的肮脏（这应当从直接意义上理解）成为他生活的组成部分……简化机器、简化劳动是为了使尚未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中的人，即使儿童变成为工人，就象一个工人成为失去父母的孤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3卷第655—656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

直到现在，这个评述也基本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整个

制度是雇佣奴隶制度，在这里，工人——这个剥削的对象——变成了机器的简单附件，在这里，朝气蓬勃的人变成了憔悴不堪的人，在这里，工人变成畸形发达的和受限制的“城市牲畜”，在这里，甚至“科学的经济管理”（泰罗制、应用心理学等等）也只是凶狠对待劳动力和进一步蹂躏工人人身的手段，缩小工人的利益范围，简化工人的生活职能；“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①

我们的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最原则性的区别就在于：“人手”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力量。工人阶级不再是剥削的对象；它——就其整体来说，通过其中的优秀人物——成为经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整个社会空气充满着对物质劳动最大的尊敬，而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则是物质劳动的体现者。任何技术上的新方法，经济的合理化，建立新的工作节奏和造就新型的工作人员的过程——这一切都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又都是受到这些利益的推动。工人阶级在我国已经挺起身来——并且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挺得更直——尤其在它开发、扩大、发展自己内在能量的全部财富的情况下。我们的根本指望也就在于此。

从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说，这绝不是温情主义的词句，这不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慈善即所谓对“苦难的小兄弟”的“爱”的表现。革命的无产阶级——不是供其他阶级的人玩弄悲伤慈善游戏的对象。我们的工人阶级——是专政者阶级、主人、组织者、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就是依靠这支真正的革命的社会先锋队的力量。

罗瑟福对原子裂变和原子内部能量释放问题的研究是很著名的。你们瞧，这个问题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能量的风暴被“制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编者注

了，被用于人类社会的需要。十分清楚，这种情况在我们生产的整个体系里，在我们的劳动、日常生活、文化的整个体系里将会引起真正超地质的变革。

现在看来在我们的社会“生产机体”中正在发生这类过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形象地说，在我们这里，巨大的能量释放过程已在进行，这种能量从前蕴藏在单个的工人身上，蕴藏在这些人的“分子”中，而这些分子的总和就是工人阶级。

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形象的比喻。假如把物理化学现象的规律性用到社会现象上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搞懂。因为懂得它们，这就是懂得它们特殊的质的独特性。此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规律性只能理解为历史特有的规律性；这里就是特殊的质。然而，正是当前历史时期的这种特殊的质使解放了的群众的创造得到了发展。

这种新的强大的劳动后备力的意外发现——它们曾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现在已迅猛地冲上历史舞台——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象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工人阶级的能量是沿着同一条渠道流动一样，如今这种能量又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物质水平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阶级布局的情况下，正在汹涌澎湃地沿着经济建设和反击顽抗之敌的渠道前进。

当我们讨论技术革命的问题时，无论如何绝不能忘记物和机器背后的人，归根结底，机器是由人创造的。马克思以天才的远见划分了社会科学需要考察的两大部分：人对物的改造和人对人的改造。难怪他写道，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也在改造自己的本性。这绝不是“夸夸其谈”，这也绝不是某种偶然的口头上的装腔作势、失言，或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空话。相反，这是一种最本质的，也许是过渡时期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特点的表述，这种表述对生产、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部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正是这种大量的、数以百万计的活的电池，活的创造能量的体现者发生作用，才使我们获得了惊人的成果。归根结底，正是这种情况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对阶级敌人决定性战斗的胜利，正是这种行动决定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阶段（国内战争、恢复时期、改造时期的开始阶段）。归根结底，正是这种情况将决定目前革命阶段的胜利结果。

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极其顽固地和声嘶力竭地扬言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试验”（“实验”）必定要遭到灭亡，因为据说资本主义制度创立了最基本的、最神圣的、最卓越的、最聪明的、最先进的东西——这就是竞争。消灭竞争就意味着给整个社会的发展扣上了黑暗而沉重的棺材盖。这就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士、保卫者、骑士和歌手们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

但是，在这种荒唐的言论里却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即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才需要资本主义竞争这样的机制。然而资产阶级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将会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经济刺激形式，新的动员人们的形式，这些形式更加完善和更加有效。这是在跨过国内战争的门槛之后出现的一种东西，它代替了资本主义竞争，代替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惶恐不安的“资本主义精神”、“竞争锋芒”。这就是一系列个人、班组、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行动起来，国内千百万群众都投入竞赛，这种竞赛同时也是一种大合作。资本主义的企业竞争，互相咬架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豺狼”，本性既是组织者又是强盗冒险家的资产者，被另一种“水的运动”形式——千百万人的运动所代替，在这里，个人、班组、车间、工厂、地区和各种其他形式的首创精神表现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建设意志。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私人进取心，以及其他的丰功伟绩和美妙之处。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丰功伟绩的意义和不顾‘人的天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列宁：《怎样组织竞赛？》，《真理报》1920年1月20日）^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它发展的胚胎形式直到最后阶段——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命令的简单执行者。这是由资本主义整个制度、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刺激，它对利润的追求，它对金钱、财富、势力的贪欲，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庞大的剥削群众的体系的起促进作用的“原则”。“海盗艺术的见习生”（这是意大利的城市法令对早期的商业资本家的称呼）；配备了商业强盗的海外考察队的英国“高尚的冒险家”；放高利贷的“吝啬的骑士”；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批吸血鬼，新教的伪君子、作坊和工厂的守财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92页。——编者注

奴和吝啬鬼；精打细算的“会计员”兼狂热的交易所经纪人；托拉斯和银行巨头，各大陆的占有者，“科学地”经营工业的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帝国主义的血腥游戏的所有各国的实际的君主们，——所有这些人都在通过残酷的斗争干着自己的事情，而工人阶级在这里则仅仅是劳动的“牲畜”、简单的工具、手段、“人手”。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完全相反，社会主义的竞赛依靠群众积极的、自觉的、创造性的行动。首先，分出、产生、组织了有首创精神的团体（突击队、技术小组、合理化小组、辅导小组、消灭废品小组、发明小组和几十个其他类似形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在不断发展，它们也带动了其他人，它们使生产会议接受自己的影响，它们成为工厂里的决定性力量，它们进行“领导”，工人全部基本群众都行动起来；创造出厂际之间的交往的新形式，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竞赛的新形式（交流经验、比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座谈会，经济政治合同等等）。列宁所英明预见和提出的群众运动产生并发展起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同社会主义竞赛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是赚钱，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为了社会公益，是为了直接（生产消费资料）或间接地（生产生产资料）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已被我国经济关系制度本身抛弃和铲除，因为这里所指的是社会主义部门。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竞赛形式多样化的情况下，绝不应该把那些为一定的物质利益（个人的、班组的、车间的、工厂的、“地区的”等等）奠定基础的形式挤掉。例如，奖金和奖赏制度就是这样。但是，即使在这种——在过渡时期完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那也绝谈不上发资本主义横财，这只能说是工人阶级本身为了使自己的经济队伍的共同进步而实行的奖励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竞赛产生了越来越大量的自愿、无私和英勇劳动和热心工作的模范，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残存在工人中的资本主义心理。因此大家都能以新的

态度来对待公物(原料、劳动工具),对待内部规章,对待劳动的质量和速度,对待总的经济任务同局部的经济任务(各种工厂的)的联系,对待所谓的“牺牲”问题。总之,在这里,工人阶级作为整个经济生活的领导者和指导者的自觉性在不断发展、提高和加强。

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就是“挤和压!”,就是一一些人死亡,另一些人飞黄腾达的原则,“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则,“人和人是狼”的原则。相反,社会主义竞争是一种合作、“互助”、无产阶级公有经济“事业”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的特殊形式。竞赛中的“优胜者”并不消灭自己的“对手”,因为他不是敌人。“优胜者”起着督促、教育、鼓舞的作用,作出榜样,进行引导。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则是敌人。在我们这里,竞赛的工作者的小组和整个经济组织——绝不是敌人,而是共同事业的合作者,他们不是互相残杀,而是互相帮助。资本主义竞争的最高(和最尖锐)形式是破坏性的战争。社会主义竞赛的最高形式是动员千百万人,大大加强竞赛的热烈程度,授予最高的“奖赏”——社会的表扬。资本主义竞争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再生产——而且是扩大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竞赛的扩大意味着加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系。

列宁以敏锐的目光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竞赛只是现在才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广泛开展起来,它将通过自己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在事实上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阵地越来越巩固;它不仅是一种有计划的、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而且它还是这样一种经济方式,它能够动员起千百万群众的毅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竞争高得多的经济活动的新的刺激因素和新的形式。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将取得更加巨大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问题的这一方面给予最严重的注意。在问题的这一方面不仅仅有政治因素,

不仅仅有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因素。在这一事物中还具有巨大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因素，因为我们的建设首先正是有赖于工人阶级毅力的发挥。

这种毅力的发挥，同样也带来我国经济的劳动力的改造，使这些劳动力有系统地学习新技能，发展工人的个性，不断开阔工人的眼界，同时使工人的技术素养，技术知识，技术经验得到提高。在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些地方，我们看到有使受着机器、传送带、泰罗制压迫的“精明工人”变愚钝的过程，在我国我们有——更确切地说，开始有——越来越主动的和懂技术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但没有陷入狭小的“事务主义”，而且把自己的积极上进的事业心同总的前途和改造时期的伟大改造计划的开展联系起来。当然，在这里我们会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是同根深蒂固的习惯，同日常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根源，同无产阶级广大中间阶层的落后性相联系的。来自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方面的帮助还很不够。还需要做巨大的教育工作。但是工作业已开始。造就新的工作人员的过程正在向前发展。

任何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时代都充满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这种思想表达了时代的客观的历史需要，它掌握着群众，因而成为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部分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重大的思想。帝国主义企图打起自己的野蛮旗帜。但是，它这块被战争撕碎了的、用骗人的和平主义的烂线织补起来的破布，已经迷惑不了任何人了。相反地，在我国，尽管还要做各种艰苦的工作，尽管还需作各种必要的努力，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思想已经掌握了千百万人，并在这千百万人的推动下前进。正在成长的新工人，或者现在常常说的工厂里的“生产者”，正沿着整个发展的基本方向一级一级地非常迅速地提高。这个过程开始进行得如此之快，以至技术领导落后于“对领导的要求”。新人才和突

击队员的技术教育和实际帮助问题，建立技术资料的问题，设置工厂实验室网、发明家制作室、设计家的工作室、半实验性工厂设备、实验工厂等等问题——成为当代的一系列最紧要的问题。这样，随着新技术和新经济兴起，一批新型的工作者正在不断出现，他们正在从根本上消除旧生活方式的残余。他们将把最新的雪亮的钢钉楔入这种方式的棺材。

不言而喻，在根本摧毁这些习惯的和陈旧的方式时，革命的汽锤将会把一些集团、阶级、阶层、个别人砸得粉碎。在它的打击下，私人资本主义集团不断灭亡，在它的打击下，野蛮抵抗的富农集团不断灭亡；它对有些阶层毫不留情，这些阶层直到现在还生活在幻想的影子王国里，留恋着“昔日的黄金时代”，“文明的”主人，警士，甚至相信卡尔德朗的格言“生活是梦”，因此他们企图同“那个世界”取得联系，而在边界的这一面就可以更多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捣乱。

无怪乎我们是生活在紧张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无怪乎近几年来我们甚至在那个称为技术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中，也发现了象恶毒的“暗害活动”这样的最重大的政治现象。它的影响范围之大远远超过了我们任何个人的预料。它的组织形式之复杂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曾想象到的。它的手段之阴险巧妙，任何人都未预见到。在无产阶级的劳动英雄主义和甘愿为实现宏伟建设纲领献出一切的热情光辉的照耀下，显出了它特别令人憎恶的原形。在反革命地下黑窝里蠕动着这群丑陋、凶恶、狠毒的侏儒，企图从四面八方布设俾氏导火线，来炸毁无产阶级巨人如此巨大努力的成果，如此巨大的工作成果！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的为时已晚的绝望反抗的企图是这样一种因素，工人专政对这种因素既不能绕道而行，也没有权利保持“中立”。它是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工人专政必须最无情

地砍杀。这里需要动用剑。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应当寻求所有技术知识分子基本群众的坚决支持。对于那些本身并不属于接受共产党号召的年青一代专家的技术知识分子来说，现在的问题比过去已有所不同。过去这个问题在于“奉公守法”、“严守中立”、忠于“职守”。现在，当国内阶级斗争出现非常尖锐的形式的时候，当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动员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当我们经受着一部分旧专家的又一次背叛行为的时候，问题显得更加绝对。现在这个问题是无条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忠实、真诚、友好地同工人阶级携起手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很清楚，在我国革命的新时期，即当革命用 40 马力的拖拉机重耕我国经济生活最荒芜的土地的时候，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新的专家问题，这些专家摆脱了保守传统，同无产阶级队伍有血肉联系，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以新的速度工作，善于利用一切国外经验，他们是勇敢的革新者，新技术的开拓者，对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满腔热忱。但是，如果说现在以更大的决心提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专家的问题，那么这绝不是说要抹杀那些过去留用的并准备在共同的队伍里和睦共事的干部的出色工作问题。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些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脱离了那些希望复辟资本主义的分子，并由于我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明确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了。

除了技术熟练程度之外，坚决断绝同一切希望复辟资本主义的分子的联系，并且最密切地联系工人阶级，应作为一块试金石，现在就应当用它来检验工程师、农艺师、广大科技人员的工作。要知道，既然工人阶级是我国建设的主要因素，那么十分清楚，正是应根据同工人阶级联系的程度（在具备必要的真才实学的条件下）衡量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

科学、技术和物质劳动在空间上大部分是被分开的，作为被分

开的总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们应当集合在一起，全部科学从任何一个纯应用的部门起，到“最高”一级的理论研究止，都应该为技术经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服务。

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是直接物质生产的时候工作的，他们象是整个科学技术思想链条上的引带，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农艺师、机器拖拉机站的专家，矿井或工厂实验室各种专业的工程师，他们都恰好处在连接点上，即把科学技术思想同物质生产紧密连接，把从实践中提升出来的理论重新变为物质劳动的实践。

我们看到，在现在革命的山口上，工人阶级的力量如同一股巨大的浪潮在奔腾向前。为了迎接它的到来，非常需要掀起一个相应的来自农艺师、技术员、工程师方面的科学技术思想浪潮，这一浪潮要使来自我们的厂矿和来自我们农村的洪流产生技术上的成果。在广泛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期，我们报刊上的宣传口号是要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上一世纪中叶革命风暴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同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在共产党铁一般的普遍的领导的条件下，宣传口号则是要把技术科学同工人为了掌握新技术而开展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同时也是今后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左拉笔下的主人公之一萨克卡尔说，“金钱通过科学造成了进步”。现在的问题是要使今后的“进步”“造成”人类最深刻的智慧所向往的科学与劳动之间的伟大联盟。技术干部应当尽一切办法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系统。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组织，我们的科学研究所都应当参加这个系统。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技术员及工程师中的某些成员竟把这件事看作是时髦的喧闹，一时的狂热，不够严肃的举动，布尔什维克的又一次“臆造”。这是眼光极端短浅，极端近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是极其有害的。必须尽

快地结束这种现象，并且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经济斗争最密集的地方。

我们最积极的和对新事物非常敏感的青年工人，加上最有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干部作出了非常好的劳动英雄主义的榜样。例如，自愿降低计件单价，热情带头认购工业化公债，异乎寻常地提高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加快整个工作的速度，这些事迹的意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为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难道这不值得高度重视和支持吗？象工程技术人员这类熟练技术力量是无权落在后面、无权袖手旁观的，不应该从庸人的舒适的“中庸”那里寻求什么安身之所，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技术人员的岗位是在技术冲锋的前沿链条上，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其内部的结构方面是不相同的。在工程师当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的阶层，同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各式各样的阶层。不应当向落后的、“中间的”看齐。应当向先锋队看齐。在我国，在社会主义竞赛的前沿阵地和在突击队里工作的常常是一些年青的、精力充沛的工人。这些青年工人就象突击纵队、新的劳动营队那样参加战斗。但是，这些青年工人应该懂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老头子”。先进工人之所以是“先进的”，是因为他们是各种新事物的首创者，是同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作斗争的战士。然而，他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同其他人的联系。年青的党员工程师往往是站在火线上的。但是他应当把吸收其他工程师参加火热的建设工作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先锋队的这种双重任务——向前进和善于带领别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忽略。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把各个生产单位的一切忠于事业的工作人员组织在一起。

我们一方面要击溃敢于反抗的敌人、无情地镇压其每一次袭

击，一方面应该从旧时代，从旧秩序，甚至从我国革命过去的时期转上新的轨道。与此同时，必须在党——主要的领导力量——的领导下，通过先进工人，依靠工人突击队，把所有的工人群众都带动起来，并把工程师阶层吸收到斗争中来，这些人不追求形式，不怕冒“技术风险”，不怕负责任，有决心坚决和彻底地组织一切力量，向我国的贫困、技术上的落后、保守和墨守成规进攻；向官僚主义、小资产阶级工作方式的残余、技术人员的机械和保守进攻；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及其走狗进攻。

技术风险的问题使很多技术人员感到苦恼。一个工程师要想不成为毫无头脑的压模机，不成为对一切都厌倦得要死的老保守，不成为把一切都弄得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废物，不成为没有一点新鲜思想的饭桶，不成为迂腐不堪的旧官吏，而成为有创造力的人，靠什么做保证呢？能够在事实上使他敢于冒技术风险的保证是什么呢？最有效的保证——这就是同工人的关系要适当。如果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使工人们感到他是“自己人”；如果他工作得使工人象喜欢一个好同志和助手一样喜欢他，如果工程师真正同工人们“结了亲”，那他就会永远受到工人人们的保护。

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一个技术员，每一个农艺师，每一个工程师的任务就是加强同群众最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加强对先进工人和跟随他们前进的无产者阶层在技术上的帮助、建议、指导，支持他们任何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改进，并积极予以协助。

现在需要的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不是只习惯于沿着已踏出来的小路行走的人，不是那种只会唯唯诺诺的人。现在需要的人要能与时间齐头并进，要能抓住来自群众深处的新事物，不甘落后和能对历史车轮的每一个必要的转折作出创造性的反应。

确实如此。我们正在建设大型国营农场，其规模甚至超过所有著名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经过一些时间以后，这些大型

农场将发展得更大，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面积将扩大好几倍，在我们面前将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新型的更大功率的农业机器问题，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实现电气化计划需要有新的技术操作方法，新的规模和措施，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和第聂伯河水电站建筑工程——这仅仅是开始。这仅仅是新的技术之春的“第一批燕子”。马克思不止一次地确认，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有“自己的”相应的技术。这似乎为下列情况所驳倒，即现时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服务的，或者是旧的技术遗产，或者是进口的“资本主义的”技术，或者是按照以前的式样造出来的新的“自己的”劳动工具。进口的机器加入社会主义系统以后，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物本身是“中性的”；同样的一门大炮，当它从白匪手里转到红军手里之后，就开始起着完全相反的社会作用。如果不是着眼于短的时间间隔，不是着眼于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深刻思想的全部真理性。我国生产单位的巨大规模必定引起新的需要，即需要新的、功率更大和效率更高的即有质的不同的机器，需要发展和合并扩大技术综合体，需要增设规模越来越大的技术设施，需要建造联合型的电站，而这些电站的作用范围并不会遇到私有制、专利法、大的（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小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私人利益”的矛盾造成的障碍。日益提高的经济的计划性，联合企业原则的必然的发展，工业同集体农业的新关系（和新结合），更适宜的工业地理布局，未来的新型城市，新城市的新规划，——所有这一切现在和将来都不可避免地会同各种劳动工具及其技术综合体的质的改变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将产生出自己的技术，这种技术反过来又将推动社会主义进一步的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在已能依靠技术变革，并以空前提高群众的福利为己任。

马克思在前面已提到的那篇著作中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时写道：“这种关于奇异工业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既是禁欲主义的，又是高利贷的吝啬鬼，既是禁欲主义的，又是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银行的工人，它甚至为了这种自己最喜爱的理想，找到了它所需要的奴隶艺术……它的主要信条，就是自我节制，拒绝生活和拒绝一切人类需要。你吃、喝、买书越少，你到剧院、舞会、咖啡馆去得越少，你思维、喜好、钻研理论、唱歌、绘画、钓鱼等等越少，你的储蓄就越多……因此，一切贪欲和任何活动都应当溶化在自私自利之中。工人需要拥有，只是为了他希望生活，而他应当希望能生活，则只是为了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3卷第657页）

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减少工人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宗旨则是全力发展这些需要。资本主义需要“禁欲主义的奴隶”。社会主义希望极大地发展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人类的需要，扩大和丰富生活。资本主义只满足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需要。社会主义则必须满足几亿人的需要（而且在不断地扩大）。然而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给自己提出了这样巨大的任务，我们的国家才腹背受敌，还处在落后和半行乞状态，应当首先进行非常宏伟的建设。为了满足需要，我们在建设各种工厂。为了日后的群众福利，现在工人阶级正在把每一个多余的（和不多余的）戈比献给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动机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不是资产阶级的“为生产而生产”。工人阶级懂得，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以重大的牺牲和英勇劳动的代价来换取群众福利的大发展。业已开始的技术变革也应当为这一事业服务。

我们一一列举了“五年计划”和“自我批评”，“大型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七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一句话，这是一份完整的革命成果清单。必须做到，再用几年的时间，广大从事技术思想设计和实践的工作人员队伍能够同工人们一起，或在不离开工人的条件下，拿出一份我们的出色技术成绩单。我们应当向这方面努力，我们也必须做到这一点。

当前技术革命的整个过程正处在非常鲜明和非常激烈的形式的阶级斗争当中。在我国内部及其小资产阶级上层，还有很多无产阶级变革的敌人。存在着某种反革命危险，其阶级表现就是富农阶级垂死和凶恶的反抗，必须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摧毁这种反抗。

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不击溃富农阶级，建设全盘集体化地区和大型国营农场是不可能的。不击溃敌人在各个阵地的阶级反抗，要建立技术、经济、科学思想的新形式是不可能的。对破坏行为不给予最无情地回击，不积极地同那些对这场斗争“麻木不仁”的分子进行斗争，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伟大厦。不同保守和落后现象，不同动摇和对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和最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进行斗争，就不可能胜利地进行建设。

正因为如此，在谈论技术和经济、工程师和工人阶级的时候，必须号召所有的同志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论如何是要胜利的，斗争的结果，是在我们的过渡时期经过一阵痉挛之后，重新获得胜利的、强大的、新的共产主义的技术，严整的和有组织的经济，在这里，将没有任何资本主义的贪婪，没有任何小市民的卑贱，没有任何可怜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没有任何一切前文明社会的怪诞现象。

* * *

笔者过去对保证在当前历史转折时期尽快达到我们所必须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道路有过错误的看法。党在这些争论中是正确的。党和党中央对我在一些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列宁的政治遗嘱》和在中央委员会最近几次全会上的发言(文件和发言)中所表述的很多观点所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党中央及时地和非常果断地提出了从根本上打破农村旧的经济形式的问题，它是正确的。这一政策的实行同毫不妥协地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主义的斗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党的整个路线及其具体表现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这一检验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每一个人都必须同全党在一起共同前进，在各自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微薄劳动献给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而这一事业也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次发表于1929年。译自《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